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维普网全文收录期刊

东方论坛

EASTERN FORUM

1988 年创刊　双月刊
2022 年第 5 期
（总第 177 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胡金焱

委　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卞建华　池田大作（日本）　窦秀艳　何云峰
侯传文　胡金焱　姜异新　姜振昌　刘东方
刘京希　刘喜华　刘跃进　吕周聚　马斗成
孟天运　孙百才　谭好哲　王绍波　王兆胜
王子今　吴义勤　钟永光　周　潇

主　编： 孙继国

副主编： 冯济平　侯德彤

1988 年创刊

2022

东南学术

5

双月刊

总第 177 期

□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及相互关系

张会龙　刘慧媛 · 1 ·

“坚持人民至上”的逻辑原点、价值支点及实践落点　邵彦敏　赵业程 · 9 ·

□ 艺术研究

丝绸之路艺术史纲（下）　程金城 · 17 ·

□ 文学研究

钟表秩序、文明转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耿传明 · 35 ·

对新文学传统的回应与超越

——论林徽因的小说　王　宇 · 49 ·

期刊基本参数： CN37-1216/C * 1988 * b * A4 * 156 * zh * P * ¥10.00 * 1200 * 14 * 2022-09

“原始强力”：生命战斗的方式

——重读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齐晓鸽 · 61 ·

东汉末年墓碑文文学成就探析 孙立涛 · 72 ·

□ 金融科技专题

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机理与建议 尹振涛 陈冠华 · 82 ·

金融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堵点”及路径选择

夏诗园 王 刚 马少君 · 92 ·

□ 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

组织与转型：集体化时代乡村经济组织及经济生活变迁研究

——基于晋南卓村村庄基层档案的考察 薛剑文 · 104 ·

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仇小敏 钟素文 · 118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失衡及影响因素研究 王梅欣 · 127 ·

□ 文化研究

重新解读“民间”：民俗学研究对象再思考 徐赣丽 刘 言 · 138 ·

反思费斯克：如何理解大众文化的抵抗诗学 李桂全 · 148 ·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未授权任何机构受理稿件。

THE EASTERN FORUM

The Contents of the 5th Issue for 2022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oretical Origin and Correlation ..... Zhang Huilong Liu Huiyuan (1)

Logical Origin, Value Fulcrum and Practical Landing Point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 Shao Yanmin Zhao Yecheng (9)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Silk Road Art (Part II) ..... Cheng Jincheng (17)

Clock Order,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ty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 Geng Chuanming (35)

Response to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New Literary Tradition - On Lin Huiyin's Novels ..... Wang Yu (49)

"Primitive Power" in the Way of Life Fighting - Rereading Lu Ling's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Rich Lord* ..... Qi Xiaoge (61)

Study on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of Epitaphs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 Sun Litao (72)

Mechanisms and Suggestions for Fintech Joining in Building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 Yin Zhentao Chen Guanhua (82)

Internal Mechanism, "Blocking Point" and Path Selec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 Xia Shiyuan Wang Gang Ma Shaojun (92)

Orga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tudy on Rural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Life Change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Er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Village Grassroots Archives in Zhuo Village, South Shanxi Province ..... Xue Jianwen (104)

The Logic of Constructing the Urban-rural Community ..... Qiu Xiaomin Zhong Suwen (118)

Study on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Community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 Wang Meixin (127)

Reinterpreting "Folk": Rethinking the Research Object of Folklore ..... Xu Ganli Liu Yan (138)

Rethinking Fiske: How to Understand the Poetics of Resistance against Popular Culture ..... Li Guiquan (148)

英文翻译：岳玉庆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及相互关系

张会龙[1]　刘慧媛[2]

1.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2. 云南大学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后文简称“两个共同体”)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执政精神的基础上，为解决民族治理和全球治理问题而提出的带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治理理念。“两个共同体”是中国智慧与世界思维、经验基础与理论升华、相互依存与双向互动的内在关系；“两个共同体”的构建和铸牢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梦与世界梦共筑等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价值意蕴。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D633；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5-0001-08

一、学术史回顾

基于研究论题和内容构架的设计，本文主要聚焦在“两个共同体”的理论渊源、相互关系和价值意义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并进行综述分析，以展现其对本文研究思路的贡献启发和该论题研究的必要性。关于“两个共同体”的理论渊源，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有关和平的思想理念等方面进行挖掘分析，徐艳玲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核心论述在当代的再现”；[①] 马俊毅从“两个共同体”在价值理念上的相通性出发，阐述两者的相通性体现在“它们都包涵着中华传统文化及中国治理理念中所蕴含的共同体精神”。[②]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思考“两个共同体”的出处，如张立文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美好的社会状态是古代中国推崇的“大同世界、天下和平”等思想的当代体现和传承。关于“两个共同体”相互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很少有深入到对于两者之间关系或者契合逻辑的研究成果，直至近两年来，国内有关学者开始关注到“两个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进而为该领域的研究创造了空间。现有研究从多种角度探讨了两者的内在关系：在讨论分析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实践方式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项目(20VMZ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会龙，男，河北安平人，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慧媛，女，湖南耒阳人，云南大学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① 徐艳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全球化困境下的理论突围》，《人民论坛》2017年第28期。

② 马俊毅：《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11期。

郝时远曾指出:“中国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是一致的”。[①] 此外,乌小花也曾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作为先行条件,两者之间的交往交流是其常态。”[②] 在“两个共同体”内在关系可能性分析上,现有研究的一般性结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基础与理论初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域升华与最终目标;“两个共同体”是一脉相承的理念,是不同视域下价值目标统一的理念。关于“两个共同体”的价值意义方面的研究,部分学者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域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意义——在国内视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巩固民族团结基础、发展新型民族关系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三个方面;在国际视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提供保障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世界民族关系的启发等方面。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视角决定了其价值意义的发挥主要在世界视域上得以展现,张希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启迪的高度决定了其核心目标是推进全人类共同的繁荣发展。”[③] 张岂之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过程中发挥的隐性功能可以衍生至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和维护多元的世界文化两个方面。”[④] 还有部分学者从人类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出发,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目前变化多端的国际格局重新审视之后所提出的国家发展对策,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方面的成功经验通过该路径传播至世界各国。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该论题相关方向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国内外关于“两个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差异较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受国家领导人在多场合、多频次地提及并阐述中国特色的“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两个共同体”的议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方向,研究成果多聚集在关于两者的内涵、价值和实践等诸类议题。然而,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种族问题、民族共同体、民族主义等议题上;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多停留在其在全球治理上发挥的作用、效益及认可度上,而缺乏对其本身理论依据和内涵界定的研究。第二,现有研究成果中,将“两个共同体”结合进行对比研究的议题较为空缺。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分别对两者进行讨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成为了民族学、民族问题等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多聚焦在政治学、外交学、国际关系等学科领域,现有研究的空缺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创造了一定空间。第三,少量研究“两个共同体”内在关系、逻辑契合的成果,对于两者相互关系的阐述与总结依然模糊,缺乏明晰观点的提出。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共同体理论是“两个共同体”的学理支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理论是“两个共同体”出场的思想源泉和学理支撑。马克思共同体理论曾阐述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共同体形态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演变的过程,在演变

① 郝时远:《改革开放四十年民族事务的实践与讨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② 乌小花、艾易斯:《“一带一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理念、价值与实现路径》,《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③ 张希中:《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维度、内涵及价值意蕴探析》,《行政与法》2016年第2期。

④ 张岂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的过程中复杂、高级的共同体形式往往是在社会生产力、物质生活水平、精神文化认同不断提高的时候出现，并且可以反映出对相对低一级共同体形态的缺漏与不足，是对其进行革新、重构、批判之后的结果。即通过批判“虚幻共同体”形式中体现出的将少数人的群体利益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这一形式的疏漏[①]，重塑后提出社会共同体的最终形态和终极目标为“真正的共同体”——“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的历史”[②]，即通过建立最高级的社会共同体形态来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更为具体地是实现每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和个体的自由得以实现，这样的形态被认为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最高境界。以此为指引可以总结得出：“两个共同体”的提出不仅是在当代重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核心逻辑和意旨，而且是将马克思共同体理论融入到实践过程中并给予其无限的创新空间。从“两个共同体”的价值目标我们可以清晰地分析出：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短期目标为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事业，但其最终的目标则是建构“真正的共同体”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和铸牢可以被认为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和标志。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在中国的有效实践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在世界视域中的创新与突破，同时，两者的铸牢与构建也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形态永进赓续的保障。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共同体”的精神根基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需要建立在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因而“两个共同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精神根基和价值向导。何谓“中华民族共同体”？它是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基础和文化积淀的共同体形式，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形态构建的过程中，促使民族平等、民族认同等全方面民族问题得以协商解决，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帮助、共商共建，使得团结一心、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得以铸牢。可见，这一共同体的形式和内涵跨越王朝国家的历史边界，具有多阶段、长时期的历史性特征，并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具体表现，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逻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努力挖掘中华文化与时代发展潮流的共频之处，将中国特色的治理经验和理念贡献给世界各国以顺应全球治理之需，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联合国大会第 70 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作为重要理论根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随后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③] 强调指出，不同于西方国家推崇的霸权主义、零和博弈等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评估当代国内外形势之后，接受整体主义，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最终共享文明成果所遵循的新路径、新理念。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考虑到对本国发展的益处和私利，并且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基本责任与使命，其核心是全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3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68 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5 页。

“两个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华民族内求和谐、外求和平理念”的传承与升华[①],其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天下为公”“和合观念”的追求一脉相承。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同心圆理论”是“两个共同体”的时代阐释

中国共产党“同心圆理论”是以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指导、以时代阐释为基础的理论重构,是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与“两个共同体”建设紧密结合、层层落实的研究范式。同心圆模型具体呈现为中国共产党是同心圆的核心,同心圆内圈是致力于中华民族团结,聚焦于中国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现;同心圆外环是致力于全球共同发展,聚焦于世界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②]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包括世界各国、各党派、各族人民和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形成坚实稳固的统一战线,为“两个共同体”的构筑输入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动力,以追求实现全人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两个共同体”的提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格局升华,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的概括,也是对现实发展时代的诠释。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互关系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思维

在中国人民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由梁启超先生提出,并广泛被时人所接纳、使用。长期以来,与西方传统的“一国一族”之思想不同,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与理论实践始终放在“坚持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时期的交流、发展、团结的过程中,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首先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是理论逻辑(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与现实逻辑(中国现实民族问题)相结合的产物,这一重要思想既深化丰富了我国新时期有关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相关理论,又为建构和谐美好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和基础。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稳固,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国家治理与民族治理面临着更为长期而艰巨的挑战,重点从“如何协调各民族间的关系与发展”逐渐转向了“怎样凝聚各族人民并增强对党、中华民族以及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认同”。因此,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中国特色的民族治理问题,提出并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③]这是深化理解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实践而产生的伟大创新,旨在为解决我国多样化的民族问题,并开辟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民族团结、民族建设道路。由此可见,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铸牢,这一成功路径的演变无一不体现了其中所蕴

① 俞祖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观念及当代价值——兼谈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第九届寒山寺文化论坛论文集》,第21—2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62页。

③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0日,第1版。

含的中国特色治理理念之精髓，处处都是“中国智慧”的独具匠心之用。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有深厚自洽的理论思想作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铸牢有扎实有力的成果作印证，这无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贡献了智慧源泉。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不同于其他共同体模式，它承载着中国人民对和谐世界建设的理想追求，兼顾并关切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是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而不是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其目的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民族主义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也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既需要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又依照人类实践活动规律，是集物质和精神文明生产于一体的统筹布局。其逻辑起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社会再生产一般原理，[①] 这既深化了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断，又从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的发展实践出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正是在准确把握世界形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共同体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无疑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提供了“世界思维”。

（二）“两个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协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升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致力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经验分析基础和参照样本；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新认识、再创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升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核心意旨为超越国家治理边界与局限，在全球进步、全球发展的维度上进一步对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两者关系予以重审评估，以争取实现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协调共进与双赢。2020年至今，全球共抗新冠肺炎疫情局面的出现，不仅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前瞻性，而且是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危机应对能力的又一重大考验，因此，如何有效协调国内外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不可忽视的课题。

面对新冠疫情，中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政府与人民上下一心、共克时艰，具体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始终牢记人民安全高于一切”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断，“封闭排查”“方舱医院四早模式”等中国特色经验成为了围剿病毒的强大合力，被全国各地严格遵守和执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社区工作者到解放军指挥部，从医疗志愿者到医疗专家团队，坚守在第一线人民群众形成了狙击新冠病毒的有力防线，国内各大企业和爱心人士无偿捐赠为疫情防控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这一系列举措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行动，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追求团结统一的内部动力，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了宝贵经验。

①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68页。

面对新冠疫情,世界各国人民风雨同舟,中国承担全球治理重任以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不仅是对世界各国的应急管理效率和治理方案储备的一次全面检验,而且深刻影响着全球治理方式的改革和治理秩序的重构。中国在保证短时间内遏制国内疫情传播势头的基础上,为世界人民防疫抗疫提供了最宝贵的援助,"向百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出30余支医疗专家组和300批抗疫援助,向2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并多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几千万美金的资金援助。"① 由此可见,中国将国家治理的重要成果、制度优势转化为了参与全球疫情抗击事业的强大动力和效能,成为了推动凝聚起全球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两个共同体"从不同维度和不同视角来分别优化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中国智慧、经验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表达、理论升华,协调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以推动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是二者的共同价值目标。

(三)"两个共同体"是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实践方略的双向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从2019年开始多次提及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② 因此,从国内视域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型民族关系和中国梦得以实现的理论逻辑,并成为了指导新型民族问题解决和推动民族工作开展的基本原则;从世界视域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论的建构到实践的过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完整的思想文化根基,也为推进其实践探索创建了依据和样板。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与铸牢是中国梦实现路径中的必需模块,同理,在世界梦这一理想蓝图的实现路径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不可或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命题"起源于中国,实践于世界",它是选择站在世界各国利益交汇点上,在保持本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上兼顾世界各国的需求和合理诉求,倡导共享、互惠、共赢,在国际道义发生争执冲突时主动维护国际公道与发挥人道主义情怀;积极推进大国特色外交,不仅在发生国际或地缘政治冲突时为弱小国家主持公道,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方面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依托多元化的政策和脚踏实地的行动来实施的,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即为一项重点工程,中国出台的这一系列相关举措,是将中国梦实现道路上的成果和种子播撒到沿线国家,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资源,双向促进,共同推进世界梦的构筑。这一系列实践与行动的支撑点是以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的"中国价值",以及成为世界和平的引领军、国际主义的维护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的"中国政治愿景"。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实现中国梦是齐头并进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全球视角的指引。中国梦的成功实现,也可完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同时,中国梦和世界梦实现都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向互动、双向指引、协调发展。

①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8日,第1版。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一）“两个共同体”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中国贡献”

面对如今随处充斥着逆全球化、强权政治、恐怖主义、贸易战等复杂的国际环境，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无疑被称作是促进和平与发展的“灵丹妙药”，而“两个共同体”在思想内涵上正好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坚定的践行者与实践者，所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当代中国实践融合的重要体现。“两个共同体”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彰显着它的核心要求，并实践运用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取向和分析方法，从这一层面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当代指引。“两个共同体”的发展与构筑赋予了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新时代内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为21世纪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中国贡献”。

（二）“两个共同体”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新方向供给了“中国智慧”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初衷是为中国民族治理发展过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探索，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人类社会的宏观发展规律的整体把握后所提出的创新理论。两者的提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今日之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新思路，而且为预判和重构国家及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新的方向。它们既充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对推动世界历史进步有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习近平“两个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实施是站在全球公道和人道关怀的制高点上，以“五位一体”的深刻意旨为核心力求在国内外两个大局中做到统筹规划，并且将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紧密结合，将国家特色治理之道与世界和平共享发展紧密相连，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应对国内外和平发展、协调共进等方面的方案构想。同时，“两个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话语体系的重要成分，世界民族之林格局中的中国话语逐渐雄厚，在此平台上中国魅力、中国特色不断被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接受并试用，让“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不断为人类社会的新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以造福于人类社会。

（三）“两个共同体”为共筑中国梦与世界梦提供了“中国方案”

彼得·费迪南德曾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是中国梦，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中国梦与世界梦搭建起了关键的沟通桥梁。”[①] 无论是在全球新冠疫情斗争中中国展现的大国思维和人道情怀，还是面对当今频繁的地缘政治冷战、热战，中国承担的世界和平的引领者角色，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机遇是日益走向复兴的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充分证明了世界的繁荣无法离开中国的助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执政理念决定了中国梦不是独立于世界的、局限狭隘的民族梦，它还承担着引领世界发展、造福人类社会的重任，因此，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国际大环境作为保障，它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世界梦紧密相连。由此可见，“两个共同体”

① Peter Ferdinand,"Westward Ho—the China Dream and 'One Belt,One Roa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6.

是促进中国梦与世界梦实现的重要力量,是中国梦同世界梦相连的重要纽带,是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为世界梦的实现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路径。

五、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国内国际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未来趋势,以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理论基点,紧随中国共产党的“同心圆理论”意旨,创造性地提出“两个共同体”的科学构想,不断丰富和创新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解决当今复杂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互通共赢”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因而,我们要多层次深入挖掘“两个共同体”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从“两个共同体”出场顺序和提出背景看,“两个共同体”是中国智慧与世界思维的关系;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实践经验看,“两个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协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升华”的关系;从“两个共同体”最终归宿和目标升华看,“两个共同体是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实践方略的双向互动”的关系。在此认知基础上,充分发挥“两个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和世界关怀,以最大化地展现和发挥其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责任编辑:侯德彤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oretical Origin and Correlation

Zhang Huilong[1] Liu Huiyuan[2]

1.School of Government, Yunnan University; 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hina's Land Frontier Governanc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re two governance concepts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o promote nat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proposed by Chinese communists with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 the core wh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Marxist community theory, carry forward and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nnovate and practice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two communities" ar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wisdom and world thinking, empir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interdependence and two-way interaction. Their conception and consolidation contain rich value implica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solution of common problems facing human society, and the co-achievement of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world dream.

Key Words: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s plan

“坚持人民至上”的逻辑原点、价值支点及实践落点

邵彦敏[1]　赵业程[2]

1.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2.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党百年奋斗的经验之一，生动诠释了党执政治国的民生底气、政治根基和发展力量，有力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和鲜明品格。人民至上不仅是党的初心诉求，也是使命指向。要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坚持人民至上”的逻辑价值与实践现实，需要从逻辑原点、价值支点以及实践落点三个方面进行深入解读，唯此才能更好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指向。

关键词：坚持人民至上；逻辑原点；价值支点；实践落点

中图分类号：D61；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5-0009-08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建党百年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决议》深刻指出，“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党领导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党治国实践的价值坐标和基本准则。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坚持人民至上”一直处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可以说，人民至上不仅是党的初心诉求，也是使命指向。要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坚持人民至上的逻辑价值与实践现实，需要从逻辑原点、价值支点以及实践落点三个方面进行深入解读，唯此才能更好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指向。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逻辑原点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充分表达；借助对建党百年历史的深刻回顾，坚持人民至上是党执政理念的有效总结；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现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至上’价值及实践研究”（20ZDA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邵彦敏，女，吉林长春人，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赵业程，男，山东济南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实诉求,坚持人民至上体现了新时代人民发展的本质需要。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推进与升华

坚持人民至上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理要义,淬炼出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底蕴,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推进与升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人民主体思想,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为坚持人民至上这一重要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1.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有力凸显人的主体地位,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价值。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指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特征,认为"现实的人"应当是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有效融合,需要借助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与唯心史观的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认为历史活动正是群众活动,人民群众在具体的劳动实践中推动历史进步[①]。物质生产作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础,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一切活动皆需依此进行,因此作为物质生产主体的人民群众也理应被视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

2.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以此确保人民主体地位的充分落实。马克思、恩格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革命目标,强调无产阶级肩负着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使命责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导向,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追求,强调个人的发展是一切自由人发展的基础条件[②],鲜明揭示了社会进步源自人民,也最终造福人民。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科学阐释了人的主体价值,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了历史进步必须以实现人民的发展和幸福为最高要求。可以说,坚持人民至上充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的核心取向,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价值魅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与提升,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开辟伟大事业的精神支柱。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的提炼与总结

坚持人民至上这一以贯之的崇高追求,是对党领导人民取得发展成就经验的提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总结[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人民战争汇聚群众力量,以群众路线推进革命事业,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充分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时期,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和主人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稳步落实,人民至上成为立国之基、执政之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三个有利于"彰显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标准的衡量基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了党维护人民利益的决心;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为核心进一步明确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发展的各项权益,人民至上为政治、经济各领域发展提供价值取向和标准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党坚持人民至上的初心诠释和使命表达,自觉将人民立场运用、落实到治国实践的全过程,无论是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还是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③ 张燚:《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百年历史及其经验》,《探索》2022年第1期。

冠疫情防控斗争中取得宝贵成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都得到切实践行，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更加持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无论是宗旨目标还是工作路线，都以人民发展为先、以人民利益为要，将人民群众的幸福摆在发展首要位置。从此意义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史[①]。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断获得人民群众的力量支持，突破克服发展中的困境阻碍，在历史洪流之中坚守自身的纯正本色，成长为优秀的执政大党。这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伟大力量，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人民至上才能实现更加美好的发展愿景。

（三）现实逻辑：新时代人民发展利益的需要与诉求

坚持人民至上不仅体现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发展现实，而且凸显落实人民主体地位的最高准则。中国共产党牢固站稳时代发展的鲜明人民立场，全力书写新时代令人民满意、让群众放心的高质量发展篇章。人的现实需要是社会演进的强力动因。人民群众需要上的发展性、动态性与诉求上的递进性、丰富性推动着社会的结构布局愈益完善。从翻身解放到实现温饱，从经济发展到全面提高，人民的现实需要一直是我国发展提升的关键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源于群众利益的现实诉求，其推进完善也以人民的需要为动力支撑，在对民众的高度关切中获得社会事业进步的持久源力，回应时代发展诉求。进入新时代以来，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突出，从基本物质文化需求到美好生活需要，鲜明折射出广大人民从“需量”到“求质”的迫切变化[②]，人民的新需要，要求党和政府工作发展、建立新标准指向，加强普惠政策落实与兜底建设完善、切实满足人民发展诉求成为新时代各项决策部署的基本出发点。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发展，在世界格局中关怀人民发展议题，以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为发展中心，充分体现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世界情怀和全球担当。因此，坚持人民至上是时代发展的必要之举，也是人类追求美好进步的伟大创造，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应时局之变、掌中坚之力的硬核作为。中国共产党坚定以群众需要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取向和价值导向，着眼于群众最关切的堵点和难点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时代发展中深切感受“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世界胸怀和人类情感聚焦于全球发展现实，深化世界时代浪潮中大国大党发展创新的使命重任。

二、“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支点

“坚持人民至上”是凝聚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为实现共同发展利益赓续宝贵的精神价值；坚持人民至上以落实人民主体价值为重要旨归，以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创造力为实践要义，全面激发群众努力奋进的主体活力；坚持人民至上夯实群众增收致富的发展基础，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价值，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指向。

① 林梅：《中国共产党百年初心使命的主题演进与实现路径》，《科学社会主义》2021 第 6 期。

② 黄寿松、杜娟：《习近平“人民至上论”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及价值意蕴》，《思想教育研究》2021 年第 4 期。

(一)精神价值:凝聚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精神的生命力在于随时间的脉动而不断丰富,经岁月的检视而日益发展,在时代洪流和历史演进中提供价值支撑。人民是凝聚中国精神发展链条的有力主体,也是延续精神谱系的中坚力量,人民至上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凝聚起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宏伟力量,成为党和人民齐心协力创造美好生活一以贯之的基因密码。

1. 人民至上植根党的精神血脉,为百年来党的生动实践和孜孜创造提供了价值之源。以伟大建党精神为谱系源头,从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唤起工农力量,带领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等鼓舞人民投身发展,同心勠力建设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特区精神、航天精神等激发人民热情,谱写奋进追赶的时代赞歌,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抗疫精神、丝路精神等凝聚民族圆梦力量,开启百年奋斗的伟大征程。以前赴后继的英勇烈士、舍身奉献的道德模范、担当有为的人民公仆、身先士卒的时代楷模为榜样,筑就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精神基因。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背景时代各不相同、行业领域各有千秋,但都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鲜亮底色和以人为本的基因品格,承载着党真挚坚实的人民情怀和厚重坚定的执政方略。

2. 人民至上的精神价值持续发力,实现人民精神动力的全面激发。人民至上的原则理念依托共同利益的价值立场,将公平与正义、权利与义务、分工与合作统一于群众一身,全面汇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美好发展而一致奋斗的精神气概。由绝对贫困迈进全面小康,从一穷二白到创造美好生活,在人民至上精神理念的号召下,中国共产党人动员起推进时代进步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力量,实现社会发展资源的全方位整合,致力于将人们的发展愿景早日转变为具体现实。时代历史的进步、美好生活的创造都需要这样的基因密码构成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全面塑造人民群众良好的精神风貌,全力提升人民群众崇高的精神境界,实现人民创造精神的充分激发,聚力凝心共创社会主义发展的美好生活。

(二)主体价值:坚守“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价值立场

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站稳人民立场、筑牢群众基础的价值导向,是凸显群众主体地位、厚植人民情怀的理念认知,是人民主体性思想的坚定表达,是时代发展中人民主体价值的有力诠释,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充分彰显。

1. 坚持人民至上,反映了人民立场至上的政治选择。回顾党的历史和现实发展可以看出,立场坚定的价值属性至关重要,可谓民之所愿,政之所向,站稳人民立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属性的必然选择[①],也是巩固执政根基和群众基础的重要保障。坚持人民至上,要求将人民立场视为根本立场,明确发展的政治属性和原则站位,将人民立场深铸于党的价值体系、制度规范、纪律标准以及发展实际,充分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价值和政治立场。

2. 坚持人民至上,体现了人民主体至上的地位要求。从人民实践中汲取发展智慧,从群众队伍中汇聚参与力量,切实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动创造,是推进未来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也是检视历史发展成果的经验所得。坚持人民至上,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发展依靠人

① 张荣臣:《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民，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最大范围地凝聚共识，在民族复兴进步中最大程度地实现创新，在社会事业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力量，使人民群众的愿望得到充分落实、活动获得充分支持、才干实现充分施展，扎实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价值和发展地位[①]。

3. 坚持人民至上，表明了人民发展至上的利益导向。人民发展以实现人的全面进步为发展目的，以密切关注群众的价值需求为发展标准，经济发展要认真考量人民利益，政治发展要全面保障人民权益，文化发展要有效回应人民诉求，社会发展要妥善满足人民需求，将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贯彻于发展的全方位和各领域。坚持人民至上，体现在发展以切实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导向，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落实在制度设计、政策部署以及实际践行的过程之中，竭力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价值和发展要求。

（三）目标价值：共同富裕，开拓社会公平正义的新境界

共同富裕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民生工程，以满足人民的美好期盼为价值追求，以提升群众的生活水平为基本目标，是对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的切实践行。在全面小康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新征程，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使命，使群众共享发展有利成果，彰显的正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

1. 坚持人民至上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主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②]，共同富裕的目标绝非是少数人或者部分人，也并非这些人或者那些人，而是要扎扎实实稳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以满足群众的期待和要求为工作基点，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望，为人民群众的富裕发展而奋力前行。可以说，坚持人民至上充分回答了实现谁的共同富裕的问题，从主体维度更加坚定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

2. 坚持人民至上明朗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力量。人民至上不仅仅意味着要以实现人民利益为先，也说明了要充分依靠人民的力量创造，汲取群众发展的经验智慧，做到“以人民为师、向能者学习”[③]。共同富裕是实现人民的富裕，也是依靠人民实现的富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目标，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调动人民发展的主观热情，在群众的齐心协力下谋富裕、促进步。因此，坚持人民至上合理规划了依靠谁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明确了落实目标的力量支撑。

3. 坚持人民至上明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坚持人民至上深刻诠释了要以人民的评价为一切工作的指标要求，无论是从宏观制度设计还是基层政策布局，共同富裕要以人民满意、群众幸福为目标导向，切实办好、管好、做好关乎人民利益的民生事务，守好人民标准这一发展基线，切实对标共同富裕是否有效贴合人民发展权益、是否全力表达群众价值诉求、以人民意志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相统一的标准作为共同富裕的价值评判。由此，坚持人民至上有力说明共同富裕的标准与导向，鲜明凸显以人民利益追求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际性进展。

---

① 王毅：《“十个坚持”的逻辑体系与深刻内涵》，《新视野》2022 第 2 期。

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第 27 页。

三、“坚持人民至上”的实践落点

坚持人民至上,必须落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践行,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密切群众联系、增进民生利益福祉;坚持人民至上,必须恪守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正确理念,筑牢党治国实践的强大根基;人民至上是引导群众投身国家发展、参与社会事业的动力指引,要为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积淀磅礴力量。

(一)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人民至上,要在实践中解决好民生实事,积极调整适应民生工作新变化,握准新时代民生工作新方位,着力聚焦人民利益关切,为人民生活注入新动能,为群众发展提供新机遇,在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增进民生福祉,亮明新时代发展的民生底色。

1. 加强创业就业导向,落稳做实就业政策。正确研判当下就业形势,制定就业创业帮扶机制,放大就业创业总量扩容、稳步实现充分高质量就业创业。从创业服务和技能培训多端着力,高度关注高校毕业学生、退伍士兵以及新生态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守牢解危扶难红线、放活就业渠道,对接素质人才吸纳引进,塑造就业发展有效竞争力。以为企业纾难为专项重点,大力出台助企稳岗政策,全力稳住现有就业存量,清除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激活优化营商环境氛围,大力发展复制性强、参考性高的创新创业模式推广。

2. 发展人民满意教育,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事业,充分落实教育公益性发展原则,构建均衡发展、全面优质的基本公共教育体系,打造新时代高质量教育服务格局。推动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地,注重教育在价值引领、观念培育、素质提升、能力锻造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全面加强学校课程体制改革。充分施展好校园主阵地作用,在“双减”政策下规范各类办学教学,实现义务教育普惠均衡、职业教育特色专业、高校教育优质高效的发展新局,培养推动人民事业发展的情怀深、政治强、品格正、才能高的时代新人。

3. 增强社会保障服务,实现人民健康发展。社保体系是重要的民生稳定器、社会稳定网,是关乎群众直接利益、人民根本福祉的基本制度安排[①]。妥善应对人口年龄趋势,科学考量阶段发展现状和经济负担水平,树立积极健康老龄观,规划出台渐进可行的退休年龄延迟、架构层次多样、支柱多元的养老保险体系。推行预防为先的健康发展战略,创新基础医疗卫生服务建设,实现中医药康养发展创新,由治病为主向以人民健康为要转变,将民生福祉推向更高水平。

(二)在执政为民中永葆强大根基

坚持人民至上,在治国实践中永葆为民本色,不仅是党担当使命的必然要求,也为党筑牢力量之基、执政之根。把人民置于发展最高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是党决策部署的根本依据,也是执政发展的价值目标,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导下,永葆党执政治国的强大根基。

1. 永葆为民初心,增强为民执政的底气。“坚持人民至上,让我们党永葆生机与活力,让红色江山

①《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2月28日,第1版。

代代相传。”[①] 要始终坚守党的为民初心、铸造坚定的使命信仰，将为民谋幸福的责任使命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坚定品格，强化为民执政的觉悟意识，践行为民执政的情怀站位，永葆为民初心，领导人民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要将代表人民利益作为党团结奋斗的最大底气，不断铸牢为民执政的信念支撑，在砥砺奋进中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提升，激励党员干事服务热情，开创强党兴国新局面。

2. 坚定惠民决心，筑牢为民执政的根基。中国共产党要把惠民造福作为党执政兴业的工作目标。作为人民的带头人和领路人，在面对发展新难题、新情况时，共产党人要勇于迎难而上，以誓不罢休的决心和意念，挺身而出、攻坚克难，做细干好每一项工作，用力尽心解决好每一个问题。要落实惠民向好的发展原则，秉持人本化执政理念，时刻以人民需求为先，聚焦群众的急难关切，力求对人民做到有问必回、有事必应、有难必帮，勇担惠民造福、强国振兴的时代重任，以坚定的惠民决心固牢党为民执政的发展根基。

3. 砥砺利民恒心，落实为民执政的目标。勇挑利民向优发展重担，以毫不懈怠的恒心落实于党的执政实践之中，从制度安排、政策帮扶做好新时代的利民者，以执政利民作为党实际工作的价值坐标，切实处理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共同利益、关注好特殊利益，将利民实事作为党执政事业的长期安排，构建利民发展的长效追踪机制，以久抓不放的恒心毅力，将服务利民的目标深植于执政理念的同时，高效落实于实践行动中。

（三）在民族大业中凝聚复兴力量

坚持人民至上，就要与人民心想一处、力聚一方、行于一路，必须顺应人民发展心意、倾听群众利益呼声，紧紧依靠人民、团结群众，形成强大坚固、一往无前的发展合力。坚持人民至上，要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智慧养料，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解决好改革发展中的系列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注入人民伟力[②]。

1. 在顺民心中获得信任力量。坚持人民至上，必须自觉问需于民、问政于民，坚持心向民、行为民，真正了解人民、走向群众，要坚定不移地顺应人民的发展心意，以为人民着想的真心、服务的诚心去赢得民心，创造良好的群众氛围。坚持人民至上，要在真抓实干中布局群众工作，在求真务实中谋篇人民事业，力戒表面文章和形式主义，不做面子工程和官僚主义，强化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将工作做到民生实处、百姓心上，获得圆梦民族复兴的信任力量。

2. 在听民意中获得支持力量。坚持人民至上，必须要深入群众之中，俯身基层，聆听民意、贴近人民，了解人民群众的难急盼愁，关心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在听民意、解民困中践行人民情怀，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坚持人民至上，要以饱满热情的暖心服务确保高质高效的工作成效，让人民的费心事变为放心事、烦心事变为暖心事，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满足感，获得圆梦民族复兴的支持力量。

3. 在集民智中获得参与力量。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善于聚集民力民智，站定依靠群众谋发展的

① 王楠、谢剑南：《红色文化融入党建工作的四重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4 月 29 日，第 8 版。

② 王虎学、何锟伦：《“人民至上”的三重价值意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 年第 6 期。

信念立场,于人民之中寻求经验,在群众之中探求智慧,动员群众的集体创造和团结力量。坚持人民至上,必须要为群众搭建施展才智的广阔平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获得圆梦民族复兴的支持力量。

责任编辑:侯德彤

Logical Origin, Value Fulcrum and Practical Landing Point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Shao Yanmin[1] Zhao Yecheng[2]

1.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ok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as one of the lessons gained through the Party's hundred years of struggle, which vividly explaine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political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and effectively revealed the original mission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is not only the Party's original aspiration, but also its mission.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log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reality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we need to make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logical origin, value fulcrum and practical landing poin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etter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wisdom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logical origin; value fulcrum; practice landing point

丝绸之路艺术史纲(下)

程 金 城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6;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9世纪,丝绸之路经历了大约两个千年的历程。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形象表达,丝绸之路艺术的发展和演变受制于这个历史过程的多种因素,也受益于这个历史过程的交流契机和融合动力。交流融合生成艺术链是丝绸之路艺术的特质并决定其历史流变轨迹。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9世纪,是世界区域性整合的时代,也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汇的时代,丝绸之路艺术由区域交流到全域交流,艺术各领域的融合不断增强并走向鼎盛。公元10世纪到公元19世纪,世界变化加剧,大区域密集交往使得历史要素及系统结构趋于复杂,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丝绸之路艺术经历了转捩和蜕变。20世纪是丝绸之路艺术重新发现和复兴期,也是创新发展期。丝绸之路艺术史范式建构,除了从纵向整体把握的通史和断代史之外,还可以有丝绸之路艺术门类史、丝绸之路艺术流变史、丝绸之路艺术思潮史等等不同体例的建构。这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 丝绸之路;艺术史;长时段特点;范式探索

中图分类号: J1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5-0017-18

丝绸之路艺术史分期(续)

从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开辟,到公元19世纪世界历史大变局,丝绸之路经历了大约两个千年,贯穿了“世界区域性整合”“大区域密集交往”和“走向全球性群体集合”的历史过程[①]。丝绸之路艺术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形象表达,其发展演变受制于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多种因素。主要有:区域地理因素,文明体系重构因素,地缘政治变局因素,经济交流和商业贸易因素,宗教因素,民族迁徙和人员流动因素,等等。它们属于不同“体系”,具有不同“层级”,与丝绸之路艺术的关系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丝绸之路艺术史的整体结构,也影响了丝绸之路艺术史的格局。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图志”(16ZDA1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程金城,男,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研究。

① 本文对古丝绸之路两个千年的历史过程和特点的把握借鉴了许倬云先生对世界历史脉络整体归纳的观点。参见许倬云:《观世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二时期:丝绸之路艺术发展和鼎盛(约公元前1世纪—公元9世纪)[①]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千余年,是世界区域性整合的时代,也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汇的时代。“轴心时代”之后人类历史重新建构,奠定了世界发展格局。丝绸之路沿线王朝更迭频繁,世界局势多变。“秦汉大帝国及隋唐帝国,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梵文世界,以及中亚的几个大帝国依次出现。”[②]中国汉唐盛世及其衰亡之后的分合,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胡汉文化融合,东西罗马分裂和拜占庭帝国兴起,匈奴、突厥及欧亚其他民族大迁徙对世界“碰撞”,中东中亚地缘政治风起云涌,继而阿拉伯帝国崛起,等等,使得丝绸之路在剧烈动荡和不断分化聚合中曲折延伸。在文化上,其“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国与普世性文化或宗教体系相伴出现。例如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区域。大规模族群以‘蛮族’入侵的方式移动,同时,长程贸易跨洲转输,商路上居间族群获利至丰”[③]。这些现象直接影响丝绸之路艺术的面貌和轨迹。

丝绸之路艺术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由区域交流到全域交流,艺术各领域的融合不断增强并走向鼎盛。这一千年丝绸之路艺术的历史过程,可分为两个时段,即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6世纪、公元7世纪到公元9世纪,也就是从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算起的第三时段和第四时段。

第三时段,公元前1世纪—公元6世纪

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6世纪,是帝国兴起、开疆拓土的时代,也是社会动荡、端绪最繁的时代;是以艺术展示大国气象的时代,是艺术交融、变易创新的时代,还是奠定世界艺术格局的关键时代。

张骞西域凿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节点。但是,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流交往,特别是丝绸之路艺术的交流交融,具有连续性,并不因这一特定历史节点而立刻发生重大变化。“节点”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研究者进行断代的“工具”。作为历史延续过程,本文将“轴心时代”的下限即公元前2世纪作为第一时期(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的结束,将公元前1世纪前后作为第二时期的开始。综合考虑当时丝绸之路东西段整体状况,这是一个较为宽泛、弹性很大的时间概念。

公元1世纪前后,是宏观政治体系集中出现的时期,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中国汉代等帝国崛起,“彼此间进行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影响了跨大陆交通的发展”[④]。此后几百年间,东西方都经历了帝国由盛而衰和分化重构的过程。汉帝国逐步开通和拓展了丝绸之路东段,罗马的疆土也一度扩张到欧洲的西北部,南亚,丝绸之路也逐步贯通。尔后东西方都出现过分裂局面,经历了社会动荡、征战不断的痛苦历史过程。分裂、冲突和聚合在客观上为不同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创化提供了条件。东汉衰亡后的魏晋南北朝,东、西罗马分裂及早期拜占庭,中东中亚国家的兴衰更迭,对丝绸之路东段、西段和中段艺术交流及其发展演变产生直接影响。

丝绸之路东段的中国处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开通并曲折发展,南方丝绸之路的延续和拓展,形成了多种文化交流交融的局面,奠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发展格局,也为丝绸之路艺术多种要素的融合开拓了空间并打下了坚实基础。西汉王朝对域外世界渴望了解、屡次遣使和开疆拓土,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三通三绝”,魏晋南北朝社会分裂和民族融合,特别是佛教的

① 本人刊于《东方论坛》2022年第1期的《丝绸之路艺术史纲(上)》将丝绸之路艺术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七个阶段,并对“第一时期:丝绸之路艺术孕育及溯源(约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世纪)”及其一、二时段进行了论述,本文承接之。

② 许倬云:《观世变》,第31页。

③ 许倬云:《观世变》,第30页。

④ 沈坚:《希腊化与拜占廷帝国》,《史林》1995年第1期。

传入与本土化,等等,为西方艺术、西域艺术及草原艺术和中原艺术等艺术体系的融合提供了历史机遇,为其再创造并广泛传播打开了空间和网路通道。汉承秦制,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汉代艺术在整体上体现出深沉雄大的气派和包容吸纳的气度,风格古拙质朴而传神,崇尚气势和力度。从文献可知,汉代长安宫苑林立,以未央宫、长乐宫为代表的汉代建筑呈现出体天象地、经纬阴阳、包蕴山海的气派,追求庞大的群体结构和气势,建筑布局样式与天体世界对应。丝绸之路的开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其成果或直接、或曲折地体现在物质交流和文化艺术交流中,这极大地促进了艺术的创化和新样态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分裂动荡,民族冲突,胡汉交融,佛教传入并演变,道教、玄学勃兴,经历了政治、社会和思想大变革,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思想觉醒的时期,也是艺术自觉的时期。而丝绸之路提供的交流通道发挥了持久而特殊的作用,"汉文化中丰富多彩甚至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元素——本土的和外来的,儒家的和道家的,宫廷的和民间的——使汉代艺术极具活力,形式和主题变化无穷"[①]。丝绸织物、各种器物、石窟建筑、雕塑、石刻、绘画、音乐、舞蹈、钱币、书法、印章等艺术繁荣发展,显示了中国风格和气派并影响东亚。丝绸之路东段的艺术因交流而别开生面。

丝绸之路西段的罗马艺术,经历了希腊化晚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前期几个阶段,多种要素的交流融合形成环地中海艺术的整体风貌。公元前 330 年,波斯帝国灭亡,公元前 30 年,屋大维征服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 "奥古斯都",罗马由共和时代进入帝国时代。"从由共和转向帝制之日起,罗马的目光就一直锁定在亚洲,由此它拥有了自己的灵魂。"[②] 公元 330 年,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首都; 公元 395 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帝国; 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覆灭,东罗马开创拜占庭帝国时代。罗马的历史变迁,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伴随军事目的的希腊化和罗马东征后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影响了环地中海及近东的艺术发展。同时,以丝绸贸易为主的经济活动成为东西方交通网路开辟与维系的持续驱动力,客观上为不同艺术的交流交融打开了空间。罗马艺术不同程度地吸收借鉴希腊艺术和埃及艺术、西亚艺术,形成了影响和辐射环地中海地区的文化艺术整体。"帝国若想壮大,必须拥有大量的城市,由此征取足够多的税收; 帝国若想辉煌,必须拥有艺人和工匠——他们的精湛技艺让有钱人相互攀比炫耀,并由此获得高昂报酬。"[③] 帝王利用艺术为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强烈的政治目的与精湛的艺术技巧的结合构成了罗马艺术的重要特点,其中建筑和雕塑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屋大维、戴克里先、图拉真、凯撒、尼禄等帝王形象的雕塑,借助艺术语言和视觉形象宣扬自己的功绩及其统治思想,"书写" 了罗马帝国的历史,继承并发展了希腊艺术的精髓,也造就了世界艺术史上罗马雕塑艺术的经典。希腊艺术的另一特色是大型建筑,也被罗马帝国发扬光大。约公元前 1 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成书[④],表明罗马建筑不仅学习了希腊经验,而且有了理论的总结和指导。大型建筑集供奉神祇、政治象征、公共空间、娱乐设施、艺术享受等功能于一体。神庙、祭坛、广场、凯旋门、宫殿、庆功柱、陵墓、元老院、剧场、

① [英] 迈克尔·苏立文:《中国艺术史》,徐坚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75 页。
② [英]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3 页。
③ [英]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 11 页。
④ 1986 年有首个中文译本:[古罗马] 维特鲁威:《建筑十书》,高履泰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年。

体育场等规模巨大的建筑,将希腊柱式、拱券技术与罗马的豪横气派和歌功颂德的目的完美结合,彰显着国威,记录着重大历史事件,也包括帝王在规模巨大的空间露面并对民众施加影响的目的。从罗马斗兽场到君士坦丁凯旋门,从万神殿到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些“不动”的标志性经典建筑,从丝绸之路视域看则有着艺术理念、规则和技巧的“流动”和发展演变,以及复杂的政治、宗教、历史文化意蕴的传承、交融和积淀。

在丝绸之路中段,处于东西文化交汇十字路口的中东中亚,经历了亚欧民族大迁徙和泛希腊化,对贯通东西方艺术发挥了极大作用。不同艺术之间的双向影响和多维组合决定了中亚艺术作为重要交汇点的“金桥”地位。中亚历来是地缘博弈的地区,在历史上从来就是一个交叉地带,亚洲大陆各个时代最主要的艺术文明都汇集于此。从东到西的丝绸之路中,最辽阔的一段曾经掌握在中亚各民族手中,从南向北穿越中亚的各条通道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古时起,印度和伊朗就是通过这些通道与草原地区各民族以及草原以外伏尔加河上游、西伯利亚、远东各民族保持着联系[①]。亚洲的这条交通大道在东方与西方艺术文明的相互关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本时段,即将谢幕的印度孔雀王朝(公元前323年—公元前187年),西亚希腊化的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05年—公元前64年),西亚强国安息帝国(帕提亚,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控制中亚和西北印度一带的贵霜帝国(公元30年—公元375年),统治印度次大陆北部的笈多王朝(公元320年—公元500年),统治伊朗和伊拉克一带的萨珊波斯王朝(公元224年—公元651年),还有草原匈奴民族,经历了长达几百年的兴衰更迭,与丝绸之路东段的中国和西段的罗马、拜占庭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冲撞、交流和交融,是东西方艺术交汇融合的中枢和桥梁,是印度、中亚、埃及、西亚、希腊、罗马和中国文化艺术的汇合地。笈多王朝是印度历史上少数几个大的统一王朝之一,著名的阿旃陀石窟艺术影响了西域、敦煌石窟等东方艺术。中亚经过晚期泛希腊化、民族迁徙、地缘博弈,不同文化艺术深度交融,共荣共存——帕提亚艺术、巴克特利亚艺术、贵霜艺术、萨珊王朝艺术、粟特艺术等交汇融合,生成新的艺术形态。石窟建筑艺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杂技、幻术、木刻、细密画、金属工艺器物等相继影响中国,而中国的丝绸、织物、漆器、陶器等手工艺以及乐舞乐器等其他艺术双向影响,因交流而丰富多彩。这个地区成为印度、波斯和罗马行省的艺术和文化的熔炉,并进而通过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一系列绿洲向中国传播[②]。中国运到贵霜帝国、从贵霜再转卖到帕提亚及罗马帝国所属各国的商品,除丝绸之外,还有玉石、漆器、织品、毛皮、铁器以及草药。丝绸之路促进了中亚手工艺生产,陶瓷制造、金属冶炼、玻璃工艺、织布等行业也都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作为中央亚西亚贸易中心的布哈拉及撒马尔罕周围地区中亚的城市地位再度得到提高,其影响一直扩展到遥远的中国隋朝边境地区[③]。东罗马与萨珊波斯钱币、器物等工艺品在中国发现很多,波斯锦风行中亚和西亚,并且输入中国[④]。因为丝绸之路,而

① 参见[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② 参见[英]迈克尔·苏立文:《中国艺术史》,徐坚译,第76页。

③ 参见[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第11页。

④ 参见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绵亘万里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60页。

使“中亚在世界艺术史上曾经是一个新的庞大的艺术中心”[①]。因此,厘清近东中亚在丝绸之路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厘清了丝绸之路艺术东西方交流的来龙去脉,也有助于厘清世界艺术的发展逻辑。

丝绸之路东段、中段和西段的贯通,对此后的整体发展态势影响深远,其艺术的发展嬗变也有同样的深远意义。除了以上所述之外,以下几个方面也需要特别强调。

丝绸连通了东西方世界,提升了人类的审美意识并影响着世界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丝绸之源,“已有十分强大的证据证明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丝绸已开始向西传播。到汉晋时期,中国典型的织锦已经出现在丝绸之路沿途更为遥远的地区,中国丝绸的产品在汉代已传播到地中海沿岸是毋庸置疑的”[②]。丝绸织物不是人类最先交流的物品,却是将人类交流链条延伸最远最长的物品,也是最接近人类审美意识共通性的物品。丝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东西方连为一体,具有划时代意义。丝绸将物质享受与审美体验完美结合而赢得当时世界的普遍欣赏,拓展了人类的审美视域,也提升了人类对物质审美的品味。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建构,需要重新认识丝绸的审美属性及其交流对世界的重大影响,重新评价丝绸提升人类审美意识及连接世界的多维价值。

丝绸的生成是复杂而充满智慧的艺术创造过程,因制作方法及原料、织染工艺不同而分为锦、绫、绮、罗、縠、纱、缣、缟、缚、纨、绀、缦、綮、素、练、绢等多个品种[③]。丝绸不仅五彩缤纷,有红、紫、黄、绿、棕、蓝等颜色,还有云气纹、鸟兽纹、几何纹、动植物纹、人物骑猎纹等等各种类型的花纹。丝绸不仅是织物衣料,还是古代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是可以作为货币支付的硬通货,并成为影响帝国时代多项政策的重要因素。丝绸经过中亚中东远销到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影响了罗马的经济发展、社会时尚甚至政治决策。丝绸及蚕丝生成、来源还被西方人想象、猜度、编成故事,赋予神秘象征意义。丝绸织物的纹饰、图案是特殊的艺术创造,并在文化交流中变易,已有丰富的出土文物为证。比如,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墓葬中发现汉代的丝绸有中国传统纹样和西域文化主题,中国青海都兰热水墓地出土了北朝六马拉车太阳神锦,新疆尉犁县营盘汉晋墓地出土的罗马风格毛织翳袍的图案中有希腊神话手持剑与盾的爱神厄洛斯形象,尼雅考古出土的蜡染棉布有希腊半裸女神堤喀手抱丰饶角的形象和希腊神话中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形象[④]。帛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现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图案纹饰和锦帛书画,具有多重历史文化和艺术史意义。如此等等,在陆续出土的文物中为数不少[⑤]。据专家研究,公元2世纪以前,罗马人衣料主要是动物纤维的羊毛和植物纤维的亚麻,织物毛粗麻硬,色泽单调,而中国丝绸轻柔飘逸、色泽多样,成为罗马王公贵族享用的奢侈品,也成为贸易首选之物[⑥]。丝绸影响了罗马人的衣着,进而影响了西方雕塑对衣纹的处理。有学者认为,罗马时期西方雕塑流水一样的衣纹皱褶效果,被认为与他们穿着中国丝绸有关系。希腊雕塑中的人物所着丝绸

① [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第72页。
② 赵丰:《丝路之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12页。
③ 参见周伟洲、王欣主编:《丝绸之路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7页。
④ 参见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绵亘万里长》,第42页。
⑤ 在周伟洲、王欣主编的《丝绸之路辞典》中,仅纺织、丝绸、织锦类的条目就有170多个。
⑥ 参见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绵亘万里长》,第56页。

服饰,直接受到希腊罗马刻画丝绸女性、神像雕塑的影响[①]。丝绸丰富了西方人的艺术视域和审美感受,被罗马的帝王达官、贵妇名媛视为稀缺宝物,并使他们沉迷于其中。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将融合了艺术要素的丝绸贸易,从中原到河西走廊和北方草原,经西域和中亚,延伸到南亚、西亚直到地中海。中亚、特别是波斯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经过漫长里程、多个环节、多个民族而将东西方世界联系起来,这样的艺术链条背后必有其不寻常的内在动力,有多维度的价值追求杠杆在推动。实用性与审美性统一,物质性与精神性融合,构成人与物的合理价值关系,而这一关系具有普遍性。这正是柔软的丝绸能够打通东西方世界联系的原因,是丝绸之路艺术具有物的审美属性的标志之一,也是丝绸之路艺术史与一般艺术史逻辑起点的区别所在。

后轴心时代的"金规则"借丝绸之路的艺术传播和嬗变。从丝绸之路视域来看,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6世纪,正是轴心时代之后宗教"金规则"形成后"实践"并传播的时期,而艺术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姆斯特朗认为,轴心时代建构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宗教伦理"金规则",这是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是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人类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推动了宗教的传播和文化交融,后来的发展进一步彰显出这一总体发展向度。"连接太平洋、中亚、印度和波斯湾的通道上不只是货物在流通,还有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和神有关的。智慧和宗教的交流在这片地区一直非常活跃。"[②] "无论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还是那些根植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还是西方前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即将问世的伊斯兰教——或在战场上取胜,或在谈判上取胜,争相向人们展示其文化的优越和神明的灵验。"[③] 丝绸之路的东段、中段和西段都有兴盛的宗教艺术现象。艺术呈现和传播了宗教,也成就了艺术自身。不同宗教是不同的解释系统,这些解释系统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系列并且在交流中本土化。祆教、印度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基督教等宗教地曲折发展,都形成了特有的宗教艺术现象。其中佛教石窟艺术是一个生成、转化、传播、创新的艺术系统,也是一条在空间和时间中不断延伸的艺术链,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宗教艺术范围,在丝绸之路艺术史乃至人类艺术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源于埃及、兴盛于希腊的神像雕造与佛教艺术结合,在印度形成佛陀、菩萨等半神半人的艺术形象,经中亚、西域和河西走廊,将造像风格和技巧传至中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和东方艺术诸多方面的发展嬗变。"在中国佛教艺术发展中,除早先由印度传来最初样式后,造像形式与风格就在中国展开并发展着。历朝历代均有画家开创的样式,使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样式。"[④] 犍陀罗艺术和马图拉艺术的东传、南传,产生了长远的艺术"历史后效",不仅对中国绘画、雕塑技巧影响很大,而且对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其他艺术类型的风格和创作意识影响巨深。东汉以来,有不少大月氏、安息、印度和康居等国的僧人东来中国传教,随着佛教教义的传播,这种基本艺术元素与地域文化精神的进一步融合产生了新的艺术样态。在贯通丝绸之路艺

① 参见向云驹:《东西方古代审美与造型的文化史考略——以丝绸之路雕塑艺术为例》,《民艺》2020年第3期。
② [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24页。
③ [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25页。
④ 马德:《敦煌古代工匠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64页。

术中段和东段的艺术中,阿旃陀石窟艺术,犍陀罗艺术,马图拉(秣菟罗)样式[①]和萨尔纳特(鹿野苑)样式,西域龟兹艺术,凉州模式和敦煌石窟艺术,云冈石窟艺术,麦积山石窟艺术,龙门石窟艺术,以及遍布中国和东亚、东南亚的诸多佛教艺术,影响了此后东方艺术的嬗变和面貌。当东方在石窟中以佛陀的本生故事、菩萨、护法神和供养人等为内容进行艺术创造的时候,当佛教与中国的道教形象系列融合的时候,在西方的教堂,艺术家也以基督、圣母、圣徒、圣灵以及生死、来世等等为内容进行艺术创造。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是拜占庭(中国文献称"拂菻")艺术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建筑、雕塑和绘画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承袭和发展了古典时期希腊化艺术的优雅风范。拜占庭图像等艺术形象在中国的墓葬石刻和绘画中也有踪迹[②],显示了丝绸之路艺术的交融性。

异域文明交流与系列艺术形象突现。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民族文化融合,促进了艺术的创化和新样态的产生,其中各种造型和图像成为最重要的丝路艺术现象。青铜器、青金石、玉器、金银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铜镜等器物艺术,陶塑、石雕、木雕、浮雕、画像石(砖)、彩绘壁画、陶俑等艺术品和图像,织物服装纹饰、图案、车马具饰物、钱币、印章、书法艺术等等艺术现象,都以各自的造型方式和图像内容构成丰富的艺术世界,形成关系复杂的艺术链。伴随丝绸之路广泛的物品输入交流,动植物形象形成重要的艺术系列。天马、狮子、骆驼、羊、龙、蛇、蛙、鸟等等形象及其变形,葡萄、石榴、桃子(金桃)、菩提树、生命树等等植物形象系列在各种艺术门类交替出现。罗马和波斯金银币、中亚金银器、东西方铜镜等各种艺术造型、图案、浮雕及其多种艺术元素的组合,构成了多元艺术风格交流交融的景象。中国自战国以来金银器突然增多,到汉代更加明显,掐丝焊珠、宝石镶嵌、错金银、鎏金银、錾金银等工艺也流行开来。它们多出土于北方草原或与北方草原邻近的地方,特别是戎狄墓葬[③]。与宗教信仰和丧葬仪式相关的各种神像、现实和来世图像、供养人形象、陶俑、木俑等等形象,以及生产生活场景在雕塑、绘画(壁画)、画像砖石、丝绸织锦等等艺术中不断置换变形的形象,特别是西方传来的一些想象动物如拉马苏、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格里芬、鹰隼、双翼日盘(太阳神)、狮怪、牛怪、天马、飞天等等形象,构成了丝绸之路超现实的艺术形象系列。一切有形,皆含道性。艺术形象含有深刻的文化、宗教、民族因素,它们因丝绸之路而超越时间、空间、民族、地域的界限,构成了不同形象系列的艺术链。

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交流影响深远。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及希腊和波斯文明都有各自的乐舞现象,构成丝绸之路西段多样的乐舞格局;中国文明、北方草原及东亚文明中的各种乐舞样态,则造就了丝绸之路东段丰富的乐舞艺术。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步开拓,地域、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乐舞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构成了音乐舞蹈史的重要内容。中国音乐、舞蹈、幻术、杂技、百戏及乐器等等,在魏晋以后至隋唐时期,不断吸收异域文化艺术养分,特别是印度乐系和伊

① 有研究认为,曹衣出水类似于印度笈多马图拉薄衣贴体的"湿衣佛像"的造型特征。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36页。

② 参见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③ 参见李零:《波斯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9页。

兰乐系,促进了乐舞艺术的全面发展,其中重要现象是作为宫廷宴享音乐即“燕乐”的形成和演变[①]。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而以前重视不够的是汉画石与西方石刻艺术的关系,需从丝绸之路视域加以深入研究和探讨[②]。

第四时段,公元7世纪—公元9世纪

这一时段,丝绸之路艺术在交流、融合、吸收和本土化的过程中走向鼎盛。公元六、七世纪,大唐帝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三足鼎立,艺术上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异彩纷呈、交相辉映。到公元9世纪前后,欧亚大陆先后有大唐帝国、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吐蕃帝国、回纥帝国、查理曼帝国等大帝国。草原的突厥西进欧洲和南下中原,使世界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文化更加复杂。丝绸之路艺术在冲突与交融中进入繁荣鼎盛时期。

开放包容、东西方互动与丝绸之路艺术全面繁盛。人是艺术的传播者,也是艺术传播的载体。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往、南北穿梭的人员流动,推动了艺术的深度交融和创化。丝绸之路上的中国隋唐时期,来自欧、亚、非各国的人员众多,艺术的繁荣与之关系密切。唐时中国疆域辽阔,海外贸易发达,丝绸之路昌盛。这是一个大流动的时代,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长安作为当时的世界大都市,外来居民数量庞大,而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外来人员也很多。据权威专家研究:“长安的外来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广州城里的外来居民则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但是在长安和广州两地都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③] 各国进入长安的使节,有来自新罗、阿拉伯、日本、林邑(今越南南部)、东罗马、波斯、婆罗门(印度)、朝鲜、泥婆罗等等,数量不计其数,丝绸之路的联系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密切[④]。这些外来居民带来了异域的服饰、音乐、舞蹈,影响了时代的风尚。长安风行异域胡人和其他国家的服饰饮食、歌舞杂技、宗教信仰。长安居民参加佛寺节日活动、舞会以及戏剧演出等。与衣、食、住以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外来影响相适应的是,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外来事物的浓厚兴趣,以反映外来事物作为创作主题[⑤]。在建筑上,采用西亚风格和建筑材料,私宅建筑吸取了西方外域宫殿的建造方法;在服饰上,远自波斯、吐火罗,近至突厥、吐谷浑和吐蕃都为唐人模仿的对象;在绘画上,将印度的凹凸画法传入中原,用铁线细描和重视设色的表现技法;在乐舞上,广泛吸收西域各国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融会了九部乐的精华形成十部乐,其中西凉、天竺、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等域外音乐占了大多数[⑥]。歌舞大曲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诗歌入乐歌唱,琵琶等乐器、胡腾舞等舞蹈及其创新变化形式极大地丰富和改

① 参见李丽萍、程金城:《丝绸之路中中国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的嬗变——以汉唐乐舞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② 李零对汉画像石与西亚石刻有独到的认识,参见李零的《波斯日记》。

③ [美]薛爱华(Edward H.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0页。

④ 参见葛承雍:《大国之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77页。

⑤ 参见[美]薛爱华(Edward H.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

⑥ 参见葛承雍:《大国之唐》,第83页。

变了中国的乐舞局面。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民族,他们将西方宗教、风俗、舞蹈、音乐、服饰等传入中国,也将中国的丝绸、造纸术等传到西方,对中西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丝绸之路的东北亚之路也很活跃,隋唐与东亚日本、朝鲜的联系更加紧密。日本不断向唐朝派出了遣唐使,学习中国制度和文化艺术。公元632年,中国高僧玄奘克服千难万险到达印度取经,并在当时北印度规模最大、最宏伟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讲学。回国后,玄奘立即开始大规模的翻译佛经工作,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文学和艺术的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容纳西方,也容纳北方草原民族。金银器、丝毛织品、陶瓷器、漆器、木简、文书、画像砖、石器、铜器、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多个类别交流十分活跃。唐代陶瓷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有研究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区都曾出土长沙窑瓷器,器身还出现了胡人、椰枣、棕榈纹饰及阿拉伯文字。长沙窑瓷器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外销瓷的文化特色,成为唐代外销瓷的佼佼者[①]。及至五代,越窑青瓷销往东亚、东南亚及阿拉伯国家,各地已发现的多艘唐宋沉船都曾出水越窑瓷器。长沙窑瓷器强化装饰,题材丰富,既有中国风格图案和唐代诗词,也有阿拉伯宗教箴言、伊斯兰图案和印度佛教纹样,凸显中西交融的产品特色[②]。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利用从朝鲜半岛和中国学来的技术,开始用低温烧制上釉的陶器,例如深绿色的绿釉陶器以及红、黄、绿三色的三彩器[③]。公元8世纪以后,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海路交通发达起来,瓷器主要经由海路传播。外来文化艺术本土化的过程也是艺术交融创新的过程,禅宗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对丝绸之路东段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佛教在唐代进一步中国化,佛教艺术更加世俗化,在艺术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高原丝绸之路”另辟蹊径,艺术交流价值独具。高原丝绸之路是从中国中原地区经由青藏高原、再由青藏高原出发的不同时期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北接新疆,与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相平行;东连四川、云南,与“西南丝绸之路”“藏羌彝民族走廊”等天然相接;西南和南面,同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中亚和南亚国家或地区相毗邻,在河谷峻岭之间有若干条自然通道相通,承担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作用[④]。它连接吐蕃文化、中原汉文化、西亚文化、中亚文化等多元文化,是沿线不同民族交往与文明融合之路。出土的丰富文物表明在青铜时代已经有外部因素进入,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及中亚、南亚等地区文化艺术交流互动源远流长。近年来,出土的汉晋、唐代的丝绸残片、宝石、珠玉等装饰品组件,吐蕃墓葬出土的仿制中亚地区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及其有翼神兽、大角动物、马与骑手等纹饰图案[⑤],进一步证明这一时期高原丝绸之路的特殊地位。

丝绸之路视域中的拜占庭艺术之美。公元7世纪拜占庭再度出现希腊化,带有希腊化印记的拜占庭文化,不仅繁盛于帝国境内,而且不时向外扩散,流播于周边地区,尤于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

① 参见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页。
② 参见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第18页。
③ 参见石云涛:《中国陶瓷源流及域外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1页。
④ 参见霍巍:《丝绸之路在青藏高原的延伸》,《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31日。
⑤ 参见霍巍:《丝绸之路在青藏高原的延伸》,《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31日。

濡染至深[①]。拜占庭艺术虽然受基督教制约,但在艺术风格和方法上以罗马晚期和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等东方艺术相结合为特点,是交流融合的艺术。公元8—9世纪圣像破坏运动,禁止与反抗圣像,圣像绘画、雕塑受摧毁。公元843年,圣像破坏运动终结,神圣人物描绘再次得到推崇。教堂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和古抄本是这个时期主要艺术内容。"将圆屋顶置于方形平面的建筑物上,乃是拜占庭式圆顶建筑革命性的创举。"[②] "圣母与圣婴"是十分典型的宗教题材绘画,绘画和雕塑被用来装饰作为文化和社会中心的教堂和修道院,其艺术体现经院美学特质。"经院美学的一大问题,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将美与其他形式的价值融合了起来",具有审美感性和寓言功能,兼具超越之美、比例之美、光之美[③]。作为对圣徒的一种崇拜,朝圣在丰富图像和艺术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朝圣者所参观的圣殿都拥有一些可供艺术家模仿、复制的著名雕像。朝圣之路逐渐成了各民族间的主要通道,文学和艺术的新创造可以通过朝圣之路传播开来。中世纪艺术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象征符号,大教堂是信仰的象征。首先表现的是先祖(包括诺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等,他们都是耶稣的远祖);紧随其后的是先知和女先知;最后是使徒[④]。宗教艺术受时代影响,从希腊到罗马,再到拜占庭,艺术的"常"与"变"在丝绸之路视域中清晰可辨。

丝绸之路上的阿拉伯艺术世界。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穆斯林宗教及其意识形态广泛传播,思想、形象和概念在文化和智力活动的所有领域和所有层次上,都有广泛的交流和互相渗透。这在艺术、建筑、文学和科学方面都产生了显著的结果,创造出惊人的成就[⑤]。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的使节拜见唐高宗李治,伊斯兰教传到中国。公元751年,唐朝镇守西域的军事长官高仙芝领兵失误,在中亚怛罗斯遭遇伏击,上万的中国官兵成了阿拉伯军队的俘虏,他们把中国的造纸术和纺织丝绸的机器带到了巴格达城。巴格达市面有中国纺织高级丝绸的织机,有中国的金银匠、画匠、泥瓦匠及纺织工匠[⑥]。公元6—8世纪是中亚艺术在整个中亚早期封建公国制度下重新高涨的时期。它的某些地方性风格从伊朗萨珊王朝的东部各地延伸到七河地区、哈萨克和新疆,其晚期希腊罗马式艺术遗产中的技巧和风格掺入了晚期罗马、拜占庭和印度艺术因素,与伊朗萨珊王朝的艺术和突厥的草原艺术也具有同源关系,"并且它还在某种程度上与它们一起构成共同的综合体"[⑦]。继突厥之后,回纥与唐朝进行"绢马交易",中原丝绸随之源源不断地流入回纥,然后又经中亚粟特人之手流往西亚、拜占庭。而东罗马、大食、印度、波斯等地的玻璃、香料、药材、狮子、骏马、驯象等大量传入中国内地,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盘、琉璃瓶等均是阿拉伯伊斯兰风格的精品[⑧]。公元8世纪以后,

① 参见沈坚:《希腊化与拜占廷帝国》,《史林》1995年第1期。
② [英]帕瑞克·纽金斯:《世界建筑艺术史》,顾孟潮、张百年译,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147页。
③ 参见[意]翁贝托·艾柯:《中世纪之美》,刘慧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27页。
④ 参见[法]埃米尔·马勒:《图像学:12世纪到18世纪的宗教艺术》,梅娜芳译,曾四凯校,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⑤ 参见[俄]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马小鹤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386页。
⑥ 参见[俄]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马小鹤译,第386页。
⑦ [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第19页。
⑧ 参见葛承雍:《大国之唐》,第77页。

中亚地区的文化艺术陆续被伊斯兰化。西方玻璃生产中心转向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玻璃工艺技巧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阿拉伯玻璃艺术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并不断兼收并蓄，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器型和纹饰。海上是中国去往南亚、阿拉伯、东非和经红海至欧洲的重要通道，瓷器向域外输出到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最远至非洲。为了适应外销需求，瓷器装饰有中国风格的图案和唐代诗词，有西亚、波斯风格的图案，有阿拉伯宗教箴言、伊斯兰图案和印度佛教纹样，艺术交融特色明显。中国艺术方法也影响阿拉伯人，他们学习唐三彩工艺，加入了自己的文化元素，习惯在器物上刻划带有宗教色彩的菱形图案[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世界几大文化体系中营养最丰富的体系群之一。它不仅从人种血脉中秉承了埃及、两河的内含文化及波斯文化，还融会吸取了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及中国唐宋文化的养料[②]。伊斯兰文化反对偶像崇拜，其艺术表现对象和面貌与唐朝和拜占庭截然不同，其图案纹饰、书法艺术、各式工艺美术品的设计制造、美观精致的瓷器和宏伟的建筑独具特色，而其在交流中融合创新的特点则与唐朝和拜占庭异曲同工，并相互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艺术历史内容。

第三时期：丝绸之路艺术转捩与蜕变（公元 10 世纪—公元 19 世纪）

公元 10 世纪到公元 19 世纪，是丝绸之路艺术史的第二个千年，是转捩期和蜕变期。这一历史时期，影响人类历史的要素及结构趋于复杂。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世界格局变化加剧。中国两宋及辽、金、西夏对峙并存，蒙古人西征，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兴衰，文艺复兴，发现新大陆，开拓新航线，工业革命，郑和下西洋，欧洲中国风，西风东渐，等等重大的历史现象，几乎都与丝绸之路的兴衰演变相关。同时，“几个主要宗教或思想体系在互相影响下，都有所重组更新与修正。中国的宋明理学与心学、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中国化、伊斯兰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等”[③]，这些世界重大历史和文化现象对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第五时段，公元 10 世纪——13 世纪

这是丝路艺术转捩期，转捩是重大变化，也是关系趋于复杂。其中与丝绸之路艺术演变关系重大的因素诸多。最重要者：一是陆上丝路受阻衰落而海上丝路兴盛，由此带来艺术交流和创化的新样态；二是蒙古西征对世界冲击，地缘政治重构，横跨欧亚的世界史在蒙古时代揭开第一页，“它把亚欧整个大陆连在一起，使得东西之间有了更多联系”[④]；三是拜占庭与阿拉伯伊斯兰关系的演变对世界影响深远。

海上丝绸之路崛起，中国古典艺术进入巅峰时期，中外艺术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从宋朝开始，中国文化艺术进入集大成和巅峰时期，外来文化艺术的中国化结出硕果，这不但影响了中国的艺术格局，也影响了其他地区丝绸之路艺术的面貌。自汉至唐，丝绸之路东段中国艺术体现出的特点是强

① 参见石云涛：《中国陶瓷源流及域外传播》，第 55 页。
② 参见范梦：《东方美术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年，第 173 页。
③ 许倬云：《观世变》，第 31 页。
④ 葛兆光：《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文史哲》2022 年第 4 期。

大的容纳之量和消化之功。这时期主要是接受消化异域文化艺术的时期,开疆拓土、对外开放、广泛吸收、交融创化是这时期中国艺术的主要特点。“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在不断地开拓、丰富、提炼、完善之后,到了宋代,中华艺术之河流入了一个集大成的时代。”[①] 有学者指出,宋代艺术的转型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崭新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展开;第二,文人集团的壮大;第三,市民阶层的崛起。宋代社会历史性转折,“创造了一个广大而富裕的民间社会,为艺术脱离对宫廷的依附,脱离对贵族的依附,自信而朝气蓬勃地走向街市,走向乡村,走向世俗,走向大众,铺平了道路”[②]。从丝绸之路视域来看宋代的历史转型和艺术转捩,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宋代对外来文化艺术的吸收已到了融合创化形成独立艺术体系的阶段,特别是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发生重要转折,艺术改变了对宗教简单依附的局面,已经内化为对艺术思维方式的建构。从盛唐气象到缠婉宋风,审美风格也发生了重大嬗变。“中国文化的进程从鼎盛期的唐代过渡到转型期的宋代,从开放的唐文化过渡到封闭的宋文化,从古典文化的巅峰过渡到近代文化的滥觞,完成了一次极大的历史转折和精神递嬗。”[③] 丝绸之路东段的这种艺术转捩,也是蜕变和新生,对东亚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瓷器、绘画、建筑、石刻、书法、服饰、音乐、舞蹈等,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并自成系统,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和而不同。中国宋元时期,形成稳定鲜明的中国艺术系统,中国艺术对外国的影响力逐渐加大,特别是外销瓷对世界瓷器制造的影响,中国绘画、书法对东亚的影响也日益显现。丝绸之路上中西方艺术元素的融合,在宋代发生了重要变化。

海上丝路与瓷器外销中的艺术。海上丝绸之路起于秦汉,唐代有重要发展,宋代以后更加繁荣,通向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阿拉伯至东非沿海诸国。瓷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东段的宋代是中国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是文明程度很高的时代。自唐五代陶瓷在亚非诸国的流行至宋初,这时期是瓷器外销的第一个高峰期。宋至明初是瓷器外销的第二个高峰期。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的外销瓷器,面向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和南亚、西亚大部分国家及非洲东海岸等,几乎覆盖了南海海域、印度洋海域和东北亚地区。有研究认为,公元12—13世纪,泉州海外贸易臻于极盛,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增加到100多个。宋元时期的泉州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景观,有印度教石刻和名种宗教艺术交融的雕刻遗迹,其中印度教石刻达300多件,如保存在开元寺的三组印度教神庙遗物——狮身人面女像浮雕石刻。泉州地区海上交通贸易发达,成为世界各大宗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明教)、犹太教等的汇聚之地[④]。由泉州可以推想其他沿海港口城市的类似情况。宋元陶瓷在亚非诸国的畅销,也引起了各国对中国陶瓷的仿制热潮。瓷器的造型、纹饰具有中国特色,又受到外国接受者欣赏兴趣的影响而不断变化。中国的绘画语言承载在外贸商品中,也随之向西方传播。以瓷器、丝绸、雕刻杂件为主的艺术工艺品通过海陆丝绸之路流入了欧洲。当这些物品出现在欧洲的时候,中国传

① 廖奔:《宋代的艺术》,《人民政协报》2016年10月10日。
② 廖奔:《宋代的艺术》,《人民政协报》2016年10月10日。
③ 廖奔:《宋代的艺术》,《人民政协报》2016年10月10日。
④ 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第90、91页。

统艺术不知不觉地被临摹转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欧洲古典绘画[①]。除了瓷器外销之外,绘画、书法等成就辉煌,手工业发达,纺织、造纸、印刷等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儒家得到佛教的形而上思维的充实之后,转变为画家和诗人的无限灵感源泉[②],宋代的文学艺术全面深化发展,构成丝绸之路东段特殊的艺术景观并影响到东亚艺术的嬗变。

蒙古西征与十字军东征对丝路艺术的影响。公元1219年,蒙古开始西征,先后占领亚欧各地,实行军事统治。蒙古西征和入侵中原,冲击世界地缘政治,充满暴力和恐怖,给中国与欧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绿洲丝绸之路中国段受阻,但中亚仍然利用这条商路。中亚从蒙古的入侵中恢复后,艺术中心重新建立起来。公元13世纪末—14世纪初,在蒙古帝国境内,商业有了显著发展。从燕京经哈剌和林到中亚、近东和伏尔加河流域的道路上,商队贸易又重新活跃起来。另一方面,中国蒙古统治者还从国外和中国其他地区如中亚、西亚、西藏以及中印半岛等地招聘了一些著名学者、建筑师、雕塑家、书法和画家等来为蒙元帝国服务[③]。前蒙古时期的技能和传统不但得到恢复和发展,还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不同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共同组成了新的娱乐和表演艺术。呼罗珊和阿姆河以北地区的戏剧和表演艺术以及节日庆典的表现形式经历了一场质的变革[④]。元代青花瓷输入波斯以后,波斯画家多模仿中国作品,在绘画中亦采用龙、凤、麒麟等中国传统图像[⑤]。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在欧亚大陆上经历了前后8次十字军东征,绵延两个世纪。十字军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财产损失,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欧洲与地中海地区,甚至远到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字军在东方的发展促进了地中海地区内部的往来交流,在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后,阿拉伯瓷器工匠的百年烧瓷技艺与金属釉技术流传到了地中海西部地区,还有丝绸、牙雕、圣物盒和金银器等进入了拉丁欧洲,拜占庭艺术中保存下来的古典传统风格因此得到广泛传播。欧洲的手工艺人同样从伊斯兰传统装饰艺术、人物或花草中得到启发[⑥]。丝绸之路艺术在动荡的年代曲折发展。

艺术交流的多样与宗教艺术的新变。公元10世纪,拜占庭艺术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一个让哲学家、学者和历史学家尽情复兴艺术和文化的时代,一个大规模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创立各种学院特别是法学院(培养法官以基督扩张之后的帝国的运作)的时代”[⑦]。拜占庭艺术到了公元11、12世纪,其艺术的发展就已不仅仅停留在对古典原作的单纯模仿上了,而是从古希腊艺术的启迪中获取创作的灵感,进入到一个着力创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作品的新时代[⑧]。罗马晚期的艺术显露出与小亚

① 参见龚之允:《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5页。
② 参见[英]迈克尔·苏立文:《中国艺术史》,徐坚译,第77页。
③ 参见[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第12页。
④ 参见[俄]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第3卷,马小鹤译,第547—549页。
⑤ 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第95、99页。
⑥ 参见吕章申主编:《地中海文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北京: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第177页。
⑦ [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109页。
⑧ 参见沈坚:《希腊化与拜占廷帝国》,《史林》1995年第1期。

细亚、叙利亚、埃及等艺术形式的结合,并在教堂建筑、圣像画、壁画、细密画等方面有重要发展。波斯画家吸收了古埃及和巴比伦宫廷中画在羊皮纸和象牙板以及墓室珠宝盒上的小型绘画和镶嵌画的方法,借鉴了欧洲中世纪的手抄本圣经画和祈祷文附图,学习了中国画工笔花卉的技法,将东西传统美术中的许多优点消化融会在一起,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波斯细密画。有专家指出,波斯细密画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初期,受到了中国绘画的影响。中国绘画对波斯细密画的影响,最初是通过蒙古人为中介而产生的,这种影响从元代延续到明代,逐渐与波斯本土的传统融合,成为波斯细密画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公元12世纪,真腊国(柬埔寨)的吴哥窟建成,其艺术特色独步天下,其与印度教、佛教的密切关系及其本土化令人惊艳。1370年,中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帖木儿王朝。它通过不断地对外战争,致使数千名手工业者、艺术家、学者以及大量文物从被征服土地上运往撒马尔罕和马维兰纳赫尔的其他城市,以兴建大型建筑物、陵墓、大清真寺、豪华的宫殿,这些建筑已成为14世纪末中亚雄伟壮丽的建筑艺术古迹。

第六时段,公元14世纪—公元19世纪

这个时段是丝绸之路艺术曲折蜕变时期,丝绸之路出现空前的重大变局。“1368年明朝建立,蒙古人北撤,至少在东部亚洲,历史就发生了转折……在蒙古时代开始联结的欧亚世界,又从合而离,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各有秩序的历史区域。”② 丝绸之路东段的中国经历了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1644—1911年)的兴亡和社会变迁,其间郑和下西洋的举动非凡而结果令人深思;丝路西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延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覆灭。从公元15世纪起,环东海、南海,也就是“东部亚洲海域”,凭借政治上的朝贡圈、经济上的贸易圈以及文化上的知识圈,重新叠加成一个纵横交错而又互相联系的“历史世界”③。继起的大航海、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世界性事件,改变着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也改变着世界及其艺术的表达,为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结和其艺术的蜕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也为新千年丝绸之路及其艺术的复兴打开了新的空间。

文艺复兴对丝绸之路艺术的延伸和超越。14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思潮,重新发现希腊罗马文化艺术贯通了一千多年来的历史精神。这一复兴运动发生于丝路之路西段节点的意大利,一定意义上是丝绸之路传统的继续,也是对人类文艺历史的回顾、反省。所以,从丝绸之路的视域看文艺复兴,或许会对人类艺术的历史有新的感悟和理解。复兴意味着对某些永恒的经典的重新肯定,也意味着它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文艺复兴是反对神权、解放人性的文化运动,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艺术与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确立了文艺发展的方向。社会开始重视具有专业技能的能工巧匠,重视作为个人的画家和雕塑家。雕塑艺术借鉴希腊罗马古典形式,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似乎又复活并超越了希腊罗马帝国艺术。文艺复兴并不只有象征意义,有些艺术家去到意大利发掘艺术技巧,在对古典艺术兴趣的复苏中,表现新的思想意识,创造了大量的艺术杰作。16世纪至18世纪,希腊神话在欧洲精英阶层的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的用具和住宅装饰中,

① 参见范梦:《东方美术史话》,第152页。

② 葛兆光:《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文史哲》2022年第4期。

③ 参见葛兆光:《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文史哲》2022年第4期。

诸神与英雄们的爱情故事成为最受欢迎的主题,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们幻想中的地中海。对希腊罗马文艺的复兴,是轴心时代以后人类的又一次觉醒。觉醒的民族进入新的“历史结构”中,而一些民族注定要经历痛苦而后才能痛定思痛。中国对世界新潮的欲拒还迎,直到20世纪才有真正的反省,但在艺术上则多有认可和接受。

大航海对丝绸之路艺术进一步交流的推动。大航海使人类走出了丝绸之路的既有领域,也推动了古老的丝绸之路出现新气象。15世纪中叶,以“三宝太监下西洋”为标志的中国航海事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郑和下西洋和欧洲人发现新大陆,虽然动机和结局不同,但都有历史意义。1492年到1519年,哥伦布和麦哲伦的环球之旅,证实了地球是圆的,打开了欧洲对世界的眼界,也带来了对外贸易和经济的扩张,对完成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转变起到了作用。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地的孤立状态,促进了世界物种和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分布。新大陆的发现,也突破了丝绸之路几千年的网路范围,开辟了新的航线,这是对丝绸之路的超越,也是对丝绸之路上积累的人类交往交流经验的继承和发扬。威尼斯和大海相连,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城市,它的强大和财富来自于它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海上贸易中的战略地位。16世纪初以来,伴随着资本的大量注入,印度的艺术、建筑和文化也开始走向繁荣[①]。中国的丝绸、瓷器都随着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输到欧洲。另外,中国的很多劳工也从中国的本土来到东南亚,参加了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岛国的香料生产和运输、贸易。自1738年开始,对庞贝和那不勒斯附近的赫库兰尼姆等罗马小城邦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古代有了重新的认识。西洋绘画对清前期宫廷乃至民间绘画也产生了影响。欧洲传教士与西洋绘画的传入——利玛窦与西洋绘画的初传,从南怀仁到郎世宁——清前期西画的影响,这些传教士画家客观上为中国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成果,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京历代王朝的都城建筑各有偏重,元朝全力建造大都新城,明朝侧重构筑宫殿、陵寝、各类礼制建筑,清朝则偏爱营建山水园林[②]。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群,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建筑艺术表明西方的建筑风格和技巧在这时被接受和融合创化。大航海改变了世界相互联系的路径,也促进了东西方艺术更快地交流交融。

古丝绸之路中段艺术的余辉。1526年,来自中亚的突厥蒙古人领袖巴卑尔攻陷德里,建立莫卧儿帝国,印度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莫卧儿帝国到了阿克巴大帝时代达到鼎盛。诸宗教和平相处,文学、建筑、艺术、绘画再度繁荣。穆斯林的统治为印度文化带来了新的要素,大批下层印度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对艺术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举世闻名的泰姬陵、德里红堡是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杰作。14世纪末—15世纪上半叶,帖木儿帝国处于强盛时期,它垄断了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全部过境的国际贸易活动。在其疆土上,大量修建清真寺和各种皇家建筑。15世纪初,在波斯,类似的辉煌建筑同样拔地而起。波斯的建筑融合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各民族的艺术成就,构成自己独特的雄伟壮丽的风格,发展出了完全可以与欧洲文化繁盛时期相媲美的视觉艺术,书籍、书法和其他视觉艺术,

① [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234页。

② 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第120页。

特别是细密画开始走向繁荣[①]。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千年帝国拜占庭灭亡了。这一事件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16世纪初叶,帖木儿帝国灭亡,中亚出现了乌兹别克国——昔班尼王朝(在马维兰纳赫尔境内)和哈萨克国(主要在谢米列契境内)。中国清王朝统一后,又开始与中亚各国发生经济贸易往来,古老的绿洲"丝绸之路"又焕发了青春[②]。这表明,丝绸之路虽然历经劫难,但其内在的生命力依然充沛,而艺术则既受制于地缘政治的变迁影响,但又有其超越性,被征服者的文化艺术常常征服了军事征服者。

丝绸之路中国风与古典艺术的终结和蜕变。欧洲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流行"中国风"并成为时尚。随着16世纪欧洲人发现远东以后,中国与欧洲之间频繁的贸易活动再次兴起。公元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艺术出现"中国热"。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漆器、珐琅等工艺品,引起了欧洲诸国的皇室、贵族、收藏家和艺术家的浓厚兴趣。在欧洲艺术界特别是建筑装饰和工艺美术领域,出现了追求"中国趣味"、崇尚"中国风格"的热潮。据专家研究,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随着中国与欧洲各国直航通道的开通,瓷器成为中国外销欧美市场的大宗商品。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外销达到高峰,行销范围遍及亚、非、欧、美各洲,景德镇窑的青花、五彩及德化窑的白瓷等风靡世界。中国广州、日本长崎、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葡萄牙里斯本、荷兰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英国利物浦……许多贸易港口成为瓷器贸易中心,青花瓷也成为元代以后外销中亚、西亚等阿拉伯地区的主要中国瓷器品种[③]。18世纪,东方艺术引领潮流,充分证明了欧洲社会对东方和土耳其文化的迷恋。而对东方异域风情的向往同样体现在建筑、音乐和服饰风格、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方面。欧洲金银器器型或带有特殊纹饰图案的仿造瓷器成为家族纪念品或观赏艺术品。据研究,外销瓷器的装饰图案有了新的发展,艺术内容和方法有很大提高。中国的阳伞系列纹饰、人物和整体布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传递了浓郁的中国风情。历史事件纪念瓷,欧洲宗教、神话故事主题瓷器出现了许多耶稣瓷,最常见的是盘心绘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图案,十字架两旁侍立着圣母和圣约翰,反映了各朝崇尚的生活习俗、流行服饰、装饰画面。广彩满大人图案多为清朝官员家庭生活、花园游玩、狩猎等场景,以艺术性和写实性兼具的生动画面,为欧洲社会提供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珍贵图像资料。纹章瓷上绘有欧洲贵族家族的徽章,镌刻欧洲贵族历史公侯伯子男王冠图案。贴花和透雕图案紫砂茶壶最受欧洲皇室贵族钟爱。器型及图案既有传统的中国风格,也有不少融合了西方元素[④]。18、19世纪中国出口到欧美国家的外销画,因其多以描绘中国的市井百态、港口风光、风土人情、花鸟植物为题材,深受西方顾客喜爱,是摄影术发明之前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最直观生动的物质载体,因此常被来华的外国商人、水手作为馈赠亲友的最佳礼物选购回国。目前存世的外销画有油画、水彩画、通草画、象牙细密画、玻璃画等品种,以水彩画和通草画存世的数量最多、流传最广。而

① 参见[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197页。
② 参见[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第13页。
③ 参见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第6页。
④ 参见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第8、118页。

广州作为清代外销商品的主要出口港,是清代外销画生产和销售的最重要口岸[①]。18 世纪,洛可可艺术曾受到中国明清工艺美术的影响,瓷器的艺术性和国际化水平大大提升,在建筑装潢、绘画、家具、雕塑上的复杂的形象和精细的图文出现了中国艺术元素。丝绸之路艺术随着世界的开放而更具互动性。

第四时期:丝绸之路艺术重新发现和复兴(公元 20 世纪—)

第七时段,公元 20 世纪—

丝绸之路艺术的重新发现。从一定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及其艺术是被重新发现的。19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大发现时代。如果说 15 世纪是人类对地理的大发现,那么,20 世纪就是人类对历史的大发现。考古发现重写了历史,也正在改写艺术史。古埃及的发现,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克洛伊城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发现,古印度哈帕拉文明的发现,吴哥窟的重新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 1601 年),中亚文明的发现,殷墟的发现,中国彩陶及其诸多文化区系的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三星堆的发现,良渚文化的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南海一号沉船的发现,近期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的发现,青藏高原皮洛遗址的发现,等等。在人类失落的文明中,艺术发现是最重要的内容。考古提供的关于艺术源头和艺术内容的物证,与温科尔曼写艺术史的时候,黑格尔以理念的感性显现构建艺术史的时候,其丰富程度无法相比。这些发现也打破了近代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艺术历史逻辑。其中,丝绸之路艺术史是逐渐清晰的最重要的历史现象。

丝绸之路艺术新千年变局。20 世纪是新千年大变局的时代,东西方各以反传统而创造了新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变易。丝绸之路艺术全方位、多层次地发展变化,形成新的艺术格局,艺术的观念、内容、方法、技巧、风格在空前的大交流、大冲撞、大融合中获得发展。标新立异的创新,过犹不及的反拨,科技手段带来的艺术载体、创作手法、传播和接受方式的变化,是延续几千年的丝绸之路艺术的转折、更新,也是新的开端和拓展。东西方的反传统中包含了东西方艺术的互补,其巨大的变化中,有着几千年丝绸之路艺术提供的传统经验和方法积累。

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当代发展。发掘和深入研究丝绸之路艺术史,将对电子化与全球化下时代艺术的嬗变发展提供不竭的资源和启示。艺术设计、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电影、电视、纹饰图案等都可以从丝绸之路艺术中汲取养分,这不是复古,而是复兴中的创新。丝绸之路是人类的历史记忆,也是依然有现实意义的精神资源。文明交汇、人员交往、物质交流、文化交融、思想交锋是永恒的现象,人类从宗教艺术的“金规则”中、从艺术负载的文化认同中、从艺术的审美享受中可以汲取共同相处的经验,为做最佳的选择提供启示。

对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分期,是从丝绸之路艺术史总体性和纵向历时性的维度所做的探讨,好处是便于宏观把握,不足是不利于对丝绸之路艺术门类及其交互性关系的深入把握。笔者以为,丝绸

① 参见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第 6、7 页。

之路艺术史的书写应该有多样的范式和不同的体例,可以有丝绸之路艺术通史,可以有丝绸之路艺术断代史,可以有丝绸之路艺术类型史,可以有丝绸之路艺术风格流变史,也可以有丝绸之路艺术思潮史,等等。而建构怎样的书写体例和范式,主要取决于哪些艺术现象和艺术作品可以进入丝绸之路艺术史的视域中,这需要另文专题探讨。

艺术,是最容易打破隔阂、从有意味的形式着眼而形成审美共识的领域,它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丝绸之路艺术遗产是人类共有的记忆,是人类精神史的肖像。对丝绸之路艺术分门别类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而对丝绸之路艺术史整体内蕴的把握和意义的理解及价值阐释,我们还是小学生,研究之路还很长,尝试建构丝绸之路艺术史只是迈出的一小步。

责任编辑:冯济平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Silk Road Art (Part II)

Cheng Jinch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106, Chin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2nd century BC to the 19th century AD, the Silk Road experienced a course of about two thousand years. As an important part and visual expression of human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ilk Road art has been limited by various factors of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and also benefited from the exchange opportunities and integration power of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lk Road art and determine its historical trajectory. From the 1st century BC to the 9th century AD, the world was a tim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first large-scale materi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convergence of mankind. The Silk Road art exchange shifted from regional to global level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fields of art was enhanced and culminated. From the 10th century to the 19th century AD, the world changed more rapidly and new continents were opened up. The intensive communication in large regions complicated historical elements and system structure.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lourished and the the Silk Road art underwent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20th century was a period of rediscovery and revival of the Silk Road art, as well as a period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adigm of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art,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history and the dynastic history, can also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styles such as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art categories,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ilk Road art,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art trends, and so on. This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Silk Road; art history; long-period characteristic; paradigm exploration

钟表秩序、文明转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耿 传 明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 现代性的本质人表现为人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客体、人为世界立法的理性化的进程,这种现代性理性秩序的确立是通过时空观念的现代性转型完成的,将“劳动时间”作为度量人生命的标准和尺度是现代化历史对人类最大的改变之一。钟表时间的采用成为这种改变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一种去主观化、人性化、立足于客观的现代性的理性秩序的确立。现代时空观念的客观化、脱域化与功利化与人的生命体验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深刻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文学作为时代心灵的敏感触角,极为全面、深入地记录了这种文明转型的阵痛与激荡,其中既表现为追求合理性化的正面现代性诉求,也表现为对抗这种以钟表秩序为标志的理性化扩张的反现代性诉求,这在苏曼殊的创作中有较为充分的表现。从这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中,我们才能把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和整体性。

关键词: 钟表秩序; 时空意识转型; 文学现代性; 苏曼殊; 正反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5-0035-14

现代性的本质人表现为人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客体、人为世界立法的理性化的进程,这种现代性理性秩序的确立是通过时空观念的现代性转型完成的,将现代劳动时间作为度量人的生命的标准和尺度是现代化历史对人类最大的改变之一。钟表时间的采用成为这种改变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一种去主观化、人性化、客观导向的现代性的理性秩序的确立。现代性的这种立足于主客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与追求无限增长的现代资本的融合,迅速推动了资本主导的现代性的世界秩序的全球化扩张,由此产生了16世纪以来的世界全球化浪潮。1872年,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冒险,那就是主人公与人打赌在八十天内环绕地球一周,这种念头对于当时连地球是圆的还没普遍接受的中国人来说近乎是一种天方夜谭,然而在西方这已成为触手可及的目标。中国人对日常生活的西方化的鲜明感受是记时方式的变化,也就是从以自然变化为参照的计时方式向脱离自然的钟表机械计时方式的转换,前现代的计时方式带有很鲜明的农耕和游牧文明的色彩,带有一种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模糊性,而后一种计时方式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它带有挣脱自然、支配自然、将自然客体化以为我所用的意味。近代中国代表着西方文明传入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现代钟表的出现,据学者考证:1853年,上海董家渡教堂建成,在山墙中部安放大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现代以来儒家士人形象嬗变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21BZW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耿传明,男,山东菏泽人,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自鸣钟,是上海华人普遍熟悉和适应西方计时标准的开始。其后更多的自鸣钟陆续出现,到19世纪60—70年代,钟点标准已经成为上海人的通行时间标准。正如当时《申报》上的"竹枝词"所言:"大自鸣钟十丈高,无差秒刻别分毫。行人要对腰间表,仔细抬头看几遭。"[①] 这都形象地说明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时间秩序、制度的皈依,其中隐寓着边缘对中心、落后对先进、野蛮对文明的认同和膜拜。计时方式变化的背后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洋场谋生的工商业者的生活已经必须以钟表之类的计时工具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工厂企业也基本上都采用钟点制来规定上下班时间。由此,计时方式的变化犹如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其后一系列的变化纷至沓来、不期而至,开启了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由浅入深、由部分到整体的全方位的转型。文学作为时代心灵的敏感触角,极为全面、深入地记录了这种文明转型的阵痛与震荡过程。本文着重于在现代性时空意识转换、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从正反现代性的双向互动中考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一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时空的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是现代性得以发生的深层动力;在逻辑上,只有时空断裂分离,才可能进一步引导出时空抽离,而只有时空分离,才可能使许多社会组织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无限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进而给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景象和秩序,这种跨越时空的制度复制、文化移植能力是以往任何传统社会都不可能具备的。因为传统社会的时空意识的特点就表现为时空的合一,人们对时空的感知都是具体的、地域的、自然的、生活化的,而现代性的发生则依赖于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时空分离的完成是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步,先是"空化"时空。即所谓"随着现代性的到来,时间和空间才都被普遍化,并被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时间和空间成为'空的'范畴,尤其是被当作存在的不同层面相互分开时。时间和空间的变空已经表示出来,它成了现代性的体制性推动力的组成媒介。只有当空间—时间抽象的、空的层面完全被融入日常生活的构成之中时,现代性的去语境化组织才成为可能"[②]。也就是说,只有完成去语境化也就是抽象化和普遍化才能完成重新整合,所以现代性首先要求的是将个体从其所附属的家庭、社会组织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具有同质性的抽象个体,催生原子化的同质个人观念,这种原子个体才能化身为现代性社会大生产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参与并推动现代化的完成,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性对人的"拔根"过程。第二步,便是时空分离。即所谓"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区分制',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域;并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③]。时空"脱域"另一方面是"定序与再定序",这种分化进一步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为它的再结合提供了基础。

马克思在1857年写的《资本论》手稿中谈到资本扩张的本性时这样说到:"资本按其本性来说,

① 海昌太憨生:《松滨竹枝词》,见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428页。
② [法]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24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通讯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① 正是这种“用时间征服空间”的激情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换，在对机器的崇拜取代了对上帝的崇拜后，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社会学的创始人法国人孔德所说的科学——实证阶段。孔德认为，人类的精神发展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虚构阶段，在此阶段，人们追求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终极原因，并把这些原因归结为超自然的主体，也就是上帝，将一切都归之于神的安排；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抽象阶段，在这一阶段，神学世界观被形而上学世界观取代，人们以抽象的“实体”概念来解释各种具体现象；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认识到人类精神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不再追求玄学的思维方式，立足于发现现象的实际关系和规律。科学思维的特质是用定量方法来研究大自然，它的第一步就是有规律地测量时间，由此也就推动了钟表的出现，而钟表对于现代文明意义远在蒸汽机之上。美国著名科技史家、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开山鼻祖刘易斯·芒福德在其《技术与文明》一书中这样谈到钟表的出现在人类历史的意义：“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在时钟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是机器的出色代表，也是机器的一个典型符号；即使到了今天，时钟仍然无处不在，为其他机器所不及，在现代技术的发轫阶段出现了精确而自动的机器，这种完美的技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努力才被推广普及到工业活动的各个领域。”② 他认为钟表的作用主要在于“时钟还是一种有能源驱动的机件，其‘产品’是分和秒；就其本质而言，它把时间和人们的具体活动的事件分离开来了，帮助人们建立这样一种信念：即存在一个独立的、数学上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这是科学的专门领域。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里，并不很容易找到这种信念的基础。”③ 由此，钟表的出现，不但可以告诉人们时间，而且起到了协调人类活动的作用，从而使得“守时”成为现代人的第二天性，也使得人们的时间记忆由日出日落、四季轮回的自然变化转化为脱离自然的普遍性的、标准化的钟表时间。对于时间的自觉、迷恋与追求以及将时间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尺度就成为现代之为现代的突出特征。在宗教信仰主宰一切的中世纪，唯一真正的时间就是永恒，唯一真正的空间就是天堂；而现代性则是背离永恒和天堂，开始在世俗生活中求救赎，由此现代时空之旅开始启程，它是以人的时空对神的时空的取代为标志的。芒福德认为自机械时钟在 14 世纪的欧洲出现之后，它“不管寒来暑往或白天黑夜都能按小时告诉人们时间。这种仪器很快传出了寺院，按时传送的钟声使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律性。钟楼上的大钟几乎可以说是标志了都市的存在。从遵守时间到按时服务到按时记账再到按时分配。在这个进程之中，永生和来世逐渐淡出了人类活动的度量标准和兴趣中心了”④。钟表代替上帝成为了人的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世俗化的时间秩序取代了宗教的神圣秩序，所以上帝之死也可以说是死于钟表之手，也就是死于为外在的时间掌控一切的现代社会的时间制度之手。

从时空观念转换的角度来看，在西方，现代时空观的确立表现为绝对时空观对亚里士多德的空

① [德]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6 页。
② [美]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年，第 16 页。
③ [美]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第 16 页。
④ [美]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第 15 页。

间有限观的取代,但绝对时空观否定时空和物质、运动之间的联系,这也正是其偏颇所在。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助成了绝对时空观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牛顿力学的特点就是承认空间和时间是和物质一样具有独立性的实际存在,但却把它们看成与运动着的物质相脱离的①。对于人来说,绝对时空观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一种物的时空观,而非人的时空观,离开了人的主观心理感受,这种时空观就是外在的、不完整的、片面的、异己的。

由钟表而开启的对机器的崇拜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和满足,欧洲从14世纪开始的机器文明,先是使人们成为了时间的服从者,守时的人,又接着使人成为时间的节约者,美国精神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时间就是金钱";节省时间就是创造金钱,浪费时间就是失去金钱,由此崇拜金钱也就是现代人的崇拜时间。现代时间的文化观念来自于犹太——基督教救赎史到启蒙主义历史哲学的演变和发展,它社会存在的基石则是来自于全球性市场经济交换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现代时间将单向的朝着未来的无限进步作为其目标,由此完善的人性、理想的社会制度以及一切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难题、无法避免的困境都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得以实现,由此也就促成了乐观主义的现代人的历史进步主义信念,相信未来一个至善无恶的时代终将到来。这是将天国从彼岸移向此岸,将其纳入到现代时间序列之中的努力。然而,这种祈求在时间中得救的努力给人们最终带来的仍是一种沉重的幻灭之感,威廉姆·福克纳的创作曾被评论家称为是"迷路的现代人的神话",他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集中表现的就是在这种现代时间的进程中,迷路的现代人的迷惘与矛盾、希望与绝望。在世俗化的现代潮流冲击之下,支撑他们精神世界的传统信仰轰然倒塌,他们陷入了一种颓唐失落之中,茫然失措,曾经极力想捍卫家族荣誉的长子昆丁最后因幻灭绝望,跳河自杀。作家在写到他的最后时光时,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对主人公手表的描写:

> 窗框的影子显现在窗帘上,时间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我又回到时间里来了,听见表在嘀嗒嘀嗒地响。这表是爷爷留下来的,父亲给我的时候,他说,昆丁,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是谬误的;……这些人类的所有经验对你祖父或曾祖父不见得有用,对你个人也未必有用。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他说。甚至根本没有人给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他是被那些小齿轮轻轻的喀嚓、喀嚓声折磨死的。②

既往人们谈到现代人杀死了上帝,但究竟上帝是如何被杀死的,语焉其详,而福克纳则直接指认钟表就是杀死上帝的最大的元凶!因为外在的时间经验主要表现为一种功利性的算计和筹划,钟表的滴答声使人们疏远了自然,遗忘了上帝,削弱了上帝的权威,也就杀死了永恒,使得人的一切活动都落入时间的掌握之中,所以追求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变得已无可能。小说中的昆丁作为家中的长子,无

① 参见李颂主编:《时空与相对论》,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② [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84、85页。

比珍视康普生家的家族荣誉。然而时移世易，这种荣誉，如今却决定于他妹妹那脆弱的朝不保夕的贞操之上，“其岌岌可危的程度，不下于一只置放在受过训练的海豹鼻子顶端的地球仪”。他无法去改变他人，更无法去改变这个钟表秩序统治下的世界。所以无力回天的他只好一死了之，在跳河自杀前把手表砸碎，用死亡杀死了难以忍受的时间，进入了永恒。与他一样摆脱了时间纠缠的是他的小弟弟白痴班吉。而最适应于这个时代的则是他的二弟杰生，他已经顺应时代，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唯利是图、自私冷酷、不择手段的“斯诺普斯主义者”（实利主义者），昆丁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与现代性潮流逆向而行的保守主义态度。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保罗·萨特这样评价福克纳的这部小说：“福克纳可以把人写成没有未来的存在物……福克纳看到的世界可以用一个坐敞篷车里往后看的人所看到的来比拟。每一瞬息都有影子在他右边出现，而左边是点点闪烁、颤动的光。只有当它们被仔细看去的时候它们才变树，变人，变车子。在这里，过去获得了一种超现实的性质；它的轮廓是明确，清晰和不变易的。不定而闪避的现在在它面前是毫无办法的；现在全是些窟窿，过去的事物，固定，不动，沉默，都溜过了它。”[①] 正如韦伯借用巴克斯特之口道出的发生在新教徒心中的价值转换，“金钱和物质这些身外之物对圣徒来说，本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变成一只铁的牢笼”[②]。这种从轻飘飘的斗篷到沉重的铁笼的变换正说明了清教徒希求靠财富来获得救赎的幻灭。如果说福克纳的小说着重表现的是没有未来的过去，是坐在疾驶的车上向后看的视角，那么与之相对的则是一种坐在疾驶的车上紧盯着前方，将过去和当下都远远地抛在身后的无过去的未来视角，这就是现代性的一种主导性的正面叙事，未来成为现代时间的决定性维度，它取得了对现在与过去的支配性地位，在理想主义时代由未来赋予现在以崇高和激情。人们的目光都盯着未来，由未来赋予当下的生存价值和意义，所以人们用“不远了，不远了或快到了、准备着”等这类对未来的期盼来激励自己、绷紧琴弦，全身心的投入到未来理想的实现之中，由此出现了一切取决于过去的传统思维转向一切取决于未来的需要的现代思维。也就是在现代父需按照子需要的方式“活着”，而不像传统子需按照父指定的样子生活，这就导致的现代性的代际关系、代际伦理的紧张和断裂。当现代性理想主义的激情衰退，一个没有过去，抛弃现在，轻视过程的空洞的未来，给人们带来的只能是茫然和空虚。当人们发现“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之后，人们开始退向内心，专注于自我的欲望和感官享乐，将任何对当下的吸引视为他者对自我的诱导和哄骗，由此产生了浓重的焦虑感与虚无感，走向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20 世纪欧美社会激进的个人主义反叛者的一个象征性行为就是砸碎钟表，所以福克纳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自杀前砸碎手表，不是纯粹的个人性的行为，而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时代社会心理的反应。将现代劳动时间作为度量人的生命的标准和尺度是现代化历史对人类最大的改变之一。现在时间所包含的现代劳动时间与人体生命时间的矛盾，是现代性的深层矛盾之一。当对未来的追求——这种外在超越方式——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则是一种将未来收摄到当下的内在超越方式，并引发了近代以来的指向未来的线性进步时间价

① [法] 让－保罗·萨特：《福克纳小说的时间：〈喧嚣与骚动〉》，俞石文译，见李文俊编：《福克纳的神话》，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年，第 120 页。

② [德]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第 142 页。

值观向古代循环往复时间价值观的回归,这正是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一种对抗。所以尼采的“伟大的中午”、克尔凯戈尔的“当下决断”、薇依的“赤裸的现在”等都是力图从瞩目未来的时间统治之手解救现在的努力[①]。本雅明曾经说过一切文明的历史同时也是野蛮的历史,所以他对于目标以文明拯救野蛮的现代性历史主义叙事抱持怀疑态度。他在写于1940年年初的《论历史概念》中,曾对保罗·克利的一幅画《新天使》做了这样的阐释,“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②]。这场让天使为之侧目、惊恐的力量来自于所谓“进步的风暴”,它指的就是启蒙主义的进步观念以及隐藏其背后的线性历史逻辑,它将现代人裹挟而去,使他们迷失于一种外在的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之道而失去真正实现救赎的可能。而这在本雅明的眼中恰恰成为现代性最大的危机,因为它为恶的释放提供了新的最佳的借口,那就是为了进步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将恶的释放视为进步之必需。由此“回头看”低空徘徊的“历史天使”作为充满断裂和危机的现代性的示警者与“一往无前”的歌德表现的浮士德精神形成鲜明对照,作为现代性的正反两极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由此反现代性也就成为现代性不可缺失的对立面,与现代性差不多同时走上舞台,发挥其所具有的制动作用。两者犹如左右手的关系、相伴相生、不可或缺。与此相通的如鲁迅在《野草·影的告别》中所表达的在明暗之间的徘徊心绪:“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我不愿意!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③] 这是一种“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绝望抗争精神,正因为它是为否定而否定精神的化身,所以它才可能成为永远不能被同化的他者、永远不可抵达的未来以及将时间三维合而为当下瞬间体验的万古太空与一朝风月。

从本质上而言,现代性所带来的触目社会现象便是物化现象,所谓物化现象也就是指人向物转化,于物认同,以致于越来越难以把人和物区别开来,人的情感、认识、感知方式都已无法与“物”相脱离,也就是说传统的灵与肉、心与物的对立日趋消解,前者与后者开始合二为一。20世纪被集中谈论的这个“物化”的概念一般认为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匈牙利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卢卡奇,他用这个词指个人行动的重要性和意义的彻底消失。小说中的人物也从一个“行动者”——行为主体——变成了一个窥视者,只能偷偷地看,成为了一个完全被动的人,而与此相反的是“物的自主性”则大大提升,这与认为物役、心为物役的现代性的历史趋势直接相关。法国哲学家吕西安·戈尔德曼认为:比细节更重要的是世界的结构的变化,物在世界里变成了特有的、自主的现实;人不但不能控制这些物,反而被物同化,人的情感也只有通过物化才能存在,这就是物化的世界结构。“物化”成为20世

① 参见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② [德]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见《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等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8年,第253—254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它和“异化”的概念并驾齐驱，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概念。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中发现了物化现象，结论是资本主义把社会关系都变成了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把每一件事物都理解成可计算、可感可触的东西，他们把一切关系都变成了物化关系，与此相关的文学艺术也都成为物化的产物。一方面人被物同化和淹没，丧失了自主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对人的表现处处与物的存在相关，离开物已无法表现人，物对人形成高压之势，人与物已粘结在一起，无法分开。与此相关的是人的价值观在物化时代也开始发生严重的颠倒，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已俨然变为新的“上帝”，成为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被统摄于科学技术之下。于是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相比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嬗变，正如马克斯·舍勒所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和有机的‘家园’，不再是爱和沉思的对象，而是变成了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①]。这也就意味着自然在现代世界里的降格，由高出于人的被尊崇者转变为低于人的被支配者，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和一种有待完善和加以理性化设计、改造的半成品。而“诗”也由以人心体天心，从而文以载道、为万物立法，转向人的自我抒情和客观书写。文化成为人的主观意见和科学客观知识主导的领域，超感性领域的玄学失去了文化合法性。科学技术的发展虽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果，那就是与昌明的科学技术恰成对照的人性的堕落，美德的沦亡，人的道德意志的衰退。爱因斯坦对此曾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们认为今天人们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真是罪孽！我找不到任何办法能够对付这个灾难性的弊端。人比他所居住的地球冷却更快。”[②] 理性进步与道德退步作为共生悖论，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

现代性颠覆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时空模式，传统人是在时空合一中体验世界的，而现代追求的则是时空分离，“以时间消灭空间”；传统时间观具有与生命合一的特性，而现代则树立起超生命、超个人、超主观的绝对时空观念，将人物放置于一个客观化的物质主义视野之中，像强酸一样融解了一切固有的价值，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③]

现代性的时空观念只能立足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之上才能得以扩展，因为只有建立起这种将物质与时空脱离、时间与空间脱离的观念，才能最大可能的将现代性的制度体系推广到整个世界，也就是将其由地方性经验转变为普遍性知识，将现代性的成功经验由独门秘术转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其次是现代性主要表现为时空压缩以及社会加速所带来的时间结构上的变化，特别是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对时间结构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一个直接

① [德] 马克思·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② [美] 海伦·杜卡斯、巴纳希·堆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72页。
③ [德]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

后果表现为“现在的萎缩”,而“现在的萎缩”代表的是时间整合功能的萎缩,“‘现在’现在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重构时间的职能”[①]。人已经没有能力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的终极之问,而成为在利益驱使下疲于奔命的奴隶。这种人之于时空的主体性的丧失,是时空领域的一个新的变化,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时间与空间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没有脱域能力,依附于人的自然的经验感受之上。而现代性则脱离了这种自然的经验感受,它直接是依赖于钟表这个机械来把握时间的变化,而这个机械是与人的生命脱节的、冷冰冰的、异己的存在。正如卞之琳的《寂寞》一诗所写:“乡下小孩子怕寂寞,枕头边养一只蝈蝈;长大了在城里操劳,他买了一个夜明表。小时候他常常羡艳,墓草做蝈蝈的家园;如今他死了三小时,夜明表还不曾休止。”[②]这道出了现代性钟表时间之外在于人的生命体验的异己性,钟表并不能化身墓草陪伴死后的蝈蝈,它永远不会死亡,因而傲然于一切生命之物,即使作为有限之人对它一往情深,它也无从回应,只是兀自前行,将一切有生之物都抛在后边。这种时间与生命的分离,正是现代性时间不同于传统时间的独特之处,它喻示着人与自然万物的精神关联已被彻底斩断。

钟表的发明制造曾是近代机械文明的最高体现,它也因而成为现代世界本质的一种象征,那就是人和世界的机器化,一种机械化的世界图景的呈现,它与传统有机化的世界恰成对照。机械化的世界倾向于将世界视为是一个物质化的世界,而有机化的世界则倾向于将世界视为一个精神化的世界。这种古今之别与西方哲学史上唯实论与唯名论的论争也是相通的,唯实论重共相和一般,唯名论则重殊相和个别,唯名论推动了现代性的发生,使其后对真理的寻找不是由共相推出个别,而是由个别推向一般,因为共相不是真实,而应转向个体和自然界,这种观念推动实验科学的兴起。此外,唯名论惟有个体才是真实的这一观念经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发挥,使个人生活即私人领域的意义和正当性得到确立,它和自然法结合形成了个人权利等近代观念,这对文学的影响相当深远。也就是说它直接推动了现代自我的发现,而现代自我的发现正是文学现代性的本质所在。

二

清末与民初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人固有的文化意识遭受整体性危机、分裂、重组,在外力压迫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期。从这一时期的文人群体的文化心态变化中,可以充分体会到这种文明转型、古今之变所带给现代中国人的心灵震撼。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文德”与“武功”相对,文人指的即是有“文德”之人,“文德”主要指的是“礼乐教化”;进入现代,文人一般指的是具有敏感的心灵触角、人文关怀以及现实超越性的“知书能文”之士,他们对于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具有一种反思能力,可以通过他们的文化创造呈现人的生存状态,透视人的生存境遇,表现人与世界、宇宙之间的互通和感应。他们可以说是宇宙规则的守护者、发现者,代表的是高出于现实世界之上的超验之维和精神追求。所以美即良知,它是一种对存在的感应,代表的是一种人心与宇宙相通的本原性

①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3页。
② 卞之琳:《寂寞》,见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卞之琳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的直觉。存在与心与美具有同构性，由此将美学的意义由来自西方的知识化转向来自东方的生命化。

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念主要包括从道观时空、从心观时空和从物观时空三种类型[①]，其主要特性表现为它是以一种超越人类造化的视角去审视宇宙万物的。正如《中庸》第二十二章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②]也就是说人与宇宙万物的存在一起都是天地化育之功，因此人不可能脱离宇宙之道而存在，人与宇宙万物都同属于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正如方东美所说，中国文化有一种"机体主义"的思想，"大化流行，自然与人，万物一切，为一大生生之创造力所弥漫贯注，赋予生命，而一以贯之"[③]。所以人与万物就形成了一个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在同样的横贯宇宙的大化之流中生死轮转。与此相应的它也认定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性，即时间与空间的合一。如将天空分为四个部分：东南西北，并将这四个方位转化为早晨、中午、黄昏、夜晚；将空间分为东西南北方，以东方为春季，南方为夏季，西方为秋季，北方为冬季。这些都是以顺应自然为特征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时空观的体现，它是以赞羡、顺应、侍奉、敬畏自然为指向的追求天人合德、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安相守、相互成全、以天道为依归的文化。

中国文明进入现代后，面临的是由一种相安相守、安土重迁、植根土地、乐天知命、天人合德的农耕文明为主导的文明转换成一种争雄斗智、依赖技术、脱离自然、崇拜强者、追求物质和功利的工商为主导的文明形态。这两种文明形态的关系不应是彼此取代、水火不容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融合、锦上添花的关系。简单地说，传统文明提供了我们基本的做人范式、伦理规范和道德理想，从而使我们的生存具有了安身立命之本；而现代文明则提供给了我们科技发明、效率财富、自由和宽裕。前者主要是解决了安所问题，止于至善的问题，是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方向的问题；而后者则主要解决的是"遂生"，也就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问题。现代社会依靠大机器生产所创造的惊人的财富将人类社会由匮乏社会带入了富裕社会，这种富裕社会自然会带来人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等相应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只是消除不必要的克制并非取消一切克制。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消除这种过分的欲望给人带来的烦恼和危害，为人漂泊的心灵找到栖息之地，传统文化的功用仍是不可取代的。现代文化导致这个时间结构上面发生的一个变化，人被过去和未来所吸引、劫持，将自己的人生献祭于过去和未来，以至于忘了当下的生存，此在的在世性。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时空焦虑所导致的生存异化，想象一种纯粹的、绝对的现代，不让一丝一毫的传统混进现代，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幼稚病，一种洁癖性的、断裂式的、完美主义的现代性，是我们需要加以反思和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他们这种绝对化的逻辑背后，是一种将所有文明归零的现代蒙昧主义冲动。而这也正是为传统伦理本位主义文化主导下的中国人所普遍不能接受的。所以在现代性兴起初期，就出现了激进的反现代性的思潮。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被称为诗僧的苏曼殊便是该思潮的典型代表。他在《焚剑记》中写傲世独立的义女、侠客："阿蕙肃然问生曰：'今宇宙丧乱，读书何用？识时务者，不过虚论高谈，专在荣利，若夫狡人好语，志大心劳，徒殃民耳！'生默而不应。他日，又进曰，'女子之行，唯贞与节。世有妄人，

① 参见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梁振杰注说：《大学中庸集注》，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3页。

③ 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89页。

舍华夏贞专之德,而行夷女猜薄之习,向背速于反掌,犹学细腰,终饿死耳。'生闻女言,怪骇而退。喟然叹曰:'此女非寿征也!'无何,生寝疾甚笃。二女晨夜省视,敬事殷勤,有逾骨肉,生深德之。"[①] 由此可知,针对现代性的唯科学主义,苏曼殊的反现代性则走向一种严苛的、决绝的"唯道德主义",它的对立面是工具理性的现代化和追求感性快乐的世俗化浪潮。苏曼殊是一位带有传统主义色彩的民族革命者,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显然与他投身民族革命的初衷相去甚远,由此他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为旗帜鲜明的反现代性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视情如命的情僧,他对摩登女性在感情上的"向背速于反掌"、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嫌贫爱富、拜金主义深恶痛绝。《绛纱记》中的霏玉就是因为曾对他浓情似蜜、已订婚的未婚妻却突然偷偷嫁给了一个绸缎庄主而自裁于卧内。《碎簪记》写"余"的朋友庄湜与两名"丽鬟绝人"的女子的悲情故事。灵芳是庄湜的友人灵运的妹妹,灵运欣赏庄湜的才华,决定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虽然此前灵芳并没有与庄湜见面,但他感激于灵运的情意,决定"寸心已定,虽万劫不能移"。故事中灵芳与庄湜只见过一面,灵芳赠给庄湜玉簪作为信物,庄湜的叔叔想让他娶莲佩为妻,莲佩十分喜欢庄湜,当她知道庄湜与灵芳的感情后,决定退出,甘愿牺牲自己的爱情,但她仍然承受不了失去爱人的巨大痛苦,自杀身亡。灵芳也知道了莲佩对庄湜的深情,认为他们如果结合在一起,会很幸福,于是悄然离去,最后也走上自杀的道路。叔叔为了让庄湜彻底断绝对灵芳的爱怜,谎称灵芳已经和别人订婚,并且打碎了玉簪。一次一次的打击使庄湜病倒身亡,"余"感叹"天下最难解决之事,唯情耳"。三个有情人为"情"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为情而死在其主人公那里成为自然之事、寻常之举,不需讶异也不需解释,其对于情的态度完全是纯真、庄重、专一甚至是严苛的、决绝的,较之传统更为极端和绝对。

苏曼殊对物质主义盛行的西方现代性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暴发户心态持鄙夷态度。正如《碎簪记》中的莲佩所云:"吾意二三年后,当往欧州一吊新战场。若美洲,吾不愿往,且无史迹,可资凭睇;而其人民以Make money为要义,常曰:'Two dollar is better than one dollar',视吾国人,直如狗耳,吾又何颜往彼都哉?人谓美国物质文明,不知彼守财虏,正思利用物质文明,而使平民日趋于贫。故倡人道者有言曰:'使大地空气而能买者,早为彼辈吸收尽矣!'"[②] 可见物质偏至、精神荒芜的现代性对苏曼殊这样的精神至上主义者来说绝非福音。

苏曼殊素有"情僧"之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其出家的目的在于"以情求道",他把爱情视为"灵魂之空气也",认为"情海"并非就是"孽海"——"稍涉即溺"。既然人生在世谁也灭不了情,也撇不开缘,故此可取之路并非以理灭情,而是以理统情、以情化理,使两者各得其所。所以他的"以情求道",并非"以情为道",他没有放弃道之于情的规范、引导、提升作用而走向放任自我的滥情,虽为出家人,但他不愿放弃他的社会责任,甚至将抨击的投枪掷向在其时代颇受瞩目的风云人物,所以,他在道德态度上经常表现出一种清坚决绝的保守性。如《断鸿零雁记》中,三郎赴日途中经过广州,要到常秀寺与师傅告别,"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学暴徒毁为墟市,法器无存"[③],显然他之卷入清末社会变革的志趣、信仰、理想、追求与世俗主义的价值取向大异其趣,而是出于一种反抗种族压迫的激愤和

① 苏曼殊:《焚剑记》,见柳亚子编订:《苏曼殊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年,第224页。
② 苏曼殊:《碎簪记》,见柳亚子编订:《苏曼殊全集》,第239页。
③ 苏曼殊:《断鸿零雁记》,见柳亚子编订:《苏曼殊全集》,第184页。

浪漫主义的热情，与现代性的人义论，人性解放貌合神离。并且他与世俗主义的这种对立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更为激化。他开始将种种追求自由、享乐、利己主义的新派人物当成其抨击对象，认为“女子必贤而后自繇（由）”，甚至说“自由之女，爱国之士，曾游女、市侩之不若，诚不知彼辈性灵果安在也！”[①] 也就是说，他的现代性追求是建立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儒道释合一的道德理想主义根基之上的，可称之为一种将入世与出世合而为一的宗教性的现代性。因此，正向现代性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倾向恰恰是他最为警惕的失德陷阱，所以他推崇传统的“静女之德”，为这种“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的失落而忧心忡忡。他的创作充分表现出生活于新旧过渡时代的人在面对灵与肉、情与礼、圣与俗冲突时的两难、矛盾心态。他对于日渐抬头的时代物质主义、拜金文化的批判，使其创作带有一种与正向现代性逆反的审美乌托邦色彩。面对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大潮，他虚构出一个远离尘嚣的乌托邦作为心灵的净土，如《绛纱记》中主人公遇船难后得救，到了一个小岛：

> 余问老人曰：“此何地？”老人摇手答曰：“先世避乱，率村人来此海边，弄艇投竿，怡然自乐，老夫亦不知是何地也。”余复问老人姓氏。老人言：“吾名并年岁亦亡之，何有于姓？但有妻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耳。”余矍然曰：“叟其仙乎？”老人不解余所谓。余更问以甲子数目等事，均不识。老人瞥见余怀中有时表，问是何物。余答以示时刻者，因语以一日二十四时，每时六十分，每分六十秒。老人正色曰：“将恶许用之，客速投于海中，不然者，争端起矣。”明日，天朗无云，余出庐独行，疏柳微汀，俨然倪迂画本也，茅屋杂处其间。男女自云：不读书，不识字，但知敬老怀幼，孝悌力田而已；贸易则以有易无，并无货币；未尝闻评议是非之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复前行，见一山，登其上一望，周环皆水，海鸟明灭，知是小岛，疑或近崖州西南。自念居此一月，仍不得五姑消息者，吾亦作波臣耳，吾安用生为？及归，见老人妻子，词气婉顺，固是盛德人也。[②]

《天涯红泪记》中也同样写了这样一个世外仙乡。对于“时表”的警惕、对于算计的厌恶、对于金钱的反感，正代表了苏曼殊独特的立于宗教性道德的反现代性立场。这与老庄哲学对于人的“机心”的警惕是一以贯之的，其问题在于“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③]。喜用机心的人，往往陷入的状态与命运是“以巧斗力，其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其极”[④]。人世间，也就是说目的被手段所劫持、心为物役，失去了自己的初衷和主动性。时间亦是如此，本来是手段，你却把它当目的，最终就会为其所制，所以，唐代赵州大师说，“诸人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辰”[⑤]。也就是说，人只有从时间统治中挣脱出来，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如果说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主要强调的是现代性时间秩序的正当性，那么苏曼殊等人的反现代性写作则恰恰强调的是反现代性时间统治的正当性，而现代性的良性状态就来自于在这两种正当性之间寻觅微妙的平衡，两者均不可偏废，犹如人的左右手一般。

---

① 苏曼殊：《断鸿零雁记》，见柳亚子编订：《苏曼殊全集》，第 237 页。
② 苏曼殊：《绛纱记》，见柳亚子编订：《苏曼殊全集》，第 218 页。
③ 庄子：《庄子·外篇·天地》，见方勇译注：《庄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92 页。
④ 庄子：《庄子内篇·卷四·人间世》，见方勇译注：《庄子译注》，第 61 页。
⑤ 聂先编撰，王雷整理：《续指月录》，成都：巴蜀书社，2018 年，第 183 页。

中国现代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有历时性的文明冲突问题又有共时性的文化冲突问题。所谓历时性的文明冲突指的是中国进入现代面临着必须实现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换的问题,它集中表现为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问题,但注重思想文化变革的启蒙主义倾向于将这一冲突表述为现代性的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用一种文野身份的转换实现了自己的文化认同的转化。也就是将西方文明视为现代唯一的单数化的文明,而皈依文明也就只能皈依西方,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而文化本位主义者则认为中西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主要是两种不同的基于不同的文化基因而形成的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他们的文明观多倾向于一种复数化的文明观。也就是说,他们在承认西方不再是蛮夷也代表着一种文明的前提下,强调中国也是足可以与西方并列的另一种文明,中国的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文明基础上的现代化。因此,他们倾向于将中西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表述为一种文化冲突,并强调这种冲突并不会因为现代化的实现与否而消失,文化自主性的消亡意味着文化的殖民化,而文化的殖民化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精神目标的失败,因为现代化不是为了成为他者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即使是具历时性的文明冲突,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善与善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而是两善之间或传统意义上的美德与现代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正当性追求之间的冲突,是不能用简单的善恶、优劣判断来区分的。这种冲突更多的是来自不理解和不认同,而不是罪恶和残酷,典型如中国的刮痧和拔罐疗法,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一种虐待和伤害,而在中国人看来只是一种相当普及且行之有效的民间治疗方法而已。所以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交叉缠绕,也无法做断然的区分,只要你放弃了单数化的文明观,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去对待其他的文明,你就可以把所谓文明间的冲突转换为文化间的冲突,进入一个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境界;同时也不能完全消除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对过时的、落后的自身文化的丑陋视而不见、文过饰非,那就会走向一种公认的野蛮。

西方现代在放弃对上帝的追求转向对理性的发展之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理性自身是有限度的,如过于迷信理性,就会走向理性的反面。针对理性主义时代人的理性的自负,荣格认为,“拥有一种秘密,一种对未知事物的预感非常重要。它使生活充满了非人格化的东西,充满了神秘。未曾体验它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人必须感觉到,他生活在一个多少有些神秘的世界;有事情发生了,自己也体验到了,但却无法解释个中原因;而且并不是即将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能被预见。世界不乏出乎意料和难以置信之事。只有此时,生活才会完整。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无穷的、无法把握的”①。所以文学的反现代性意义就是在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的“制造神秘”,也就是提醒人们理性主义并不能垄断对世界的解释,也就是告诫人们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获得财富和权力这些有限的目标之上,而在于他有没有能力意识到无限和永恒。人当下生存的意义来自于“永恒无限”的投影,它是万古长空(永恒无限)在一朝风月(当下瞬间)中的显现,如果作为永恒无限价值的万古长空已经瓦解,那么一朝风月的意义就会随之崩溃,也就是当下性就会随之瓦解,“存在”的被遗忘也就此发生。而当下性正是时间意识产生的立足点,因此我们说的时间三维,从主观意义上而言都是通

①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王虹霓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97—398页。

过当下来把握的。也可以说成是过去的现在,未来的现在和现在的现在,犹如奥古斯丁所说的主观时间——将来在等待中,过去在记忆中,现在在注意中。内在时间不同于主观时间,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主观时间起源于对印象的反思,而内在时间则起源于对外在时间客体的感知;主观时间本质上是主体的延长,而内在时间本质上则是客观化的时间意识或由主观意识构成的客体;主观时间显现在期待和记忆中,而内在时间则显现在意识的视域中,由此胡塞尔把时间分为主观时间与内在时间和自然时间三类。依胡塞尔之见,人们无法预见不存在的东西,"将来"未来而不存在,所以无法预见,可是我们却在预见将来,所以将来应是存在的,但只在意识中。预见将来不是已经见到将来而未来的东西,而是已一样,它也在感知和现在之中!预见将来不是已经见到将来而未来的东西,而是已经见到将来事件的先行现象。这个先行现象与后继现象早已在记忆中留下了相互关联的印象,我们的意识依据这个印象预见将来的事件,并生出对将来的期待——将来就在期待中。预见将来不是已经见到将来而未来的东西,而是已经见到将来事件的先行现象。这个先行现象预见将来的事件,并生出对将来的期待,将来就在期待中。所以人对未来的期待和想象受制于人的"前理解",初遇西学接触的清末中国人所理解的已经实现了现代文明的西方,是一种用中国古代的"三代之治"才能比拟的华胥国,它是一种礼乐达于天下的文化昌明之邦,显然与西方偏重于物质富裕的价值指向相左,所以文化的接受往往是在文化的误读中发生的。

现象学的内时间意识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感知并不仅仅是意识的当下行为,而是集当下、前摄和滞留于一身的三重体验边缘域;现在并不仅仅是作为眨眼瞬间的当下,而是包括当下和非当下即滞留和前摄在内的现在;时间不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滞留、当下和前摄的点状流动;滞留和前摄不仅进入到当下之中,它们还成为当下得以成立的前提和条件。由此在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这样的平台上,"现在"才变成活的、动态的,而不是僵死的。人对对象的意识包括原初印象、持留记忆和连带展望三个环节,原初印象代表现在,持留记忆指向过去,连带展望指向将来。现在不是单独出现的,它总是跟刚过去和即将到来结合在一起出现。这种活生生的现在构成了"时间场",而时间场的推移则构成了时间之流[①]。而作为五四新文学开山之作的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时间意识的现代性就在于它打破了僵化的现在,将狂人的原初印象——当下所感"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与持留记忆——"四千年吃人履历"和连带展望——"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揉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过去、当下、将来的三层体验边缘域、鲜活流动的"现在"时间场,而这个时间场的推移就构成了时间之流。《狂人日记》杰出之处正在于作家的这种内化的历史——时间意识的超绝和独特,实际上也就是作家的心灵世界的层峦叠嶂、幽深峭拔的体现。这种"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文化豪杰之气是鲁迅能成为中国新文学开山之祖的精神根源。这是一种现代小说中所独有的"意识流时间"的成功展现,它与既往小说中的"自然时间""巫性时间"等一起,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时间叙事,打开了看待现实的新的眼光,可称之为一种彼岸对此岸的朗照。

然而,古语云"有所得必有所失",对于这种聚焦于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矛

① 参见傅永新、刘小龙:《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疏论》,《江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盾、冲突的现代文学,很多人特别是一些仍保有某种古典情怀的作家表现出不适和排斥,就如日本作家志贺直哉所说他眼中的自然是遥远而贫瘠的乡间山林和村落所彰显的宁静简朴和远离尘嚣,能够给人带来顿悟和真正的安宁,而现代文明则更多地呈现为空洞、无意义、令人厌恶的人际关系。如此,哪种文学更能滋养人的心灵,也就不判自明。即使现代文明将它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那种如马克思·韦伯所预言的“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肝的享乐人”,作为“最后的人”也只能构成对“人”这个称呼自身的讽刺。现代文明究竟要将我们带往何方,人应该如何遂生、如何安所,都是需要我们去继续思考、探索的问题。这也就是现代性中的正反现代性两极会一直存在,但真理并不存在于两极之中的任何一方,而在两极之间的中位,它是需要人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责任编辑:冯济平

Clock Order,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ty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Geng Chuanm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human essence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is expressed by the fact that man becomes the main body, the world the object, and by the rational process of man's legislation for the worl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ational order of modernity is done through the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use of modern labor time as a measure of life standard and scal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changes to mankind in modern history. The adoption of clock tim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is change, which repres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rational order that is free from subjectivism, humanized and based on objectivity. The objectification, delocalization and utilitarianism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space and time have formed a profound contradiction with human life experience, which has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modernity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as a sensitive tentacle of the mind of the era comprehensively and profoundly records the pain and shock of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 rationality of positive appeal and an anti-modernity appeal against this clock rule as a sign of rational expansion. In particular, this finds full expression in Su Manshu's creations. Only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an we grasp the complex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modernity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clock order;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sciousness transformation; literary modernity; Su Manshu;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dernity

对新文学传统的回应与超越

——论林徽因的小说

王　宇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林徽因的小说几乎篇篇都有可圈点之处。《文珍》中出走的丫鬟、《绣绣》中新时代的旧式弃妇、《钟绿》中希腊乡村少女,这些形象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女性形象类型似是而非;《吉公》对清末西学东渐背景下知识分子命运的表现以及科学、科技之辨,则是五四新文学较少触及的命题;而她的第一篇小说《窘》不仅体现了娴熟的心理描写技巧,还表现出对个人生活、情感的不加掩饰的坦诚,这又是五四新文学最基本的底色。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林徽因小说的独树一帜,以及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回应和超越。

关键词: 林徽因小说;新文学传统;回应和超越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5-0049-12

林徽因的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同在1931年开始,但小说常常被人忽略,因为学界一般认为林徽因诗歌成就高于小说。其实一如她的诗歌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之作,她的小说也是京派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尽管她只有6篇小说,即《九十九度中》《窘》以及由《钟绿》《吉公》《文珍》《绣绣》组成的"模影零篇"。人们一般只关注《九十九度中》,认为体现高超的意识流小说技巧。其实她的另外5篇小说也几乎篇篇都有可圈点之处。如:《吉公》对西学东渐、新旧交替之际的知识分子命运的表现以及科学、科技之辩;《文珍》中区别于五四娜拉出走的丫鬟文珍的形象;《绣绣》中新时代的旧式弃妇形象;《钟绿》则写意性提供了一个与废名的三姑娘、沈从文的翠翠似是而非的乡村少女形象;而她的第一篇小说《窘》不仅体现了娴熟的心理描写技巧,还表现出对个人生活、情感的不加掩饰的坦诚。林徽因诗歌对个人情感的不加掩饰的坦诚,我们已经窥见一斑,在小说中她依然如此,据说为此还给她"带来一些麻烦"。林徽因曾经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说过:"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借力于迫真的,体验过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①]《窘》正体现了她的这种小说理念。而这种对个人生活、情感的不加掩饰的坦诚也正是新文学作家最基本的底色。上述总总都足以说明林徽因小说创作对新文学传统的回应和超越。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本土化研究"(19BZW1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宇,女,福建福安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02期,1936年3月1日。

一、《窘》:个人与时代的印记

创作于1931年6月香山养病期间的《窘》[①],是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说,带有明显的小试身手的味道。也是林徽因小说中个人印记最明显的一篇小说。熟悉林徽因生平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人物、情节都大致取材于她自己的真实生活。

老爷少朗的原型是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老爷的朋友、年近中年的教授维杉的原型是徐志摩,徐志摩正是林长民的好朋友。老爷的女儿芝的原型就是林徽因自己,而经常在少朗家里和少朗的儿女们玩耍的隔壁孙家的孩子小孙,即芝称为篁哥的男孩,原型就是梁思成。只有芝的哥哥、老爷的大儿子沅是虚构的人物。林徽因是林长民的长女,并没有哥哥。人物的年龄也与原型相当,芝16岁,而1920年徐志摩第一次在伦敦见到林徽因时,林徽因正好16岁。小孙比沅大两岁,沅大约比妹妹芝大1岁多,小孙比芝大三岁,梁思成正好比林徽因大三岁,小孙的秉性也与原型梁思成相近。少朗既有老派名士的闲适、风雅,又有新派知识分子的开明、新潮,这正与林长民相似。他的家庭中西合璧,和谐温馨。太太则兼具中西方女性的温婉和大方。显然,家庭气氛和太太的形象虚构的成分就多了一些。林徽因的原生家庭并不和谐美满,她的生母是林长民的妾,而且性情古怪愚钝,颇受林长民冷落,林长民后来又另娶一房妾程桂林,后者颇得他的青睐。林徽因童年时代和母亲偏居冷清的后院,从小饱尝旧家庭的种种心酸,以至于在成年以后每当提及原生家庭,"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的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②]。小说中那个和谐幸福的新旧合璧的家庭已然是她的理想和虚构。当然,老爷少朗对女儿芝的爱,却不是虚构的。林长民虽然不喜欢林徽因的生母,但对从小聪慧懂事的女儿林徽因却怜爱有加。小孙不仅年龄和梁思成相仿,而且爱好秉性也相近,"运动也好,撑杆跳的式样'简直是太好',还有游水他也好。……本来在足球队里",还酷爱雕刻,样样都和清华学校时代的梁思成相似。最后小孙和芝结伴去美国纽约留学,芝学美术,这也和生活细节大致一致。1924年林梁两人正是双双结伴赴美,先到纽约附近位于以色佳的康奈尔大学暑期班,后一同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梁思成进了美术学院建筑系,但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只好进了这个学院的美术系。小说中芝对维杉兴奋地说起自己和小孙结伴出国的前景,"我们自然不单到美国,我们以后一定转到欧洲、法国、意大利,对了,篁哥连做梦都是做到意大利去,还有英国"。这种漫游欧洲的憧憬显然相似于林徽因和梁思成1928年结婚后一同前往欧洲度蜜月并考察古建筑情形,他们当时就是尤其着迷意大利。小说与现实生活中细节的相似还有很多,如,小说中芝第一次见到维杉,称呼他杉叔,现实生活中,1920年11月在伦敦,当徐志摩第一次到林长民住所拜访时,林徽因也称呼这位已有家室的、父亲的朋友为"叔叔",虽然徐志摩只比她大7岁。小说中维杉频繁光顾少朗家,并对16岁的芝怀有暧昧的情感,显然影射了1920年冬到1921年夏天在伦敦,林徐两人初识之际徐志摩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维杉为了接近芝,只好硬着头皮与小孙、沅、芝等年纪比他小得多的几个孩子在北海公园游玩、划船的细节,接近1921—1924年间徐志摩在北京对林徽因展

① 林徽因:《窘》,《新月》第3卷第9期,1931年9月,文中所引,不注。

② 林徽因:《致慰赉梅信》,转引自[美]慰赉梅:《梁思成与林徽因》,曲莹璞、关超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第104、105页。

开热烈追求，并因此时常厮混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等年轻朋友群中的情形。

1931 年 3 月初，林徽因由于身体原因和母亲、女儿移居北平西郊香山静宜园双清别墅附近的居所疗养，到 9 月才下山。这年 1 月，徐志摩正好也到北平，开始了北京大学等校的任教，便与张奚若等人经常相约前往香山看望。有关林徐的这段交往，并非像坊间流传的那样，深受西方人文主义生命伦理熏陶的林徽因，实际上一直是将徐志摩非常特殊的个性看作一种理想的人性形式来欣赏，“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 来推崇，“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①] 林徽因自己无论是对这段时间与徐志摩的交往抑或是十多年前在伦敦与徐志摩的交往，都相当坦荡。正如她几乎在写作这篇小说的同时，在 1931 年 9 月发表的《深夜听到乐声》一诗中所表白的：“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②] 但她似乎也充分预料到坊间的微词[③]，因此，林徽因写这篇小说实际上带有自证清白的意思。毕竟她此时已经为人妻为人母，而且还怀有身孕，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世。所以小说充满对朝气蓬勃、博学多才的小孙的赞美，和对暮气沉沉的维杉一厢情愿而多情的善意调侃。还有一个细节，芝只有 16、17 岁，而维杉的年龄是 34 岁，“究竟说三十四岁不算什么老，可是那就已经是十七岁的一倍了”。其实徐志摩生于 1897 年，林徽因生于 1904 年，两人只差 7 岁，林徽因在小说中有意夸大两人年龄差距，其实也是有意强调两人之间发生爱情的不可能性。

小说对维杉尴尬心理的描写非常细腻、传神，足见林徽因心理描写的功力。这种描写除了善意嘲讽外，其实也在曲折地为他开拓。维杉对芝的情感相当朦胧、模糊、暧昧，其实很难坐实在纯粹的男女之情上。混合着长兄对小妹妹、甚至长辈对晚辈、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对美的不顾一切的痴迷，这最后一点在林徽因后来写的《悼志摩》《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中有充分的表现，特别是《悼志摩》写到徐志摩在伦敦冒着瓢泼大雨在桥上等彩虹的事件，足见诗人一向对美痴狂。

有关小说中维杉的 “窘” 心态有以下原因：第一，源自自己的年龄。这点特别值得注意，维杉不过 34 岁，但总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处处自惭形秽。这首先当然是个体的原因，因为他心仪的对象是个 17 岁的小姑娘。当年 23 岁的戴望舒面对只比自己小 5 岁的暗恋对象施绛年（施蛰存的妹妹），竟写下这样的诗句：“见了你朝霞的颜色 / 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山行》想来维杉也有同样的心境，更何况自己的年龄还是芝的两倍。第二，则是文化和时代的原因。中国文化中的个体对年龄、老化认知普遍比西方国家提前。当代亚洲人和西方人对年龄及老化的认知，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相较西欧，“亚洲普遍将生命中尚不年轻的阶段认作‘老龄’”；亚洲人对老化年龄的认定为 59 岁，在英国、西班牙及土耳其等受访者中，大多认为 67 岁才是年老，而亚洲人则整整提早了 8 年”[④]。何况将近 100 年前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不仅没有改变这种文化状况，反而加重了这种状况。因为五四新

① 林徽因：《悼志摩》，原载 1931 年 12 月 7 日《北平晨报》副刊，转引自陈学勇编：《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 年，第 006、007 页。

② 林徽因：《深夜里听到乐声》，见陈梦家编：《新月诗选》，上海：上海书店，1931 年。

③ 林徽因小说《窘》发表两年后，冰心发表《我们太太的客厅》（《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 年 10 月 27 日开始连载）。尽管此时，徐志摩早已于 1931 年 11 月飞机失事，不再出没 “太太的客厅”，但林徽因、徐志摩的朋友们一眼就看出这篇小说影射、嘲讽的对象。

④ 参见 2016 年 3 月 21 日 CIGNA 在发布会上发布的《2015 年中国 360° 健康指数调研中国区报告》。

文化是青春文化,信奉进化论、幼者本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曾有过著名言论“人到四十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鲜明体现了五四青春文化的特征。34岁的维杉处处自惭形秽的心理,正是个人、文化与时代多种合力的产物。第三,中年教授维杉的“窘”还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一种精神状态,作为历史中间物,一方面无法像少朗那一代老派名士那样“真正过老牌子的中年生活”,另一方面又不能像“活龙似的”年轻一代那样朝气蓬勃地生活。

二、《九十九度中》:建筑师的结构能力

《九十九度中》[①]一直被认为是林徽因最好的小说。尤其是小说调动情节、布置结构的高超技巧一直被研究者称道。《九十九度中》最鲜明的结构特征就是采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结构全篇。“蒙太奇”来源于法语“montage”,原为建筑学术语,意为构成、装配,电影发明;后引申为“剪辑”。1923年,爱森斯坦率先将蒙太奇作为一种特殊手法引申到戏剧中,后又被他延伸到电影艺术中,开创了电影蒙太奇理论与苏联蒙太奇学派[②]。蒙太奇既指画面与画面的组合,也指画面与音响、色彩之间的组合。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电影人接触到蒙太奇理论,并开始尝试性运用。尽管林徽因熟悉欧美文学艺术,但是笔者没有查到有关林徽因接触过蒙太奇的文献记载,只能做这样的推测:对于这个原本来自建筑学领域后又被艺术学科借用的概念,建筑学科班出身的林徽因应该是熟悉的,建筑艺术本身就是空间蒙太奇。她在宾西法尼亚大学修过全部建筑学课程。宾大建筑系在学科建制上属于美术学院,归入艺术学门类。因此,林徽因具有熟悉蒙太奇艺术理论的极大可能性。

小说娴熟地采用空间蒙太奇手法,将华氏99度(摄氏37.3度)溽热中北平不同阶层生活画面流畅地拼接叠加,呈现出一副北平生活的众生相,画面感极强:随着美丰楼饭庄送菜肴的三个汗流浃背的挑夫空间位置变化,我们看到张宅的喜棚,老太太的寿宴紧张准备中,张灯结彩、鸡飞狗跳,老太太、少奶奶、孙少爷、丫鬟、奶妈、赴宴的宾客,不仅表情和言语生动传神,而且各怀的心事也一目了然,甚至还穿插着老太太的陈年往事,各种点心、鲜果、菜肴、器皿、摆设活色生香;然后随着走到张宅门口打发挑夫的赵妈的身体位置,画面转到门口的两个车夫身上,接着是这两个车夫因为十四吊钱爆发激烈的争吵、厮打,争吵厮打又引来了另一家喜燕堂客人的瞩目,随着这家客人的身体位置我们又来到了另一家正在举行的婚礼的现场,婚礼仪式正在进行,可新娘阿淑却满腹心事,新娘忧伤的爱情往事一一浮现,然后镜头回到喝喜酒的男女宾客们身上,甚至用特写镜头表现其中一个矫揉造作的女客肉色丝袜裹着的长腿,正在上菜的年轻茶房想起头一天晚上上菜时看到自己暗恋的戏子与四爷的调情;然后似乎有点突兀地转到一间冰厅里,逸九、老卢、老孟三人闲聚消暑,他们在闲谈中又提到新娘阿淑,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突然加入的冰厅场景并不突兀;逸九、老卢、老孟三人走出冰厅来到街上,随着他们的身体位置,画面中出现两个车夫在大街上扭打,这正是前面那两个因十四吊钱而厮打的车夫;车夫的旁边还出现坐在洋车里准备去张宅赴寿宴却又为自己不合适的衣着怄气的

① 林徽因:《九十九度中》,《学文》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文中所引,不注。

② 参见[俄]谢·米·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导演笔记),《左翼艺术战线》1923年第3期,转引自[英]玛丽·塞顿:《爱森斯坦评传》,史敏徒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第57—58页。

刘太太，然后镜头又回到开头三个美丰楼饭庄挑夫身上，这回他们正在用张宅得到的赏钱买冷饮喝，然后又是张宅的寿宴场景，老太太、少奶奶、宾客、丫鬟又有一番表现，甚至还把镜头伸向张宅后院，外孙小姐和孙少爷在偷偷幽会、拌嘴；然后又是开头出现的三个挑夫中的一个，他疲惫不堪回到家里突发疟疾，邻居赶紧去请丁大夫，但丁大夫不在家，他正出现在张宅的寿宴席上，不多时挑夫的破宅里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紧接着又是张宅场景，寿宴刚结束接下来是搭台唱戏，老太太的大儿子、大老爷从上海刚刚赶回来，在廊上遇见自己已经长大了的侄女，伯侄两人寒暄并讨论侄女毕业后去上海谋事，然后镜头又出现丁大夫，有人把电话打到张宅请他给疟疾病人出诊，他在电话里打发病人去医院……最后出现一组并置的镜头，“编辑坐在办公室批阅新闻”，随着编辑的视线我们看到张宅寿宴名伶送戏、车夫打架、挑夫因疟疾毙命一一出现在报纸新闻栏中，下一个镜头便是打架的车夫杨三、王康被关在拘留所里，杨三的主人老卢正打电话给王先生要保杨三出来，但王先生出去赴饭局了，哪个饭局？是张宅的寿宴还是阿淑的婚宴？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电话没打通。因为车夫没保出来老卢出不去，只好躺在床上烦闷地打着扇子，小说到此戛然而止。

前半部结构如天女散花，一一散开，后半部开始逐个收束，最后收束到一张报纸上，将出现过的人事一一呈现在报纸新闻标题中，仿佛一篇论文的最后结语一一提点概括全文。事件彼此互相呼应，错综复杂却又井井有条，作为出色建筑师的林徽因果然具有高超的结构能力，而且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流畅的电影剪辑流程。对此，李健吾当年在《〈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一文中作这样的评价：“《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①] 这和李健吾对林徽因为人处世的评价一样准确到位，一语中的。

还有两点必须指出，第一，《九十九度中》这种独具匠心的结构并非对纯粹形式方面的追求，同时还有哲理的意味，看似毫不关联场景、人事，其实存在错综复杂、看不见的关联性，意味着世间万事万物之间的神秘联系，这正是这篇小说的现代主义的因素，当然也意味着北平实在是个“熟人的社会”。第二，小说发表在1934年5月《学文》第1卷第1期上，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对此李健吾在次年即1935年的《〈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一文也有提及：“我相信读者很少阅读这篇小说，即使阅读，很少加以相当注意。我亲耳听见一位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向我承认他完全不懂这不到一万五千字的东西。他有的是学问，他缺乏的便是多用一点点想像。真正的创作，往往不是腐旧的公式可以限制得下。”[②] 李健吾认为小说较少引起关注主要是读不懂，连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教授都读不懂，更何况普通读者！至于为何读不懂，李健吾认为是这位国立大学文学院教授缺乏想象力。但李健吾忽略了另外一个读不懂的原因，那就是文学观念的问题。无论是文以载道的旧文化传统，还是以小说启蒙民众的新文化传统，其实都认为作品的内容要比作品的形式更重要，情节本身比处理情节的技巧更重要，讲什么故事要比怎么讲故事更重要。直到1980年代末先锋文学的出现，小说家对叙事技巧的重视才得以正名。而《九十九度中》精华之处恰恰“不在故事，而在故事的运用；不

① 刘西渭（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大公报·“小公园”副刊》1935年8月18日。

② 刘西渭（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大公报·“小公园”副刊》1935年8月18日。

在情节,而在情节的支配"[①]。显然,这篇小说是个早产儿,意味着文学艺术的自律、自足的诉求,这是文学现代性的诉求,也是京派文学家一向的主张。

三、《吉公》:清末的西学东渐与林徽因的科学、科技之辨

吉公是林徽因的小说《吉公》[②]中的主人公,他原是"我"祖母的母亲即曾外祖母抱养的孩子,按辈分他算是"我"的舅公,按福州方言的读音就是"吉公",这便是"吉公"这个名字的由来。曾外祖母和曾外祖父去世后,"我"的祖母、吉公的长姐只好把生活无着落的吉公带到夫家,即"我"的祖父家,成为大家族中的寄居者。于是童年的"我"得以结识这位奇特的人物。吉公所以沦落到要去姐姐婆家当寄居者,是因为他从小"不喜欢做对子读经书","关于学问是如何的没兴趣""始终不能参加他们认为光荣的考试。"一句话,吉公如同贾宝玉那样拒绝仕途经济道路,成了旧秩序的一个另类,无以安身立命,只好到姐姐的婆家寄食。住在大家庭里一处闲置跨院破旧的小楼上,由于"被认为是不读书不上进的落魄者,所以在举动上,在人前时,他便习惯于惭愧,谦卑,退让,拘束的神情,唯独回到他自己的旧楼上,他才恢复过来他种种生成的性格。与孩子们和蔼天真地接触。"吉公自有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吉公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这个世界就是"自鸣钟的机轮的动作,世界地图,油画的外国军队军舰,和照相技术的种种",他还"想到上海去看一次火轮","吉公所懂得的均是具体知识,他把枪支在手里,开开这里,动动那里,演讲一般指手画脚讲到机器的巧妙,由枪到炮,由炮到船,由船到火车……"不仅对具体知识,他对整个外洋世界也很了解,对世事甚至很有见地,"在外国,能干的人也有专管机器的,好比船上的船长吧,他就也懂得机器还懂地理。军官吧,他就懂炮车里的机器。尽念古书不相干的,洋人比我们能干,就为他们的机器……"

要理解吉公形象的时代意义显然不能忽略西方科技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史。根据小说种种细节大约可以推断吉公生活的时代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正是西方科技第二次在中国传播的时期。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有两个时期,包括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重要时期。前者以西方传教士和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译介西方科学著作为主,并没有普及到大众层面。这次译介西学的高潮到清代雍正时期因禁教政策而趋于衰落。西学东渐的第二次高潮始于鸦片战争、国门洞开之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已经内忧外患,受西方坚船利炮威胁和被动挨打的刺激,清政府部分当权者开始寻找富国强兵之道,特别是其中的洋务派积极主张发展工业、增强国力,积极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体制。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积极推行洋务"新政",兴办新式学校,设立翻译机构(如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等),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促进了译介西方科学技术的活动再次活跃起来。洋务派对西方科学技术均采取的是"中体西用"的态度,以强烈的"工具主义"眼光来看待和理解科学技术,关注的是知识层面的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的工具价值,大大促进科学技术传播活动的下移,进入寻常百姓家[③]。吉公对西方科技的兴趣和了解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

① 刘西渭(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大公报·"小公园"副刊》1935年8月18日。

② 林徽因:《吉公》,《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4期,1935年8月11日,文中所引,不注。

③ 参见任福君、翟杰全:《科技传播与普及概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纪初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形成的。所以吉公和具有新派思想的姐夫即“我”的祖父聊天,从苏伊士运河、到庚子呀、甲午呀,“结论总回到机器上”。“庚子”“甲午”显然指庚子赔款、甲午海战的惨败,可见洋务派、维新派“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但是,直到1906年废除科举之前,读书人(尤其是官宦世家子弟)依然重复着祖辈父辈的人生道路,读经书做对子,操练八股文试贴诗,然后考秀才、举人、进士,最后搏个一官半职。如果这条大路走不通,那就还有一条小路——给人当幕僚或经商做买卖。偏偏吉公对大路小路都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却是被普通官宦人家看作粗人伙夫才摆弄的机器技术。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曾这样描述1899年18岁的鲁迅准备上新学堂时面临的压力,“说起来,清政府的一班大员发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已经有十多年了,但在一般城镇士绅的眼中,这学堂还是不伦不类的怪物,其中讲授的‘声光化电’,更是洋人的‘邪学’,自以为正经的读书人,一般都不屑于跨进去读”①。所以鲁迅后来自嘲是“走异路逃异地”的异端。吉公年龄大致和鲁迅相当,他面临的处境也大约和鲁迅当年相似。总之,他也被认为是一个异端——沉湎于洋人的奇技淫巧,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甚至玩物丧志的异端。也就是说,吉公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技术天才,“我相信如果他晚生了三十年,这个社会里必定会有他一个结实的地位的”。而他却结结实实地早生了三十年。在吉公的时代,他所兴趣并擅长的知识、技术至多只能用来照照相给大家庭里的老老少少消遣凑趣。但吉公中年以后的结局却意想不到的完满,他得到一个逃离他寄居的大宅、去“另找他的生活”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看起来不太体面——“到一个外省人家去入赘”,但就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异端性的机会却让吉公从此幸福生活,生儿育女,“住在城里,境况非常富有”。更重要的是他得以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到轮船上做事,到码头公司任职,更进而独立的创办的他的小规模丝织厂……”因此,吉公显然代表了从传统文人到近代知识分子身份、生存方式的转型,从依附于封建体制到依附市场、现代工业。

吉公的结局相当完满,但小说结尾叙事人却怅惘若失,认为吉公后来虽然又是去轮船、码头任职,又是办工厂,但“这些全同他的照相一样,仅成个实际上能博取物质胜利的小事业,对于他精神上超物质的兴趣,亦不能有所补助,有所启发。年老了,当年的聪明一天天消失,所余仅是一片和蔼的平庸和空虚。认真地说,他仍是一个失败者。如果迷信点的话,相信上天或许能补偿给吉公他一生的委屈,这下文的故事,就应该在他那个聪明的孩子和我们这个时代上。但是我则仍然十分怀疑。”这段话其实相当意味深长,传达出颇为复杂的思想内涵。首先,是为生不逢时的吉公一代人的青春抱屈,等到变迁了的时代能够接纳他们了,他们却早已两鬓苍苍,由此引发生不逢时的人生慨叹。其次,是名教杀人,扼杀人的聪明才智,如果不是吉公最后奋力一搏,他可能就要被埋葬在那个大家庭里破旧的小楼上。再次,这段话包含了林徽因的人生观和生命观,在她看来,人生应该超越蝇营狗苟的物质性利益,追求高远精神境界。她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除了战争避难云南期间(1938年),物价飞涨不得不每周两次去云南大学教授英文来贴补家用外,她一生极少为物质利益而工作。林徽因是个工作狂,夜以继日地写作、研究建筑、交往,却都并非为了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寻求自我认同、自我

①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命名、自我实现。从次,也是最重要的,上述这段话还包含了林徽因超越时代的科学思想。按照科学史家的观点,中国人对科学最大的误解在于科学和技术不分,中国传统里有技术无科学,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发达的技术传统,但是却没有"科学"。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的态度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而不是把知识看作是目的本身,这就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也过分着眼于它的实际应用,也就是技术①。而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更加重这个认知,因为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是在强烈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诉求背景下发生的,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洋务派对西方科学技术均采取的是"中体西用"的态度,以强烈的"工具主义"眼光来看待和理解科学技术,关注的是科学的工具价值、技术特征,而忽略了技术背后强大的科学体系的支撑。吉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触到西方科技的,因此吉公式的科技兴趣当然无法带给他超功利性的科学精神。也就是说吉公终究只是一个匠人,对真正的科学精神是陌生的,因此,其精神世界终究只是"一片和蔼的平庸和空虚"。当然,也许吉公有可能成长为一个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但是时代扼杀了他。而林徽因自己恰恰一生都在追求这种超功利性、工具性和实用性的科学精神,她超越了将建筑看作是一门土木营建技术的层面,提出的"建筑意"思想就是最好的证明②。最后,作者将摆脱吉公式的平庸和空虚的希望寄托在吉公"那个聪明的孩子和我们这个时代上",但随即马上否定自己,"我仍然十分怀疑"。这显然是对五四式进化论世界观、启蒙主义历史进步论的怀疑,因为小说写作之际已是1935年了。综上,林徽因思想的深刻与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四、《文珍》《绣绣》《钟绿》:超越新文学女性形象类型

尽管《吉公》的末尾表达了对进化论世界观、启蒙主义历史进步论的疑虑,但在林徽因一生中,无论是作品还是现实人生,大部分时候她还是笃信它们的。《文珍》③《绣绣》④正是这种笃信的直接产物。

我们知道,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中,五四文学反封建、反礼教纲常的主题获得更深入的展开,如巴金激流三部曲、曹禺《雷雨》等。林徽因发表于1936年的《文珍》也不例外。文珍形象和《家》中鸣凤、《雷雨》中的四凤是相呼应的,只是相对于后两者,文珍形象不仅反封建礼教,还有更加明确的反抗阶级压迫的痕迹。她从文环的投井自杀中清醒看到了少爷们虚情假意的嘴脸和自己的真实处境,当她收到芳少爷暧昧的礼物(扇子)时,十分恼怒,"'你看我稀罕不稀罕爷们的东西!死了一个丫头还不够呀?'一边说一边狠狠把扇子撕个粉碎,伏在床上哭起来"。她不像鸣凤和四凤那样对少爷们抱有幻想,她明白自己的幸福在哪里,毅然决然在被当物品般地嫁掉的前夕,和一个革命党人私奔了。文珍的故事显然不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甚至也不全是五四经典的娜拉出走的故事,文珍不是五四娜拉,后者更多的是中上层的知识女性,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

① 参见清华大学教授、科学史家吴国盛的喜马拉雅科学史讲座《科学简史》第1集"中国人对科学的最大误区"。

② 有关林徽因"建筑意"的建筑思想,参见王宇:《讲述林徽因的意义: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③ 林徽因:《文珍》,《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2期,1936年6月14日,文中所引,不注。

④ 林徽因:《绣绣》,《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25期,1937年4月18日,文中所引,不注。

亚梅、杨振声《玉君》中的玉君、冯沅君《隔绝》《隔绝之后》中的隽华和《旅行》中的“我”、郭沫若《卓文君》中的卓文君、白薇《苏斐》中的苏斐等。而文珍是个底层女性，当然，五四文学中也有底层娜拉形象，如田汉《获虎之夜》中的莲姑、许杰《台下的喜剧》中的金纱、《大白纸》中的香妹。但无论是知识分子娜拉还是底层娜拉的故事，都只是在反礼教的层面上，引领娜拉出走的男性人物不过是她们的爱人，其政治身份模糊。而引领文珍出走的男性人物则有着明确的政治身份——革命党。文珍和革命党爱人出走，自然要去投奔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文珍形象似乎是1927年大革命前后茅盾等人小说中革命娜拉形象的继续。而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后来的“十七年文学”中更是常见到这类追随革命爱人出走进而追随革命的女性形象。这篇小说俨然是内在于中国新文学谱系的。而在林徽因自己的创作谱系中，文珍的出走和吉公的出走更是构成互文关系的，都是逃离表面上温情脉脉实际上杀人不见血的旧家庭。如果说吉公的故事牵连着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潮流，那么，文珍的故事则牵连了近代中国的革命潮流，都是以个人的故事传达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是转型期中国现代性经验的表达，也表明林徽因其实始终关注着“窗子以外”的世界。

发表于1937年的《绣绣》，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可以看作是篇儿童文学作品，表现旧式家庭对儿童身心健康的无视甚至摧残，当绣绣心爱的小瓷碗被父亲砸碎——“那美丽的尸骸同其他茶壶粗碗的碎片，带着茶叶剩菜，一起送入一个旧簸箕里，葬在尘垢中间”之际，一同被埋葬的当然还有绣绣童真、美好的心灵，因为“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①]，如同鲁迅《风筝》中小弟弟被大哥折断蝴蝶风筝的翅膀。但《绣绣》悲剧还远要比《风筝》残酷，绣绣美好幼小的生命最后消失于一个寒冷的清晨。对旧家庭扼杀童真、爱情、才华的指控俨然都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最经典的主题，在这点上《绣绣》和《吉公》《文珍》异曲同工。

但这篇小说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绣绣的母亲徐太太这样一个弃妇形象。中国古代文学中就有源远流长的弃妇形象传统，在《诗经》、汉乐府、唐传奇、元杂剧、明清小说以及各种地方戏曲、民间故事中，弃妇形象几乎汗牛充栋。最著名的如《诗经》中的《卫风·氓》《邶风·谷风》以及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上山采蘼芜》《白头吟》中的抒情女主人公；叙事文学传统中的弃妇形象更是家喻户晓，霍小玉(《霍小玉传》)、杜十娘(《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金玉奴棒打无情郎》)、秦香莲(《铡美案》)、赵五娘(《琵琶记》)等等。弃妇产生的原因多半是因为礼教吃人抑或男性贪图荣华富贵、喜新厌旧等不良操行。五四新文学中弃妇形象同样常见，但产生的原因却有独特的时代性。新文化提倡的“恋爱自由”“离婚自由”等新道德对旧文化造成了强大冲击，获得了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恋爱自由”“离婚自由”这些原本促进个人自由和两性平等的新文化伦理革命，却催生了一个“被离婚”的妻子群体[②]，如庐隐《时代的牺牲者》中的秀贞、《一幕》中的徐先生的前妻、石评梅《弃妇》中的表嫂、冯沅君《贞妇》中的何姑娘等等，这些被划入旧文化阵营的“妻子”们，不仅面临旧礼教的压迫，同样也有来自新道德的伤害，体现了历史的多副面孔。而在新文学弃妇形象群中还有一类新型弃妇形象，她们本身是新女性，经由自由恋爱、自主择偶，以为从此可以挣得自由、幸福，不料却被自

① 鲁迅：《风筝》，《语丝》周刊第12期，1925年2月2日。

②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杨联芬：《浪漫的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28—137页。

主选择的丈夫、同居者抛弃,例如《伤逝》中的子君、庐隐《蓝田忏悔录》中蓝田、石评梅《林楠日记》中的林楠、包括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的主人公韦明等等。上述两种弃妇类型也可以分别概括为:被新男人抛弃的旧女性和被新男人抛弃的新女性。绣绣的母亲徐太太显然都不属于上述两种新文学中的弃妇类型,她本身并非新女性,而绣绣父亲也并非操持"恋爱自由""离婚自由"的新男性。绣绣的母亲显然是新时代里被旧男人抛弃的旧女性,这一类弃妇类型恰恰是新文学多少忽略了的,要到1940年代张爱玲小说中才会出现,如《红玫瑰白玫瑰》中的孟烟鹂、《十八春》顾曼璐、《连环套》中的倪喜等等。这类弃妇形象不仅有其可怜更有其可鄙之处,徐太太也一样,林徽因毫不留情地写出了男权社会、旧家族制度如何催生徐太太这样变态的精神人格。本身作为家族、男权制度牺牲品的徐太太又是如何从精神肉体上再去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女儿,深度地揭示了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女性、儿童命运的戕害。如果说,在五四女性文学中,母亲的形象一般都是慈爱无私而又深受父权压迫的苦难深重的正面形象[①],但是从袁昌英1930年的《孔雀东南飞》[②]开始出现恶母形象和审母倾向,到了张爱玲《金锁记》则将这种倾向延伸到极点,徐太太形象显然也凝聚着审母倾向。但和《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以及《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又有质的不同,小说对她的同情溢于言表。这其实来自林徽因的个人经验。

毋庸讳言,绣绣母亲徐太太身上有林徽因自己生母的影子,绣绣的生活有林徽因自己童年生活的影子。有关林徽因生母何雪媛在林家的境遇我们前文已经提及,正是这样的境遇使得母亲的性格也日益孤僻古怪。林徽因小小年纪便要痛苦地周旋于这样的母亲和父亲之间,母亲和二娘(即林徽因父亲后娶的妾)以及二娘所生的弟妹之间,这对林徽因幼小心灵的伤害其实很大,《绣绣》中到处都是这种伤害的蛛丝马迹。绣绣母女两人,"好像被忘记了的孤寡……明明父母双全的孩子,却那样的伶仃孤苦","妈妈是个极懦弱无能的女人……她的脾气似乎非常暴躁"。绣绣对小伙伴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爹爹也太狠心了,妈妈虽然有脾气,她实在很苦的,她是有病。你知道她生过六个孩子,只剩我一个女的……","绣绣始终只缄默地坐在角落里,无望地伴守着两个互相仇视的父母","但是缔结在绣绣温婉的心底的,对这两个人仍是那不可思议的爱"。林徽因的母亲也生过多个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林徽因一个。母亲一辈子跟着林徽因生活,林徽因当然很爱母亲,但和母亲的关系却始终处不好:"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③]"她(林徽因)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④]这几乎就是绣绣和父母关系的翻版。正是对母亲这种夹杂着怨恨的爱,使得小说没有将绣绣的母亲描绘成曹七巧式的恶母形象。

《钟绿》[⑤]在这四篇中独树一帜,它是林徽因文学创作中唯一一篇涉及自己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

① 参见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② 袁昌英:《孔雀东南飞》,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

③ 林徽因:《致费慰梅信》,转引自陈学勇:《莲灯诗梦 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④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转引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⑤ 林徽因:《钟绿》,《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56期,1935年6月16日,文中所引,不注。

学留学生活的作品。正如前文提到的，林徽因 1924 年和梁思成一同进入该校美术学院，梁思成进了美术学院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只好进了美术系。小说中的“我”身上也不难看出一个美术专业学生的蛛丝马迹。主人公钟绿是一个希腊美女，是唯美浪漫而又淳朴静穆的古典美的化身。这不仅是林徽因本人的审美趣味，也是京派文学审美理想的拟人化。我们知道，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曾经提出著名的“静穆”文学理念[①]，钟绿对工厂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工业艺术”的嘲讽，“我”桌上摆放的唐陶俑和图章，都是这一“静穆”古典主义审美趣味的体现，显现出艺术抵抗社会现代化的自律品格，这在京派作家沈从文《边城》《潇潇》《长河》以及废名《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浣衣母》中也得到充分表现。作者特意在这篇极短的短篇中匀出相当可观的文字，详细描写了钟绿对英格兰乡村的记忆以及后者对她的深刻影响：

> 这农村的妩媚，溪流树荫全合了我的意，你更想不到我屋后有个什么宝贝？一口井，老老实实旧式的一口井，早晚我都出去替老太太打水。真的，这样才是日子，虽然山边没有橄榄树，晚上也缺个织布的机杼，不然什么都回到我理想的以往里去……
>
> 到井边去汲水，你懂得那滋味么？天那，我的衣裙让风吹得松散，红叶在我头上飞旋，这是秋天，不瞎说，我到井边去汲水。回来时你看着我把水罐子扛在肩上回来！

这完全是一幅 18 世纪欧洲古典主义时期的乡村风景画，静穆悠远的乡村、淳美的人性，肩着陶罐汲水的美丽少女……这也是京派文学风格最形象的表述。小说的结尾，钟绿死在一条帆船上，这是远古纯美人性的无可挽回的毁灭，一如《长河》《边城》的结尾。其实从审美层面而言，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废名笔下的三姑娘和林徽因笔下的这个希腊乡村少女钟绿存在内在的联系性。这样的乡村少女其实和乡土中国没有多少关系，与乡土中国密切相关的少女形象要到 1940 年代孙犁、赵树理等人笔下才出现。也许我们可以把后者命名为“乡土性”，而前者命名为“乡村性”。前者与历史中的中国乡村其实是游离的，所以《边城》和《竹林的故事》都刻意淡化具体历史背景。钟绿的爱人在结婚前一周“骤然死去”，不久钟绿也死在一条帆船上。这种人生无常的宿命意味其实也很像《边城》，当然这里面还有林徽因自己的人生体验。她在宾西法尼亚大学留学第二年，父亲林长民应张作霖部将郭松年之邀赴沈阳任郭的顾问，次年郭松年举兵反对张作霖，兵败，林长民死于乱军之中。这对林徽因犹如晴天霹雳，对于林家更是灭顶之灾，林徽因几次想辍学回国打工或者重新考取公费留学，后经梁启超劝说未成行。当然，最重要的是梁启超承担起她在美国的留学费用，她才放弃回国得以继续学业，但精神上的打击依然非常沉重。应该说此前林徽因成长历程尽管有些大家庭中的龃龉、烦恼，但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父亲的突然离世一下子将死亡、人生无常这些沉重的命题摆在她的面前，给她这段原本明媚的留学生活笼上一层浓重的阴影，在多年后重写这段留学生活时依然摆脱不了忧伤的情调。

---

① 1935 年朱光潜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一文中论及陶潜：“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见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396 页。1948 年他在《陶渊明》一文中又补充道，虽然陶潜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冲突，“满纸都是忧生之嗟”，却“终于达到调和静穆”，也就是说朱光潜将调和静穆看作是艺术的极境。参见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256 页。

林徽因一直视建筑为正业,文学是副业,她总是在养病期间才进行文学创作。她的诗歌创作正开始于1931年香山养病期间。与众不同,林徽因一生奉行“少一事不如多一事”①,日常总是塞得满满的,除了筚路蓝缕的古建筑考察、研究,频繁的社会活动,广泛的交游,还要管理自己的小家和应付梁氏大家族的人情往来。文学创作是她在繁忙日常事务中、甚至生病中挤出时间进行的。即便如此,依然有诗歌71首、散文12篇、小说6篇、剧本1部、译文1篇存世,此外还有大量书信(这些书信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文化史价值)。不难想象,时间可能也是她选择主要从事诗歌写作的不该忽略的原因之一②。因为诗歌篇幅简短、占时不多,而小说则颇费时。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推设,如果假以天年时日,林徽因一定会创作出更多的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事实上,在她一生最艰难的困守李庄时期③,她就曾想方设法查阅汉代史料,计划用英文写作鸿篇巨制的《汉武帝传》。这也说明她对把握卷帙浩繁的叙事文体的雄心和信心。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即便她事实上仅留下6篇小说,也篇篇都有可圈点之处,在某些篇章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艺术的含金量甚至超过她的诗歌。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目的。

责任编辑:冯济平

Response to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New Literary Tradition – On Lin Huiyin's Novels

Wang 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lmost all of Lin Huiyin's novels are commendable. The runaway servant girl in *Wen Shen*, the old abandoned woman in the New Era in *Xiu Xiu*, and the Greek village girl in *Zhong Lyu* are all seemingly similar to the types of female images in the May 4th new literary traditi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fat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debat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Ji Gong* are propositions rarely touched by the new literatur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However, her first novel *Embarrassment* not only embodies the skillful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skills, but also shows the candid personal life and emotion, which is the most basic feature of the May 4th new literature. All these are enough to illustrate the uniqueness of Lin Huiyin's novels, as well as the response to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new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Key words: Lin Huiyin's novels; new literary tradition; response and transcendence

① 参见王宇:《讲述林徽因的意义: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② 当然,林徽因开始诗歌创作有更重要的原因,例如徐志摩的影响,以及1931年在香山养病期间独特的心路历程。参见王宇:《讲述林徽因的意义: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③ 1940年11月,迫于战争严酷的形势,林徽因、梁思成夫妇随他们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一同迁往四川小镇李庄,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才离开。这段时间是林徽因及其家庭最艰难的时期,穷困潦倒,疾病缠身。

“原始强力”：生命战斗的方式

——重读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齐 晓 鸽

《书城》杂志社，上海 200030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是路翎在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关照下创造出来的精神搏斗之作。这种精神搏斗的方式，是对“原始强力”主题的开掘。路翎通过“原始强力”来展现人物对生命困境的反抗，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人物形象；并通过心理分析、语言陌生化等创作实验来表现“原始强力”，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审美表达。

关键词：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原始强力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5-0061-11

钱理群曾评价说，在时代的大浪中，坚持透过现实生活来表现个人的内心体验，并且在极度动乱的世界上对生命有着不可重复的深刻体验的作家就是路翎[①]。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②]就是路翎在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关照下创造出来的灵魂搏斗之作。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的其他创作，在这部具有史诗般结构的小说中，路翎通过复杂的心理分析，极力表现人物的内心体验，展现了人物精神世界的汹涌波涛和激烈争斗，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个“神经质”般的独特人物形象。

这种对人物生命“不可重复的深刻体验”，蕴含着作家对时代和民族生存困境的深度思考。受胡风文艺理论影响，路翎认为，在救亡图存的抗战背景下，作家要主动搏击到生活内部去，不能仅仅在“现象上拨弄”人物，而是要展现人物身上激烈的精神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听清人物心底的声音，发现真实的生活[③]。路翎向生活内部搏击的方式，即是开掘出人物身上的“原始强力”，用这种力向压抑的现实战斗。

“原始强力”，是指在人的欲望受到压抑后迸发出来的本能的反抗之力。在给胡风的信中，路翎说，“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④]，“我是用‘原始底生命强力’来反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内外一战华工书写文献整理与研究”(20BZW17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齐晓鸽，女，山东菏泽人，《书城》杂志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期刊出版研究。

① 参见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6页。

②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上卷1945年11月由重庆希望出版社出版，下卷两年后出版，共80万字。小说纵深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的这段被民族战争所激荡的中国社会，上卷写到1937年抗战爆发，描写一个封建财主大家庭分崩离析的过程；下卷作者将画面转移到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以及在其中遭遇的形形色色的大后方世相。

③ 参见冰菱(路翎)：《淘金记》，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34—36页。

④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对‘精神奴役底创伤’的”[①]。所谓“精神奴役底创伤”是由胡风提出的,他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阿Q的时代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人的精神世界内部,盘根错节地积淀着众多国民旧根性,“他们(人民)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精神奴役底创伤”[②]。路翎深知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它是“人民里面的旧习惯和旧情绪、旧道德观和旧人生观”[③],“它控制了人民底精神,它是杀人不见血的”[④]。他要用“原始强力”来阻挡人民被“精神奴役”的进程,通过“原始强力”的战斗,为受压抑的民众寻求个性解放。“原始强力”是“朴素的、自发的,也就常常是冲动性的强烈要求”[⑤],因此当我们走进《财主底儿女们》,看到的是战争背景下一颗颗时刻躁动不安、摇摆多变、激烈争战的“火辣辣”的灵魂。这些“神经质”的人物对命运和时代的不懈战斗,是路翎反抗“精神奴役”的一种创作追求。

如果说胡风“精神奴役底创伤”是“原始强力”的现实的、内部的理论来源的话,那么厨川白村的“生命力受了压抑产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⑥]的“生命力”学说,则是路翎创作的外部理论来源。本文将探讨路翎在“原始强力”的开掘上如何发展和运用了“生命力”学说,“原始强力”对人物生命价值的超越性意义,以及在对原始强力的书写上,作家在叙事方式和叙事语言上的创作实验;进而思考路翎“原始强力”的书写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侧面,怎样释放了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作家的这种探索之于中国现代小说文体和审美趣味的丰富性意义。

一、“原始强力”的开掘

在《我与外国文学》一文中,路翎说:“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中国流行很久了,我看过也很久了,我还时常记得他的对人生有深的感情的理论和观点。”[⑦]厨川白村将弗洛伊德的“利比多”和叔本华的“意志”整合为“生命力”,并推测“生命力者,就像在机关车上的锅炉里,有着猛烈的爆发性、危险性、破坏性、突进性的蒸汽力似的东西”[⑧]。这种神通广大、神秘莫测的生命力,如同幽灵,依附于生命个体,体现为“内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对,在外却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断地压迫着。在两种力之间,苦恼挣扎着的状态,就是人类的生活”[⑨]。由此,厨川白村推导出“生命力受了压抑产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⑩]的结论。在《我与外国文学》一文中,路翎又说,“艺术是人民性的正义感和美学追求的形象思维,它是人类追求往前、追求创造自身形象的表现和工具,它也是人类的美感的表征和象征,在黑暗的时代,自然也就是正直和被压迫者的苦闷的象征,我

①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见张业松编:《路翎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84页。
② 胡风:《现实主义在今天》,《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1页。
③ 余林(路翎):《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第97页。
④ 余林(路翎):《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第99页。
⑤ 路翎:《路翎评论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⑥ [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
⑦ 路翎:《我与外国文学》,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第261页。
⑧ [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第8页。
⑨ [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第11页。
⑩ [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第8页。

这么说，并非想探讨厨川白村的题旨‘苦闷’够不够力，我是说，厨川白村的感情是我时常想到的”[①]。在这样的影响下，路翎吸收了厨川白村的学说，生命力成为他文学中的重要构成要素。

那么这种原始的生命力到底为何？它又能在人的生命中实现怎样的突破？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原始生命力，是能使个人完全置于其力量控制之下的自身功能，是一切生命肯定自身、确证自身、持存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如性与爱、愤怒与激昂、对强力的渴望，等等。它既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毁灭性的。“当原始生命力占有了一个人的整个自身而无视这一自身的整体性，或者，无视他人的独特性与欲望，无视他人的整合需要时，它就会成为一种恶，因而表现为富于攻击性、充满敌意和残酷——即我们自身中令我们深深恐惧，但我们随时都是在防范和压抑，并很可能投射给他人的那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不过是确证并激发我们的创造力的同一事物的另一侧面。整个生命过程就流动于原始生命力的这两个侧面之间。”[②] 罗洛·梅揭示的是处于自然状态的原始生命强力，它无所谓善恶，既可以为了正当的生命欲求发扬光大为不可遏止的创造力，也可能因为遭受压抑而成为毁灭一切常规生活的破坏力。

路翎显然对这种原始生命力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开掘出了“人民底原始强力”的命题，为在压抑中生存的生命个体打开了一道突破的窗口，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主题。在给胡风的一封信中，路翎曾经说，“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③]，“我是用‘原始底生命强力’来反对‘精神奴役底创伤’的”[④]。在谈到“原始强力”时，他说“‘人民底原始强力’是什么？它就是，反封建束缚的那种朴素的、自发的，也就常常是冲动性的强烈要求，这种自发性是历史要求下的原始的、自然的产儿，是‘个性解放’即阶级觉醒的初生的带血的形态”[⑤]。杨义认为：“所谓‘原始强力’乃是一种未经民主主义启蒙和无产阶级革命洗礼的，却存在于群众之中的带着原始状态和自发性质的反抗精神。”[⑥] 原始强力就是一种欲望受到压抑后迸发出来的力量，虽然它有时呈现出自发性和盲目性，但正是这种“原始强力”的突进，才阻碍了“精神奴役创伤”下的民众沦为“奴性”的进程。路翎相信尽管有些中国旧文明迫使人民受到精神的奴役，但还有一种自然的力量推动民众去抵抗沦为精神奴隶。石桥场上的刁顽青年赵天知，凭借一股蛮力惹出许多荒唐的事来。但蒋纯祖喜欢这种“荒唐”：“他觉得，正是荒唐的，永不止息的冲击，能够破坏旧有的，灰沉麻木的一切。”[⑦] 他加入到赵天知荒唐的举动里面去，并且感到光荣。这种“原始强力”构成的是一种反抗的精神，向着禁锢着民众的囚笼不断地撞击。

在这样的一种“原始强力”理论的关照下，路翎将《财主底儿女们》中人物的生命意志力提到了令人惊心的高度，对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层的开掘。作品中的人物不停地在美好与丑恶、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下、觉醒与麻木、抗争与失败、友爱与仇恨、欢乐与悲哀、痛苦与幸福、理智与荒谬、

① 路翎：《我与外国文学》，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第 262 页。
② [美] 罗洛·梅：《爱与意》，北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第 126 页。
③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第 45 页。
④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见张业松编：《路翎印象》，第 284 页。
⑤ 路翎：《路翎评论集》，第 206 页。
⑥ 杨义：《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文学评论》1983 年第 5 期。
⑦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110 页。

追求与破灭等对立的两极之间跳跃。

二、“原始强力”的超越

走进《财主底儿女们》之中,我们会看到在“力”的支配下激烈挣扎战斗着的各种生命状态。

上卷中,新女性王桂英为了在自私的哥哥那里显明自己的立场,离家出走投奔蒋少祖。在欢呼的十字街头,权力的诱惑使她突然地跳上岗位台,向人群庄严地宣扬抗日救亡的信条。就在那岗位台上,“她明白了她底新的地位:她站在高处,群众在她底脚下仰面看着她”①。充满征服欲望的她希望获得人们的崇拜,以此征服她的恋人蒋少祖。而蒋少祖虽然在她的狂热中看出了矫情和虚伪,但他的这种貌似敏锐的观察,本身又被“未曾料到”的“嫉妒”所控制,他不允许别人的权力凌驾于自己之上。和蒋少祖体验了冒险的情欲带来的快感后,王桂英生下了他们的小孩。但当孩子的存在也无法使她在蒋少祖和哥哥那里得到尊重和接纳时,她就杀死了那个孩子。

出身卑微、一向得不到尊重的蒋家大儿媳金素痕,靠出轨的刺激和对蒋家的战斗来获得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哪怕最后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她也要向长期压抑着她的一切秩序战斗。以对权力的征服,来获得生命的意义。

下卷中,从上海向武汉流亡的蒋纯祖,在安徽旷野上与一群被日军冲散的官兵结伴逃难,但却目睹了队伍内部的互相杀戮。士兵丁兴旺,因为恐惧和害怕,孤独地在黑暗的旷野里散步,他碰到了一个老女人,突然意识到,和这个老女人相比,他更具有权威。在权威之力的支配下,他决定抢劫她。但当他看出老女人明白了他抢劫的意图后,又觉得被当作强盗侮辱了自己,在这种侮辱之中他抢了老女人一元钱。但是逃跑的老女人碰到了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团长,于是她向团长哭诉自己被抢劫了。团长认为丁兴旺的举动违背了一个军人的要求,当即枪决了丁兴旺。丁兴旺临死前的惨叫,引来了木船里的同伴,在一场枪林弹火的拼斗中,团长又死在了朱谷良的枪下。

希望用权力统治一切、拯救人类的朱谷良,看到仇敌石华贵与一名强奸妇女的低级军官决斗时,开枪打死了那名军官,并因此觉得在情感上征服了石华贵,要拯救昔日的敌人。当石华贵强奸妇女的时候,他又用枪对准了石华贵。这个时候旷野上唯一的知识分子蒋纯祖挺身而出,用胸膛挡住枪口,阻拦了朱谷良。他哭着说:“我是你们底朋友……我是兄弟!我爱你们,相信我!”② 但令蒋纯祖惊愕的是,石华贵反过来枪杀了朱谷良。

因为石华贵是旷野上另一个妄图统治一切的人,他无道德和理想,经历过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唯有烧杀抢夺、奸淫民女的流氓方式,才能使他感到生存的意义。但在村里看到强奸民女的低级军官时,他却愤怒了,其实他昨晚也在强奸妇女。他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和立法者,他不允许还有另外一个强者。“对于朱谷良底拯救,石华贵是感激的,而这种人,是有着蛮性的自尊,害怕这种屈服的。”③正是朱谷良的拯救,使他对朱谷良的敌意越来越深,直到巨大的复仇痛苦让他杀死了朱谷良。

①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65页。
②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733页。
③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690页。

旷野上旁观朱谷良死去的蒋纯祖、丘根固、刘继成、张述清，感到怯懦和屈辱，于是他们结成复仇的队伍，又炸死了石华贵。

正如蒋纯祖感觉到的那样，旷野让人“不再感到人们称为社会秩序或处世艺术的那些东西了”，它只剩下“人类与野兽所共有的简单的求生本能”①。在这片寂寞的旷野中，精神演化为强大的狮子。在旷野上，朱谷良不信仰“理性、光明、热爱”，只信仰“力量”；石华贵则不愿与另一个强者共存；处在他们之间的蒋纯祖等人，左右逢源，靠狡诈的谎言来求生。但路翎没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评判旷野上的狰狞与杀戮，相反通过蒋纯祖的伦理与道德在旷野上所呈现出来的虚伪无力，搁置了道德与理性。同时也把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倒退等时代公认的价值尺度搁置了起来。作家让一个个受压抑的灵魂在原始强力支配下奋勇突进，原始强力就是他（她）们生命战斗的方式。

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蒋家二儿子蒋少祖年轻的时候相信西欧文化，信奉尼采的悲观主义，认为社会需要激烈、自由和优秀的个人英雄主义②。他反对封建、独断、机械、麻木，觉得“必须勇敢地走向现代文明”③。他还认为人只有在孤独里才能找到真理，为此他勇敢地和权力宣战。但仅仅四年后，在战争带来的流浪生活中，蒋少祖投降了，没有在“人生底战场上前进一步”，反倒是“希望从这个战场后退了”④。他每天吃饭、喝茶、散步、种菜、收租，整理中国文化典籍，最终在自己反对过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心灵的和谐。路翎通过蒋少祖生命力的衰弱、激情的消退，来使他完成人生方向的寻找——向宁静生活回归。

而蒋家小儿子蒋纯祖，在遭遇了旷野的杀戮、武汉演剧场的虚伪、石桥小学启蒙教育的惨痛失败后，在贫困的乡场上，他得了严重的肺病，经常体验到死亡的逼近。但就在蒋纯祖身体逐渐的衰弱中，一种内在的“原始生命力”在他身上腾腾燃烧。他开始一遍一遍地用抒情的方式在内心里呼喊“我亲爱的克力”，“‘春天会来临，阳光会照耀，——我亲爱的克力啊！’他说。他的亲爱的克力是谁，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常常念着她，呼喊着她”。⑤这种说不清的、在他体内燃烧的“克力”就是前文罗洛·梅所说的“原始生命力”。这种“力”推动着他对生命道路的探寻和确认。在对“克力”的一遍遍呼喊中，蒋纯祖从内心深处听到了时代雄壮的命令，“‘前进！’好像一匹年富力强的、自觉美丽、充满着虚荣心的马，在前进的命令之下，蒋纯祖底全身都要兴奋地战栗着。‘前进！’这匹马开始奔驰，向那些要塞，那些堡垒猛扑过去。‘从此我就脱离了那陈腐的、愚笨的、黑暗的一切，在我底周围，是战争底封狂的火焰，亲爱的、无上的克力啊！’”⑥“无上的克力”推动着虚弱重病的蒋纯祖毅然决然地要走“一条险恶的、英雄的道路”，要跨越横亘在那个时代中国前进道路上的“僵尸前进”⑦，他兴奋着、希望着，但又不知道兴奋和希望的是什么。在“克力”的燃烧中，他“心里忽然甜蜜，忽然痛苦，他忽然充满力

①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 695 页。
②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 6 页。
③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 6 页。
④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 1227 页。
⑤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 1159 页。
⑥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 1195 页。
⑦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 1212 页。

量……忽然又堕进深刻的颓唐……”[①] 他时常在自我肯定与怀疑之中、绝望和希望之间、彷徨与前进之间挣扎探寻,呼喊“克力”,希望在这种力的指引下最终找到前进的方向。正是在这种一会儿燃烧一会儿冷却的生命力的反复交替中,蒋纯祖完成了对生命的探索,直到病死前的一刻,他仍然呼喊着“克力”“前进”[②]。虽然到最后他仍没有找到明确的前进方向,但这种生命意志力一直伴随他不停地寻找;并且随着他的探索,这种力越来越强,在他死亡的那一刻熊熊燃烧。

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当中,路翎坦言,“我所设想为我底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生命在呼唤着。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底缺点,憎恶他底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正是我们中间的多数人因凭借无辜的信条和劳碌于微小的打算而失去的”[③]。他竭力地告诉他所设想的对象,“这个世界上,人们应该肯定,并且宝贵的,是什么”,“是渴望着这个民族和他们自己底新生的人们,就必得有怎样的精神和勇气”[④]。路翎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个体价值的实现并不是外在的一切所能赋予的,而是要在复杂的生活里面不停地探寻、搏斗,超越自己。

三、“原始强力”的写作方式

对人的内在生命力的关注、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示,方法来自于作家对人物潜意识的深层挖掘。如前文所说,作家将笔伸进人物内心深处,一些潜藏在人物无意识之中的思想变换,支配行动和话语意识被展现了出来。对人物内心的挖掘,路翎也进行了叙事手法上的探寻,对叙述的自觉实验,对日常审美的挑战,构成了《财主底儿女们》这部小说文本上的独特之处。

舒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路翎的小说里,最触目的特点是,作者分析的详细和故事的平常。那些分析就是战斗,那些平常的故事就是人生。”[⑤] “分析”一词很好地概括了路翎的叙事特色,个体生命关照下对历史、民族、人类的思考,都融入在作品详细的分析之中。这自然也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主张作家深入到生活内部去,要有批判、分析的能力有关,而完成这种分析的主要方式就是叙述,通过叙述来发掘和分析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

1943年5月13日路翎在写给胡风的信中说:“写实主义底所谓内容,常常只是罗列事实和追寻外部的刺激:以情感为精神。因此写实主义全无高度的组织气魄。我底反抗是去年动手写长篇时开始的。”[⑥] 并认为“叙述的彻底摒弃等等,则生根于近来的某些倾向里:以为要尊重读者底想象力,以为作者不需多说话,以为作者要宽大,使读者去明白那些未显露的内容”,“叙述的摒弃令使所表现的

①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217页。
②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312页。
③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第2页。
④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3页。
⑤ 舒芜:《什么是人生战斗——理解路翎的关键》,见杨义编:《路翎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
⑥ 据朱珩青的《路翎:未完成的天才》(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一书介绍,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写于1942年4月,可以推断此处“长篇”意指《财主底儿女们》。

一般化，其次，作者底较难深沉的感情由所谓的含蓄而逃亡了”[①]。显然，路翎希望从叙述中追求的是“作者”感情的强烈表现。因此，我们常在《财主底儿女们》中看到充满作者主观色彩的叙述语言。

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质是“讲述”故事，作者充当故事的讲述者，很少对人物内心进行刻画，最多是对人物言行的表达。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学的变革之一，就是用客观冷静的描写代替中国传统文学中全知全能的叙述。五四文学主要是在“展示”，而不是在“讲述”。五四时期的作家大多用“照相镜头”的方法，详细描写一个社会的横断面，故事不是他们的中心，他们的重点在于展示性的启蒙。事实上，按照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的研究，没有纯客观的描写，在作品当中或多或少的都有作家的声音[②]。到了20世纪40年代，因为要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小说的故事性被加强。但不同于赵树理、张爱玲那样娓娓道来地叙述一个故事，路翎的叙述除了一些包含主观色彩的讲述和判断之外，大多是关于人物内心的叙述。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探讨，是在大量的分析和叙述中进行的，使得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心理描写语言的界限十分模糊，呈现出主观性较强的心理分析色彩。

但在路翎的心理分析中，他并不全知他的人物的性格，甚至他的人物也不一定知道自己的全部性格，因为他（她）们的内心没有一刻停留在一个点上，时刻处于一种自我肯定又否定的变换当中，叙述者只能在叙述中与人物一起寻找性格的发展变化。《财主底儿女们》当中，叙述者并不是高高在上全知全能的，而是把自己融入到作品当中去，和人物一起探讨。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财主底儿女们》当中安静地听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而是要跟着人物一起经历一番心灵的挣扎与思考。

在获得了蒋家大量财产后，蒋家大儿媳金素痕突然感觉到孤独和痛苦，她开始珍惜起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的内心被一幅和平的图画所召唤：主妇的权威，老人的悠闲，丈夫的服从；家宅的修整、改建，财产的整理和花园的繁荣。在这种召唤下，她动身前往苏州去和公爹蒋捷三和解。在去的路上，她有着从未有过的宁静，感觉到生活的幸福。枯藤、老苔、卖花女的歌唱，都变得和平甜蜜。然而，带着美好愿望的她一进门便听到了蒋捷三的死讯，她立刻又陷进了绝望的漩涡，“金素痕混乱地痛苦着，觉得整个巷子在旋转”[③]。她突然感到了周围的敌意和自己的孤独，内心有了风暴，又开始了阴沉而残忍的战斗。在巨大的心灵状态的跳跃中，灵魂的挣扎与无助，痛苦与绝望都被展现了出来。严家炎认为，路翎在“心理刻画方面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善于写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丰富变化的心理变化，善于写出从某种心理状态向另一对立的心理状态的跳跃”，“这样的变化幅度与速度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都是罕见的”[④]。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没有一刻是停留在一个画面上的，他们在瞬间找到精神的栖息之地，又在瞬间摧毁刚刚建立的追求。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是完美无瑕的，也没有一个人物是让人咬牙切齿憎恨的，他们摇摆在美好与丑恶、觉醒与麻木、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下、友爱与仇恨、痛苦与幸福、追求与堕落、理智与荒诞等矛盾之中。

在龙潭乡间的铁道旁，少年蒋纯祖和陆明栋有着强大的兴奋，他们表现出对火车的狂热。在无边的原野之中，袭来雄壮的雷雨，两颗生命躁动着：

---

①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第65—66页。

② 参见[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③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333页。

④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从强烈的快感突然堕进痛灼的悲凉,从兴奋堕到沮丧,又从沮丧回到兴奋,年轻的生命好像浪潮。这一切激荡没有什么显著的理由,只是他们需要如此;他们在心里作着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最灼痛的思索,永远觉得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呼喊。①

当火车发出骚乱的大声穿过平原时,蒋纯祖在心里大喊:"停住!停住!"

……蒋纯祖凝视着,突然向火车狂奔。他感到周围像海洋。他感到周围浓黑,起伏着波涛,而火车像战舰,愤怒地驶过波涛。

……他唤醒了痛苦,在铁道上徘徊着,立刻便痛苦得打抖了——那种年青人底尖锐的痛苦。他打自己,撕着头发,虚伪地哭出声音来。"我要一个海岛,一个海,一支枪,要!要!这样才没有人知道的心里的坏想头!我不要读书,我不想!我要!要!我的!不是你们的!"他高声向自己说。并且伸手去打他底假想的仇敌。②

当作者深入到蒋纯祖的潜意识中,将这汹涌澎湃的内心世界展示给我们的时候,一股强大的、想冲破一切的"原始强力"就奔驰了过来,这样的内心就如机关车的蒸汽机一样驱动着车辆前行。

这种心理分析,不仅具有战斗性,也极具侵略性。读到对龙潭乡间的风景描写,你会发觉那不是客观的风景描写,而是被蒋纯祖的主观愿望过滤过的风景。就如蒋纯祖所感到的"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和周围的一切调和,他们觉得周围的一切只在参与他们底内心战争这一点上才有意义"。作者在一切描写当中都融入了人物的内心感受,风景同人物一样,也在焦虑不安。

这一时期,来自西方的纪德、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理论给了路翎很大影响。他对于西方作家使小说突破传统的情节中心而向人类的心理世界深入,使小说脱离单纯的故事性樊篱而获得对于人类生存境遇的某种整体性的探讨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有的批评家赞誉说:"社会结构剖析与心理结构分析的统一,艺术家、心理学家与历史学家的统一,使《财主底儿女们》具有了'心理历史小说'的特征,当之无愧地成为展示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史诗。"③

这种分析到人物灵魂内部去的精神展示也体现了路翎在现代文坛的独特性。比较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创作,老舍的心理描绘是活泼而不跌宕,转折而不失连贯性;钱钟书的心理描写是冷静客观的讽刺,展示出另一种人类的存在哲学;更不用类比解放区作品对农民翻身后喜悦的心理的描写;路翎是在泥沙俱下的人性内涵之中探寻。

路翎通过对"原始强力"的开掘,塑造了一种有悖于我们传统审美的繁缛的文本世界。造成这种审美异常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语言的自觉实验。

在传统小说的语言观中,语言仅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和媒介。到了20世纪西方出现索绪尔等人的语言学革命,导致了人们语言观的改变,文学作品的语言由传统工具论转向本体论。语言不再是一种工具,而是成为了目标与本体。因此,在长篇小说现代化开始叙述策略的转变时,语言的策略也首当其冲被纳入了实践的范畴。

①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478—479页。

②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482—483页。

③ 钱理群:《展示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史诗——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简论》,《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财主底儿女们》创作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已经出现了老舍、沈从文等一批在白话文写作领域颇有成就的作家，这些作家以他们独特的、富有风味的语言风格为之后的文学创作开辟了语言范式。但《财主底儿女们》中，无论人物的语言还是叙述的语言都显得晦涩、夸张、怪诞、文绉绉，这造成了《财主底儿女们》阅读的困难，劝退了不少读者。

在路翎的晚年作品《我与胡风》一文中，路翎回忆和他和胡风之间的一次讨论。胡风向路翎转达了向林冰等人对《财主底儿女们》语言的批评，说路翎“小说采取的语言，是欧化的形态”，“人物的对话也缺少一般的土语、群众语言”，“大众语言的优美性就被你摒弃了”。对这样的批评，路翎反驳说，“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语言，不是土语的”，“他们在心里，用这思想的，而且有时也说出来的。我曾偷听两矿工的谈话与一对矿工夫妇谈话，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词汇的。有‘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汇”，“我想，精神奴役底创伤，也有语言奴役底创伤，反抗便是趋向知识的语言”[①]。在这里，路翎提出了“语言奴役底创伤”。并且在他看来。这种“语言奴役底创伤”同“精神奴役底创伤”一样是压抑在广大民众身上，使其动弹不得的痼疾所在。反抗中国人沦为“奴隶”的斗争，就也要反抗“语言奴役底创伤”。

路翎认为反抗的方式是“知识的语言”的使用，这种“知识的语言”被认为是欧化句法的使用。例如，在《财主底儿女们》开头：

> 一·二八战争开始的当天，被熟人们称为新女性和捡果子的女郎的，年青的王桂英，从南京给她底在上海的朋友蒋少祖写了一封信，说明她再也不能忍受旧的生活，并且厌恶那些能够忍受这种生活的人们；她，王桂英，要来上海，希望从他得到帮助。[②]

当代作家李锐曾经评论说，这样的欧化句法已“病入膏肓”，“时隔半个世纪之久，我们还是不免要被这样的语言碰得鼻青脸肿”[③]。其实《骆驼祥子》《围城》都大量采用了欧化的笔法，欧化的笔法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营造氛围、突出意境。路翎“知识语言”的异质性，并不能全部归于“欧化”的语言，很大程度上它是作者自觉实践的语言的“陌生化”。

“陌生化”理论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来的，它通过对普通语言的“扭曲”，造成对事物感觉的“陌生化”，从而达到艺术地“更新我们对生活和经验的感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种手法“是造成一种对客体的特殊感受，创造对客体的‘视象’，而不是对它的认知”，“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识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④]。按照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语言的审美变异就是对普通语言进行艺术的扭曲，使其迥异于常规，从而更新我们的感觉。《财主底儿女们》当中，大量形容词的反复、重叠使用，人物世界的复杂扭曲，就是这种“陌生化”理论的体现。

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中，路翎说，“我特别觉得苦恼的是：当我走进了某一个我所追求的世

---

①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第282—283页。

②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3页。

③ 李锐：《春色何必看邻家——从长篇小说文体的变化浅议当代汉语的主体性》，《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④ 转引自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形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118页。

界的时候,由于对这某一个世界所怀的思想要求和热情的缘故,我就奋力地突破,而结果弄得好像夸张、错乱、迷惑而阴暗了:结果是暴露了我底弱点"[①]。在作家的叙述当中,一种自觉的语言"陌生化"追求观表露了出来。为了反抗和"精神奴役底创伤"一样压迫人思想的"语言奴役底创伤",他勇敢地进行一种语言的实验。但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暴露了他的缺点,但还是奋力追求。

语言"陌生化"是作家寻求一种已有语言无法表达的审美意蕴的选择。人物理性世界的摇摆不定,怪诞的行为,激烈的精神斗争,都决定了《财主底儿女们》不可能采用通俗、幽默的语言。"突击的时代我要寻找往前进和唐突与痉挛,因为时代和人的心理都有旧事物的重压,所以有这种唐突与痉挛。"[②]这种"唐突"与"痉挛"的"陌生化"语言的运用,代表着路翎向生活搏斗的激情和勇气。

其实这样的实验一直进行到中国当代文学。读读《财主底儿女们》发表四十年后,残雪、孙甘露等人对语言"陌生化"的实验,我们就能更明白路翎的意义。或许我们读不懂残雪的语言,但你能在作品中感受到一种挣扎。或许我们无法在《财主底儿女们》中寻找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但我们却能听到一首来自灵魂内部的战斗之歌。

这种语言的自觉试验,也是对民族审美思维的一种挑战。当这样复杂多面的人物内心世界和陌生化的语言,呈现在读者眼前时,可能从心理和审美思维上都无法直接接受。胡风就曾经用比喻的方式提出过《财主底儿女们》中人物潜意识的开掘对民族心理和民族思维的挑战:"你说过,你在南京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看到笼子里的老虎饿了,就将大饼给它吃。不是有许多人责备你并要打你么?人是不可作特异的行动的。人们说你买大饼给老虎吃,扰乱了民族精神,民族不这样干的;你写作,塑造蒋纯祖的形象,人们也说'扰乱了民族精神'。民族是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的,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人们是理智的。"[③]正如钱理群所说,路翎"自觉地揭示精神现象的复杂,强烈,丰富,挖掘隐蔽的、病态的、阴暗沉重的心理,追求强力、繁复的美,不仅是对中国的传统美学,更是对民族精神(民族思维、心理、情感)的公开挑战"[④]。这种挑战一方面显示了作家打破一切陈规、探求光明自由之路的强烈愿望和勇气;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表达。独特风格文本所发出的独特之声,也唤醒了惯性思维的读者,重新思考那个时代和人。

如前所述,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通过对人物的深层心理现象的揭示,反映个体的生存境遇和心灵感受,表现出一种焦虑体验,同时在叙事手法上采用心理分析对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日常生活中微妙心理、变态心理的开掘,使得《财主底儿女们》与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具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比较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与"新感觉派"小说的不同,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上路翎的自觉选择。路翎描写的不是"新感觉派"笔下的都市生活,而是凋零的封建家庭、流亡的旷野、愚昧的乡场,联系的是整个时代和民族的事实。因此他的主要人物也不是舞女、姨太太、少爷、银行家,而是肩负探寻民族之路重任的知识分子。虽然路翎的人物也具有非理性的心理,但不同于"新感觉派"的颓废萎靡,他们是在生活中战

①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第1页。
②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见张业松编:《路翎印象》,第283页。
③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见张业松编:《路翎印象》,第286—287页。
④ 钱理群:《文体与风格的多种试验——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斗，也因此《财主底儿女们》呈现出悲凉又激昂的基调。

1944 年，在给好友袁伯康的信中，路翎说，“但‘我听到……日光冷清地哭’，‘昏睡的泉水亮不起一个梦’等等，仍然是‘外部的美观’，不好。这种诗句，是生活在动乱时代而又不敢正视现实的人的诗句，就是所谓印象派之类。劳苦的人们，奋斗的人们，不写这样的句子”①。虽然他极力去展示人物的内心，但对于不痛不痒、无病呻吟的内心描写痛恨之极。路翎认为，激烈的精神斗争中，可以听到人物心底的声音，那才是真实的人生。要毫不顾忌地对历史提出疑问、追求个人的道路、关注现代人困境中的存在。但作家要像音乐家那样，要抓住这种真实当中的反抗之力，欢乐、豪放地去和黑暗现实战斗。正如他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中所说：“我所追求的，是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②

责任编辑：冯济平

"Primitive Power" in the Way of Life Fighting – Rereading Lu Ling's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Rich Lord*

Qi Xiaoge
Editorial Board of *Book Town*,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Rich Lord*, an epic of spiritual struggle, is an important novel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eated by Lu Ling based on her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 This way of spiritual combat is an excavation of the theme of "primitive power". Lu uses this power to show the characters' resistance to the dilemma of life, creating unique character imag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psychological analysis, language defamiliarization and other creative experiments, she tries to express "primitive power", thus opening up an unique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Lu Ling;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Rich Lord*; primitive strength

① 张以英编：《路翎书信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 年，第 22 页。
②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第 1 页。

东汉末年墓碑文文学成就探析

孙 立 涛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受东汉末年政治环境的影响,文人儒士在墓碑文的写作手法上多有开拓。从行文语言上看,以隶事运典为尚,且多用修辞手法,这既表现在对逝去碑主的品赞性用语上,又表现在碑文本身的行文语言上。从情感表达方面来看,哀婉的文辞中蕴含着清流士人的深挚情感,渐趋骈俪化的文辞又使碑文极具力度和气势。从布局谋篇上看,既有对碑主生平的铭记实录,又有颇多的夸饰与虚构,从而使碑文虚实相间、韵味深远。这些手法的运用,使东汉末年的墓碑文在实用价值之外,又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

关键词: 东汉末年; 墓碑文; 文学成就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5-0072-10

东汉末年碑文较为兴盛,《文心雕龙·诔碑》篇载:"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①] 蔡邕擅作碑文,他曾对卢植说过:"吾为碑铭多矣。"[②] 其碑文的艺术成就也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莫大推崇。《后汉书·文苑传下》载:"(黄射)尝与(祢)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黄)射爱其辞,还恨不缮写。"[③]《文选》始列"碑文"一体,且收蔡邕《郭有道碑文》《陈太丘碑文》。严可均辑《全后汉文》收录蔡邕碑文40余篇,其他无主名的汉末碑文尚有多篇,基本为墓碑文。另据《后汉书》各传主的传记,与蔡邕同时及前后的其他文人,如桓麟、马融、边韶、崔寔、张升、高彪、张超、卢植等人,都撰写过碑文。

除史传、散文集、碑文集中载录的汉末碑文外,历史上出土并保存至今的汉碑也为数不少。历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汉碑的形制、书法艺术及其史料价值,近年来对其文学意义的研究也渐趋增多,但以探究蔡邕个人碑文特色者居多[④],或者是对东汉碑文的文学特征作出整体性关照[⑤],而专门针对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东汉清议与士人文化新变研究"(18FZW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立涛,男,河北河间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4页。

②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27页。

③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下》,第2657页。

④ 如刘跃进:《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王银忠:《蔡邕碑文文学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赵德波:《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系管窥》,《齐鲁学刊》2010年第6期。

⑤ 如任群英:《东汉碑铭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何如月:《汉碑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东汉末年特定背景下墓碑文文学性成长的分析，则相对缺乏。其实，东汉末年碑文的兴盛除碑文艺术本身的发展外，还与当时诸如士人清议活动、党锢之祸等政治因素密切相关。故本文欲结合这个时段的社会背景，从行文语言、情感表达、布局谋篇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当时墓碑文所取得的文学成就。

一、墓碑文行文语言的用典与修辞

从行文语言上看，汉末墓碑文多引经据典，多用修辞手法。在汉代以儒学立国的政治体制下，士大夫群体熟识儒家及相关领域的经典和先贤事迹，故在朝堂奏议或个人行文中，援引经义、隶事用典现象普遍存在，在其各类文体著作中，亦能找到诸多引经据典的例子。东汉末年，当碑文成为众多文人儒士的创作体裁后，引事运典自然也会被带入碑文的创作中。受汉末清议活动的影响，多数墓碑文是从人物品评的角度撰写的[①]，因此隶释运典也多是对逝去碑主的多方形容和品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形容碑主品行正直，会以“羔羊”作比，如《郎中王政碑》“有羔羊之絜，无申棠之欲”[②]；《武斑碑》“孝深《凯风》，志絜《羔羊》”[③]；《夏承碑》“《羔羊》在公，四府归高”；等等。此典出自《诗·召南·羔羊》，其序曰：“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④]

褒扬以德化民的地方官吏时，会借“甘棠”为喻，如《冀州刺史王纯碑》“圣朝嘉君，旋拜徐州，流化甘棠”；《沛相杨统碑》“甘棠遗爱，东征企皇。念彼恭人，怒焉永伤”；《严诉碑》“所在若神，宣布政声，□□甘棠”；等等。此典出自《诗·召南·甘棠》，其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玄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⑤]

颂安贫乐道的思想，则以居“衡门”来指代，如《从事武梁碑》“安衡门之陋，乐朝闻之义”；《山阳太守祝睦碑》：“君惟老氏，名遂身退，色斯翻翔，纡精衡门”；《繁阳令杨君碑》“处靖衡门，童冠如云，故乃名问俞高，休声益著”；等等。此典出自《诗·陈风·衡门》，毛传曰：“衡门，横木为门，言浅陋也。”郑玄笺云：“贤者不以衡门之浅陋则不游息于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国小则不兴治致政化。”[⑥]

---

① 胡宝国说，东汉时期碑刻的大量涌现，“是由当时的人物品评风气造成的”“人物品评通常又被称为‘清议’。”详见胡宝国：《杂传与人物品评》，《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5—146页。何如月也说：“碑文也是一种书写于碑载体之上的盖棺定论和人物品评，它不仅体现出汉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亦反映了当时朝野清议的内容标准。”详见何如月：《汉碑文学研究》，第256页。

②《郎中王政碑》与下文示例中提及的《冀州刺史王纯碑》《沛相杨统碑》《严诉碑》《从事武梁碑》《山阳太守祝睦碑》《繁阳令杨君碑》《司隶从事郭究碑》《堂邑令费凤碑》《平舆令薛君碑》《冀州从事郭君碑》等，皆引自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八至卷一〇五，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93—1055页，不再另行出注。

③ 除《武斑碑》外，下文示例中提及的《夏承碑》《娄寿碑》《刘熊碑》《鲁峻碑》《孔彪碑》《郑固碑》《校官碑》《衡方碑》《尹宙碑》，皆引自高文：《汉碑集释（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7—456页，不再另行出注。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8页。

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第287页。

⑥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七，第377页。

赞碑主天资聪敏,会以“岐嶷”一词来形容,如蔡邕《东留太守胡硕碑》[①]“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娄寿碑》“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刘熊碑》“诞生照明,岐嶷逾绝”;等等。此典出自《诗·大雅·生民》,其诗曰:“诞实匍匐,克岐克嶷。”毛传曰:“岐,知意也。嶷,识也。”郑玄笺云:“能匍匐,则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识别也。”[②]

除以上较为常见的典故外,汉末墓碑文品赞碑主时化用《诗经》篇名或辞句为典的例子还有一些。《鲁峻碑》中“悲《蓼莪》之不报,痛昊天之靡嘉”一句,借用《诗·小雅·蓼莪》诗意[③],以称颂碑主对父母的孝心。《夏承碑》中“高山景行,慕前贤列”一句,化用《诗·小雅·车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④],以喻碑主心存慕德行善之高识。

《诗经》之外的其他典籍文辞,在汉末墓碑文中化用为典的情况也很多。《山阳太守祝睦后碑》中“色斯举矣,复身衡门”[⑤]及蔡邕《陈寔碑》中“以所执不协所属,色斯举矣”,直接化用《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⑥],以指代退世归隐、洁身自爱的操守。蔡邕《太傅胡广碑》“生荣死哀,流统罔极”,《武斑碑》“生荣死哀,是为万年”及《司隶从事郭究碑》“生荣死哀,弈贵遗称”,借用《论语·子张》“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以评论碑主生前身后功勋荣誉之卓著。[⑦]《娄寿碑》“下学上达,有朋自远”,出《论语·学而》中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语,以称颂碑主人格魅力之大。《堂邑令费凤碑》“有耻且格,牧守旌功”,引用《论语·为政》中“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⑧],以称颂碑主的克己修身、明德守礼。《孔彪碑》“丑类已殚,路不拾遗”,合用《左传·文公十八年》“丑类恶物,顽嚚不友”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国无盗贼,道不拾遗”句意,以赞颂碑主为政之美。又,《孔彪碑》“云行雨施,□□大和”,直接化用《易·乾》卦《彖》辞“云行雨施,品物流行”[⑨],以赞碑主广施恩惠之德。蔡邕《处士圈典碑》“童蒙来求,彪之用文”,引用《易·蒙》卦辞“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⑩],以喻碑主学行修身对求学者吸引

---

① 《东留太守胡硕碑》与下文述及的蔡邕其他碑文:《陈寔碑》《太傅胡广碑》《处士圈典碑》《琅邪王傅蔡朗碑》《太尉李咸碑》《汝南周勰碑》《太尉乔玄碑》《范丹碑》《太尉杨赐碑》《司空房植碑》《荆州刺史度尚碑》,皆引自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七十五至七十九,第759—787页,不再另行出注。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七,第530页。

③ 《蓼莪》序曰:“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诗中有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郑玄笺云:“哀哀者,恨不得终养父母,报其生长己之苦。”(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三,第459页。)可见,此诗用以赞颂怀有报孝父母之心的士人。

④ 郑玄笺云:“庶几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四,第482页。

⑤ 参见洪适:《隶释·隶续》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4页。

⑥ 何晏注“色斯举矣”曰:“马(融)曰:‘见颜色不善则去之。’”邢昺正义曰:“此言孔子审去就也。谓孔子所处,见颜色不善,则于斯举动而去之。”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6页。

⑦ 何晏曰:“孔曰:‘言孔子为政,其立教则无不立,道之则莫不兴行,安之则远者来至,动之则莫不和睦,故能生则荣显,死则哀痛。’”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九,第2533页。

⑧ 邢昺正义曰:“民或未从化,则制礼以齐整,使民知有礼则安,失礼则耻。如此则民有愧耻而不犯礼,且能自修而归正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二,第2461页。

⑨ 孔颖达正义曰:“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者,此二句释‘亨’之德也,言乾能用天之德,使云气流行,雨泽施布,故品类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无所壅蔽,是其‘亨’也。”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页。

⑩ 王弼注曰:“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一,第20页。

之大。《司隶从事郭究碑》"昭德塞违,克纪克纲",直接借用《左传·桓公二年》中"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①],以夸饰碑主昭明善德之举。《金乡长侯成碑》"安贫乐道,忽于时荣"[②],化用《论语·学而》"未若贫而乐"和《文子·上仁》"圣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③]等语,以形容碑文坚守道德准则的节操。

除化用古代典籍文辞或文意为典外,古代的先贤良士,亦是汉末墓碑文品论碑主时借以为典的对象。以儒学才士蔡邕的作品为例,《琅邪王傅蔡朗碑》"云龙感应,养徒三千",借"孔门弟子三千"来影衬碑主处居讲学的成绩;《东留太守胡硕碑》"孝于二亲,养色宁意,蒸蒸雍雍,虽曾、闵、颜、莱,无以尚也",以严守孝道的孔门弟子曾参、闵子骞、颜渊和道家人物老莱子来比赞碑主的孝行;《太傅胡广碑》"劳思万机,身勤心苦,虽老莱子婴儿其服,方叔克壮其猷,公旦纳于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礼,曷以尚兹",以西周贤臣周公旦、方叔及春秋时期老莱子、正考父这些先贤来比衬碑主的美德。而《太尉李咸碑》用典尤多。"夙夜严栗,孝配大舜""操迈伯夷,德追孔父""协德魏绛,和戎绥边""虽元凯翼虞,周、召辅姬,未之或逾",以舜帝比配碑主孝行,以伯夷比配碑主操守,以孔子比配碑主德行,以魏绛比配碑主戍边之功,以"八元八凯"和周公、召公比配碑主的辅佐之德。另外,蔡邕《郭有道碑文》《陈太丘碑文》《太尉刘宽碑》《司空房植碑》《荆州刺史度尚碑》等文中,都有取用前人为典的情形。当然,"以前人为典"在蔡邕之外的其他无主名碑文中亦多有存在。如《郑固碑》"穷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学,襄冉季之政事",以孔门名徒子游、子夏和冉有、季路比拟碑主在文学、政治上的成就。《荆州刺史度尚碑》(阙名)"深入则轻冠军,附士渥于李广"[④],以西汉名将霍去病和李广比附碑主军事上的功绩。《鲁峻碑》"视事四年,比纵豹、产""有黄霸、召信臣在颍南之歌",以春秋战国时期子产、西门豹及西汉黄霸、邵信臣这些贤臣,来映衬碑主治理地方的美政。《校官碑》"履菰竹之廉,蹈公仪之絜",以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和春秋时期鲁人公仪休,来比拟碑主的廉洁,等等。

汉末墓碑文的撰作者多为儒学文士,他们有着较为深厚的学识与素养,因而在称颂碑主之外,碑文语言本身亦多引事运典。如《巴郡太守张纳碑》"杼柚其空,溯流转漕"[⑤],直接化用《诗·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杼柚其空"[⑥],以形容社会生产遭受破坏;而"腾前付冀,道回且艰"一句,则从《诗·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引申而来,喻为人理事之艰难。《太尉杨震碑》"鸿渐衡门,群英云集"[⑦],从《周易·渐》卦爻辞[⑧]发展而来,以指代仕途升迁。《平舆令薛君碑》"不憖遗君,奄忽薨徂",

① 孔颖达正义曰:"昭德,谓昭明善德,使德益章闻也。塞违,谓闭塞违邪使违命止息也。"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41页。

② 参见洪适:《隶释·隶续》卷八,第92页。

③ 王利器:《文子疏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57页。

④ 此碑作者失考,非同于蔡邕同名的《荆州刺史度尚碑》。参见洪适:《隶释·隶续》卷七,第84—85页。

⑤ 参见洪适:《隶释·隶续》卷五,第62页。

⑥ 郑玄笺云:"小也、大也,谓赋敛之多少也。小亦于东,大亦于东,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谭无他货,维丝麻耳,今尽杼柚不作也。"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三,第460页。与之相似的还有《竹邑侯相张寿碑》:"征役赋弥年,萌于□戈,杼轴罄殚。"详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一〇一,第1017页。

⑦ 参见洪适:《隶释·隶续》卷十二,第136页。

⑧《渐》卦爻辞:"初六,鸿渐于干;六二,鸿渐于盘;九三,鸿渐于陆;六四,鸿渐于木;九五,鸿渐于陵;上九,鸿渐于陆。"其《彖》曰:"渐,之进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王弼注曰:"以渐进得位也""鸿,水鸟也。适进之义,始于下而升者也,故以鸿为喻之。"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五,第63页。

从《诗·小雅·十月之交》“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①]一句演化而来,以表达哀悼之意。《荆州刺史度尚碑》(阙名)“恩信并宣,令行禁止”,出自《管子·立政》“令则行,禁则止……政之所期也”[②],指代政令亨通。蔡邕《汝南周勰碑》“厥初生民,天赐之性”,从《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借用而来,以描摹伟人之语加诸碑主之身,以凸显其人格的伟大。

由上可见,汉末墓碑文隶事用典不仅使用频繁,而且方式多样,不管是以之品赞碑主,还是用其作为行文语言,皆恰到好处。

当然,汉末墓碑文众多,这些典故并非零散地偶见于各篇碑文中,一篇墓碑文多处用典的现象也是常见的,如上文提到的蔡邕《太尉李咸碑》即是如此。又如《衡方碑》中,“安贫乐道”出自《论语·学而》和《文子·上仁》,已见上文。“履该颜原,兼修季由”,此句所涉人物为孔门弟子颜渊、原宪、季路。“长发其祥”,出《诗·商颂·长发》。“少以文塞,敦庞允元”,化用《尚书·舜典》“惇德允元”句意。“遵尹铎之导”,尹铎为春秋时期人物,赵简子曾使其治晋阳[③]。“化速邮置”,化用《孟子·公孙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将继南仲、邵虎之轨”中,南仲为周文王时的武臣,邵虎为周宣王时平淮夷的武臣。“感背人之《凯风》,悼《蓼仪》之劬劳”句,借用《诗·邶风·凯风》和《诗·小雅·蓼莪》文意[④]。“寻李广之在边,恢魏绛之和戎”中,魏绛和李广分别为春秋时期和西汉时期的著名武将。“归来洙泗”中,洙泗为鲁国曲阜的洙水和泗水,本指代孔子于此间删诗定礼、聚众讲学[⑤]。“恩降《乾》《太》,威肃《剥》《坤》”,借用《易》乾卦、泰卦、剥卦、坤卦涵义。“有单襄穆典谟之风”中,“单襄穆”指单襄公和单穆公,典谟指《尚书·皋陶谟》。“《雅》《颂》兴而清庙肃,《中庸》起而祖宗□”,分别借用《诗经》和《中庸》题旨。“诸子缀《论》,《斯干》作歌”中,《论》指《论语》,《斯干》借用《诗·小雅·斯干》文意。“不忝前人”,借用《国语·周语上》“奕世载德,不忝前人”。“揽英接秀,踵迹晏平”中,晏平指晏婴。“显显令闻”,从《诗·大雅·假乐》“显显令德”演化而来。“剋长剋君,不虞不阳。维明维允”,分别借用《诗·大雅·皇矣》《诗·鲁颂·泮水》《尚书·舜典》中文句。“能哲能惠,克亮天功”,分别化用《尚书·皋陶谟》“能哲而惠”和《尚书·舜典》“惟时亮天功”。“兢兢业业,素丝《羔羊》”,借用《尚书·皋陶谟》文辞和《诗·召南·羔羊》寓意。“闾闾侃侃,颙颙昂昂”,化用《论语·乡党》“侃侃如也,闾闾如也”和《诗·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謇謇王臣,群公宪章”,化用《易·蹇》卦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和《礼记·中庸》“宪章文武”。“乐旨君子,□□无疆”,又化用《诗·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万寿无疆”。可见,《衡方碑》中隶事用典现象何其繁多!其实这些典故只是从碑文表面上看到的比较明显的例子,《衡方碑》文辞中隐性的用典还有不少。但只是这些已足以让我们感觉,此篇碑文文辞句句有来历、句句有深意。从一篇碑文多处用典的情形中可以看出,汉末碑文作者在运事

① 陆德明注“慭”曰:“《尔雅》云:‘愿也,强也,且也。’”郑玄笺云:“慭者,心不欲自强之辞也。言尽将旧在位之人与之皆去,无留卫王。”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二,第447页。

②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0页。

③ 参见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九》,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48页。

④《诗·邶风·凯风》:“凯风自南”,毛传曰:“南风谓之凯风。”郑玄笺云:“以凯风喻宽仁之母。”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二,第301页。《蓼仪》:即《蓼莪》,已见上文。

⑤《礼记·檀弓上》载:“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郑玄注曰:“洙、泗,鲁水名。”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82页。

用典方面的娴熟程度及在碑文语言上的研磨之功。故后人评曰:“汉碑雅驯,词句皆有所本……经子成语,触目皆是。”①

此外,汉末墓碑文因品赞碑主之需,还大量运用了比喻、对比、衬托等修辞手法。如蔡邕《太尉乔玄碑》用比喻句“拔贤如旋流,讨恶如霆击”“如渊之浚,如岳之嵩。威壮虓虎,文繁雕龙”,来形容碑主的高风亮节。《郭有道碑文》借隐士洪涯、巢父、许由之事比衬郭泰名节:“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②《琅邪王傅蔡朗碑》用对比手法描述碑主功绩:“虽安国之辅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又如《刘熊碑》比喻碑主仁义曰:“仁恩如冬日,威猛烈炎夏。”《司隶从事郭究碑》以前贤对比碑主政绩曰:“虽赵武之佐晋,宋甫之疠色,操筹撰功,君其越诸。”《鲁峻碑》以前贤衬托碑主政绩曰:“有黄霸、召信臣在颍南之歌。”其实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与碑文中化用古代典籍文辞、文意或取用古之先贤之事之语为典的现象是同步的,多数典故的运用即是以比喻、对比、衬托等方式出现的。这在为碑主品评润色添彩的同时,其修辞效果又使得碑文语言含蓄隽永、耐人寻味,从而为汉末墓碑文增添了较强的文学意味。刘师培评价蔡邕碑文时曰:“涵咏《诗》《书》之音节,而摹拟其音调,不讲平仄而自然和雅。”③此评语亦适用于汉末同类碑文中。

二、墓碑文的充沛情感与气势之美

从情感表达方面来看,汉末多数墓碑文文辞不仅辞采华美、哀婉动人,而且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渲染力。尤其是碑主的友朋、同僚或门生故吏撰作的那些述德性碑文,在为逝者抒发孝道与哀情的同时,读之又能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时士林间的诚挚义深。这是因为,汉末碑文撰作者皆是深受儒家伦理纲常熏陶过的士人,他们研习儒家经典,熟谙交结之礼,且都曾心怀通经入仕的梦想,这在无意间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当汉末政局变故、仕途受阻,尤其是同道之人因反对宦官弄权而遭受党锢迫害或政治打压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同病相怜、同忧相救之感油然而生,他们彼此荐引、声援同类,期盼社会正常秩序能够重建。当这种情感倾注于为同类所作的碑文时,文辞自然感情饱满、深挚,读之则觉跌宕起伏、情真意切。如蔡邕《范丹碑》中充满了对碑主固守节操的敬意和对碑主遭受党锢迫害的惋惜与同情:

> 见嫉时政,用受禁锢。君罹其罪,闭门静居,九族中表,莫见其面。晚节禁宽,困于屡空,而性多检括,不治产业……禁既蠲除,太尉张公、司徒崔公前后四辟,皆不就。仕不为禄,故不牵于位;谋不苟合,故特立于时,是则君之所以立节明行,亦其所以后时失途也。

又如蔡邕《陈太丘碑文》④,把碑主遭受党锢的不幸、淡泊名利的心态,碑主的对话、临终遗命及时

①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3页。
②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01页。
③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0页。
④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十八,第802页。

人对碑主的赞语皆引入碑文中。其中还不厌其烦地描述群官百僚以各种方式寄托哀情、表达敬慕的场景,如对大将军的谥词、太守的诔文全文刊录,对会葬人员、人数及各方吊唁之行悉数铺陈。这些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汉末同道士人间的惺惺相惜及对社会贤良的眷恋。正如《文心雕龙·诔碑》篇赞辞中曰:"铭德慕行,文采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① 也只有在汉末时局动荡、贤士反受其害的特殊背景下,才会出现这样主观色彩鲜明和情感表现突出的墓碑文。

此外,语句上趋向骈偶,也为汉末墓碑文的情感表达增添了一股贯气通神的力度美和气势美。众所周知,从东汉末年始散文创作趋向骈俪。而墓碑文作为汉末散文之一,无疑也会受到骈俪化倾向的影响,再加上墓碑文作者亦是参与其他散文创作的文人儒士,因而碑文文辞趋向骈偶似不可避免。如《冀州刺史王纯碑》:"穷则乐善,达则□人,进则延宾分禄,退则却扫闭门。"《沛相杨统碑》:"德以化圻民,威以怀殊俗,慕义者不肃而成,帅服者变衽而属,疆易不争,障塞无事,功显不伐,委而退焉。"《尹宙碑》:"立朝正色,进思尽忠,举衡以处事,清身以厉时,高位不以为荣,卑官不以为耻,含纯履轨,秉心惟常。"这些碑文文辞往往错落有致、声律铿锵,表现出明显的骈俪化色彩。

整体上看,受文体自身性质和时代因素的影响,汉末骈偶性碑文既要尽孝表哀,又要为碑主品评论赞,以褒贤举善为目的,因此碑文文辞往往兼具抑扬顿挫与声情并茂之美。像蔡邕《琅邪王傅蔡朗碑》述及碑主才识时曰:"知机达要,通含神契,既讨三五之术,又采《二南》之业。"《太傅胡广碑》述及碑主政绩曰:"公乃布恺悌,宣柔嘉,通神化,道灵和,扬惠风以养贞,激清流以荡邪,取忠肃于不言,消奸宄于爪牙。是以君子勤礼,小人知耻,鞠推息于官曹,刑戮废于朝市,余货委于路衢,余种栖于畎亩。"《太尉杨赐碑》述及碑主人格风尚曰:"其教人善诱,则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则闾闾焉罔不释也。迄用有成,缉熙光明。"《司空房植碑》述及碑主德行时曰:"治身,则伯夷之洁也;俭啬,则季文之约也;尽忠,则史鱼之直也;刚平,则山甫之励也。总兹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丝发,树私恩,不为也。讨无礼,当强暴,弗避也。"《荆州刺史度尚碑》述及碑主道德与秉性曰:"事亲以孝,则行侔于曾、闵;结交以信,则契明于黄石。温温然弘裕虚引,落落然高风起世。信荆山之良宝,灵川之明珠也。"这些骈俪句式长短错落,声律和谐,使得对碑主的赞颂效果更加含蓄、深刻,读之又觉情韵四溢,能强烈地感知作者在其中倾注的深挚情感。《文心雕龙·丽辞》篇在述及包括蔡邕作品在内的丽辞体创作时曰:"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而《文心雕龙·诔碑》篇在述及蔡邕的碑文时又曰:"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② 蔡邕被看作汉末骈文大家,是与包括这些墓碑文在内的骈俪化创作分不开的。其《郭有道碑文》常被看成是中国古代骈文史上初期的作品,被收入各种骈文选集中③。拿其序文部分来看:

> 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时缨缕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

①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15页。
②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88、214页。
③ 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二十四、任继愈《骈文类纂》卷三十二、谭家健《历代骈文名篇注析》等,均有收录。

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①]

其行文方式虽看似未有章法，时而四字句，时而六字句，其间穿插三字句、七字句等，但往往两两对照、前呼后应，读之又觉错落有致，舒缓有节。而其铭文部分虽为整齐的四言，但亦音韵和谐、情感真挚。刘师培评价蔡邕碑文时曰："汉文气味，最为难学，只能浸润自得，未可模拟而致。至于蔡中郎所为碑铭，序文以气举词，变调多方；铭词气韵光彩，章节和雅。"[②] 能使碑文艺术达到如此境界者，非一般文学儒士刻意模拟即可使然，惟有在汉末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那些心怀天下并自觉承担起褒贤举善以化导世风为任的清流士人，才能造就出这样的以气运词的佳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骈俪化墓碑文文学成就的取得，除得益于汉末文人儒士本身的艺术才华外，关键还在于其间蕴含着清流士人敦风化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也是汉末碑文文辞间流动着充沛情感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墓碑文布局谋篇上的写实与追虚

从布局谋篇上看，汉末多数墓碑文具有"写实追虚"的特点。《文心雕龙·诔碑》篇曰："写实追虚，碑诔以立。"[③] 因丧葬需要而产生的墓碑文，本为一种实录性较强的文体，但同时它又侧重于对碑主一生的褒评，故在铭记实录之外，衔实以佩华，极力铺张碑主的功德也是墓碑文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在东汉末年，因清议活动之需，多数墓碑文以褒德扬善、敦风化俗为撰作目的，所以，在实录逝者名讳、籍贯、生平仕宦、离世日期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竭力盛赞碑主的天资才性、品行才识、道德节操、政绩功勋等，从而使得墓碑文虚实相间、韵味深远。如前所述，多数墓碑文在颂赞碑主人格风范时采用历史典故来比拟、衬托，夸饰性的文辞屡见不鲜。这种现实与理想的交错、华辞与朴语的交叠，是墓碑文"写实追虚"的主要表现。

另外，墓碑文还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开篇即对逝者的先祖、家世进行追述。这样行文的目的当然也是凸显碑主人格的伟大。但是非常多的墓碑文将上限追述到远古时期，甚至着意向古代帝王身上靠拢，就显得虚华不实。举例来看，如《衡方碑》"肇先盖尧之苗，本姓□□则有伊尹，在殷之世，号称阿衡，因而氏焉"；《冀州从事郭君碑》"其先出高辛，兴自于周"；《尹宙碑》"其先出自有殷。乃迄于周，世作师尹，赫赫之盛，因以为氏"；《安平相孙根碑》"厥先出自有殷，玄商之系，子汤之苗"[④]；《北军中侯郭仲奇碑》"其先盖周之胄绪"[⑤]；从其中多用"盖"字来看，所述碑主先祖及家世亦多为推测之词。又如蔡邕《郭有道碑文》谓郭泰："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而《后汉书·郭泰传》涉及郭泰家世时只曰："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十八，第 800 页。
②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 119 页。
③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 215 页。
④ 洪适撰：《隶释·隶续》卷十，第 115 页。
⑤ 洪适撰：《隶释·隶续》卷九，第 99 页。

事县廷。”[①] 蔡邕《陈寔碑》谓陈寔:“其先出自有虞氏,中叶当周之盛德。有妫满者,武王配以大姬,而封诸太昊之墟,是为陈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国氏焉。”而《后汉书·陈寔传》只载其为“颍川许人也。出于单微。”[②] 以此来看,汉末墓碑文对碑主的家世及其先祖的强调,多有虚构或夸大成分。

随着墓碑文在东汉末年的强势发展,以及碑文文辞中虚化成分与夸饰成分的增大,导致汉末魏晋时期的碑文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弊端,一些无德无名之徒受时俗浸染,亦倾慕于碑文纪功述德之功能,故其亲属逝后亦大造功德碑,从而对后人造成贻误。这种现象当然也会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甚至进而攻击碑文一体的弊端。曹魏桓范在《世要论·铭诔》篇中即批评道:“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③] 后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为据,上表陈述曰:“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④] 桓范与裴松之所言之弊俗,也是汉世之后禁碑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有乖事实的碑文确实存在着德薄者位厚、名与实相违的现象,并导致浮夸相尚、贻误后人的弊端,对这类碑文予以禁止有其合理性,诚如裴松之所言:“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

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汉末因敦风化俗的需要,清流士人在墓碑文中略带夸饰性的推贤达善之举,是他们主观向善的愿望导致的。在汉末士人清议活动中,名士对人物的品评一度出现“每所称述,多过其才”的现象,庞统对此解释道:“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⑤] 在人物品评风气下而产生的墓碑文,其与名士清议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诸如蔡邕作碑文“每有愧色”、碑文中有虚构或夸张的成分,抑或汉末竞相造作述德性碑文现象的发生,除墓碑文继承了铭文“称美而不称恶”[⑥] 的传统外,也是汉末儒学名士欲以此感召人心向善、扭转汉末弊俗的表现。这与他们识鉴、奖掖士人的心理是一样的,应与后来那些盲目拔高、偏离事实较远的墓碑文有所区别。从另一方面看,这些看似不实或稍有夸大性的碑文文辞,却正是文学色彩的凸显之处,它们作为汉末墓碑文的重要构成部分,直接丰富了碑刻文化的内涵,这从反方面证明了汉碑文学的兴盛。也正是由于此,汉末墓碑文才会被收入后世各种文学典籍之中,并为众多的文人学士所推崇和仿作。

---

①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第2225页。

②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二《陈寔传》,第2065页。

③ 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十七,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9页。

④ 沈约:《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9页。

⑤ 陈寿撰:《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953页。

⑥ 蔡邕《铭论》和《文心雕龙·诔碑》篇都认为“碑”起源于“铭”,只是“以石代金”而已。而《礼记·祭统》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九,第1606页。

综上所述可见，东汉末年墓碑文的社会职能因政治需要而得以扩展，故文人儒士在写作手法方面用力颇多，从而使这种实用性较强的文体，在行文语言上可读性强，在情感表达上极富感染力，甚至在布局谋篇上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汉末墓碑文这些文学成就的取得，对后世碑文艺术的发展影响甚大，晋代之后碑文独立成体，历代撰作碑文者皆以汉末碑文为宗，收录各代优秀碑文作品的文集亦层出不穷。

责任编辑：潘文竹

Study on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of Epitaphs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Sun Li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literati and Confucian scholars made some breakthroughs in the writing skills of epitaphs. As far as the writing language was concerned, the epitaphs quoted from the classics and used more figures of speech, which is reflected both in the language on the praising the decreased epitaph owners, but also in the inscription language itself. From the view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y fully embodied the scholars' deep emotion through pathetic language, and the use of antithesis makes them more powerful.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e and layout, they contain both memoirs for the tombstone owners' life and exaggeration and fiction, thus adding a mixture of truth and untruth and a lasting appeal. The application of all these methods endow the epitaphs of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with more value and higher literary achievement.

Key words: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epitaph; literary achievement

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机理与建议

尹振涛[1] 陈冠华[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北京 100710; 2. 北京工商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 金融科技应用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推动作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的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国内金融市场需求,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对外开放。当前,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建设还需防范新技术运用导致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信息泄露风险及垄断问题等。我国应继续加强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政策支持,提升保障金融科技安全、高效发展的监管能力,注重金融科技人才培养,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支持。

关键词: 金融科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金融监管; 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5-0082-10

受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指出,我国应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实现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和帮助。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充分利用其普惠性、智能化、高度适应性等特点,发挥对传统金融体系提质增效的功能。一是有助于完善消费市场结构,扩大内需。二是有助于合理调配生产领域的资金需求,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有助于实现调控政策的精准触达,实现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以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强化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关联性,提升国内金融系统的开放水平,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资源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总之,发展金融科技有助于完善国内金融体系,优化国际金融环境,为加快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助力。

一、发展金融科技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

现阶段,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无论在技术、产品和服务创新还是实践领域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尤其是大型科技公司对金融科技发展的带动作用尤为明显。我国监管机构对金融科技发展实践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政策,加之我国营商环境总体上不断优化,消费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为科技企业探索

作者简介: 尹振涛,男,山东青岛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金融科技与金融监管研究; 陈冠华,男,山西临汾人,法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金融监管研究。

金融科技领域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及监管环境，以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公司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在金融科技应用实践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传统金融机构借助自身经验和资本优势，通过与科技企业合作或采取独立研发的方式，不断探索新的业务模式，拥有良好的金融创新发展趋势。移动支付、智能投顾、数字信贷等金融科技服务场景在我国金融市场大规模应用的益处有三。一是降低了金融业本身的运营成本，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二是使得金融服务能够覆盖更为广泛的长尾客户群体，推动实现普惠金融的同时扩大了消费市场需求[①]。三是通过丰富的金融科技实践，积累了技术迭代所必须的宝贵经验。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部分，构建完善的内循环发展格局本质上就是要畅通国内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使得再生产过程相互适应，始终处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之上。[②]金融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起到工具作用，为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提供资金支持或流通手段。另一方面，金融业的发展将反向拉动再生产环节的建设，尤其是金融科技的应用，使得金融业在优化国内大循环过程中的能动性更为凸显。国际循环无论是吸引外资、加强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是提高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提升中国制造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都需要相应的国际金融市场服务。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连通国内外资本市场，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繁荣与稳定，为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高效、高质量的国际金融服务。发展金融科技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金融业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第一，金融科技的发展经历了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三个阶段，技术运用使得金融机构在成本可控、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扩大了客户规模。例如银行、证券公司可以利用网络触及更为广泛的用户群体。依托互联网技术产生的股权众筹等投资模式，能够吸引更多的长尾客户参与到投资活动之中。

第二，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的应用，将减少现金的使用，提高资金流转效率。现金流通具有较高的应用成本，例如现金制造成本与远程交易成本。数字货币的应用将降低预防性货币需求，弱化现金的储蓄功能，提高资金流转效率。此外，移动支付的应用也可以改变实体企业的经营逻辑。例如传统零售业可以通过移动支付获得大数据信息，进而对用户需求有更为精准的认识和了解，有助于上述企业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经营逻辑由 B2C 升级为 C2B2C，生产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

第三，金融业务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除了降低金融业本身的运营成本外，还可以有效应对金融风险，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成本。例如，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不完全信息对于借款者和贷款者关系的重要影响使银行获得关于企业项目信息的成本较高，因此传统信贷与抵押物价值的关联性较强，从宏观角度看易导致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基于大数据风控技术的数字信贷业务，能够降低征信对抵押物价值的依赖，降低企业贷款的顺周期性，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

第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金融行业必须走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道路，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对传统金融机构能够发挥鲶鱼效应。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为实体企业提供更为全面的金

① 黄余送：《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探索》，《清华金融评论》2016 年第 12 期。

② 张慧君：《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20 年第 6 期。

融服务。此外,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对促进金融业、实体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以大数据等技术为依托的数字征信,不仅可以提高贷款活动中对借款人资信考察的效率和准确性,还有助于提高实体企业在商业交往中的失信成本,亦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信用水平。

第五,金融科技发展推动了金融监管变革,使得金融监管更为精准和高效,有助于实现调控政策的精准触达,更好地引导资本市场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宏观调控的方法引导经济发展方向。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已不能满足金融创新的发展需求,监管科技的应用有助于提升金融创新的监管能力。此外,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可以依托同样的基础设施开展活动。因此,金融科技的升级将有能力带动监管科技的发展。充分运用监管科技具有诸多优势,其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运用可以提高监管信息获取与分析的效率和质量,为监管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其二,根据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和里德定律(Reed's Law),互联网技术的内生因素决定其有将更多用户纳入网络连接的动力,加之大数据可以对用户进行更为精确的分类,政策传导的范围、效率与精确度都将得到提高。

(二)改善区域经济与居民收入不平衡现象,满足企业与消费者的金融需求

第一,金融科技能够从规模、质量、效率等多维度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我国金融科技发展至今,始终将普惠金融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这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环境、政策导向等因素有关。尤其是由科技公司主导的金融科技业务,其商誉积累、资金实力等方面短期内无法与传统金融机构相竞争,因此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的长尾客户群体成为金融科技企业的主要服务对象。同时,正是由于长尾客户的存在,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以及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可以显著提升中小企业价值。[①]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中的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技术运用,可以有效提高中小城市、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激发此类下沉市场的内需潜力,从而起到扩大消费市场规模的作用。

第二,金融科技能够有效降低信贷成本。由于传统金融机构在风控、合规等经营模式上付出的成本相对固定,不以客户群体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其客户多为具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征信记录良好、还款能力强的高净值客户。金融科技企业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以较低成本实现了为包括次级客户在内的不同客户群体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的能力。此外,金融科技可以有效缓解传统信贷过于依赖抵押物价值的痛点。整体上看,数字消费信贷主要采取小额、分散的贷款策略,违约风险的集中度较低。贷前审核方面,数字消费信贷在传统财务、抵押等信贷信息外,还可以收集客户的实时信息、行为偏好等数据,通过模型分析可以拥有比传统消费信贷更为有效的风险控制能力。贷后管理方面,数字消费信贷机构通过运用大数据模型、依托实体消费场景实,可以有效识别多头信贷,实时跟踪贷款使用情况,可以有效防止欺诈和挪用。

① 孙继国、陈琪、胡金焱:《金融科技是否提升了中小企业价值?——基于技术创新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财经问题研究》2022年第8期。

第三，金融科技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资源，使得更多居民可以便捷的享受金融服务，降低投资成本。通过智能投顾等技术，可以优化投资选择，切实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源渠道，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

第四，金融科技有助于实现普惠金融，除了个人消费领域更加易于获得普惠性贷款外，小微企业融资同样可以受益。此外，开展 B2C 经营模式的平台公司涉足金融科技领域，其先天具有大数据存量优势，使得微型企业更易于获得贷款。利用金融科技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可以降低小微企业的波动性。一般认为，企业信贷可得性与波动性呈负相关，其原因在于，当企业经营因外部环境变化受到冲击时，企业能够获得必要的流动资金帮助其度过难关。

（三）保障开放环境下的金融稳定，支持外循环发展格局构建

对外开放面临的堪称为“灰犀牛”的风险，便是国际金融体系中长期存在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问题。倘若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业务甚至整体运行受阻，实体企业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开展贸易、投资和其他金融活动时将面临交易、支付、结算以及利率与汇率风险，我国经济发展将因此受到较大影响。但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为建设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了现实路径。

第一，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能够加快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金融科技以网络化、数字化为依托，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开展海外业务需在域外建立实体网点相比，更易于进入域外的金融市场。例如我国的支付企业已经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电子钱包等业务，在美元体系之外探索建立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结算系统。

第二，金融科技的支付系统、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具有去中介化的特点。例如通过 Ripple 支付系统可以绕过 SWIFTS 结算系统，既提高了国际间汇款的效率、降低了汇兑成本，也可以降低国家或其他实体单一支付结算体系的依赖。与 SWIFTS 系统相比，Ripple 系统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其缺点也比较明显。例如 Ripple 系统具有匿名化的特点，不利于外汇管理以及对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的监管。[①] 虽然 Ripple 系统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应用的条件，但类似系统的出现有助于改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因此，我国应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推动国际金融支付、结算系统的多元化发展。

第三，我国具有参与国际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应用、市场实践、标准制定等能力，有助于提高我国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广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指为金融活动提供公共服务的硬件设施和相关制度安排，狭义金融基础设施主要指各金融参与机构用于支付、清算、结算、登记等多边系统和运作规则。国际清算银行支付与结算委员会（CPS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将金融基础设施分为支付系统、中央证券托管系统、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方、交易数据库五类。除了上述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建设外，金融科技的应用还需有配套的技术支撑，例如数字消费信贷业务，需要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网络技术及相关的监管、法律制度等支持。扩大我国在国际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参与度，包括提供相应的核心技术，有助于提高在国际金融科技监管制度制定中的话语权，进而提升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

① 单科举：《Ripple 与 SWIFT 比较分析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16 年第 10 期。

二、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面临的问题

科技本身是中性的,不具有价值上的评判意义,但是科技的运用却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效果。倘若对金融科技不予以全面、合理、合法、审慎的规制与监管,则其负面效应可能对金融发展造成损害,不但不利于双循环建设,反而可能成为堵点。因此,了解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能产生的问题并提出解答,是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应用正向价值的客观需求。金融科技既存在自身发展的问题,又有在双循环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上述问题既可能单独发生,也可能交互产生,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造成不利影响。金融科技的本质是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变革,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金融效率、降低金融风险。虽然当前金融科技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但仍不足以化解传统金融行业的固有风险,反而因为创新型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可能使得传统金融风险出现新的变化;另一方面可能因技术的固有特性或技术不成熟等问题导致新的次生风险。传统金融风险、金融科技自身风险与金融科技在助力双循环过程中产生的风险相互叠加,可能引发以下问题。

(一)产生具有新特点的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可能影响金融机构稳健运营

金融科技可能因金融环境或科技应用产生风险,对金融机构运营的安全造成影响,进而影响金融服务的稳定性。保障金融机构运营安全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畅通经济循环的前提条件。

第一,流动性风险在金融机构内部表现为资产与负债流动性风险[①]。化解资产流动性风险要求金融机构妥善分配资金,达到投资与资金储备之间的平衡;负债流动性风险则需防范挤兑等短期内资金大规模赎回事件的发生。移动支付、互联网借贷等金融科技的应用,一方面使得资金流转效率大为提高,提高了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利益驱动力,可能引发更多不理性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也使客户对于金融产品的兑付效率需求随之提高,对金融机构资金调配与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引发“合成谬误”并加剧流动性风险。[②] 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得出对个体投资者而言最优的投资决策,但是这样的投资策略易于被机械性复制从而引发羊群效应。倘若发生风险事件,极易引发群体行动导致挤兑。

第二,传统金融机构面临的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利率和汇率风险。[③] 国内大循环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外循环建设过程中,金融机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程度将不断加深,利率和汇率波动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将逐渐加强。此外,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可以灵活运用利率手段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但科技主导型的金融科技企业应对市场风险的经验明显不足,在与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技术应用风险包括技术发展不完善引发的原生性技术风险以及因操作不规范或受到恶意攻击而产生的次生性技术风险。例如,金融科技的应用依赖于底层技术的有效性、安全性,需要高效、稳健运行的网络等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监管需平衡技术发展的实践需求与金融安全需求,可以在风

① 方意、王羚睿、王炜、王晏如:《金融科技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内生风险视角》,《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② 尹振涛、范云朋:《监管科技(RegTech)的理论基础、实践应用与发展建议》,《财经法学》2019年第3期。
③ 刘孟飞:《金融科技的潜在风险与监管应对》,《南方金融》2020年第6期。

险可控的前提下采取沙盒监管、合作监管等方式，引导金融科技健康发展。

（二）信用风险仍然存在，可能影响投资与消费市场建设

在金融领域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信用风险可能导致国内投资与消费市场萎缩，与双循环建设扩大内需的核心要求背道而驰。科技对金融的影响只存在于产品、服务及业务模式方面，金融业的信用内核并未发生改变。金融科技的应用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用风险，但是，一方面无法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新的诱发潜在信用风险因素。

第一，金融科技应用带来的金融产品创新，通常缺乏完整经济周期的检验，或是具有复杂的产品结构，使得信用风险具有隐蔽性。一方面，监管部门及投资者、金融消费者难以在事前察觉。另一方面，当风险发生造成损失后，难以确定责任承担的主体，提高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的维权门槛。

第二，金融科技采用的底层技术具有同质化的发展倾向，信用事件的影响范围更广。个体信用风险更易于在行业内进行传播，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此外，金融科技提高了资金、信息的流转效率，同时也加剧了风险的传播速率。

第三，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对象多为长尾客户群体，并且征信更加注重行为信用而非抵押品价值。此类人群抗风险能力较差，易于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产生信用风险。

第四，部分机构借助金融科技的概念，利用监管漏洞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活动甚至金融违法犯罪活动，逃避风险责任，进而产生信用风险。

（三）可能产生数据泄露与滥用现象，需要更加重视数据安全和金融消费者的隐私保护

金融科技企业与客户之间，应将客户数据收集与保护问题置于首位。传统金融机构在业务模式的选择上倾向于以产品为中心，金融科技企业则多以客户为中心，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不足的问题，有助于打通经济内循环的各个环节，使得消费与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协调。金融科技应用以客户为中心的特点使得与客户有关的数据资源成为了金融科技企业的核心资产之一，实际上，金融科技的应用基本上是围绕用户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展开。数据安全不仅关系到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更涉及客户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问题，因此应被高度重视。

保护数据安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其一，数据收集阶段，应保持数据收集的最低限度。广义的大数据信息采集并没有明确的应用目的，而是想通过数据分析找出可用信息，进而应用于金融产品或服务创新。此时的数据采集应对个人信息进行模糊化处理，防止他人利用该信息反向定位到个体。其二，数据保存阶段，应当提高数据安全防护技术，降低数据被盗风险。其三，明确数据权利主体及责任承担主体。参考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任何已识别或可识别的与自然人相关的个人数据，其权利归属于该自然人，其享有包括知情同意权、修改权、删除权、拒绝和限制处理权、遗忘权、可携权等一系列广泛且绝对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金融科技企业在收集个人数据前应履行告知义务并取得权利人同意。其四，数据使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金融科技企业不得利用数据优势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歧视性差别对待。其五，数据分享是否需要取得原始权利人同意尚存在争议。例如掌握用户数据的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是否可以直接向该金融机构提供用户数据？笔者认为，应当对数据进行分类管理，模糊使用的数据可以不再经由本人同意，但是可以追溯到个体的数据，在不同应用主体，甚至是同一主体在其不同产品和服务项目上的使用，都应当取得权利人本人或

其监护人的同意。其六,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应坚持安全有序原则。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数据信息应严格限制其向境外输出;对于企业发展需要的数据,应设立相应制度规范鼓励其有序跨境流转。此外,应妥善解决国内数据治理机制与国际数据管理体系的衔接问题,在提升开放水平的背景下,提高我国的数据利用与治理能力。

(四)存在潜在的市场垄断问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垄断对相关市场发展带来的危害不需赘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为保持市场活力必然要解决垄断问题。此外,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发挥市场机制,引导相关市场主体充分竞争,优胜劣汰。从金融业本身来看,完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集中优势资源促进金融业转型升级,以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助力双循环建设。金融科技领域产生垄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监管者为应对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未知风险,倾向于强化资本监管,希望通过提高注册资本的方式降低风险水平,由此形成了行业准入的资金壁垒。其二,金融科技的发展依托于科技进步与创新,因此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具有相应的技术垄断优势。其三,上文已提及,金融科技对数据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掌握数据资源的平台公司等企业拥有数据垄断优势。

金融科技企业的垄断问题不同于制造业或其他实体企业的垄断问题。首先,二者的共性在于垄断者滥用优势地位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例如平台企业要求经营者独家经营,抑或利用信息优势对消费者进行大数据杀熟等行为,必须予以禁止。其次,金融科技领域技术垄断的产生具有客观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创新的遏制效果。徐心等人为解释金融科技领域的技术垄断问题提出了垄断式创新的概念,认为市场对金融产品具有“共识需求”,客观上会导致金融科技产品占据垄断地位。此外,金融科技创新以需求而非技术进步为驱动力,即便某项金融产品或服务居于垄断地位,需求的变化仍会驱动该领域的创新。[①] 李怀等人认为,在具有信息标准化需求的技术竞争市场,必然会出现垄断。但是垄断并非竞争的结果,而是下一轮竞争的开端。[②] 因此,在金融科技领域,对垄断行为的价值判断应基于其行为结果而非事实状态。只要未对市场创新造成影响,便应当承认其存在的价值。最后,为构建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应在国内大循环中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以满足市场主体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金融科技企业的准入门槛可以适当降低,金融监管应更加注重动态的资本约束而非一次性的注册资本要求。鼓励我国的金融科技企业与域外企业进行竞争,有助于我国金融科技企业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和业务水平、扩大经营范围,更好地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

(五)构建高水平、高质量对外开放格局,还需在对外交往中关注核心技术与数据安全保护问题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中,金融科技公司可能存在赴境外上市或引入外资股东的情形。其原因有三。一是满足公司发展的资本需求。部分金融科技公司具有独特的股权架构,尤其是采用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难以符合国内的上市条件。此外,我国金融市场中科技创新以及科技驱动的金融

① 徐心、张晓泉:《垄断式创新:金融科技的底层逻辑》,2022年6月12日[2020-05-27],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738722052531952&wfr=spider&for=pc.

② 李怀、高良谋:《新经济的冲击与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的出现——观察微软案例的一个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

业务创新速率较高，金融科技公司想要取得竞争优势必然要提高研发效率，因此对资金获取的时效性要求较高。由于我国的上市审核周期普遍较长，因此，部分公司选择赴境外上市融资。当然，随着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推广与完善，国内股票发行与上市的效率将不断提高。二是在金融科技公司开展境外业务时，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与阻挠。吸引境外投资者，可以加深两国间的利益关系，有助于降低贸易摩擦的强度及发生概率，有助于金融科技公司在当地顺利开展业务。三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加之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完善，投资渠道拓宽，投资便利性不断增强，国内市场的繁荣发展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提高了我国金融科技企业引入外部投资的可能性。

三、支持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发展策略与政策建议

（一）将发展金融科技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使其成为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助推器

当前我国金融科技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创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够得到有效的推广与实践。金融科技发展可以获得良好的外部环境，离不开监管赋能与相应的政策支持。但是，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创新过程伴随着金融风险的暴露过程，例如近些年滥发虚拟货币，P2P 暴雷，利用科技手段创造复杂金融产品逃避监管、转嫁责任等现象频发，给金融消费者造成了大量损失，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虽位于世界前列，但仍然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发展金融科技作为金融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来源已被多数国家所认可，为了增强我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的能力，提高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必须以明确、持续的政策支持促进金融科技创新，支持金融科技发展。

（二）提升监管能力，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高效、稳定、高质量的金融支持

首先，应当树立主动监管，科技监管与金融监管并重，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并重的监管理念。主动监管要求提高监管的前瞻性，以柔性监管的方法与被监管主体共同探讨产品和服务发展的进路。科技监管与金融监管并重，要求既要注重对传统金融风险的监管，也要注重对科技应用，诸如网络安全、技术漏洞等，引发风险的监管[①]。在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评估中，应向效率价值倾斜。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应给与金融科技创新更大的探索空间。其次，应坚持监管中性原则，对国有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对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应公平对待，监管标准应当统一。再次，鉴于金融科技具有服务范围广，产品结构复杂等特点，在监管主体的选择上应注重联合监管，即金融监管部门与公安、工商部门，行业协会等应积极探索联合监管的方式，提升监管有效性。

（三）注重发挥金融科技的正外部性，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首先，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创新依托于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网络等底层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上述科技发展不仅可以应用于金融科技创新，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尤其对提高制造业科技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促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改善我国长期以来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下游的不利

① 李广子：《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含义、动因与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20 年第 3 期。

地位。其次,金融科技为传统金融机构、实体经济的数字化、科技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有助于促进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实体经济领域的产业结构优化。目前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服务对象的定位不同,但是金融科技的运营模式具有被传统金融机构复制的客观条件。限于金融科技的发展阶段,为有效控制风险,目前金融科技服务主要集中于普惠金融、小额信贷等领域。但是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技术进步与监管能力的提升,金融科技的应用范围将大为扩展。金融科技企业通过加强市场竞争,能够促进传统金融机构提高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促进其主动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最后,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国或某一地区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稳步上升。发展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我国市场环境的国际声誉,进而加强我国与国际社会的经贸往来,加深利益联结,减少贸易摩擦,有助于国内大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加强金融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改善国际资本市场单一化的状态,为双循环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金融市场环境

金融科技的发展为建设多元化的国际资本市场提供了契机,我国应加强金融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繁荣与稳定。[①] 首先,上文已提及,市场对金融产品具有共识需求,国际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更加需要各个国家或其他金融主体的积极参与。倘若缺乏应用主体,无论技术、产品或服务如何先进,都无法实现金融业资金融通的基本目的。其次,金融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底层技术众多,包括但不限于需要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等软件与硬件的支持,核心技术的研发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技术迭代与研发周期较长,单一国家或经济体独立进行研究或许可能成功,但在效率上则远不如合作研究。再次,在技术研发和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采取合作态度,更易于形成共识需求,能够减少金融产品和服务域外推广的阻力。最后,在外循环的发展战略中,应鼓励实体企业在对外经贸往来过程中积极应用我国金融科技的创新成果,带动贸易伙伴加入金融科技生态圈,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科技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五)加强金融科技企业对外融资的指导和监测,降低核心技术与关键信息的外流风险,为建设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市场保驾护航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应当加强我国资本市场建设,提高资本市场的包容度,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倘若能够将更多优秀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金融科技企业留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不但有助于提高该金融科技企业运营的安全系数,更能够便利我国居民投资,共享金融科技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不断加强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外资入股金融科技公司不可避免。一是要加强金融科技企业对外融资的事前指导,提高企业对外融资的安全意识。二是增强外资入股金融科技公司的安全审查。例如美国有一系列的外资并购审查法案以及系统的审查规则,并在2017年开始对《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进行修订,进一步扩大了审查范围,加强了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力度。[②] 我国应研究学习美国外资并购审查体系的成功经验,通过立法加以

① 郑联盛:《美国金融制裁:框架、清单、模式与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

② 孟雁北:《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内含悖论》,《中国外资》2020年第5期。

规制。

（六）加强金融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为新发展格局打通人才要素流通渠道

金融科技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较高。首先，在教育改革方面，建议设置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机制。美国研究型大学在跨学科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近些年发展十分迅速，2016—2017 年颁发了 30800 个跨学科本科学位，比 2000—2001 年增长 195%。[①] 金融科技发展尤其需要具有科技、金融、法律等综合性知识的人才储备。其次，实施相应的人才保障措施，既要能吸引人才，也要能留住人才。最后，应当建设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的人才梯队。一是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的研发人才，二是金融科技企业的管理、人才，三是金融监管的科技人才。通过人才梯队建设助力金融科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金融科技对内可以助力普惠金融，为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内循环提供更为精准、高效、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对外为建设稳定、可靠、高效的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相应思路，有助于加强我国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链接程度，为经济外循环提供金融保障。未来应在全面监管的基础上，鼓励金融科技产业和行业的发展。一方面，提升金融业发展质量与金融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加强金融科技研究与实践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利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优势地位，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一道，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繁荣与稳定。（本文系《中国金融报告 2020：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变革》中金融科技报告的精编版，作者授权在本刊首发。）

责任编辑：潘文竹

Mechanisms and Suggestions for Fintech Joining in Building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Yin Zhentao[1] Chen Guanhua[2]

1.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2.Faculty of Law,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48, China

Abstract: Fintech can support to build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provides better financial services to promote the real economy, promote domestic financial market demand, and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financial security promote the opening-up. At present, for fintech to support building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certain risks should be prevented, i.e., liquidity risk, credit risk, information leakage risk and monopoly risk. We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mprove the regulatory capacity to ensure the safe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fintech,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talents and give the high-quality financial support to build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fintech;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financial supervision; financial risk

① 陈翠荣、敖艺璇：《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培养科技人才的主要路径与保障机制》，《中国高校科技》2020 年第 4 期。

金融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堵点”及路径选择

夏诗园[1] 王 刚[2] 马少君[3]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审计科研所,北京 100086;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金融研究所,北京 100010; 3.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经济系,美国 20742

摘 要: 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能够助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的创新,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拓宽农村金融服务边界。然而受农村金融科技相关法律不够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农村金融主体存在认知局限等因素的影响,金融科技在乡村振兴的实际应用中仍面临应用场景有限、服务质量有待加强、风控模式难以适应等痛点。提升金融科技服务农村金融效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应加速推进“五大着力点”:强化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夯实制度基础;提升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水平,激发乡村潜力,实现乡村数字化转型;创新金融科技产品,提供特色产业、消费场景服务;强化金融科技监管,破解信息孤岛壁垒,严格金融风险监测;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夯实乡村金融科技人才基础等。

关键词: 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应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5-0092-12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党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金融供给、全力推进农村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作为金融服务和基础技术的融合创新,金融科技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能有效打破传统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中的准入难、风控难和盈利难等痛点,满足农村居民的新型金融服务需求,助推新一轮乡村产业革命。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农村金融科技相关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作为一项新技术,金融科技在落地乡村的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较多阻碍。如何积极探索更多农村金融场景、创新相关产品和服务、有效防控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实际落地中存在的新风险和新挑战,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

一、金融科技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作用

金融科技(FinTech)是金融(Finance)和科技(Technical)的合成词,最早用来描述由于引入更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去杠杆进程中地方政府债务管控研究”(19CJY05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夏诗园,女,河南周口人,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金融学研究;王刚,男,天津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金融学研究;马少君,女,山西阳泉人,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经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研究助理,主要从事金融学研究。

更便宜、以人为本的金融服务给金融业带来的破坏性挑战，现已成为流行词。当前关于金融科技并没有全球统一的定义，是一个广义的术语，可被认为是技术和金融之间的交集[①]，是信息科技与分布式分类账技术（DL）在金融中的应用[②]。金融科技是对金融行业的应用、流程、产品或商业模式开发中展示创新的新解决方案，具有高度创新、开拓性、颠覆性和以客户为中心四个功能，其技术主要包括人工智能（AI）、大数据、物联网（IoT）等，应用范围广阔，并不限定用于某个特定部门或某种特定商业模式[③]。

金融科技旨在利用软件和现代技术提供金融服务，现已应用于商业贷款、资本市场和交易、信用评分和分析、金融服务、金融基础设施、监管和合规、房地产投资等几乎所有业务领域，主要作用有五。其一，简化商业流程，降低商业成本。金融机构、商业组织和政府致力于将金融科技列在战略计划中，以期利用其实现流程自动化，并利用各种来源的大量数据来进行更科学的决策、执行更高效的操作。金融科技通过使用以移动为中心的IT技术来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④]，迫使金融机构深化金融服务模式改革，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⑤]，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⑥]，提高盈利能力[⑦]。其二，推动战略金融领域的发展，削弱市场分割，助力良性金融生态。在对传统银行失去信心和市场上缺乏信贷需求推动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已成为银行、保险、资产管理和金融教育等领域新金融服务的重要驱动力[⑧]，在支付系统、账单、个人金融、在线和移动银行、直接贷款、P2P贷款、货币转移等领域开发新服务和产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领域都是战略金融领域。与此同时，在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过程中，新业务形态不断涌现，不同业态相互嵌入，传统金融部门与新兴金融企业之间的合作明显大于竞争，良性的金融市场生态逐渐形成。薛启航等基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后发现，无论是消费者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金融科技发展都能有效削弱国内市场分割现象，有效降低了区域银行业的集中度，促进了区域银行业的竞争[⑨]。其三，有利于加强创新，推动企业成长。金融科技可通过增加消费者需求来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⑩]。金融科技重构了商业模式，扩大了消费者需求，并提供了创新机会，有助于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增加企业违规成本；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的违规操作动机，提

---

① Gomber P., Koch J. A. and Siering M., "Digital Finance and Fintech: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2017,87,pp.537-580.

② Preece R.,"Understanding the Fintech Hype", *CFA Institute Magazine*, 2016,27(3), pp.52-53.

③ Arner D., Barberis J., Buckley R.,"The Evolution of FinTech: A New Post-Crisis Paradigm?"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5,47(4),pp.1271-1319.

④ Kim Y., Choi J., Park Y. J., et al., "The Adoption of Mobile Payment Services for Finte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ngineering Research*, 2016, 11(2), pp.1058-1061.

⑤ 谢治春、赵兴庐、刘媛：《金融科技发展与商业银行的数字化战略转型》，《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8期。

⑥ 沈悦、郭品：《互联网金融、技术溢出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研究》2015年第3期。

⑦ 张锦程：《金融科技对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统计与决策》2022年第13期。

⑧ Kerényi Á., "A FinTech-jelenséghatása", *HitelintézetiSzemle*, 2017, 16(3), pp.32-50.

⑨ 薛启航、王慧敏、魏建：《金融科技发展是否削弱了国内市场分割？——来自消费品市场和资本品市场的证据》，《改革》2022年第5期；孟娜娜、蔺鹏：《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竞争的影响：微观机制与实证检验》，《南方金融》2021年第12期。

⑩ 冯永琦、张浩琳：《金融科技促进创新绩效提升了吗？》，《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10期。

升内部控制水平,推动企业去杠杆化,提高企业创新水平。[①] 其四,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产业转型。金融科技是新技术与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能有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②],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存在积极的空间效应。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金融科技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新时期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金融科技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合理化,而金融发展水平只能促进一些重点城市的合理化。[③]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提升金融功能效率方面的优势,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④] 其五,减少贫困,实现普惠金融。金融科技在向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金融科技技术提升了普通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数字化特征,使得既不具备研发所需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普通消费者积极参与在线行为的意愿日益提升。[⑤] 通过借助金融科技使生活在金字塔底部的人获得以前获得不了的诸如小额贷款、经常账户和汇款转账等基本金融服务,增加个人获得服务的机会,创造协同效应和网络,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社区、政治、环境、健康和福祉。[⑥] 在此过程中,信用卡公司、银行、金融科技公司和移动运营商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利用这一庞大的客户群体,更准确和快速地了解了他们的需求,提高产品或服务和公众需求之间适合度,产生更具多样化、适应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造额外的收入。

总体来说,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金融科技1.0:金融电子化阶段。此阶段,金融机构基于金融服务的增加,对本机构内传统工厂软硬件进行信息技术更新,从而实现相关业务的电子化办理,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ATM、POS机等的大力普及和应用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营业利润,但由于此阶段金融科技技术较为初级,而且只涉及金融服务的个别环节,所以推动作用较为有限。二是金融科技2.0:互联网金融发展阶段。此阶段,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公司通过积极搭建网络平台、借助移动终端等手段,有效提升了交易结算等业务办理的便捷性,实现了传统线下金融业务向线上金融业务的转移。与此同时,也推出了更为高效化的金融产品,进一步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三是金融科技3.0:金融科技发展阶段。此阶段,金融科技在金融市场的渗透率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不仅作用于金融交易的交易阶段,更是逐渐融合至业务的前中后,丰富了金融服务的内涵和外延。

---

① 牟卫卫、刘克富:《金融科技发展能抑制公司违规吗》,《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9期;李春涛、闫续文、宋敏、杨威:《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期;张斌彬、何德旭、张晓燕:《金融科技发展能否驱动企业去杠杆?》,《经济问题》2020年第1期。

② 谭中明、刘倩、李洁、卜亚:《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统计与决策》2022年第6期。

③ 邓宇轩、祁明德:《金融科技对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效应》,《财政科学》2021年第6期。

④ 刘志洋、解瑶姝:《金融功能论视角下金融科技服务绿色金融发展机制分析》,《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7期。

⑤ 肖静华、吴瑶、刘意、谢康:《消费者数据化参与的研发创新——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视角的双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

⑥ Mulgan G., "Measuring Social Value", *Stanford Soc Innov Rev*, 2010, 8(3), pp.38-43; Vanclay F.,"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2003, 21(1), pp.5-12.

二、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农村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呈现多元化和融合化趋势，单一的服务形式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金融科技在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优化和改善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并逐渐成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

（一）缓解信息不对称，改变金融排斥，助推农村居民金融服务普惠化

长期以来，和城市金融金融市场相比，农村金融信贷业务规模相对较小，传统金融模式下的农村征信机制不完整，信用环境相对较差等特质使金融机构难以真正了解农民资产信用情况，也无法正确评估其信用风险，而资本要素追逐利润的本性也会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更偏向大企业，农村用户长期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下沉，一方面可使金融机构通过数字技术有效搜集相关数据，科学分析农户的消费行为和风险偏好，及时、有效、全面地评估农户信用状况，改变金融排斥问题，延伸服务领域至传统金融服务无法覆盖的长尾群体，拓宽了金融服务边界。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也可使农村金融服务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空间、成本和时间限制。即使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农民，也可随时随地使用互联网、智能终端等开展资金投资，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用性、便捷性和渗透率，助推农村居民金融服务的普惠化程度，使全体农村用户和城市居民共享金融和科技发展的红利。

（二）创新应用场景，加大金融产品创新供给力度，赋能农业产业现代化

其一，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扩大产品升级。通过运用金融科技可有效疏通产业链，用智能平台引导产业发展，推动高端智能绿色制造发展，扩大优质产品供应，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有利于围绕区域“三农”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构建农业产业链新生态场景，实现农作物种植标准化、智能化存储、在线交易、可追溯可视化和功能服务集成。[①] 其二，减少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在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下，农村金融业务高度依赖物理服务网点，但实体网点的配置不仅需要在选址、机械和服务人员投入巨大，还需要专门的技术维护和升级成本。而且，由于农村金融网点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相对较低，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有待提升。而云计算、开源软件等底层技术的应用可有效缩短金融交易流程和环节，数字交易平台的建立可为农民提供仓储管理、食品安全检测、信息管理等功能服务，有效提升金融业务运营效率。其三，产业链上下游以及供给之间的精准对接。通过探索金融科技和“三农”的深度融合创新，构建“三农”数字平台，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综合性金融服务的能力，促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有效流通，提高金融供给与科技创新需求的匹配度，有效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供求之间的精准对接，重构产业链生态。

（三）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化，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引入，可助力在农村地区构建新的金融服务生态系统，为提高

① 植凤寅：《数字平台“农”情暖》，《中国金融》2021年第23期。

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提供有力支持。其一,提升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通过构建综合政府服务平台可实现不同主体行政审批数字化的线上线下融合目标,提高政府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助力“数字政府”“智慧政府”建设,增强民众获得政府服务体验的满意度。其二,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分布式等特征,能有效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和透明度,从源头上加强风险控制、动态管理和应急响应,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其三,提升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在确保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利用线上线下综合服务平台中的“政务大厅”功能,切实关注农民工、老年人、大学生等特殊群体的基本权利和生活需求,缩短政府和民众间的距离,为人民提供公平和包容性的政府公共服务,提高居民幸福感指数。

(四)提升金融机构风控的专业化、智能化、灵活性,助力农村金融风险防控建设

其一,增加农村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从结构上来说,农村地区大型企业相对较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相对较多,而这部分企业由于缺乏基本的信用记录和抵押物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是违约率相对较高的企业,导致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而农村金融机构无论是在资产配置、处置风险的能力还是水平方面都和大型商业银行或者国有银行不具有可比性,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隐患。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能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数据分析水平,帮其科学、快速、准确地对目标客户进行信用评估和风险预测,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风险防控质量的专业化、智能化和灵活性。其二,提升农村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从监管机构角度来说,当前我国地方监管水平仍有待提升,存在政策缺失、监管规则以及权责关系界定不清等缺陷,导致监管工作在实践中存在监管空白、监管缺位以及监管重复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监管效率。以金融技术为驱动力的智能供应链金融平台具有智能在线、连接多方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的特点,可实现全天候、全程的动态监管,降低农村金融监管机构监管成本、提升预测和识别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效率和透明度,维护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三,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农村金融业务主体受教育水平、见识等因素的影响,对金融违法行为的辨识度较低,近年来极易成为违法犯罪分子攻击的主要群体之一。通过在农村金融机构中运用金融技术,借助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构建老年客户年龄模型监控系统,可实时全天候实时检测非法集资、欺诈等违法活动,及时拦截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群体资本账户的异常转账和开户行为,并及时提醒和干预。还可借助语音、人脸等相关检测技术为农村金融客户构建更加安全的支付环境,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堵点”

金融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虽然金融科技对提升金融机构业务水平、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改善整体社会福利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金融科技并未因技术创新而改变其传统金融的功能和风险属性[①],金融科技的技术和创新属性也使金融科技的应用面临风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②]。同时随着科技创新

① 汪可:《金融科技、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上海经济》2018年第2期。

② 王志宏、孙鹏:《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的快速发展，传统金融与现代技术的融合速度加快，金融业对科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发生概率。[①] 另外，金融技术创新极易引发多重复杂的金融风险，这些都对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提出了挑战。[②] 而且，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也会使金融科技在农村的推广应用中存在诸多“堵点”，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科技在支持农村振兴战略方面效力的发挥。

（一）金融科技应用风险

一是法律合规风险。作为一项创新事物，金融科技给我国传统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其业务的明显混业特征模糊了市场和产品边界，新业态、新事物、新场景的快速推陈出新也使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如何在金融交易的实践中选用适用的法律条陈和依据来规范新技术和调整新社会关系成为难点之一。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受到技术和市场的双重影响，和金融科技技术的快速迭代相比，法律制度的制定通常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周期，这就导致法律无法对金融科技相关产品和服务形成及时的约束，法律制度的缺失容易导致监管的滞后和空白，极易把广大投资者暴露于巨大的风险之下，无法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操作风险。金融科技的操作风险可从金融科技企业和金融科技使用者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金融科技企业角度，一方面，金融科技技术对于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要求较高，如果一个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金融科技相关技术程序设计、应用环境和内部控制体系不够完善和成熟，算法缺陷和技术漏洞会使数据和应用环境脱离控制范围，从而造成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一些金融科技企业的员工培训工作尚不到位，员工的金融科技知识或者业务操作相对较为缺乏，极易有意或者无意的出现操作失误现象，从而给金融科技企业造成一定风险和损失。而且金融科技的应用也使金融市场间的联系进一步紧密，一旦其中一个企业出现问题，很有可能引起整个市场的连锁反应。从金融科技的应用者角度来说，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有的交易者由于不了解金融科技的相关技术操作，操作失误也会对自身造成经济损失隐患。

三是监管风险。金融科技在从广度、速度和深度等不同方面推动金融系统的发展的同时，其技术的复杂性又使得金融科技的风险显得更加的隐蔽、不确定性也进一步加强[③]，这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考验。其一，责任边界不明确。金融科技的发展模糊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地区和行业界限，传统监管模式显然不适合混业监管的需求。如，有些单一业务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许可，但如何确定多种单一业务叠加后不同服务实体之间的责任边界，仍是当前监管的难点和重点之一。其二，大型金融科技公司的垄断。随着各种新型数字金融服务提供商的系统重要性不断提高，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在充分发挥其行业优势推动市场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对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垄断，极易导致市场失灵，给监管金融相关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三，金融创新带来的未知风险。金融商业模式和组织制度

① 吴成颂、王超、倪清：《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基于沪深股市上市商业银行的证据》，《当代经济管理》2019 年第 2 期。

② 任怡多：《金融科技穿透式监管的逻辑机理与制度构建》，《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 年第 2 期。

③ 任怡多：《金融科技穿透式监管的逻辑机理与制度构建》，《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 年第 2 期。

创新在为市场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成为了违法分子进行不法行为的新型工具。有些机构通过互联网平台利用监管漏洞“无证驾驶”开展金融业务,长期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成为潜在的风险隐患。其四,缺乏监管协同效应。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的差异,各地对于金融科技的态度不一,监管水平的差异也较大,相互之间监管合作和协调机制的缺乏,也使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效率大打折扣。

四是数据风险。金融科技的应用和推广,也使金融市场功能和金融市场新业态不断增加,金融应用场景也越发复杂和多样,对金融数据安全治理的要求也越发严格。其一,数据安全。近年来,数据成为了土地、资本、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的新型生产要素,已被中央文件列入了生产要素的范畴,并赋予其和传统生产要素同样的重要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数据出现了倍数级、甚至指数级的增长,数据要素在成为培育市场发展新动能的同时,各种数据安全问题也不断暴露。一旦金融机构的信息存储和保管工作出现漏洞,或者其相关技术受到外部黑客攻击时,就会造成严重的数据泄露、数据窃取、数据贩卖等问题,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如何盘活农村市场数据要素并进行有效治理,保护农村基本数据存储库现已成为了乡村振兴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二,数据垄断。近年来,金融市场监管趋严使金融科技平台开展金融业务时候面临的监管合规成本进一步增加,为强化自身技术属性和比较优势、缓解监管压力,许多金融技术平台巨头转型为金融技术数据或技术服务提供商。但和转型前相比,转型后的金融科技平台巨头与科技研发主体形成了更加明显的直接竞争关系,借助网络效应、赢家通吃、平台生态系统作为竞争保障,金融科技大型公司对金融数据的过度收集、数据滥用、价格歧视等行为,不仅形成了数据垄断,同时也对消费者福利的潜在侵犯。

(二)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堵点”

首先,农村金融科技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缺乏必要的制度指引和配套设施。其一,立法工作较为滞后。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是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但当前农村数字立法工作较为滞后,数据所有权、采集、存储等方面的权责界定尚且空白,也缺乏金融科技具体落体农村地区的科学规划,更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导致农村金融科技在具体应用和推广时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和行为指引。其二,缺乏相关配套设施。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时缺乏相关必要的财政贴息、政策性融资担保等,使金融机构、企业和农村地区金融消费者对金融科技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产权关系涉及范围较广、较为复杂,各地确权工作进展不一致,农村要素产权不规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如何正确的处理好金融科技创新和传统农村要素产权规范之间的关系平衡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其三,缺乏协调机制。当前处于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科技的认识水平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等差异的影响,各地对于金融科技的态度不一,各地区在制定金融高科技的应用政策时也会产生一定的行为差异,各地区、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更多的还是主要侧重本地区和本部门的职责和利益,缺乏金融科技整体协同规划和合作机制,无法形成协同效应,容易造成政出多门、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等问题。

其次,农村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有待提升,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其一,金融科技相关基础设

施较为落后。当前我国金融科技的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东部地区明显比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科技水平高，农村地区较城市地区相比的金融科技运营环境支撑能力不足、支付体系不健全、征信服务体系管理和服务相对落后，缺乏专门的征信机构，征信平台对农民信用评级的评估不准确等弊端，导致征信体系的有效性无法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其二，农村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科技服务的动力不足。作为一项新事物，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科技的认知上过度强调其技术属性，对于金融科技的应用也更倾向于对相关技术设备的物理引进，对于金融科技的总体规划以及数据和业务模式等方面尚缺乏深入思考。而且有些农村金融机构认为金融科技的引进看不到短期成效，但是确需要对其进行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投入，对金融科技认知能力的局限导致农村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科技技术应用的动力不足。其三，农村金融服务专业人才短缺，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金融技术改变了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对金融从业人员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其不仅掌握扎实的金融理论知识，具备金融业务能力。同时，还应掌握互联网应用知识，具备风险防控能力。但当前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业务能力水平和金融服务效率较低，这主要是因为日益严重的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了农村“空巢”的比例，适龄人员大多数人外出工作，老年人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缺乏人工智能和金融知识，而具有金融和科技复合知识的人才更是寥寥无几，无法胜任金融科技相关工作。而且，从城市地区来农村地区的人才通常留不住，无法扎根农村、振兴农村，金融科技人才储备不足抑制了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纵深发展。

再次，金融科技相关产品和服务同质性较为严重，应用场景较为有限。其一，金融科技的应用较为有限，金融科技数据整合的程度较低。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在农村地区较为有限，产品和服务在农村地区的投放主要集中在支付清算领域，业务主要以信贷等为主，且金融机构之间的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融资类金融科技产品与农村电商平台、微信、支付宝的粘连度不高。从农户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到产品和服务消费终端之间的数据信息彼此分割，尚未形成数据产生、数据整合、数据应用的完整金融科技基础链条。其二，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科技相关产品和服务同质性较为严重，无法满足农村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与农村居民和农业经营实体的金融需求相匹配的产品和服务很少，农村金融机构金融服务主要以基本存取款、支付结算等金融产品为主。信贷支农主要以小额贷款为主、信贷产品相对单一、金额小、期限短，但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除了传统的存款、贷款和外汇业务之外，农民还希望获得如理财顾问、私人银行、资金管理、政务等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增值服务，现有金融服务显然无法满足需求。

另外，金融风险防控水平较低。农产品生产经营受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干扰很大，现有的风控模式难以适应农村金融产品风控要求。一方面，长期以来在金融市场中，农村居民缺乏征信、社保等数据，各类涉农数据分散、数据质量低、收集难度大，传统的现场数据采集、登门调查、手工录入等方式，导致数据更新效率低、周期长，即使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数据处理也存在一定难度，行业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加剧了数据信息孤岛现象。另一方面，农业产业经营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影响大，对现金流稳定性形成冲击，一般非农业务风控模式难以满足涉农业务的事中审查、事后监督需求，虽然很多银行在尝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这方面工作，但具体效果还有

待进一步观察。

最后,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普及度不高,金融素养有待提升。与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相比,农村中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和低学历群体所占比例相对较高。这些群体大多缺乏足够的数字技术技能和认知,金融素养和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对现代金融服务的政策以及数字金融产品的流程、法规、优缺点缺乏足够的了解,对金融科技、金融技术等新概念、新模型的认知较为模糊,金融意识和素养有待提高等,很容易被动成为金融技术的“弱势群体”。

四、金融科技破解乡村振兴堵点的路径选择

为强化金融科技全面推进农村振兴,充分发挥金融科技技术对农村振兴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为农村振兴政策提供强大引擎,提出加强金融科技技术在农村市场的战略布局、资源配置和创新应用的“五大着力点”。

(一)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的前提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夯实金融科技制度基础

一是科学制定金融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实施计划。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制定目标明确的行动方案以及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和保障措施,积极发布相关计划和制度,有计划的督促和指导各项目建设单位依法依规组织推进项目建设,加快推动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高质量发展。政府部门应牵头制定金融数据资产定价和交易规则,确保金融科技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有效落地落实。积极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步解决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应用时法律缺失、法律滞后和法律冲突等问题,扫清相关法律障碍。

二是研究制定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机制。优化审贷程序,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农村地区客户的授信效率。进一步扩大农业贷款抵押范围,建立完善的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和多方互信认可机制,建立健全农农业保险和信用担保工作,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充分发挥金融投资的引领作用,全面运用金融财税政策,支持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金融科技助农专项资金,激励杠杆化金融资本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村市场,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

三是注意推广应用金融科技的重点和节奏。在乡村地区开展应用金融科技技术,既不能因循守旧、畏首畏尾,也不可以一味求新求变、过度创新,需要从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相对优势领域发力,科学推广应用相对成熟可靠、安全稳定的适应性技术,并将其应用到具有较高契合度的乡村场景,有效促进业务、资金、技术的深度融合,切实提高乡村金融服务供需两端的匹配性和一致性。[①]

(二)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的基本点:提升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激发乡村潜力,实现乡村数字化转型

① 卜银伟、李成林、王单:《金融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研究》,《西南金融》2022年第4期。

其一，完善乡村金融科技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便捷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在农村地区推动金融科技运用的重要技术支撑，应加快建设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继续加强农村基本公共网络建设，同时加强电子设备、移动终端、智能终端设备、物联网设备的投资和引入，重点推进农村千兆光网络、5G 等。通过卫星遥感、电子围栏、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动态、远程进行场景模拟和预测，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和服务信息反馈机制，增强农村客户金融服务的可访问性和安全性。构建金融数据交易平台，积极发展征信业务，建立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全面的信用信息报告体系，优化风险定价和控制模式，提高客户识别和授信能力。

其二，完善农村数据采集规则，提高信息透明度。提高行业数据以及个人数据的采集能力，统一数据存储标准，科学整合各种数据资源，构建专门的数字化平台提高农村金融资源承载能力。与此同时，积极发挥行业组织在行业数据统计披露、风险监测与提示、金融标准研制、消费权益保护等方面的作用，加强信息披露和公众监管，提高金融数据的透明度。

其三，释放数据价值，推进涉农主体信息数字化。依托大数据、区块链、量子通信等技术，构建安全可靠的金融大数据共享平台，实现金融大数据的安全采集、高效治理、综合利用和可靠共享，促进银行、政府、企业数据的融合应用，增强银企信息对称性。打造三资管理平台，着力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标准化水平，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创新商业模式、金融科技赋能、加强风险管控、优化系统设计等措施，经农户授权，推进涉农数据跨领域采集、存储、处理、治理、分析以及数据的综合利用和可信共享；

其四，强化科技赋能，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在生产上，完善信用评估模型和风险监控机制，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农村支付模式，对接农业产业链全环节企业，提供一站式融资、支付，结算等综合金融服务。在生活上围绕外出务工、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等场景，拓展农村水电、农村社保等农村生活缴费场景，以及农村电商、消费娱乐、乡村旅游等消费场景，助力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挖掘农村理财服务场景，设计符合农村需求的理财产品，将银行、第三方平台与政务联系起来，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高频场景和供给水平，助力生活富裕。

（三）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的核心点：创新金融科技产品，提供特色产业、消费场景服务

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和推广，必将激发乡村地区经济主体释放出巨大的金融需求，从而也会激发更多的消费场景。

其一，打造场景 + 金融平台，构建乡村发展融合生态。构建数字平台有效收集和分析客户采购、生产、销售等数据，为农民提供涉农资金发放、信息查询和服务预约等相关服务，构造科学的信贷授信模型充分挖掘农村消费者消费习惯，实现精准供需。

其二，增强金融供给能力，加快金融科技发展成果的转化应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应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金融科技高效服务长尾客户的特点，优化金融机构信贷机制，提升涉农金融机构服务质效，促进农村金融服务降本增效。充分发挥“技术 + 数据”的两轮驱动作用，创新数字农业相关融资产品，打造适应农村客户群体特点的专属涉农普惠贷款品牌，提高服务农村振兴战略的金融供给能力。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机构的本地化优势，有序将金融技

术嵌入其前、中、后服务平台,鼓励大型金融科技机构与农村金融机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大型金融科技机构大数据处理能力优势,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定制化金融科技服务。打造涵盖基础金融服务、数字人民币应用等金融场景融合的服务模式,充分激活乡村金融服务需求的活力。规范发展地方金融组织,增强小型金融机构风控能力、特色经营能力、市场感知能力,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平台化、流程化、数据化风控管理平台,增强其服务中小微客户的能力。

其三,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夯实多层次立体服务格局。农村金融机构要加大力度,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手段对传统金融行业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革新,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加快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平台和业务流程的科技化改造步伐,构建征信共享平台,为客户进行信用评级、风险评估和信用决策,实现在线业务、智能运营和流程自动化,创新服务方式,加强与农村地区的电商、物流以及公共产品服务提供机构的对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的根本点:强化金融科技监管,严格金融风险监测

保障安全永远是金融科技发展的生命线。在发展金融科技过程中,应做到风险管控与产品服务创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应急处置和内部控制等制度,确保各类风险始终处于可管可控。同时,充分考虑"三农"群体在金融知识储备、信息保护意识、风险承受能力、技术应用条件等方面的不足,采取信息披露、风险提示、教育培训等方式,切实建立起全方位的风险保障体系。

其一,积极把握监管原则和适用方向,完善相关制度基础。坚持前瞻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坚持创新、风险防控和合规管理并重的原则和方向。严格落实监管要求,建立健全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和监管等制度,制定严格的业务操作流程、管理制度和风控要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金融科技监管体系。

其二,积极运用监管沙盒,加强穿透式监管。积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相关经验,运用穿透式监管手段,建立完善金融科技应用试错、容错、查错、纠错机制,完善常态化运行监测、预警处置等防控体系,提高金融科技监管的广度和深度,提高风险处置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其三,强化协同监管。构建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第三方机构之间建立协同监管机制,提升监管数据收集、传输、整合、分析、共享的效率。

(五)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夯实乡村金融科技人才基础

其一,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农民金融素养的提升需要从宣传教育和习惯养成两个角度进行,构建金融知识教育长效机制,优化金融知识下乡的方式方法,利用网上宣传、远程教育等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进行宣传教育,提升宣传和普及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和及时性,提高教育活动的正规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宣传和教育的内容既要包括金融基础知识、金融科技知识,也要包括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了解以及互联网金融的操作方法,增强金融教育的便利性,提升农村居民有效使用现代金融工具的普及型,在农村地区形成普及金融知识的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其二,积极培养金融科技相关人才。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说,积极培养和引进专业的复合型人才。金融机构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坚实人才基础的支撑,这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进行具体分析,从内部角度来说,要加强机构现有人才的培养,定时选派业务人才到农村地区进行挂职交流和学

习，深入农村实践全面了解农村地区以及农民的状况，学会与农村居民打交道。同时，多措并举从外部引进既懂金融、金融科技又懂“三农”业务的复合型人才，为业务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从农村地区角度来说，应积极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村地区金融科技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加强农村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实施各类优惠政策，鼓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地区为了乡村振兴事业发光发热，提升农民的金融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能力，培养一批懂技术、懂农村、爱农民的科技人才。

其三，深化农村地区和高校、机构、政府、企业以及协会的合作。加强产、学、研、用一体化，储备一批具有金融、科技背景的专业人才。完善与金融市场相适应的考核激励机制，最大程度上和各级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共同提出制定参与乡村振兴目标措施和具体行动方案，并与地方政府签订人才战略合作协议，为农村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提供智力支撑。

责任编辑：潘文竹

Internal Mechanism, "Blocking Point" and Path Selec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Xia Shiyuan[1] Wang Gang[2] Ma Shaojun[3]

1.Audit Research Institute, Audit Office of the P. R. C., Beijing 100086, China; 2. Fina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100010, China; 3.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20742, USA

Abstract: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 rural areas can help to innovate the types of rural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broaden the boundaries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However,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lack of sound laws related to rural financial technology, the imperfect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ognitive limitations of rural economic entiti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ill faces pain points such as limited application scenarios, low service quality and difficulty in adapting to risk control modes. In view of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 rural areas, "five key point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 serving rural finance and help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and consolidate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servic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frastructure, stimulate rural potential, and realize r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e financial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provide services for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consumption scenarios;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crack the barrier of information island, and strictly monitor financial risks; improve the financial literacy of rural residents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Key words: financial technology; rurual rejuvenation; risk of application

组织与转型：集体化时代乡村经济组织及经济生活变迁研究

——基于晋南卓村村庄基层档案的考察

薛 剑 文

青岛大学 发展规划部，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农村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环。在此期间，国家和集体在村庄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自上而下不断深入，组织变革和经济转型给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村庄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考察典型村庄的经济组织变迁以及生活特点，可以从整体上反映集体化时代通过“组织与转型”对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的影响，为当下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关键词：集体化；农村；经济组织；经济生活

中图分类号：D427.7；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5-0104-14

集体化时代作为中国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一环，已成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重要视角。学界一般认为，集体化时代指的是“从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建立互助组到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①]。集体化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型的重要连接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农村组织变革和经济转型在这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改变了中国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从这个角度讲，研究集体化时代农村组织制度变迁及经济生活特征，对于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集体化时代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后集体化时代的农业农村建设也不无裨益。山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集体化运动一直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农村农业政策在山西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贯彻执行。村庄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卓村作为晋南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村庄，各类档案保存完整，经历了集体化时代各个发展阶段。因此本文侧重以卓村为线索，具体考察集体化时代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变迁及经济生活特征。

作者简介：薛剑文，男，山西河津人，经济学博士，青岛大学发展规划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①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45页。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变迁

旧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世所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选择了变革农业生产关系来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路径。农村集体化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组织制度变迁看，大致分为互助体制、合作体制、公社化体制三个阶段。这个渐进过程也是将国家权力深植于传统农村经济的一种实践。

（一）互助体制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实现了农户简单的联合经营

土地所有制问题是推翻封建社会制度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就以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和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为纲领。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实现这一纲领的内核[①]。到新中国建立时，约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的华北、东北老解放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规划的蓝图。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是在经济上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引导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②]在全国范围内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③]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土地改革法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度的合法性，巩固了土地改革的革命成果，有效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开展。

1947年底晋南全境基本解放，土改工作组进入卓村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土改运动。1949年12月，卓村发放新地契并收回旧地契，土地证和房窑证把农民在土地革命中所获得的收益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④]。根据档案资料，土改前卓村人均土地5.14亩，其中无地农民占到总人数的2.9%。全村60%以上的人占地面积在村人均占地面积5.14亩之下，土地改革后，卓村人均占有土地7.3亩，人均占地5亩至10亩的人数占到38.81%，占地达51.46%。中农经济所占比率明显上升，由土改前的百分之二三十逐步上升到百分之七八十[⑤]。1950年4月底，晋南地区历时三年的土地改革运动结束。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家户个体经济基本适合农村生产力要求。土地所有制的改变为农村生产恢复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但是，由于长期封建小农经济的影响，再加上旧中国战乱天灾频繁，农村长期落后、封闭、贫困的状态在短时间内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农户家庭积累薄弱，普遍缺乏生产所需耕畜、良种和农具等生产资料。许多农户无法独立完成农业生产全过程。以卓村耕畜分配为例，土改前全村232户，共有牲畜116头，户均0.5头，其中155户没有牲畜，占村

①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134页。

②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5-208页。

③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六册，第763页。

④ 参见薛剑文：《集体化时代晋南乡村经济研究——以山西省临猗县北辛乡卓村为个案》，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5年。

⑤ 薛剑文：《土改至高级社前农村土地、牲畜分配研究——以山西省临猗县东卓村为个案》，《三晋基层治理》2021年第6期。

庄总户数的66.81%。土改后,没有牲畜的家户由原来的155户减少至128户。占有1头牲畜的家户由原来的58户增加至72户,这72户占村庄总户数的31.03%,占牲畜总量的62.07%。对比土改前后可知,无法独立拥有耕畜的农户均占农户总数的60%以上[①]。档案资料显示,卓村贫困农户虽然获得了土地,但依然无法解决耕畜和生产工具等普遍缺乏的境况。劳动互助成为获得土地的农民维持生产的现实选择,同时,国家的引导和扶持也是互助合作的重要动因。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②]。1950年到1954年期间,互助组是晋南农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主要组织形式。一般区分为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临时组大多具有季节性,根据农户生产和季节需要临时组织,农忙互助,农闲分散。常年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常年互助,农副业结合,有相应的生产计划和少量公共财产,实行以工换工和计价结算。据档案资料统计,1950年临晋、猗氏两县共有农业生产互助组152个,其中常年互助组17个,临时互助组135个,入组农户636户,占农户数的1.1%。1951年,互助组发展到2089个,入组户数9211户,占到总农户的16.1%。1952年,互助组增至5081个,入组户数23229户,占到总农户的40%。1953年落实"入组自愿,出组自由"的原则,两县巩固互助组2189个,入组户数10542户,占到总农户的17.4%。1954年两县合并,临猗全县共有互助组5348个,其中常年互助组2982个,临时互助组2366个,入组户数27599户,占到总农户的45.4%[③]。

总体来看,互助组是在土地农民所有、家户独立经营的基础上,成员之间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自发进行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变迁以自愿为前提,保护了农民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一方面解决了分散生产无法解决的困难,使得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互助组是农户间简单的联合经营,具有规模小、临时性和不固定性的特点,是较为松散的组织形式。新组织与土地农户所有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导致互助组内部产生许多摩擦,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合作体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生产合作社是探索重建农业组织的一种新尝试。1951年初,中共山西省委提出要战胜农民自发因素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办法是扶植与增强"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来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④]。1952年底,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业化建设投资剧增,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需求量骤升,农业生产难以满足工业建设需求,供需矛盾导致粮价上涨并影响建设成本不断上升。由于粮、油、棉和副食品供求关系相继紧张,迫使国家调整一系列制度来保证粮食的收购和供应。解决问题的重点开始集中到"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上来,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之间矛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矛盾。加强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加快推进农业互助合作就成为国家重要政治议程。

① 薛剑文:《土改至高级社前农村土地、牲畜分配研究——以山西省临猗县东卓村为个案》,《三晋基层治理》2021年第6期。

② 参见何森:《康庄大道: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开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9—10页。

③ 临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猗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200页。

④ 参见何森:《康庄大道: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开展》,第2页。

1953 年 10 月，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成为合作化运动从“办好互助组”转向“办好合作社”的转折点。当年底，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①]。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极大地强化了国民经济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实行统购统销制度目的是保持国家对农产品的低价收购，稳定粮价和保障供给。实质上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障策略，由国家垄断市场，强制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同时，为确保在计划调节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必须变革组织制度实现国家权力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控制。在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分析了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指出党在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变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②]。决议强调继续贯彻“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并规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数字要达到 80 万个左右[③]。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根据档案资料，1955 年，临猗县当年入社农户 17983 户，占总农户的 29.4%[④]。

按照所有制权属变化，农业生产合作社可分为初级社和高级社两个阶段。初级社也称土地合作社，它建立在土地农民所有制基础上。基本形式是社员的土地作股入社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红。社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初级社以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为基本特征，如果说互助组是接近于乡村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那么初级社就是打破这种传统并向其相反方向跨出的重要一步。初级社同互助组相比有很大不同，尽管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没有改变，但实现了统一经营并积累了公共财产，因此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作为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初级社具有了半社会主义性质，成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步骤。

合作社与互助组相比，好处是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通过统一经营解决了互助组无法解决的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对土地可以实行统一规划，对劳力可以实行合理分工，实现因地制宜、用人所长。在生产规模上可以更多地采用先进农耕技术、更多地开展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1954 年，卓村组建了本村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有 20 户农民加入[⑤]。初级社按照社章和生产计划统一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农户可以凭借土地入股，参加年终分红。在晋南，土地参与入股分红一般有二八、三七、四六等几种分成方式，卓村年终分红采用“二八”分成比率，地二劳八。[⑥]

初级社期间，国家对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主要通过诱导的方式。由于乡村政权对农村经济的主导地位尚未确立，初级社土地私有和统一经营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对农村难以“实现完全的计划经济

①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96 页。
②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册，第 227 页。
③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册，第 234 页。
④ 临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猗县志》，第 202 页。
⑤ 卓村档案：编号为 65 的《临猗县北辛乡东卓大队账册资料》，该账簿记录了 1955 年到 1956 年两年间东卓村入社社员年终分红情况，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⑥ 卓村档案：编号为 65 的《临猗县北辛乡东卓大队账册资料》，该账簿记录了 1955 年到 1956 年两年间东卓村入社社员年终分红情况，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和全面的社会控制”。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寻求一种更合适的生产关系”,“于是群众要求实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把主要生产资料归合作社集体所有”[①]。高级农业合作社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农村合作体制开始向集体体制转型。

(三)集体体制实现了“政社合一”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高级社的基本特征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和按劳分配。社员的私有土地、耕畜、大中型农具归集体所有,保留自留地和经营家庭副业,劳动产品由高级社统一分配。高级社的建立,标志着农村合作体制向集体体制的转型。集体所有制是集体体制的内核,起到了主导和支配作用。这个时期,国家对农业体制采取了进入和转型的办法,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集体体制大致可以分为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两个阶段。

1954年先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强化了合作化运动在农村工作和生产运动中的中心地位,并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和步骤[②]。在迎接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的精神指导下,不少地区出现了要求建大社、多建高级社,以致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强迫农民入社的冒进情况,引起了农民的恐慌。再加上,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未能达到以计划调节的办法解决农产品供需矛盾的最初设想,因而农业合作化又被认为是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产量的主要途径。因此,国家对农业合作化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目标,要求在比较先进的地方1957年春季以前、全国大多数地方1958年春季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由初级社转变为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③]。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进入了普遍办高级社的阶段。到1956年11月底,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共达76.4万个,入社农户11674万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1%,其中高级社48.85万个,入社农户1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④]。根据档案资料,1956年,卓村加入嶷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年,临猗全县办起高级社104个,入社农户55044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7.9%。截至1958年,全县有高级社175个,入社农户55755户,占总农户的88%[⑤]。

高级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在经营管理上,高级社是独立的核算单位,对生产队采用“三定一奖”(定产、定工、定投资、超产奖励)、“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投资、超产奖励)和“四固定”(固定耕地、牲畜、劳力、农具)等管理方式。这种经营模式符合引导落后的小农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设想,以后的农村经济组织改革尝试都没有超越这个模式。

从合作化向集体化的转变,是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路径选择。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国家权力深深植入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具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过渡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具有完全性质的高级社,中国农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国家意志也从最初引导性的诱导式进入到强制性的主导式制度变迁阶段。

---

① 转引自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65—66页。

②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册,第318页、422页。

③ 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61页。

④ 赵铁桥:《办好农民合作社走好共同富裕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合作社百年变迁与启示》,《中国农民合作社》2021年第8期。

⑤ 参见临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猗县志》,第203页。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预示着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确立，新中国由此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国家从政策主导、社会实践和组织体制三个层面同时发力，推进农村合作体制向集体体制的转型。在政策主导上，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①]。其中，“多”和“快”是总路线的重点。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超英赶美、急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主观构思成为会议的基调。这次会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序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在社会实践和组织体制上的具体体现。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体系，实行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具备集中统一领导、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的组织方式，既适应了“大跃进”运动大规模组织生产活动的需要，也满足了尽快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合并和改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②]。人民公社化运动随之迅速在全国掀起热潮。根据资料统计，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临猗县也于当月将全县划分为 6 个人民公社，下辖 145 个管理区，461 个自然村，共 175 个高级社。9 月 2 日，临猗县又将 175 个高级社调整为 180 个生产大队，大队以下调整为 1599 个生产队，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并同时取消了乡政府。人民公社体制的最大特征是“一大（规模大）二公（公有化程度高）”和“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公社之“大”，体现在全国平均 8.5 个农业社并成一个人民公社。山西省平均 44 个农业社并成一个人民公社[③]。公社之“公”，体现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部为集体所有，在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农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形成“生产集体化、生活社会化、行动军事化、分配平均化”[④]。

公社体制强化了行政主导经济生产的制度安排，为运动式的农村社会治理创造了条件。人民公社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片面追求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力图把一种凭借主观构思的先验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套用在社会实践当中，很快就显示出它的弊端。公社体制下，地权和产权变得越来越模糊，农民对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热情逐步降温。在巩固人民公社和推进农业大跃进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急于求成、生产关系变革上的急于过渡仍是农业农村政策的主导力量，这也成为农村形势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原因。由于农业和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结构呈现畸形，财政出现大量赤字，物资供应相当紧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从 1959 年开始，国家经历了历时三年的经济生活严重困难时期。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首先表现在粮食生产和供应的全面紧张，大量出现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

①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三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453 页。
② 参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三册，第 520 页。
③ 参见《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1958 年 9 月 30 日。
④ 行龙、马维强、常利兵：《闵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52 页。

为全面挽救农村形势、进一步纠正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国家开始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进行系列政策调整,逐渐放松单一公有制计划体制的禁锢以适应农村生产力现实基础。1959年4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生产小队也应有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①]。这是对人民公社在体制上的一个重大改进。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和重申了包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内的一系列政策[②]。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中起到了统一认识、指导实践的作用,成为扭转农村形势的关键。1961年3月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对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等方面做出了制度性规范。1961年6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对条例草案中的一些规定作了重要改变,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结合工资制的规定,提出了生产队是否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无论包产收入还是包产以外收入都按劳动工分分配等基本符合农村实际的规定[③]。条例草案和修正草案的实行,在较大程度上割除了"一大二公"公社体制的许多弊病,对稳定农村经济和社会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农村形势逐渐趋稳向好的情况下,针对生产中尚存的生产权与分配权不一致的问题,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改变了公社中存在的生产权在生产队而统一分配权在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生产关系的调整有利于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影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基本形成[④]。山西省委也下发了《结合春耕,切实做好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的通知,确立了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基本政策。卓村大队各生产队于1961年开始建立独立账簿,包括明细分户账、明细分类账、社员往来账以及其他往来账等。各生产队开始真正成为一级核算单位,并有权安排本生产队的各项生产活动。至此,"一大二公"的大公社体制过渡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公社体制[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是低级形式的所有制,生产队作为部分所有权属的非独立经济组织,在公社组织体系中的地位并不稳定。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⑥],以及随后在农村普遍开展的"清账、清库、清工、清财"四清运动等,在政策制度层面上起到了巩固集体经济的作用。

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采用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在其初期,实行过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工资制结合供给制的分配制度。后经多次调整,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形式基本确定下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公社体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以"集体所有、分户经营"

① 参见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三册,第44—45页。
②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三册,第374页。
③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三册,第457页。
④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四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⑤ 参见薛剑文:《集体化时代晋南乡村经济研究——以山西省临猗县北辛乡卓村为个案》,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5年。
⑥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四册,第132页。

为特点的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标志着农村集体化经济的终结。

二、集体化时代农村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

集体化运动经历了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等不同的组织形式。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的几次调整，形成了以单一公有制计划体制为特征的农村经济结构。这个时期，农村经济生活有这样几个特征：

（一）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农村集体化运动伴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变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成为新政权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政策途径。首先，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和管理制度建立起来。随着农业集体化的进程，土地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逐步从个人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民基本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虽然后来变土地公社所有为生产队所有，同时也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但又同时规定，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这可以理解为生产队的土地所有权是不完全的，生产队在遇到土地调整和占有等问题时，缺乏保护土地所有权的政策依据。不仅如此，严格意义上说，在单一公有制计划体制下，政府确定生产计划、统一分配政策，生产队必须严格执行。生产队作为生产组织者丧失了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分配权。其次，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实现了集体化。除了对土地进行统一经营外，本归农户所有的生产工具也被租借过来统一调配使用。现存的 1954 年卓村农业社固定财产登记簿很清楚地展现了当时初级社生产工具的特点、来源和金额情况。其中，还包括从社员处借得农具的记录。卓村初级社的农具基本上是一些简单的手工生产工具，像牲口梢套、耙、铁犁、铡、木桶、土车等，付给报酬 5 万到 15 万不等。1956 年高级社建立，卓村农户主要以耕畜、农具作价入股。到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家庭除保有住房和少量自留地、家畜、家禽的所有权外，其他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①]。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组织社员生产活动，负责劳动报酬分配。土地产出由生产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归社员家庭和个人所有。

（二）体制上的政社合一

集体所有制以集体经济取代个体经济，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迈入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的制度尝试，其核心是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在高级社以前，农村实行的是乡社分立的管理体制，乡是基层政权，合作社是农村经济组织。高级社建立后，政社合一、分级管理的体制在农村已具雏形。人民公社制度是农村集体化运动的集大成者，公社体制将基层政权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合二为一，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的“一体化”管理。

根据档案记载，晋南农村普遍建立了以公社、大队、生产队为组织形式的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公

① 卓村档案：编号为 5 的《临猗县北辛乡东卓大队账册资料》，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社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统筹经济社会各方面全过程。小公社体制取代大公社体制后,大队和生产队的权力开始有所扩大,逐步确立了大队党支部在村庄的绝对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晋南农村各生产大队都建立了健全的大队组织系统,包括大队党支部、大队委员会和生产队、共青团、妇联以及民兵组织。党支部由全体党员组成,其他组织都必须接受党支部的领导并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晋南农村党员主要来源于贫农,也包括少部分中农。党的组织原则在农村生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支部的大部分成员都在大队各组织系统中担任重要职务,直接领导着各个组织的运行和操作。卓村大队党支部当时共有25名党员,出身贫农的17人,中农6人,下中农2人,其中11人担任大队干部①。

(三)以集体作为基本会计单位

集体是当时的基本会计单位。最早的会计单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一般与村庄相当。初级社时期,农户以土地入股并参加年终分红,同时还必须在初级社账户中存留一定的社股份基金用于日常的生产。收益分配主要包括公共费用开支、国家税收、集体提留以及社员分配等四个方面。分配标准以社员入社土地和劳动日为依据。地劳比例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卓村年终分红按照"二八"分成比率,地二劳八②。大公社体制建立后,公社作为基本会计单位。由于规模太大管理成本高,小公社体制期间基本会计单位又变成了生产队。生产队由相对较小的30—40家农户组成,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分配。

根据档案资料,卓村农民在合作社期间,现金按照共同劳动、按劳取酬的形式分配,粮食一般按人、劳比例计算分配。人劳比例在各社队之间有"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之分。基本口粮1956年按人头分,1957年改为按年龄大小、划等定成的办法分配。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临猗各村生产队在收益分配上实行基本供给制,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全年成人每人供给粮食275公斤,供给布6米,棉花0.625公斤,每人每月1—4元津贴费,同时规定理发、洗澡、看戏、公费医疗、婚丧补助等福利标准,总计合款80.02元③。1962年,生产队成为会计单位,卓村大队各生产队基本都建立了独立的账簿,包括明细分户账、明细分类账、社员往来账以及其他往来账等,并于当年底停办大食堂,在收益分配方面实际废止了基本供给制,工分制的分配机制逐步得以确立。

(四)工分形式的计酬方式

由于农业劳动不同于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既标准不一、岗位不同又种类繁多,质量难以检验。合作化运动后,各地农村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整套以工分制劳动计酬的制度,主要包括评定底分、按时记分、定额记分等等。工分制作为一种劳动分配制度,以工分作为分配标准折算个人劳动和报酬所得,社员的劳动报酬以"工分"形式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的条件下,劳动报酬总额决定于劳动者本人参加集体生产所得的工分和工分值的高低。

---

① 资料来源:《卓村大队支部党员基本情况表》,《卓村档案》,现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② 卓村档案:编号为65的《临猗县北辛乡东卓大队账册资料》,该账簿记录了1955年到1956年两年间东卓村入社社员年终分红情况,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③ 临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猗县志》,第209页。

晋南地区工分制的大致构成是，扣除年度生产费用、公共财产的磨损和折旧、国家农业税、社员口粮款、社员劳动报酬、公益金等，剩余部分留作公积金用于储备和扩大再生产。其中，社员的劳动报酬采用“劳动日基本报酬加奖励”的办法。首先确定每个劳动日的基本报酬，在增产部分内抽出一定比例作为附加报酬，按劳动日进行分配。其次，制定奖惩制度，按照社员每年的基本劳动日和农活质量进行衡量，奖优罚劣[①]。一般情况下，登记工分以劳动时间为依据。卓村工分计算方式为：劳动一天记 10 分，上午 3 分，中午 3 分，下午 4 分。如果失去劳动能力、参加劳动次数过少或不参加劳动，则无法获得全额口粮。需要时可以通过给生产队打欠条借粮，也可以花钱购买口粮。年终结算时，根据会计账册记录的工分，集体会统一计算出净收入总值，并按一年的总工分平均分配到个人。小孩一般不被记作劳力，不参加集体劳动，年终仅获得口粮[②]。

（五）流通领域实行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是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或商品，实行有计划地统一收购、统一供应、统一分配的一种购销方式，主要目的是解决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不能适应工业化需求的矛盾。1953 年 12 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③]。政策规定，凡是统购统销的物资除了国家委托的企业有权经营外，其他任何企业和个人都不准经营。粮食供应包括农民口粮的数量和品种等，完全由国家计划安排。统购统销，从 1953 年开始直到 1990 年代初期停止，共施行了近 40 年。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不仅是要在当时生产力基础上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也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步骤。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表明国民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被极大地强化了。1955 年春，国家试行粮食的“三定”政策，所谓“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简而言之，就是根据年龄核定每个农民的粮食消费水平[④]。据档案材料记载，卓村 1957 年的口粮标准为：1 岁至 3 岁每人 10 斤，4 岁至 6 岁每人 200 斤至 280 斤，7 岁至 9 岁每人 280 斤至 330 斤，10 岁至 12 岁每人 330 斤至 380 斤，13 岁至 16 岁每人 380 斤至 460 斤，17 岁至 19 岁每人 460 斤至 520 斤，20 岁至 50 岁 600 斤至 650 斤，51 岁以上 440 斤至 500 斤，单身汉 500 斤[⑤]。农民自产粮食超过口粮标准的部分由国家统一收购，农民自产粮食不足口粮标准的部分由国家统一供应。卓村大队每年向国家供应商品粮 2 万余斤，政府直接与生产队打交道，实行过“一定三年”“一定五年”的办法[⑥]。在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方面，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供应。1954 年，农业生产资料被国家确定为“综合换购”物资。“综合换购”的实质是供销社可以凭借生产资料的垄断地位换取更多的农民出卖的廉价农副产品。例如，农民在出售粮、棉、油料、生猪、鲜蛋、豆、芝麻等农副产品时，可以领到“山西省出售农副产品奖售化肥票”，然后凭票到供销社购买化肥。1961 年改奖售为切块分配。1978 年重新恢复奖售，以后陆续增加了补

① 临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猗县志》，第 209 页。

②《卓村档案》，编号为 3，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③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册，第 196 页。

④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册，第 502 页。

⑤ 参见卓村档案，编号为 3，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⑥ 参见薛剑文：《集体化时代晋南乡村经济研究——以山西省临猗县北辛乡卓村为个案》，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5 年。

助、扶持等办法。农药、农用薄膜、部分铁竹木小农具都由供销社或公社、大队分配到生产队,生产队或社员按配额到供销社购买[①]。

统购统销政策在稳定粮食供给、保证人民基本的消费需要、稳定物价和社会安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为工业化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是,统购统销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它割裂了市场和商品之间的关系,脱离了生产力发展实际,也背离了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造成了生产滞后、生活不便,严重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三、余论

两千多年的传统小农经济和生存方式,决定了中国以农户为基础小规模农业经济的社会特征。如何变革组织形态把分散的农民纳入到统一的制度框架,改变旧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涣散的状况,构建一种能够使国家意志有效治理农村基层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结构,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这是新中国面临的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造的基础之上的,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始终被作为推动体制变革与结构转型的中心要义。客观上,如果没有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变革,就不可能有中国如今的发展格局。新中国建立后所实行的社会改造整体上将旧的社会机制全面重构,是现代中国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石。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一个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基础的核心,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将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成为中国唯一经济基础。从小农经济的现实出发,解决好农业农村问题并为社会转型创造条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改变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制度环境,国家其它制度安排也随之开始深刻而剧烈的变革。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改变了经过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再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原有设想,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过渡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作为国家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安排,过渡时期总路线是进行其它制度安排的基础,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部宪法的实质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法律化,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实现“一化三改”[②],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宪法规定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发展的方向,排除了农户个体经营继续长期存在的可能性,也进而缩小了国家重构农业经济组织路径选择的空间。

农业合作化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先导,是从变革农业生产的组织结构入手的。这种新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废除传统的农村组织,而是由国家赋予其新的职能并转变为一种新的形式。最根本的改变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农业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把分散的、个体私有的农民组织起来。农村集体化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规模逐渐变化过程,也是逐渐提高农业生产资

① 参见临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猗县志》,第211页。

②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册,第227页。

料公有制程度、逐渐强化政府对农产品市场控制、逐渐深化农民国家意识和农村经济逐渐纳入国家计划体制的过程，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集体化运动，全面重构了国家与农村的社会关系。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国家与农村社会一体化的体制特征。

集体化的农村体制被赋予多个职能，具有鲜明计划经济体制特征。一是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农业体制，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取农产品的稳定供应，提高了政府为工业化建设投资调动资源的能力。二是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在对农作物直接征收农业税的基础上对粮食实施较低的国家定价形式，实际上是对农产品征收了隐形税，实现了农产品剩余的征收和转移，使农民为工业化付出了更多的间接成本。三是国家用农村组织变革引导和推动农村社会生活转型，组织农业生产的同时提供社会服务和商品流通。集体所有制作为低成本的有效重建农村的方式，可以为农村提供新的社会服务和更好的生产要素投入，国家赋予农村集体的社会职能为农村重建提供了组织化起点。此外，这种组织形式也为国家有计划地组织、治理农村社会，引导管理农民生产生活秩序，在农村推行经济和政治创新提供了便利渠道。不可忽视的是，集体化体制同样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特别是劳动者决策自主权的缺失限制了转型推动生产发展的效果。在理论上，集体体制具有适应生产要素市场导向的经济功能，但在实践中，其决策自主权受到了国家计划体制的严格限制，难以对市场刺激作出充分反应。自主权的丧失，意味着农户没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策略，不能优化资源配置。比如，粮食优先的政策贯穿于整个农业集体化时期，国家将粮食生产放在首要地位是落实一系列国家建设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实施粮食优先政策在增加粮食产量方面确实很成功，但因为实行粮食低价策略，导致农民缺少粮食生产的经济动机。同时，“以粮为纲”以损害其他产品的生产为代价，致使农副产品的人均消费不断下降。尤其是土地基本上被用来完成粮食统购配额，农户对于种植作物种类、使用多少土地没有自主权，粮食生产的投入成本高于增产收益。因此，在实践中农业集体所有制难以完成组织农业生产这个最基本的目标，工分制既难以激励生产积极性也难以协调农户利益，更难以保证生产质量。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基础缺乏维持规模经济发展的条件，集体化的价值取向因缺乏有效的动力机制，而无法提供最有效的组织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也是集体化走向终结的根源所在。

中国农村集体化时代是一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和思想运动变为了社会现实生活。虽然以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初衷在实践中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但组织形态的变革却带来了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方面的有益变化。首先，农村公共服务得到加强。集体化之前的中国农村几乎没有公共服务的职能，集体化农村体制可以充分调动资源为生产提供更多的投入。比如，在集体经济初期，占用土地的老坟被平掉，分散的土地被合并，土地集约化的程度提高有效地增加了土地供给。在农闲季节，集体组织可以有效动员并激励农民从事农田水利、建筑工程等基本建设。另外，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供销合作社作为农村集体组织的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为农业提供生产服务。农村信用社吸收农户存款，为农村交易提供流动性。农村供销合作社为农业发展提供现代农业资料，同时也负责购买农民的盈余产品。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以及防范风险等领域，农村集体组织为自己的成员提供社会服务建立了基本制度保障。其次，农村集体组

织建立了缓冲风险的机制。集体所有制保证了农户的土地权属,当农户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集体组织可以救济农户减轻风险的威胁。集体化时代许多农户得到了政府或集体不同形式的帮助,也有许多农户赊欠了集体分配的粮食,还有一些较穷的集体公社长期得到国家的资助。再次,农村集体组织具有较强政治职能。作为国家最基层组织的公社具有部分政府职能,农村组织的三级集体结构可以为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稳定的组织渠道。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组成的三级集体体系很好地适应了传统乡村建制形式。生产队作为基本会计单位专注于农业生产,能够很好地维持生产生活秩序,而多数经济与非经济农业职能都由大队和公社负责。同时,户籍集体登记制度可以有效控制迁移,防止出现未经政府批准的人口流动。总的看,农村集体所有制是组织农村社会日常生活的有效体系,三级集体所有制作为一种有效的劳动分工形式使农村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政治状态。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是一种艰难的探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生产力落后国家有怎样的发展模式、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将经历怎样的阶段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局限同样鲜明,从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到发展生产力的急于求成,从“以粮为纲”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一大二公”到“政社合一”,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都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局限紧密相关。从基本国情出发,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就有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①。中国乡村在20世纪后半期有过两次激烈的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这次变革使农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组织起来的数亿农民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次变革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这次变革终结了农业集体化进程,并推动农村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大步迈进。这两次变革对传统农村都具有极其重要而且深刻的影响,两次变革的结果造就了当今中国农村的基本格局。

集体化运动虽然最终并没有实现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设想,但是集体化改造了传统个体小农经济,组织起来的农民实现了向集体经济的转变。同时,重构了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基础,乡村社会面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空前的深刻变革。集体化运动对如何打破两千年来分散的小农经济,实现小农的联合,推动农村产业化以及整个农村组织改造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这是建立在沉痛教训基础上的历史总结。进入新时代,中国已经走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农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事关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进程,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的转型需要农业组织形式的新变革。目前,家户经济的小农基础在农村还没有根本改变,这是我国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滞缓的根源所在。探索现代农业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农业

① 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2年1月13日,第1版。

农村现行制度和政策体系，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就要改变农村个体农业基础，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积极发展新型农村社会组织。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就要实现农民自身的现代化转型，构造一个由农民自己主导的共同富裕、充满生机的现代化农村社会。从这方面讲，集体化时代又为当前农村农业改革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中进行深入思考。

责任编辑：侯德彤

Orga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tudy on Rural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Life Change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Er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Village Grassroots Archives in Zhuo Village, South Shanxi Province

Xue Jianwen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era of collectiviza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tate and collective we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villages. A serie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movements were occurring from top to bottom. Organizational reform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eft a profound historical mark on the rural economy and farmers' life. By examining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changes and lif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areas in southern Shanxi, especially in its Zhuo Village,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flect the impact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era on the whole rural economic situation of China through "orga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collectivization; rural area; economic organization; economic life

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仇小敏 钟素文

广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摘 要: 当前我们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以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就必须扫除城乡分割治理观念,树立城乡共同治理理念,形成城乡治理共生共荣的思维范式,为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提供思想基础。同时,要打破阻碍城乡共同治理的体制机制,健全城乡共同治理的政策体系,为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加快推进“三农”现代化建设进程,形成新农村治理与新城镇化治理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双轮驱动的新格局,为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提供路径选择;提高“三农”人员素质,培育一支包括农民在内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为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提供力量主体;加强党对城乡共同治理的坚强领导,巩固城乡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联动,健全城乡居民自治、法治、德治即“三治”相结合的党群共同治理体系,为建构城乡治理共同体提供组织保证。

关键词: 社会治理;治理共同体;城乡治理共同体;乡村振兴战略;城乡共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5-0118-09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①] 这就告诉我们,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事实说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和科学认识城乡之间的变化趋势、辩证关系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也说明了城市和乡村的治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所谓治理共同体,就是人们在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治理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有家庭、氏族、城市、村镇、部族、民族、区域、国家、人类、地球等诸多不同类型和级别的共同体。它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存在的(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基于主观和客观上认识的共同特征,并在各层次的社区进行自发治理、自我规范其政治组织的团体和种族的总体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曾明确指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

项目基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网络空间统一战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1VMZ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仇小敏,男,湖南邵东人,哲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广东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信研究;钟素文,女,广东普宁人,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助理,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3—8版。

新型城乡关系”。[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健全城乡融合发展”。[②] 然而以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现代化治理的重点放在城市，相对忽视了乡村的协同治理问题。而且较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公共资源分配都是明显向城市倾斜，城市与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不协调，因而造成了城乡居民所能够享受的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上的不平等、不公平，形成了城乡治理的二元格局。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现状是制约城乡共同体、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障碍。事实上，推进城镇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乡村从来不是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城市也不可能脱离乡村而独立发展。二者的不同就是乡村是在发展趋缓中产生的，而城市是在快速发展中形成的。但是“消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无法实现的”[③]。事实也证明，城市和乡村的治理从来都是互相促进、互相联系的，是不可分割的治理共同体。我们要努力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齐心合力建设城市和乡村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美好家园，才能真正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也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一、共生共荣思维范式：城乡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思想基础

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造成了我国发展的一些不平衡、不充分，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④] 而“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⑤]。所以清除城市与乡村相分离的旧观念，构建城市和乡村共同治理的新理念，从全局视野进行城乡规划的顶层设计，在整个中国范围内进行资本、技术、领导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的优化配置、充分融合，形成城乡发展彼此不可分割的思维范式，为城市和乡村形成治理共同体打造新动能、形成新格局和培育新的经济体提供先决条件，这是我们当今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精神支撑和思想基础。所谓扫除城乡分割旧观念，树立城乡治理新理念，就是不仅要让农村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水准的生活样式，也要让城市居民感受到乡村对城市的基础意义和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使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面貌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城市和乡村的治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思维定式。这是为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提供思想基础。

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城市与乡村的治理也正在逐步成为愈发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治理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不协调的必然结果，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变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2 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2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04—105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72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42 页。

革会使城市与乡村在更高基础上的相互融合。马克思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①]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而避免两者的片面性和缺点”[②];“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城市和乡村的治理中变得更加凸显,这样面向可持续性的未来需要城乡治理新的变革和新的突破。今天人们常说,城镇化会伴有“城市病”,其实乡村也有“乡村病”,它们各自都有自己存在的短板、不足与缺陷。而且当前乡村发展缺乏活力,并不是我国农村独有的特殊现象,而是整个世界城市的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历史与经验也证明,实施城镇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彼此统一。因为“三农”的现代化和城镇的现代化都不能建立在城乡分割的基础之上,不仅要通过城市的发展、通过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带动农村各方面的发展,也要通过乡村的振兴、通过新农村的科学治理来促进城市的繁荣稳定,一句话必须实现城乡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不然城乡分割的二元治理旧格局就依然没有改变,城乡社会治理共同体就依然不会形成。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④];“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⑤]。这就给我们如何构建城乡社会治理共同体指明了发展的正确方向。事实上现在已经形成了农村和城市已经彼此不可分离,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无法隔绝、脱钩了。所以城乡治理必须尊重乡村与城市关系中的对等性,二者的互动是相互影响和彼此决定,而不是城市单方面决定乡村。对城市“先决”地位的假设只是一种人为假设,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存在严重的人为主观性。

所以要通过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易学易懂的方式,加强思想理念相关方面的宣传教育,引导农民朋友转变观念,使他们明白不仅要依靠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援工业、农民支援市民,而且要依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市民帮助农民,贯彻城乡彼此共同发展的双向互利共赢的思路;不仅要注重完善乡村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要推进城市道路、信息、网络、电力等基础投入向农村延展,推进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城乡均衡化发展,实现城乡共同治理的无缝对接。因为这是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共同发展政策体系:城乡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制度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够建立在城乡治理体制机制相分离的基础上,势必要通过城市和乡村要素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⑤ 习近平:《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光明日报》2015年5月2日,第1版。

互动和流通机制来实现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因此,应该搭建并优化城市与乡村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共同治理,打破阻碍城乡共同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而且就相对于缩小城乡治理在历史上形成的差距而言,通过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来增进社会公平,是更为容易实现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① 这是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完善规划体系,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推进城乡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② 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早就指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理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③ 我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随着中国乡村的发展,农村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城市的繁荣发展,但城市的发展繁荣更需要立足农村振兴。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构建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权益平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以打造产业发展融合化等制度性治理体系安排,维护城乡治理制度体系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化城乡治理的科学性和约束力。

所以今天我们把以往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变成了“城乡融合”,即从“统筹”“一体化”到“融合”,这是对当下中国的城乡制度关系、城乡关系发展规律和城乡治理制度体系创新建设规律的认知升级。只有城乡治理制度体系“融合”了才能成为共同体,这是城乡治理共同体必要的前提条件。这“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等提法明显不同,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中国开始把城市和乡村作为平等的发展主体,有助于激发乡村内生增长动力和活力”④。而过去“统筹”更多地是用城镇来统筹乡村,让乡村跟上城镇的体系架构。所以要按照“定位不同、功能互补、邮寄融合、同样美好”的治理理念,统一编制城乡制度体系发展规划,统筹城乡资源要素和管理政策体系,解决城乡治理规划脱节和制度的地区分割。这样通过优化配置城乡资源,逐渐打破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治理壁垒,推动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从而构建缓解矛盾、缩小差距、实现协调、共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因为从当前创新的发展情况来看,相对来说,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融合”显得更加紧要和迫切,更能反映现实的需要与可行。在“融合”的语境下,建构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发展之后,城市和乡村两者治理变得更为平等重要、更加均衡发展、更加彼此依存,才能真正成为互为融合的主体与客体,才能形成真正的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2 页。

② 习近平:《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光明日报》2015 年 5 月 2 日,第 1 版。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5 日,第 2 版。

④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5 日,第 2 版。

城乡治理共同体。

三、协调发展新格局:城乡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路径选择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它作为全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①] 他还明确强调“三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②] 因为农村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正所谓“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史记·孝文本纪》);“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晋书·齐王攸载记》)。“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而当前“三农”现代化治理赤字是实现城乡治理共同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也应该是突出的短板所在。所以加快推进“三农”现代化治理与建设,是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路径,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治理再上新台阶,以实现城市和乡村具有同等的生活条件,朝着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方向大踏步前行。

“三农”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现实表明,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最大的治理短板在农业,最大的治理短腿也在农村,最突出的治理问题还是在农民。其实我们党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统揽了之前的“三农”政策,早就关注到新时期城乡要素对流、交融的动向,早就包含了要着力解决“三农”现代化和城镇化治理的不平衡问题,也早已展现了一幅城市和乡村共存共荣、相互依赖需求的城乡治理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我们党也已经认识到,城镇中国和乡村中国共同发展、携手前行才能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它们是一对治理共同体,在互动中共同治理发展;但互相不能取代,城镇要像城镇的基本样式,乡村也要具有乡村的主要特点。农业的现代化是包括城市在内的国民经济中最基础的现代化,因此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是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村居点的现代化,包含了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意味着农村居点的城镇化,强调城市对农村的扶植支援力度。农民是农业的经营者和操作者,农民的现代化就是农民队伍的专业化、技术化、精干化、高素质化,所以农民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但是在当前,城乡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是最大最直观的。要实现创新共同发展,就要把公共资源配置重点体现在农村农业农民上,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加快推动公共服务下乡,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由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即将进入城乡互促共赢的新时代。所以要不断深化“三农”现代化建设,形成“新农村建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②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63页。

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的新格局。

这就为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补齐“三农”这一短板。这样通过乡村更新，我们将实现宅园清、家园净、田园美，营造一个由本地居民、外来消费群体、创客人士等共创共享的“城乡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推进“三农”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治理，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农业必将有可能缩小与工业、服务业的差距，农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必将有可能接近甚至必将赶上城市市民生活水平，农村经济也必将有可能赶上城市经济。这应该也是整个经济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提供的路径选择。

四、高质量人才队伍：城乡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力量主体

现代化的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和农村兴旺，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三农”人才队伍。这是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主体性工程。中国古语曰：“农，天下之大业也。”俗话也有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人群，农村是中国国土的主要部分，农业是我国最基础的第一产业。不言而喻，当前导致一些乡村发展不景气、经济萧条、人力资源不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多年来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人才持续不断地流向城市，农业生产仅仅依靠留守人员和少数失意的返乡农民工勉强应付农村工作，其农村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效果可想而知。但是没有建设城乡治理共同体的主体性力量的“三农”人才队伍，一切“三农”方面的美好理想与愿望都将只能是黄粱美梦、南柯一梦。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人，要让农民成为一种让人向往的职业，培养造就一支亿万“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工作队伍。[①] 我们认为，这样一支“三农”工作队伍将不仅是实施振兴乡村战略、治理好“三农”问题的主力军、生力军，也是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幸福不会从天降，天上不会掉馅饼，城乡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也更不会自然而生成。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不能坐享其成，是等不来的、也送不来的，要靠广大“三农”人才一起奋斗才能得来。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治理融合，以致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不是靠天、靠地、靠神仙，而是要靠一批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队伍去落实、去奋斗、去完成。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人员素质问题的根本之策。一方面，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需要动员和激励一大批青年能手回乡创业，依靠他们把新技术、新知识、新观念带到农村中去，并在农村实践中培育一批懂技术、能办事、有能力的新农村的致富带头能人，从而在农村形成以点带面的模范、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农民是不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受益者，也是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和受益者，所以一定要把亿万农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性等调动起来。因此今天我们党提出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要求也完整地构成了新时代“三农”工作队伍的基本能力与素养要求。不然城乡治理共同体就会缺少“三农”人才这个短板。今天，在乡村人才严重流失的背景下，更需要果断采取措施破解农村人才需求的瓶颈、短板。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乡村乡贤、能人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具有市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2 页。

场意识、经营能力的乡村能人和乡贤的作用;另一方面,要便利人才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通过资金、福利、待遇、制度和政策创新提供支持和引导,鼓励和吸引外来的涉农人才来到乡村开办实业,参与到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乡村社区的建设、乡村文化的发展等“涉农”事业当中来。实施农村“三创”带头人培育行动,支持农民兴业创业,引导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兴业,而且还要将返乡创业兴业的农民工纳入一次性补贴范围。

总之,只有着力培养和造就数量充足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人才队伍,并能扎根农村、把稳定与发展统筹抓起来的“三农”人才工作队伍,才能补齐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三农”人才短板,才能确保城乡治理共同体得到高质量的实施,才能让那些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一切人才在广阔农村大舞台上大显身手、大展才华、大施所能,从而实现乡村在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上汇聚起来并且在生产要素实现各要素的良性循环。事实上,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三农”人才成为口袋鼓囊囊、精神亮堂堂的职业农民,农村发展越来越生机勃勃,农业产业越来越欣欣向荣,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才能建成城乡治理共同体。也只有农业成为拥有生机、前途与活力的优产业,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新天地,农民成为令人向往的热职业,形成城市人离不开乡村农业、向往农民农业并愿意长期留在农村的良好氛围,形成工农互促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才能扎实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

五、党群共同治理体系:城乡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组织保障

促进城乡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是我们党历届领导集体的不懈追求与奋斗目标。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实践中相对忽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和发展规划,造成农村党组织的发展落后于城市党建的事实。这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乡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影响城乡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实践证明,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关键在党,责任也在党。正如俗话说的好: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中国共产党就要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就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所以今天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共同治理,就必须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定力,确保我们党始终纵览全局、协调各方,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农业农民工作能力与水平,就必须使农村党组织活起来、干起来、强起来,大力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自治、法治、德治”即“三治”应有的战斗堡垒作用。

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首先要加强党组织对城乡共同治理的坚强领导。有严密的组织才会倍增的力量,有健全的体系才能有有力的行动。城乡基层党组织是确保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政治基础、组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实现城乡治理共同发展、解决城乡治理共同发展的农村短板,我们党逐步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农村党组织开始活起来提供了组织保障。其次城乡基层党组织要带好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就指出,要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构建城乡共同体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发展的“火车头”“指挥所”,更是“先锋队”:既要将党和国家关于城乡治理共同发展的政策传达给村民,让他们了解党和国家的城乡共同计划和战略;又要成为具体的行动者和实践者,发挥党员干部的先

锋模范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赶上城市居民那样高品质的生活水平。再次要建立城乡互联、结对城乡共建的基层党组织，实现双向共赢。要通过结对共建，推动薄弱农村进一步明确发展思路、落实发展举措、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促使城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效能、展现服务形象，不断推动城乡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城乡基层党组织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效性。要充分调动城乡基础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建设美丽乡村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只有发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村民、城市基层党组织中的市民，激发他们建设自己城乡共同美好家园的热情，城乡治理共同体构建才能落到实处。最后要健全基层党组织关于“三治”相结合的城乡共同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①。这就为未来党的城乡民主治理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所以要特别注意完善村民法治，促进农村基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创新、改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模式，处理好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乡镇政府的法律关系，彻底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依法治国意识和行使依法治国的能力。

当前要促进城乡基层党组织工作机制这一工作思路，就必须以强化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广大“三农”人员一道苦干实干、再接再厉，结合本地区自身实际情况，实实在在的干出实际成效出来。并且在城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注重城乡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活动共办、党员共管，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自治、法治、德治”建设水平，达到与城市基层党组织一样的治理水平，不断为城乡经济社会共同治理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对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政治上要信任，工作上要依靠，生活上要关心。城乡基层党组织还要围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体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城乡基层党组织各自的自身优势，建立健全城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机制，实现城乡基层党组织共建、党员干部共育、党建资源共享的目标，努力开创并形成城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新格局。

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所在，也是我国全面决胜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大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与现实课题。世界的发展趋势和现实的实践经验越来越证明：扫除城乡分割治理旧观念，树立城乡治理共同体新理念，形成城乡治理共生共荣的思维范式；打破阻碍城乡治理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城乡治理共同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推进“三农”现代化治理进程，形成新农村治理与新城镇化治理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双轮驱动的新格局；提高“三农”人员素质，培育一支包括农民在内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治理人才队伍；加强党对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坚强领导，巩固城乡建构城乡治理共同体提供政治组织保障；等等，都是我们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路径的根本选择，也是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内在的逻辑要求。21 世纪是城乡关系治理需求更加走向协同、创新的世纪，也是一个城市和乡村治理共同发展的世纪，更是逐步形成城乡治理共同体的世纪。城市与乡村应该相互学习借鉴、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2 页。

互动演化、协同发展,这是时代的担当、历史的责任。但是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的、复杂的超大型工程,更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大计,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充分认识到其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按照“基在农业、利在农民、惠在农村”的治理思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而发展的城市化来实现城乡一体化,真正实现城乡治理共同发展,才能达到城乡治理共同体的最高境界。这就需要我们党不断加强对于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共生、共存、共享格局的构建,需要我们对构建城乡治理共同体的模式和机制进行新的努力、新的探索和新的创新,需要我们大家久久为功、齐心协力、撸起袖子加油干,奉献我们的磅礴之力。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Logic of Constructing the Urban–rural Community

Qiu Xiaomin Zhong Suwen

Institute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aliz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uild the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t is necessary to eliminate the concept of urban and rural divided governance,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urban and rural common governance, form the thinking paradigm of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symbiosis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vide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e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Meanwhile, we should break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hat hinder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mprove the policy system of joint governance, and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constructing an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solving problem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form a new patter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utual benefit and two-wheel driving of new rural governance and new urbanization governance, and provide a path choice for building an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ople working on problem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cultivate a contingent of people, including farmers, who understand agriculture and love th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so as to provide the main body of strength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We will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ver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solidate the linkage of work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e the Party-masses governance system that combines self-governance,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o provide an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building an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Key words: community;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problem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urban and rural common development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失衡及影响因素研究

王 梅 欣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以城市老年人为对象研究社区居家养老的供需问题,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和水电维护方面。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受年龄、收入、受教育水平、健康情况、自理能力、住房条件、与子女居住距离的远近等因素的影响,这种不均衡很大程度是由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不足导致的。因此,要达到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加快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就要扩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宣传,提高老年人对该类服务的认知水平;调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价格标准,使之与老年人的经济水平匹配;建立多元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体系,满足不同类型老年人的需求等。

关键词: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供给;供需平衡

中图分类号: D66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5-0127-11

一、引　言

随着全球老龄化形势的日趋严峻,更多的国家把居家养老作为解决老年人口养老问题的一个主要方式。二战后,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主张对老年人提供照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责,所以机构养老一度成为“理想”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以及机构养老弊端的显现,社区照顾理念开始受到政府青睐。[①]20世纪50年代英国率先推行社区照顾的模式,80年代初联合国也开始提出倡议,如今居家养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②]国内学界最早提出居家养老的是袁缉辉,其核心是通过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确保尽量多的老年人在家中安度晚年。[③]我国政府2000年开始把居家、社区和机构三者相结合讨论它们的关系,提出“在供养方式上坚持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福利机构为补充的发展方向”(国办发〔2000〕第19号),确定了养老服务体系基调。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等部门2008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

基金项目: 本文系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岛市社区居家养老供需错配及解决路径研究”(QDSKL20010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梅欣,女,山东青岛人,比较公共政策学博士,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健康老龄化研究。

① 崔恒展:《居家养老的源起演变及其内涵探究》,《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② 李佳、于昌健:《日本“黄金计划”对我国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构建的启示》,《现代日本经济》2019年第3期。

③ 袁缉辉:《强化家庭作用 支持居家养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形式。20多年来,国务院、全国老龄办、卫生部、民政部、工信部、财政部、老龄健康司等多部门先后颁布下发了几十条社区居家养老政策法规,不断探索以居家为基础的社区养老的新模式。社区居家养老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是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结果,也是老年人群体自身变化、老龄工作提高以及老龄事业发展的结果。[①] 社区居家养老可以让老年人继续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有助于其精神状态的维持。由社区提供日常生活及护理方面的照料,一方面可以弥补老年人自我照料的不足,另一方面,还有助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从2004到2015年的10年间,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尽管都有显著增长,供需缺口也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但是生活照料服务供需不平衡加剧,供需结构、地区和城乡间的不平衡进一步凸显,总体供需缺口仍十分严重。[②] 一方面,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另一方面,大量养老服务项目和设施少有问津。这种"有需求,无供给"与"有供给,无需求"矛盾背后的原因是"供需失衡",根源是对老年人的需求认识不清、把握不准。本文将在论述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以及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现状的基础上,使用官方调研数据,探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目前存在的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深入分析其成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需求视角的研究

王琼利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0年度"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城市老年人数据,对我国城镇老年人家庭照料需求的现状与影响因子进行分析,认为崇尚节俭和为子女着想等传统文化观念、收入等经济因素以及身体机能、年龄、社会地位、性别、所在地区等因素,均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③] 姚虹和向运华以农村空巢老人为研究对象,发现他们对医疗保健服务、精神慰藉服务和生活照顾服务的需求最多,健康状况和空巢原因显著影响了空巢老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④] 孟杨等人指出,我国老年人以自我照料为主,依靠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仅占36.6%,主要集中在家庭医生上门服务、家政服务和健康讲座方面。[⑤] 王艳芳和冯志涛通过理论基础的研究,提出了影响居家养老需求的主要因素:一是老人的个体特征,即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二是老人的家庭特征,包括婚姻状况、居住状况、经济来源和存活子女数量;三是老人的身体特征,包括自理情况和患病情况。[⑥]

① 姚远:《从宏观角度认识我国政府对居家养老方式的选择》,《人口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张新辉、李建新:《社区老年服务供需动态变化与平衡性研究——基于CLHLS 2005—2014的数据》,《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2期。

③ 王琼:《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性的城市老年人口调查数据》,《人口研究》2016年第1期。

④ 姚虹、向运华:《健康状况、空巢原因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以恩施市农村空巢老人为例》,《社会保障研究》2018年第1期。

⑤ 孟杨等:《上海市宝山区居家养老现状与需求分析》,《职业与健康》2015年第11期。

⑥ 王艳芳、冯志涛:《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需求供给影响因素分析》,《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年第11期。

（二）供给视角的研究

徐庭柯等人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分析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强度提升，但总量仍不足；不同类型服务供给覆盖率均增长，但发展不均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呈聚集态势，且愈发失衡。[①] 李兵水等人从老年人的期望值出发，对老年人的期望供给主体进行研究，根据老年人的意向，政府是他们最希望的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主体，家庭、社区和非盈利机构居中，最后是志愿者、义工和盈利性机构；居住地也是影响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的主要原因，城镇居民以社区为主，农村居民以家庭和志愿人员为主。[②] 王艳芳和冯志涛认为，制度、资金、服务人员素质以及机构等都是影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的重要因素。[③]

（三）供需综合视角的研究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失衡是学界的共识，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供给模式采用“自上而下”的统一养老服务，政府的偏好和判断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有较大偏差。[④] 其二，供给能力不高，社区硬件条件差，资源分割缺少共享，专业人员匮乏等。[⑤] 其三，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参与度低、市场调节度低。[⑥] 其四，老年人的低收入水平以及崇尚节俭的传统文化思想抑制了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⑦] 改进策略方面，有基于服务项目的初步分类[⑧]，通过由运作机制、需求导向机制、供给激励与约束机制组成的均衡机制[⑨]；借助“服务链”理论，实现服务供给、服务输送和服务利用的均衡[⑩]；通过完善体制措施，转变政府角色，打造专业服务平台，建立多元化筹资途径[⑪]；借力互联网 +，搭建服务平台，借助社会力量，整合服务资源，最大限度地改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⑫]。

以往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只是实证分析大多集中于老年人需求因素的探讨，未能将其与供给结合，在研究供需失衡的影响因素方面也尚缺少有力的实证研究。本文将尝试找出社区居家养老的供需差以及导致这些供需失衡的原因。

---

① 徐庭柯等：《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时空差异研究——基于 CLHLS（2008—2018）纵向数据》，《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 年第 3 期。

② 李兵水、时媛媛、郭牧琦：《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分析——从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期望的视角》，《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 期。

③ 王艳芳、冯志涛：《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需求供给影响因素分析》，《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 年第 11 期。

④ 王建云、钟仁耀：《基于年龄分类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层次及供给优先序研究——以上海市 J 街道为例》，《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⑤ 马驭等：《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发展养老服务的调研报告》，《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1 期。

⑥ 丛春霞、彭歆茹：《城市居民居家养老服务供需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⑦ 张国平、柏雪：《居家养老服务产业化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公共产品的视角》，《现代经济探讨》2019 年第 7 期。

⑧ 郭竞成：《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强度与需求弹性——基于浙江农村老年人问卷调查的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⑨ 李兵水、时媛媛、郭牧琦：《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分析——从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期望的视角》，《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 期。

⑩ 王莉莉：《基于“服务链”理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供给与利用研究》，《人口学刊》2013 年第 2 期。

⑪ 何健、赵怡冰：《现阶段我国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3 年第 2 期。

⑫ 邵文娟、王家瑛：《养老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研究——以互联网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核心》，《劳动保障研究》2018 年第 1 期。

三、中国老年群体养老的突出需求与社区的服务供给

(一)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的特点。当前最迫切的养老服务需求有:

一是经济保障需求。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老金、离退休金、子女供养、各类年金等。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四调")的结果,2014年,我国城镇老年人的年人均收入为23930元,农村老年人的年人均收入为7621元。同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844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489元。可见,老年人收入水平总体不高,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口数量依然较多。

二是医疗护理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的各项机能开始逐渐下降,极易患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慢性疾病。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老人的比例明显增加。"四调"结果显示,2015年,我国城乡老年人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为15.3%,比2010年的13.7%上升了1.6个百分点,比2000年的6.6%上升近9个百分点。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在医疗护理方面的需求日趋增加。

三是生活照料需求。伴随经济水平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我国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2020年平均家庭户规模已降至每户2.62人。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显示,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总数已超过一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近10%,而大中城市的空巢率更是高达70%。做饭、打扫卫生、看病、购物等以往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的生活照料,将逐渐向社会转移,对社区服务的需求提高。

四是精神慰藉需求。大多数老年人退休后遇到的普遍问题是角色退出。在社会、家庭中的角色变化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自我感觉和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生理机能和大脑功能的老化以及社会角色的改变,老年人在心理方面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孤独感、自卑感、失落感、抑郁感等也会随之增加。但是有限的经济能力、个性的差异以及社区帮扶的多寡,会使得老年人的社交需求无法满足,或者难以满足更高的精神需求。空巢老人尤其是失独老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更甚,所以急需社区来补充这部分缺失。

五是自我实现需求。老年人,尤其是低龄老人有实现自我价值、继续奉献社会的需求。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比55.83%。这些低龄老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和技能,身体相对健康,发挥余热的潜力较大,可以通过社区志愿者、博物馆讲解员等方式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和对社会再奉献愿望。

(二)社区的养老服务供给

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伴随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和少子化。在家庭养老功能退化、机构养老不被大多数老年人接受的当下,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最高效的方法。以下从三个方面阐述供给现状。

1. 服务供给主体。现行的社区养老服务主要以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为主,企业参与为辅。社区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还有部分社会捐赠和社区服务项目收入。2013年,

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仅有不到1%用于老年福利支出，约112亿元。政府重视程度不高、养老产业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等原因，导致民间资本对养老服务热情不足、参与较少。

2. 供给设施和服务内容。一是社区活动中心，主要为老年人提供文体活动场所，比如棋牌室、乒乓球桌、阅览室等。二是日间照料中心，为白天无人照料的老年人提供托管服务，内容涉及医疗护理、生活照料和情感服务。三是社区食堂提供助餐服务，既能保证营养又能让老人少花钱，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也可以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四是居家上门服务，即老年人生活在家中由社区以及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供身体复查、打针吃药等医疗服务或者助餐、助浴等生活辅助性服务。根据《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1年底，我国共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6万个，门诊部（所）30.7万个，村卫生室59.9万个。

3. 服务人员。社区服务的工作人员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承担社区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兼任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主要提供的是生活照料。二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和护士，主要提供在日间照料中心的医护服务和家庭病床的上门护理服务。三是民间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兼任生活照料服务和护理服务。

（三）基于“四调”的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现状

“四调”结果（详见表1）显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排在第一位的是上门看病服务（38.1%），第二位是上门做家务服务（12.1%），第三位是康复护理服务（11.3%）。我们发现，包括上门看病、康复护理、健康教育在内的健康服务是老年人期待最高的社区养老服务，其次是做家务、助餐、助浴等日常生活服务，再次是心理咨询服务。了解老年人的这些服务需求规律将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指引。

表1 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内容及占比

社区养老服务需求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			
需求内容	老年人需求比例	生活类服务	社区提供比例	医疗康复类服务	社区提供比例
上门看病	38.1%	法律或维权	33%	健康讲座	37.5%
上门做家务	12.1%	殡葬	21.8%	上门看病	35%
康复护理	11.3%	托老	15.6%	心理咨询	15.5%
心理咨询或聊天解闷	10.6%	家政	15.2%	康复	12.3%
健康教育	10.3%	老年餐桌	5.9%	上门护理	7%
日间照料	9.4%	陪同购物	2.2%	陪同看病	5.6%
助餐	8.5%	老年婚介	1.6%	家庭病床	4.5%
助浴	4.5%	——	——	康复辅具租赁或出售	3.9%
老年辅具用品租赁	3.7%	——	——	——	——

数据来源：《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15年。

目前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大体分为生活类服务和医疗康复类服务两大类。如表1所示,生活类服务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法律或维权,有33%的社区提供该项服务,殡葬(21.8%)和托老(15.6%)分别列第二位和第三位;医疗康复类服务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健康讲座(37.5%)、上门看病(35%)和心理咨询(15.5%)。对比社区提供的服务与老年人的需求,可以发现,虽然老年人的所需社区均有提供,但是提供的数量并不能很好地匹配,即需求大于供给;另有一些服务(如法律或维权等),社区提供的过多而老年人所需甚少,即供给大于需求。只有当老年人的所需即社区的所给时,供需才能匹配。所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应适时调整服务内容,紧跟老年人的需求意愿和时代的发展。只有这样,老年人的需求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

四、实证分析

前述分析表明,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普遍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下面我们将使用微观数据进行建模定量分析,以便找到问题背后的原因。由于没有兼顾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全国数据,所以本文使用青岛市老龄办提供的《青岛市老年人口信息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数据进行分析。青岛市是全国最早施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试点城市之一,很多养老政策都走在了前列,所以用青岛市的数据做分析具有一定代表性。《登记表》主要对老年人的个人基本特征、身体状况以及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和接受现状等做了调查。我们选取市南区、李沧区和崂山区60岁及以上住在家中的老年人口,样本总计64001份,其中市南区和李沧区调研于2013年,崂山区调研于2014年。受访老年人具有低龄、受教育水平有限、不与子女同住但与子女居住距离较近、自理能力较强等特点。我们将从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供给、供需不平衡3个角度进行实证分析。

(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现状

充分认识到老年人的需要,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优质的服务,并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是实现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途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分为"居家上门服务"和"社区养老服务"两种。[①]《登记表》将居家上门服务分为了住家保姆、紧急救助、医疗护理、打扫卫生、理发洗澡、陪同聊天、买菜做饭、陪同外出等八个选项。老年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多项选择。调查结果(详见表2)显示,老年人对打扫卫生的需求最多,达到45.90%;其次是住家保姆(32.7%),排在第三位的是紧急救助(30%)。

表2 青岛市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需求情况统计表

服务类别	频率	服务需求百分比
住家保姆	4087	32.70%
紧急救助	3753	30.00%
医疗护理	2477	19.80%
打扫卫生	5742	45.90%
理发洗澡	2162	17.30%
陪同聊天	1788	14.30%
买菜做饭	2440	19.50%
陪同外出	1016	8.10%

① 王梅欣、殷婷:《青岛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及对策研究》,《东方论坛》2015年第2期。

在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方面，共设有定期探视、医疗保健、一日三餐、日间托养服务、水电气维修等选项（多选）。调查结果显示（详见表 3），老年人对水电气维修服务的需求最高，占比达到 49.6%；其次是医疗保健（44.9%），排在第三位的是一日三餐服务（37.7%）。

表 3　青岛市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情况统计表

服务类别	频率	服务需求百分比
定期探视	1692	12.00%
医疗保健	6336	44.90%
一日三餐	5316	37.70%
日间托养服务	1356	9.60%
水电气维修	6999	49.60%

（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登记表》从老年人需求和利用角度询问了关于居家养老的现状。因为有供给才会有利用，所以将调查问卷中的居家养老现状和享受社区养老服务作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代理变量，由此做相关的供给分析。两者皆为多项选择。

由表 4 可知，青岛市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现状，以自我照料（占 86%）为主，其次是配偶和子女照料；具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性质的政府购买、住家保姆、钟点工和志愿者服务等，仅占 2.7%。

表 4 居家养老现状

居家养老现状	频率	百分比
自我照料	55058	86.00%
配偶照料	22620	35.30%
子女照料	16961	26.50%
亲戚照料	766	1.20%
政府购买上门居家养老服务	315	0.50%
自费住家保姆服务	616	1.00%
自费钟点工服务	436	0.70%
志愿者服务	306	0.50%

由表 5 可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以在社区老年人娱乐室活动为主（13.50%），其次是在社区养老互助点活动（6.5%）和社区助餐送餐服务（6%），在日间照料中心接受服务的仅占 1.6%。但是，值得注意的是，77.90% 的老年人未曾享受社区养老服务。

表 5 社区养老服务

享受社区养老服务	频率	百分比
无	49857	77.90%
在社区老年人娱乐室活动	8647	13.50%
在社区养老互助点活动	4154	6.50%
享受社区老年人助餐点用餐或送餐服务	3811	6.00%
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接受照料	998	1.60%

（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失衡的影响因素分析

1. 模型构建

我们建立两个模型进行分析研究。一是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模型，二是老年人对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平衡模型。由于两个模型的因变量皆为二元离散选择变量,因此均采用Logit回归。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frac{P[(D_i=1)]}{1-P[(D_i=1)]}=a_0+\sum_{i=1}^{n}a_kX_{ki}+\mu_i$$

在需求模型中,以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否有需求为因变量。具体的,将选择居家上门服务或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任意一项认定为有需求,此时 D_i 取1;当对居家上门服务或社区养老服务均选择"无"时,则认定为无需求,此时 D_i 取0。

在供需平衡模型中,以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和服务供给是否一致作为因变量。当老年人选择了居家上门服务或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任意一项,并且服务被利用时,认定为供需一致,此时 D_i 取0;否则 D_i 取1,即供需不一致。

模型中的 X_i 是自变量,包括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一共有k个。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测度方式及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6所示。年龄按实际年龄进行分析,文化程度按照学历相应的年数进行折算;与最近子女的距离按由远及近分成七个指标,对应为子女对于老年人的照顾程度,将居住状况中的独居和与配偶生活合并在一起,意为老年人自己照顾自己,并将自理情况中的部分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合并为不完全自理。为了减少异方差的影响,对每月固定收入取对数处理①。

表6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测度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是否需要	需要=1,不需要=0	0.20	0.397
	供需是否一致	一致=0,不一致=1	0.36	0.480
解释变量	年龄	实际年龄	69.99	7.864
	性别	女=0,男=1	0.48	0.500
	文化程度	小学=6,初中=9,高中/中等专科+技工学校/职业高中=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硕士=19,博士=22	9.59	3.005
	婚姻状况	无配偶=0,有配偶=1	0.85	0.353
	居住状况	与子女同住=0,与配偶居住或独居=1	0.80	0.397
	住房情况	自有住房=1,非自有住房=0	0.90	0.305
	与最近子女的距离	同一社区(村)=7,同一街道(镇)=6,同一区(市)=5,同住青岛市=4,市外省内=3,省外国内=2,国外=1	5.42	1.422
	健康状况	健康=0,患有疾病=1	0.42	0.493
	自理情况	完全自理=1,不完全自理=0	0.92	0.265
	每月固定收入水平	被访老年人收入的对数	7.45	1.391

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所以为避免随机误差项异方差导致的不良后果,我们使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法进行回归②。

表7第(1)列是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其中所有的解释变量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年龄系数为0.023,几率比为1.024,即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会增大,年龄每增加一岁,需求会增加2.4%。性别的系数为负,说明比起男性,女性

① Yang Z., Xiong Z., Xue W., et al.,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Fee Reform on the Emission of Water Pollutants: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19(17): pp. 10660.

② Xu Q., Meng T., Sha Y., Jiang X. et al., "Volatility in Metallic Resources Prices in COVID-19 and Financial Crises-2008: Evidence from Global Market", *Resources Policy*, 2022, 78(9):pp.102927.

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更高。文化程度的系数为0.030,大于零,所以受教育年限越长,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大;其几率比为1.030,说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增加3.0%。婚姻、居住和住房状况都是分类变量,且系数皆为正,分别说明有配偶、与配偶共同居住或者独居(即不与子女同居)、有自有住房的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更大。尽管不与子女同住,但是如果子女离老年人的距离越近,则可以降低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这一点从变量"与最近子女的距离"的系数小于零可以得出,即子女距老年人居住的越近越方便照顾父母。健康状况的系数为正,几率比是1.591,说明患有疾病的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概率是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的1.591倍。自理情况的系数为负,说明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对于该项服务的需求低于不完全自理老人。老年人每月固定收入水平的对数的系数为0.051,大于零,所以收入越多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大。

由上可知,年龄越大、收入越高、女性、文化程度高、有配偶、有自有住房、不与子女共同居住且距离子女越远的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越高;患有疾病、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对该项服务的需求更高。

表7 Logit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养老服务需求		(2)养老服务供需失衡	
	系数	OR值	系数	OR值
年龄	0.023*** (0.001)	1.024	−0.013*** (0.001)	0.987
性别	−0.105*** (0.021)	0.901	−0.045*** (0.017)	0.956
文化程度	0.030*** (0.004)	1.030	0.010*** (0.003)	1.010
婚姻状况	0.755*** (0.036)	2.127	−0.317*** (0.026)	0.729
居住状况	0.129*** (0.030)	1.137	−0.033 (0.023)	0.968
住房情况	0.548*** (0.038)	1.729	−0.165*** (0.027)	0.848
与最近子女的距离	−0.207*** (0.008)	0.813	−0.030*** (0.006)	0.970
健康状况	0.465*** (0.022)	1.591	−0.260*** (0.018)	0.771
自理情况	−0.331*** (0.038)	0.718	0.565*** (0.038)	1.760
收入对数	0.051*** (0.008)	1.053	−0.028*** (0.006)	0.973
常数项	−3.770*** (0.149)	0.023	0.645*** (0.123)	1.905
R^2	0.74		0.23	
样本容量	64001		64001	

注:( )内是稳健标准误,*** 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3.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失衡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7第(2)列给出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失衡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除居住状况外,所有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年龄的系数为−0.013,说明老年人的年龄越小对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的供需越不一致,其几率比为0.987,可以得出年龄每增加一岁,该项养老服务供需的一致性将提高1.3%。性别的系数为-0.045,几率比为0.956,说明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更不一致。对于文化程度的系数为0.01,大于零,所以受教育年限越多的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越不一致;其几率比为1.01,说明对于文化程度来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的不一致增加1%。婚姻和住房状况的系数皆为负,分别说明无配偶、无自有住房的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越不一致。与最近子女的距离的系数为-0.03,小于零,说明子女离的越近,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越一致。健康状况的系数为负,自理情况的系数为正,说明健康老人、完全自理老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不一致。每月固定收入水平的对数,其系数为-0.028,小于零,所以老年人每月固定收入越少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越不一致。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年龄越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越一致;男性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比女性的需求少,男性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更加一致;婚姻状况中有配偶的老人比无配偶的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多,有配偶比无配偶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更加一致;住房情况中拥有自有住房比无自有住房的老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大,自有住房比无自有住房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更加一致;健康状况方面,患有疾病的老人比健康老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更多,且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更一致;自理情况方面,完全自理的老人倾向不需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不一致;收入越多的老人越需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且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越一致;文化程度越高的老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高,但文化程度越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越不一致;与最近子女距离越近越不需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但越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越一致。由此可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在很多因素上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有关,即多数情况下需求越多供需越一致;需求越少,供需越不一致。因此我们要加大力度扩大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Logit模型,使用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与接受供给是否一致以及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年龄、收入、性别、文化程度、是否有配偶、是否拥有自有住房、与子女居住距离的远近、健康和自理状况的好坏等,都是影响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平衡的原因。供需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其深层次的含义是老年人的潜在需求未能被激发,所以扩大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潜在需求是缓解该服务失衡的有效手段之一。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一是提高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老年人的年龄越大,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多。但是,老年人的年龄限制了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了解,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许多老年人由于不知道该项服务而使该服务的利用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社区以及该工作的从业人员需要增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意识,增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一切老年人能够获取到的途径使更多的老年人了解和熟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从而提高养老服务的利用率。

二是设立合理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价格标准。收入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失衡的重要影响因素，低收入是现阶段导致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供给失衡的深层根源因素，这与杜鹏和王永梅等人的研究[①]发现相呼应。老年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由意愿转化为实际利用是需要收入来保障的。如何合理地调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价格、使之与老年人的收入匹配、获得最大化的效用，仍然是一个比较急迫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政策倾斜，增加资金投入，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价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三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设置应有所不同或倾斜。一方面，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项目具有不同的偏好，因此社区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建立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体系；而且，各社区的服务内容不必强行统一，可以根据社区老年人的年龄分布、健康状况等设置不同的服务项目。另一方面，由于患病老人、不能自理老人以及与子女距离远的老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更多，所以在服务内容的设置方面，应该更倾向于满足不与子女同住且身体状况欠佳的老年人的需求。

责任编辑：潘文竹

Study on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Community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ang Meixin
School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Study of the urban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 shows that the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ir needs for life care, medical care and hydropower maintenance. Empirical analysis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s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age, income, education level, health status, self-care ability, housing conditions, and the distance from their children. This imbalance is largely caused by the elders' insufficient demand for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In view of this, we mak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increase the publicity of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improve the cognitive level of the elderly on such services; adjust these services to match the economic level of the elderly; and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 supply system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the elderly. All these measures aim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services in China.

Key words: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demand; supply;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① 杜鹏、王永梅：《中国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17 年第 3 期。

重新解读“民间”：民俗学研究对象再思考

徐赣丽 刘 言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一直以来，作为民俗学核心概念的“民间”充斥着人们的浪漫主义想象。“民间”一方面被抬高和美化，被认为代表着纯粹的、本真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充当了精英文化的对立面，被视为是具有无限力量的均质化的底层民众。但当下的现实已与这些刻板化的想象相去甚远，早期设立的学科研究对象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现代民俗学应直面变化的“民间”，把个体的“民”及其创造性的文化实践纳入到研究视野当中，重新思考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民间；民俗学；美化；浪漫主义；个体性

中图分类号：K890；J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5-0138-10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民俗学界开始从“眼光向下”的革命转向对当下人们日常生活的关注，与此同时也开始重新思考传统研究范式和学科概念。高桑守史曾指出，“迄今，民俗学的重点曾是通过变迁来研究民俗的持续。面对今天急剧的民俗变化，其研究方法与体制尚未充分。为了适应现代的民俗变化，民俗学需要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①] 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民俗或民间文化，而“民间”这一概念对民俗学来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当前，“民间”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重新解读这一学科的核心概念是必要的。“解读民间”并非从语义层面理解文本，而是基于不断变迁的社会事实，反思民俗学学科传统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回顾作为民俗学学科概念的“民间”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内涵变化，探讨现代性背景下“民间”新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当下民俗学转型后的学科定位，推进民俗学现代学科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建设。

一、历史语境下的“民间”

从欧洲和美国的宏观历史语境来看，西方民俗学的兴起以文艺复兴的地理大发现为先声，作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基于消费需求导向的传统工艺当代传承路径研究”（18BH161）、华东师范大学2022年度文化传承创新研究专项项目“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研究”(2022ECNU—WHCCYJ-19）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初稿徐赣丽曾在2017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庆讲座发表，后由刘言整理。

作者简介：徐赣丽，女，江西省宜丰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民俗学、文化遗产等研究；刘言，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城市民俗学研究。

① [日]高桑守史：《人口过疏与民俗变异》，王汝澜等编译：《域外民俗学鉴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

现代性文化的“他者”角色出现，并带有浓厚的尚古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①] 霍布斯鲍姆指出：“由于受到18世纪晚期浪漫主义的影响，欧洲各国掀起了一股崇尚单纯、简朴以及尚未腐化的乡民生活之风，也开始重新发现不同人群特有的民俗传统，而着手整理方言民谣……这场极富有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为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②] 受泰勒“文化遗留物”观念的影响，大批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家们把民俗与过去、落后联系在一起。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民间文化是民众知识本真性的代表。民俗学的兴趣是赞美普通人，也包括他们怀恋的、正在消失的语言和风俗。[③]“民”被视为乡俗，即真正价值知识的持有者。只有乡民和农民才是充分意义上拥有本真的民族传统的“民”。[④] “俗”被建构为本真之物的文化表征，为学者忽视现代性问题提供合理性。“民间”被拟想为纯粹的、理想化的远离现代文明的民之共同体，成为一切非现代之物的隐喻。[⑤] 早期民俗学以本土文化的发现为目的，服务于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

西方民俗学建立之初集中于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的整理搜集，这也导致民俗学将未受工业文明影响的边远地区的“庶民”视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与之相似，日本民俗学一开始把“山人”定为研究对象，逐渐推展到巫女、游方僧人等，后来才逐渐拓展到“常民”的范围。[⑥] 事实上，从早期民俗学的研究指向保有传统生活方式的农民和手艺人及其传承着的民俗文化到晚近民俗学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随着学科理论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宽容的局面。但遗憾的是，民俗学界并没有对此建立完善的阐释框架，也没有在前沿的理论脉络下进行充分的经验研究，导致仍有很多民俗学者对“民间”的理解仍旧被狭义的浪漫观念所束缚，正如当代著名的德国民俗学家卡舒巴所批评的：“民俗学者们成为传统的管理者和真伪的鉴别者……他们通过标记特定物品、特定仪式和特定传统为地道、本真的，帮助构建了帝国时期的农村民间文化。”[⑦] 这种重视传统且以均质的农民为研究主体的惯性，严重地束缚了现代民俗学的发展。

中国民俗学对“民间”的理解与西方有相似之处。“民”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与“官”相对立或相区分的一方。民间作为民的扩展词汇，亦有着强烈的阶层内涵。汉语中的“民间”一词源于日常生活且长期未获得学术定义，人们使用时多从其否定的一方或阶层分化的概念即“非官方”对其加以理解。一般而言，凡是官方或是精英文化之外的领域均可以称之为“民间”。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一直伴随着民俗学的建立与发展。五四运动开始，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和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意识到以农民为主体的基层民众有自己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移用“民间”翻译“folk”，并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提倡知识分子走向农村，促进了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在该阶段，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浪漫主义的乡村生活观，认为中国城市的实质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产物和工具，唯

① 刘晓春：《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的根源》，《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
②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③ [美]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④ 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⑤ 参见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⑥ [日]福田亚细男：《日本民俗学的形成》，王京译，载萧放、朱霞主编：《民俗学前沿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3—25页。
⑦ [德]沃尔夫冈·卡舒巴：《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欧洲经验与视角》，《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有农民的身上保持了人的善良本性。[①]1919年周作人在《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指出,“民间”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②] 顾颉刚也认为“民”或“民众”始终是与绅士或士大夫的上层阶级相对而言的下层阶级。[③] 由此可见,当时的“民间”从地域空间上被认为是农村,就文化的承载者而言则指向农民。

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民间文学如歌谣、民间故事等是没有被雕琢和污染的,是最为纯粹的朴素的文化,这些下层民众所传承和创造的文化正是传统中可以转化或激活为现代性要素的内容,那么持有这部分传统的下层民众自然就成为“五四”学者所期望的改良社会的重要推进力量。[④] 总之,当时所谓的“发现民间”并不是出于建设一门文化学科的目的,而是希望民众能从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认同转移到对民间的认同,从而推动现代国家意识的建立。这一时期的民俗研究更多的是作为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工具和手段,夹杂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同时,五四知识分子对以农民为代表的下层群众美化,赋予其浪漫的想象,将民间文化(当时的知识分子所认为的“真实的”文化)与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相区隔,大量地搜集乡村民众的歌谣,并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劳动人民”成为了国家主体。但在原来的表述中,“人民”是体力劳动者,并非文化创造者。那么新中国立国的文化基础从何而来?人民的创造性如何体现?为了回应相关问题,一直被视为底层文化的民间文艺从边缘被推到了中心。在民间文艺中,“人民”这个群体才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⑤] 于是,新中国第一个学会组织——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0年成立。此时“民间”的含义更多地延续了五四运动的底层关怀以及浪漫主义的思想,对民间故事等文学作品的挖掘和整理也是出于对农民、工人等群体的政治地位和权利的肯定。民俗学研究中阶级本位的观念也赋予了“民”更多的政治性和规定性。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中国民俗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部分学者也对固化的民间概念提出了质疑。如董晓萍在总结了世界各国民俗学界各个时期“民”和“俗”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在现代化时期民俗学原有定义中的“民”和“俗”的概念和范围都应该不断扩大,当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必再用某种具体对象将其限制。如此对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争论至今为止仍旧存在于中国民俗学界。[⑥] 但遗憾的是,认为“民间”属于过去或者是过去在现在的遗留物的载体,代表着异域的、古老的、纯粹的原始人及其生活,至今仍是学界主流话语中的认知之一。民俗学始终作为与现代社会文明相对立的参照系出现。总体而言,自20世纪初民俗学学科成立以来,在文化层面上,“民间”多指古老的传统,具有物质的遥远性和时间的往昔性;从民众群体的角度看,“民间”代表着由均质的

① [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只是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② 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歌谣周刊》1923年六号第四版。

③ 参见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④ 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⑤ 高丙中:《发现“民”的主体性与民间文学的人民性——中国民间文学发展70周年》,《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

⑥ 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个人所组成的面目不清的底层群体。[①]

那么，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融入，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化越来越与文化展演、民俗旅游等联系在一起，民俗主义逐渐成为现实。对民间本真性的探讨已然成为了一个学术问题。倘若民俗学总是过分强调研究对象相较于精英文化的特殊性，自觉地把民俗与精英文化或上层文化相区分，那么在当下文化杂糅的现实语境中，二者的区分边界又该如何设定？如果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概念区隔不再重要，民俗学的立场又在哪里？当“民间”的概念从以乡村社会为传承母体的本质主义文化概念走向建构主义的抽象符号时，民俗学研究的合理性如何自洽？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民俗学人。

二、不变的“民间”想象和变化的“民间”现实

传统的民间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作为现代文化的对立面而存在，是文化连续性和历史建构的现代隐喻，其产生的原因本就含有学者自身的理想建构。户晓辉在对中外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话语中“民”或“民间”概念初步梳理的基础上指出，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话语中的“民”更多的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以及“俗”作为“被发明的传统”。由此他进一步提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或“民间”的概念将逐渐演变为地方文化的修辞策略和符号化手段而继续作用于学科范式之中。[②] 也就是说，在过去，民俗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研究，过分地高估了“民间”，民间文化很多时候是指一种理想的存在样式，一种文化真实性。[③] 事实上，一直以来，乡民社会的研究都被认为裹挟着某种文化想象。“早期的理论家将乡民文化的概念发展成为他们自己社会的镜中映像。他们‘创造’了已经逝去的形象并相信这些能够解释他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为了理解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混乱状况，早期的社会理论家们‘创造了过去’”。[④] 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民间的想象主要包含着双重指向：一是借助乡愁和怀旧的社会思潮，“民间”被美化成田园牧歌般的图景，作为当代都市群体的情感补偿；二是将“民间”作为一个集体并赋予其无限的力量，将其视为上层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对立面。但是现实中的“民间”已然发生了变化。

当代社会中，鉴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乡愁和怀旧的情感在中国社会中迅速蔓延。同时乡愁作为一种文化叙事，使民俗文化成为建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愁情怀，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对于一直被边缘化的民俗学的学科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契机。但是在现代民俗学的视角下，这样的现象却是需要认真反思的。美国民俗学家多尔逊在《现代世界中的民俗》一文中提出，在不同的民俗学家心目中，过去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最初的概念中，民俗就暗示了一种隐蔽的、被遗忘的和落后的文化轮廓。无论在何种历史背景中，民都代表了不同于大都市权力、

① 彭牧：《实践、文化政治经济学与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民间文化论坛》2005 年第 5 期。

② 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71 页。

③ 户晓辉：《第 6 届国际民俗学暑期培训班侧记》，《民族文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④ [美] 约翰·R·霍尔、[美] 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晓虹、徐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104 页。

财富、进步、产业、思想和政治活动中心的世界。[①] 理查德·鲍曼也指出,在宣称某种对象是传统的时候,并不是要接受传统的权威,而更多地是为了进行"策略性的争辩"。[②] 作为社会思潮的乡愁使得民间被美化,民俗学家们在研究中不自觉地抬高民间的文化价值,迫切地想要重建质朴的乡民文化,以追回想象中的乌托邦。

但是在民俗文化遗产化和资源化的背景下,许多民间文化早已脱离了原有的生存空间,更新了文化内涵,在政府和资本的作用下被包装成为地方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名词。比如在传统的民间信仰体系中,祭祀仪式等行为活动是秘而不宣的。信仰组织内部成员的实践行为和活动过程是不允外部介入的;但随着非遗运动如火如荼的举行,所谓的民间信仰常常脱离了固有的"民间"层面,从民众的生活领域转化为政府组织的集体活动,民间信仰的仪式活动也因此成为了民族文化的综合展演。由此,民间信仰对于局内人的文化功能逐渐被模糊,参与仪式活动的群体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许多民间信仰活动在政府和民俗精英的推动下,脱离了"愚昧""迷信""落后"的帽子,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成为地方旅游收入的重要部分。在这种语境中,民间信仰中的"民"呈现多元化、多面向和多层次的特征,可能是国民,也可能指村民、俗民、市民、公民,还可能跨越阶层、跨越民族、跨越国界。同一个信仰对象被不同人群所共享,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共同体。

民间文学也处于类似的状态。当代民间文学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主要是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在旅游场域和非遗展示中表演,演变为某种文化符号进行对外展示。万建中曾批评,民间文艺逐渐脱离生活语境趋向"舞台化"。民间文艺不再是当地民众自娱自乐的方式而是被他者所消费。[③] 若进一步调研可以发现,许多文艺表演场合,甚至媒体所谓的原生态表演,其实都是被官方和市场授意后经过精心的建构或改造的。此时的民间文艺与"民间"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解读?对于研究者而言,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作为象征符号的"民间"和作为生活本身的"民间"?作为文本的民间文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其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需要客观地认识现实世界中的"民"。一方面,民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可能是民族文化的草根部分;另一方面,集体性的"民"是缺乏主体性的,很多的实践行为是出于对上层群体或专业人士的模仿,也常常被动地受到上层文化的渗透、改造、浸染和同化;同时,并非所有的民都保有传统的"高尚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民"也可能是"乌合之众"。事实上,我国小农经济酿生的民是存在诸多弊端的,如狭隘、短浅、自私、欺骗等,而在民俗学家的眼里无疑是被美化了。[④] 部分民俗学家沉迷于看似美好的非遗运动,将加工后的民间文化误认为是人们的真实生活,固执地追寻本真的民间。这样的研究理路更多的是一种学者的文化想象,而非从社会现实出发的研究。除此之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在政治话语中,人们过于强化民间的力量,强调民间与精英的对抗;抬高民间文化,视之为是精英文化的源流;没有看到民间文化的包容性及其带来的复杂性,忽视了"民"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作

① Richard M. Dorson: Folklore in Modern World, Mouton Publishers,1978, pp.11-12.

② [美]理查德·鲍曼:《民俗界定与研究中的传统观》,杨利慧、安德明译,《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

③ 万建中:《市场与权力:"民间文艺"批判》,《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3期。

④ 许多民间故事中都对此有所呈现,比如斗地主的故事、阿凡提的故事等都表明并非所有的民都保有传统的"高尚道德",民间也并非均质性的、整齐划一的集体。

为集体概念的民”是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转化的能力。

民间艺术在现代语境中也与传统有所不同。当下我国的民间艺术呈现混杂的面目，越来越与专业艺术难分彼此。在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从内容形式到风格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①] 不少民俗学家提倡民间艺术要回归生活，将其与高雅艺术或精英艺术相分割，视其为民间文化自我创造的产物。但当代民间艺术与专业艺术、高雅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一方面是专业艺术借助民间文化符号进行创造，力图呈现新的风格或体现民族文化的深度与厚度；另一方面，民间艺术朝向专业艺术发展，手工艺和传统民间艺术大多失去了实用性，而成为一种满足审美需要的文化消费。工业化及大机器生产，对传统民间艺术带来巨大的冲击，诞生于农耕文明时期的各种产业及其相伴而生的民间艺术，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同时，在都市语境中，手工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手工艺逐渐脱离实用功能，不再只是补贴家用的家庭副业，转而成为一种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手工艺人也随之脱离了“民间艺人”身份，逐渐演变为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更多的手工制品也作为一种文化表征走进了中产阶级的家庭，成为一种中式生活方式的装饰或用具。

可见，当下的民间艺术早已不再是自产自销的民俗文化，而成为了他者享用的艺术符号，这与民间艺术原本的角色定位和文化内涵已经相去甚远。艺术的风格和艺术形式往往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中特定阶层和流行文化的产物。艺术的演变往往是艺术的自律性和社会因素的客观性[②]、艺术家的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创新与习俗等各种相互矛盾的社会因素相互冲突并妥协的结果。虽然民间艺术大多数有着数代传承的稳定特性，但在全球化社会的文化冲击和杂糅的过程中，民间艺术出于自我保护和自我延续的目的会重塑自身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应市场形势和当代人的审美需求。[③] 而许多民俗学者对当下社会中异质性和杂糅性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坚持将民间假想成具有无穷力量的稳定集体，忽略了民间本身的流动性和多元性。民间艺术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变迁过程则提示我们要打破对民间文化的刻板印象，将变化的社会现实纳入到民俗学的研究视野当中。

总结而言，无论是沉溺于乡愁和怀旧的叙事还是被视为均质整体的民间文化，民俗学的研究一直作为现代性的“他者”，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区分，学者们对“民间”的看法，从视其为浪漫主义想象和理想主义的寄托到聚焦于“俗”，奔赴田野寻找“真实的”民及其生活。而这样的理路使得民俗学不得不拘泥于各种资料搜集的经验性研究范式，民俗学的学科力量囿于经验事实的搜集和整理，缺乏从学理角度出发建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

我们应该看到，在当下社会中，民俗已经不再只是中下层百姓自己创造、享用和代代相传的，而可能是政府传承、精英传承、中产阶级传承和商家传承的。[④] 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和信息交换，西方新思想与本土观念互相流动和影响，文化渗透、借用、融合、甚至同化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于学者而言，当传统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甚至很多传统物品的功能从实用性转变为一种符号价值，我们需要对传统和传承的内涵做全新的界定，反思民间的浪漫化倾向。

---

① 徐赣丽：《民间艺术的当代变迁——以手工艺为中心》，《民族艺术》2019 年第 6 期。

② [德] 西奥多·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

③ 徐赣丽：《民间艺术的当代变迁——以手工艺为中心》，《民族艺术》2019 年第 6 期。

④ 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民俗研究》2015 年第 3 期。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经过多次扫除封建迷信和破“四旧”的文化革命运动,传统的民间文化似乎已经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在学术讨论中,“民间”却成为一种表述的策略在各种场合中出现。一方面,“民间”成为了当代人解脱现代性困境的需要,被不断创造和美化;另一方面,这种民间概念的发明使得学者们沉浸于经验性的生活事象之中,导致无法区分当代民间概念的建构特征,而是将其作为实体研究对象看待。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当代人向“诗意地栖居”的乡土世界回归是一种时代错乱的幻想。从当代社会心理和文化认同的意义看,乡土世界(民间)所表征的文化精神作为当代人重新发生的传统认同想象的根据,在当代高度都市化的社会环境中仍然有可能获得新的生存空间。[①] 民俗学研究长期执着于乡愁叙事。我们一直在寻求一种乌托邦可以寄托我们共同的信念,以“民间”的表述来抵抗或区别精英或官方,但是却发现许多时候,所谓的“民间”其实只是一种想象和说辞。就此周星提出,现代民俗学应该超越家乡民俗学中“乡愁”“怀旧”“民间”的概念,反思其中将家乡浪漫化的倾向,将“乡愁”与“本真性”对象化,使之成为现代民俗学之学术自觉的对象。[②] 现代社会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导致商品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现代科技对生活世界的彻底渗透导致其在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生活者不断建构意义的需求导致民俗主义司空见惯。[③] 如果民俗学者仍旧坚持要寻找“真实的”民间,认为目前国内各种如火如荼的民俗旅游、民族风情表演、民歌新唱等文化事象是伪民俗,并非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对新的现实生活领域,如网络、手机短信、流行文化等领域不屑一顾,民俗学将无法从根本上融入现代社会科学的对话之中,也无法对当代社会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面对当今民俗主义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承认原本的“民间”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民间”已经弥散在整个生活世界之中,以民间想象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理路阻碍了民俗学朝向当下社会。那么,在社会巨变的浪潮中,现代民俗学面对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又该如何向前?

三、大众文化:现代民俗学的可能路径

20世纪60年代起,欧美国家首先提出对“民间”的相关问题重新思考,这与当时美国学界“表演理论”的提出密切相关。在表演理论之前传承性被视为民俗的根本特征之一而得到强调,民俗事象往往被当做抽象的而又相对稳定的物质实体而存在;但表演理论重视过程和语境,认为民俗不再只是文化遗留物的身份,而是处于被不断创造的动态的过程之中。由此,人不再是被动的传统的接收者,“民”也不再代表抽象化、面目不清的个人,代表着落后与愚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表演为中心的研究的另一个转向就是使以往被忽略的民俗中的“人”得到了重视。[④]

民俗学对“日常生活”概念的引入,则是将“民”的概念内涵从民众主义者建构的复数的高大的

① 姚朝文、袁瑾:《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周星:《现代民俗学应该把乡愁与本真性对象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③ 周星、王霄冰主编:《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民俗主义、本真性、公共民俗学、日常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④ 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

人民形象和一般民俗学理论中定义的农民、乡民等阶层属性转变为任何权利维度上的“他者”、边缘的主体。“这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打破了民众主义支配的‘历史取向’和‘向下取向’对民俗概念的束缚与建构，将民俗的定义拓展为边缘性的日常文化生产的实践。”[①] 这样的视角转变不仅使民俗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约定俗成的“俗”以及处于边缘位置的“民”，而是将视角放置于当下正在生活着的“民”及其所创造实践的通俗（大众）文化。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乡俗与时俗的界限逐渐模糊不清，民俗文化的创造主体和实践主体分离，我们如何用一个普遍化的概念将其统合？我们又如何在多样化的经验研究中看到丰富的、活生生的人及其生活实践的图景？面对层出不穷的大众文化现象和人们不同于乡村社会的现代生活方式，民俗学应从哪个角度切入予以关注？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直以来，作为学科概念和学科对象的“民间”都是从现实经验中总结而来的应然，并不是通过理论开辟出来的必然。但学科对象的民的表达首先应该是一种理论认识和概念的概括，而不是基于对生活经验的归纳总结。事实上，在赫尔德等人的民俗学思想中，“民”最普通的意思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人口中最大的或最有用的、最有感情的那一部分人。[②] 从这个意义说，“民间”就是德国乃至整个北欧的民俗学、民族主义、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与后来民俗学所建构的“民间”概念有所不同。户晓辉在对赫尔德浪漫主义思想的梳理中指出，最初这个学科设定的目标并非仅仅是为了研究民间文学或民俗本身，而是通过研究民间文学或民俗来解放人。在此理路中，“人”并不仅仅指下层的“民间”或现实的民众，而是理想的民众，是未来社会的主体——公民。[③] 高丙中提出“公民社会”的概念来阐释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及回应朝向未来的民俗学研究。[④] 这些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纠正民俗学一直以来存在的美化的“俗”和局限的“民”的问题偏差，将“民”看作是拥有自由行动权利和自主行为能力的个体，这样的转变也进一步明晰了民俗学的学科定位，即关注人以及人的生活意义。

相较于传统民俗学，现代民俗学的研究不仅是将研究范围从乡村转向城市，更多的是研究视角的转变，即从关注群体中普遍性的、模式化的文化实践到对研究对象的个体性权利和自主性选择的关注。关注“我与你”的关系并非“我与他”的关系，这其中就隐含了对研究对象的个体性权利的关注。民间不能等同于古代汉语中的“民”，也区分于现代学者所发明的“美好民间”，“民”不再是下层社会的各种角色和民间文化，更是理想的“新人”或“新民”。所谓的“新民”指向的是作为个体概念的“民”。[⑤]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模糊的、面目全非的群体变成了有生命力和自由意志的个体。由此，现代民俗学的学科意义并非只是对城市问题的关心，更多的是对研究对象个体性和个体权利的关注。卡舒巴曾指出，传统的民俗研究只知道复数，很少知道单数；但考虑到现实社会，我们必须尝试

① 张青仁：《民众主义与世界民俗学的浮沉》，《开放时代》2020 年第 4 期，第 209 页。

② 户晓辉：《论欧美现代民间文学话语中的“民”》，载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646 页。

③ 户晓辉：《赫尔德与“（人）民”概念的再认识》，载朝戈金主编：《中国民俗学》第 1 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④ 高丙中：《“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思想战线》2012 年第 1 期。

⑤ 个体性的民并不指向研究对象数量的单一化，而是对于“民”的个性的关注，此时的“民”的表现形式可以只有一个人，亦可以是一个群体。

去区别于乡民社会集体性意见的个体性和身份的全新表达方式。[①] 吕微同样对民俗的集体性特点以及民俗学的研究问题作出反思,他指出"民俗不仅仅是集体的行为模式,首先是个人的活动方式。民俗学并非是着眼于传统文化和集体认同的学问,民俗学也能够关注现实的社会甚至个体的生活或者个人的人生,即自身的主体性存在价值和意义"。[②] 由此可见,国内外的许多民俗学者已经对个体性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思考。

在当下原子化的社会中,面对个体性和身份的全新表达方式,民俗学应该关注某种文化事象背后的"民"的表达。正如高丙中指出的:"民俗学的集体主义方法论必须创新,给予个人应有的位置,以适应这个时代的价值转向。"[③] 民不再是集体性的,而是由具有个性追求的不同个人所组成的异质性的群体。民俗学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转向也可就此达成。同时,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承认也为民俗学关注非均质性的市民的创造性实践和大众文化提供了合法性。

但是,大众文化一直被研究民间文化的民俗学者视为要保持距离的对象,因为"大众文化"作为学术概念,来源于西方学术界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基于马克思主义商品拜物教理论,将大众文化模式与"真实艺术"理念相对照,认为大众文化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品,是低下的,具有异化消费大众的效果。[④] 这导致人们对大众文化持否定的态度,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后,中国学界对之也是如此。

把大众文看作是消费主义导引的缺乏独立自主性的媚俗文化,是被民众消费而非自我创造的文化,这样的看法其实是固化了这一概念,而不是动态看待问题。换言之,"大众文化"概念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学科的学者眼里,有着多面向和多层意义。在我们看来,大众文化是指当代城市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文化,包括受消费主义和现代传媒影响的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但在此所谓的"大众"不是指均质性的大集体,反而是各具特色的彰显个体性的小群体。如果我们重返民俗学学科起源,就会发现,赫尔德所指的"民"与大众文化关联密切。赫尔德所说的"Kulyur des Volkes(民众文化)具有民族文化(the nation culture)和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双重含义。"popular"一词最初作为一个法律和政治用语,意思是"属于民众的"。该词在16世纪时被解释为"下层"(low)或"底层"(base)的含义,18世纪时其内涵逐渐扩大,具有了"广受喜爱的"(widely favoured)和"受人欢迎的"(will-liked)之义,既指人民创造的文化,又指文化工业为"公众"创造或提供的文化。[⑤] 受18世纪末期赫尔德《民间文化》(Kultur des volkes)的影响,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认为,"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指由普通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⑥] 基于此,民俗学所关注的大众文化研究更强调其最初的意义,即强调当下社会正在发生着的普通人的文化实践。

---

① [德]沃尔夫冈·卡舒巴:《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欧洲经验与视角》,《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② 吕微:《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

③ 高丙中:《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新生命》,《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

④ 魏艳芳:《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多维度批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⑤ 户晓辉:《第6届国际民俗学暑期培训班侧记》,《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另见,户晓辉:《民间文学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

⑥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01—402页。

事实上，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抽离于现代媒体和商品社会影响的与大众文化相区隔的纯粹的民间文化；当代的民间文化有朝向大众文化、亚文化、流行文化发展的趋势，或成为一种融合性的混杂体存在。在发展文化产业和推动文化消费的社会形势下，民间文化的商品性和消费性特征日益突出，许多在今天被继承的传统民俗，是被有意地挖掘、加工、包装的，“民间”成了人们怀旧的对象和传统的代名词。除此之外，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在生产新的民俗，而这种民俗与传统的“民俗”定义不同，不是均质的、扁平化的，而是小众的、个体性的，类似于丹·本－阿默思（Dan Ben-Amos）界定的民俗学研究对象：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artistic communication in small groups），[①] 而这正是现代民俗学更为关心的。随着城市化发展，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已经从诞生于乡土社会的民间文化变化为城市空间中呈现多样化形态的大众文化。[②] “民间”的概念在分析当下民俗学问题时多有局限，跨越“民间”的界限进入到大众文化的领域，未尝不是建构新的民俗学可能。

需要强调的是，民俗学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既非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也并不是为了盲目追求社会热点话题的“群氓”选择，而是从民俗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赋予大众文化新的文化内涵，并在生活世界的理念基础上，对“民间”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具体而言，现代民俗学所关心的民间不再是抽象的、普遍化的或者类型性的“民”所创造的民间文化，而是以小群体为基础的，包含着个体间互动的众生相。在这个意义上，民间不再是局限于某个阶层意义的概念，也不再指向某种边缘性的文化因素。大众文化框架下的“民间”打破了过往民俗学的时空框架，将民俗学的目光从遗留物转到当代国民正在进行的生活实践，从集体创造转移到个体实践上，关注“事件”和“人”的关系，在当下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理解民间，使民间从学者的想象中分离出来。此时的“民间”不再是原始的乡民社会，也不是建构的“世外桃源”，而是生活在当下的每个个体及其所生产的文化。

责任编辑：董德英

Reinterpreting "Folk": Rethinking the Research Object of Folklore

Xu Ganli　Liu Y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As the core concept of folklore, "folk" is full of people's romantic imagination. On the one hand, "folk" is exalted and beautified, and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a pure and authentic cultural form; on the other hand, it acts as the opposite of elite culture and is regarded as a homogeneous bottom class with unlimited power. However, the current reality is far from these stereotypical imaginations, and the research object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stage are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refore, modern folklore should face up to the changing "folk", bring the individual "folk" and its creative cultural practice into the research field, and rethink the research object of folklore.

Key words: folk; folklore; beautification; romanticism; individuality

① [美] 丹本－阿默斯（Dan Ben-Amos）：《在承启关系中探求民俗的定义》，张举文译，《民俗研究》1998 年第 4 期。
② 徐赣丽：《城市化背景下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学术月刊》2016 年第 1 期。

反思费斯克：如何理解大众文化的抵抗诗学

李桂全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抵抗诗学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理论价值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费斯克认为，大众在大众文化文本的消费过程中通过与日常生活相关点的结合，创造出新的意义和快感，新产生的意义与快感使大众在微观层面和符号层面能够形成对宰制性力量的疏离、抵抗、冒犯等诸种能动性。事实上，这种理论假设是值得怀疑的。梳理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抵抗诗学的具体层面，清理费斯克论证路径中意识形态批判与普遍价值发生的断裂，审视快感抵抗和符号意义抵抗的有效性，是揭示抵抗诗学作为价值论设失落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解读大众文化》；抵抗诗学；价值论设

中图分类号：D03；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5-0148-09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早已弥散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理解大众文化就可以多一种维度理解我们何以如此的生活方式，这一直吸引着思想家们持续地思考大众文化理论问题。进入20世纪后，大众文化理论异彩纷呈，如伯明翰学派冲破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关注平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与日常经验，法兰福学派从批判理论的视角把大众文化还原为文化工业，把大众揭示为被资本操控的对象，文化霸权理论的被引入呈现出大众文化研究的“葛兰西的转向”等等，而且每一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几乎可以说，有多少大众文化研究者就有多少大众文化理论。不同历史时期和特定语境下形成的理论对我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诸多洞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费斯克在吸收欧洲理论的基础上把抵抗诗学作为大众文化的价值论设，并以此承担起对资本主义宰制力量的否定与对抗。尤其在费斯克的微观政治学批评中，抵抗诗学直接、明了地显示出了对资本宰制体制的批判价值。如何理解抵抗诗学成为我们理解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关键，为此，我们以1989年同时出版的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和《解读大众文化》两本著作为反思对象，反思其抵抗诗学的基础层面和理论逻辑路径。

一、抵抗诗学的基础层面

抵抗诗学作为一种文化理论暗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在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上，一些文化理论成果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现代性视域下中国艺术自律实践研究”（2021SJA1383）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审美文化产品的评价理论研究”（12AZD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桂全，男，山东泰安人，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大众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

往往具有价值立场，如利维斯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肯定，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操纵性的揭示等都具有一种立场性。抵抗诗学一词天然包含着价值冲突，这一理论有着多种思想渊源，如霍尔“解码”理论中的积极受众、布尔迪厄的场域斗争与交换理论、罗兰·巴特的文本细读与符号学理论、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巴赫金的文本“外在性”理论等，正如费斯克自己所言：“事实上，我所运用的理论都源自欧洲，他们出自布尔迪厄、德塞图、巴特、霍尔以及巴赫金的著作。”[①] 费斯克抵抗诗学的思想资源如果用一句话融汇在一起可以表述为：在文本的细读过程中，积极受众在日常生活与文本“外在性”结合中，创造性地解读出符号意义，并与快感构成了对资本宰制性力量的抵抗。当然费斯克不仅局限于此，费斯克在积极受众的基础上赋予“大众”新的含义，对日常生活与文本的相关点等内容也展开了丰富的论述。具体而言，什么是抵抗？在费斯克看来，是对资本主义规训性、霸权式、一体化等宰制性意识形态的逃避、对付或对抗。支撑抵抗诗学的基础在于，大众在大众文化消费过程中所获取的圆融的、自由的、快感的、愉悦的、刺激的、逃避的、狂欢的等诸种快感与再次创造出的符号意义。抵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内容上看，费斯克对抵抗诗学的分析着重体现在大众与大众文化上。

（一）“大众”分析。费斯克对“大众”的概念给予了新的界定，并且在伯明翰学派“积极受众”的理论基础上，从大众的主动消费行为、快感体验的生产、符号意义的创造等方面对大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行了细致的论述。

费斯克从流动性的视域赋予“大众”新的含义。汉语“大众”一词对应的英文翻译有多种，如 the popular、the masses、the mob 等。在西方文化研究中，“大众”有着复杂的含义。虽然不同的理论家对“大众”有着不同的阐释，但是多数指向特定的人群，如利维斯认为是与少数精英相对立的多数人，霍尔认为是“与权力集团相对”[②] 的大众阶级，阿多诺等人认为是被文化工业资本操纵的群体，等等。费斯克对“大众”的界定超越了特定群体的概念，在他看来，“‘大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它无法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因为它并不以客观实体的形式存在”[③]。大众不是某一个人，某一团体或群众，而是不断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由于大众具有的不同层理，导致效忠从属关系处于不断地流动中。大众中的每个个体在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中不断地建构不同的意义空间。在这种意义上，大众中的每一个个体以移民的形式出现，他们通过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在资本宰制力量的体制中到处游走。这种游走使庞大的体制无法将大众固定在某一处，于是大众与体制形成了一种永无止境的对抗关系。尽管大众会被宰制性体制“收编”，但宰制的体制不会一劳永逸地胜利。体制越是庞大，越是给大众留下战术空间。此外，由于个体社会效忠从属关系的不断变更，一个人既可以是霸权的共谋者，也可以是霸权的抵抗者。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大众在体制内部制造的矛盾也给体制一种打击。

费斯克在“积极受众”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大众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尤其体现在大众自身

① [美] 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2 页。

② [英] 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戴从容译，析自《大众文化研究》，陆杨、王毅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第 55 页。

③ [美]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 29 页。

的消费行为、大众的快感等。第一,大众的消费行为。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有两种经济——金融经济、文化经济,其中文化经济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在文化经济中,大众对大众文化的消费就由消费者转变成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资本的战略往往只能在金融经济中完成,而很难在文化经济中实现。在文化经济中,不同的意义生产是由大众消费模式的差异决定的。消费模式的差异会导致意义生产的差异,于是,意义生产的多样性构成了对资本主义体制同一性的战术袭击。第二,大众的快感。快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宰制性体制的暂时遗忘,不论是美学的还是政治的都构成了对现实的一种批判。身体快感缺失的外在表现首先是饥饿与劳累,古时灾害、赋税、收入低下等常常让人喘不过气来①,有时身体的快感常常是对苦难的暂时遗忘和逃避。对于大众来讲,快感的形式多种多样,每一种快感都具有不同的抵抗功能。躲避的快感集中在身体上,当身体失控之后产生的极度兴奋快感是一种自我丧失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对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的逃避。生产式的快感往往维护着弱势者的亚文化权力。狂欢式的快感暴露了社会秩序的脆弱性,隐含着对社会秩序的激进反抗。冒犯式的快感使被压抑的内容得到释放。尴尬的快感在费斯克看来:"尴尬的体验,恰恰发生在保守与颠覆、宰制与服从,自上而下与从下向上之力量间的冲突之处。"② 这些多种多样的快感使大众在一定意义上逃离了宰制性力量的控制而构成一种抵抗。

(二)文本分析。费斯克分析大众文化文本的关键在于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文本如何连接大众与日常生活并被大众解读出新的意义从而构成对现实生活抵抗的呢?这得益于大众文本自身的诸多特点。第一,文本具有多义性与复杂性。这种多义性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巴赫金的"建筑术"理论,即一个文本从来不是完善的、封闭的、自成一体的文本,总会有一个"外在性"。不同因素的调和最终会生成不同的整体方式。具体到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如大众因牛仔裤的不同品牌会导致对牛仔裤不同意义的理解,即便是同一品牌,内部又充满了丰富的理解空间,如破旧牛仔裤与新牛仔裤,而即便是被收编的"破旧"牛仔裤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意义会召唤出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这种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构成了对同一性宰制力量的抵抗。第二,文本具有矛盾性。一个文本成为大众文化的必要条件是"它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宰制性力量的机会"③。这就是说,大众文化的矛盾性不是矛盾本身,而是这种矛盾结构使它成为社会权力结构矛盾的隐喻,正如费斯克一再强调的:"大众文化始终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文化,它总是关涉到生产社会意义的斗争。"④ 如广告对商品的推销与推销的被拒绝。自上而下的力量只有遭遇到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时才开始运作。因此,大众文化一旦运作,就充满了抵抗的力量。正是因为大众文化的这些特点,使大众文化的文本充满了裂隙、矛盾,以及留下众多可阐释的空间,从而邀请"生产者式"⑤ 的解读。"生产者式"解读的自由大众总是与企图限制文本意义的宰制力量进行着斗争。事实上,文本的这些特点也促发文本符号意义的再生产。当文本意义再一次被生产时,文本不再是资本自我增值的逻辑,而是大众创

① 马斗成、刘文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岛粮价波动与政府应对(1929—1937)》,《中国农史》2021年第4期。
②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③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④ [美]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⑤ "生产者式文本"是费斯克从巴特的"读者式文本"的概念引申而来,主要侧重读者的再创造。

造性的逻辑。文本再生产既是文本的片面遗忘，也是新的叙事随之成立的再生产[①]。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本符号意义必然回溯到金融经济中形成对资本的抵抗。

总之，不论是大众的特点，还是文本的特点，共同组成一个复杂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日常生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费斯克所言："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而文本只有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而被阅读时才能产生社会关系。"[②] 至此，费斯克抵抗诗学的论证思路和论证逻辑层面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第一，费斯克分析大众文化是在金融经济的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大众的积极性；第二，费斯克采用了快感与符号意义的抵抗。

二、逻辑路径与思想领域的错位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有没有问题？显然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并不出现在细节上。虽然他在具体细节层面上做了很多击中要害的分析，但是"战术"的胜利并不能带来"战略"胜利。费斯克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分析路径和符号抵抗策略的问题。就他的论证路径来看，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分析采用两种路径——金融经济、文化经济。他以电视商品节目为例进行了分析，电视节目呈现的金融经济又有两种细分：第一，生产者是演播室，商品是节目，消费者是经销商；第二，生产者是节目，商品是观众，消费者是广告商。在电视节目的文化经济路径中，生产者是观众，商品是意义 / 快感，消费者是观众自己。认真分析费斯克的两种论证路径，我们会发现文化经济路径只是金融经济路径的延伸，即在观众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观众的积极性。第一条路径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社会经济学分析，即大众文化是由背后资本力量生产和操纵的。这也是他论述文化经济路径的起点，这一路径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并没有任何差异，只是费斯克在此转向积极的受众进行论述，而法兰克福学派在此基础上揭示受众的被动性。因此，在金融经济路径的分析中，费斯克的抵抗诗学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重合性，也就是说，他所采用的方法和批判理论所采用的社会实证还原方法并没有差别。社会实证还原方法的经典论述就是把某一普遍流行的观点还原到当时社会语境提出这一观点的少数人当中，从而揭示普遍观点往往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这种观点被用于大众文化分析，即把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流行性还原到经济中，结论是大众文化被还原成资本获利的商品或手段。关于资本的获利性和宰制性，费斯克从来没有否认过。因此，不论他对大众的主动性分析是多么精彩，其理论逻辑的前提没有改变，即资本逻辑在大众文化中的运行。这就决定了费斯克的研究路径和批判理论研究路径的起点是一样的，仅仅是研究方向更改了，也就是把被愚弄、被操纵的大众论述为积极主动的大众。看似费斯克与阿多诺等人在大众文化理论上是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其实，他们思想路径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只是，费斯克沿着生产与消费的路径转向了大众消费行为的主动性和符号学研究的视角。这就决定了其思想的起点必然带有批判理论同样的缺失、局限与错位。

先看抵抗诗学锋芒的来源与指向。在界定大众文化的概念时，费斯克已经超越了 mass culture 而

① 马斗成、李遥：《荀子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回忆》，《原道》2020 年第 1 期。

② [美] 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 页。

转用popular culture, popular具有普遍流行的涵义。但是,在具体的论述层面,费斯克似乎抛弃了这一层涵义,依然带有二元对立的痕迹,如“大众文化属于被支配者与弱势者的文化,因而始终带有权力关系的踪迹,以及宰制力量与臣服力量的痕迹”①。费斯克用社会实证还原的方法把大众文化的普遍流行性还原成资本权力集团获利的手段。于是,统治与被统治、宰制与被宰制、大众与资本权力集团的二元对立关系就被揭示出来。这种研究路径的展开是他对大众文化做出一系列价值评判的基础,其深刻性在于将普遍流行的大众文化理解成某些资本力量利益的自我实现。这也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论述的逻辑起点。当完成这一步之后,费斯克把论述方向转到了大众身上,认真地探寻大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选择性等特征。大众一旦具有了主动性,大众在其所处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无疑具有了抵抗力量。抵抗诗学自然就在这些二元对立关系中呈现,正如他在《理解大众文化》书中一再申述的:“贯穿本书的主题是:大众文化是围绕着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各种形式的对立关系加以组织的。”② 费斯克的分析直接把抵抗的锋芒直指背后的资本权力集团。但是,这种方法本身是有问题的。问题是批判理论本身的局限,正如一学者所言:“这是一个从事实到规则,从部分人的需求到向普遍意志过渡之逻辑联系的断裂,一个关乎合法性来源的根本性断裂。关键是,只要仅仅从还原的角度去理解,断裂就是永恒的。”③ 这里说明的是历史动机与普遍规则的问题,当然,也同样适用于大众文化。如果沿着批判理论社会实证还原方法的分析,大众文化会被还原成普遍性是虚假的,而获利是真实的。但是,大众文化的普遍性、中性化含义不能因为大众文化隐藏着资本集团的利益动机而被否定,否则,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流行性和中性化含义荡然无存。这样看来,大众文化的历史动机和大众文化的普遍流行和中性化含义如果用社会实证还原方法分析就存在一种断裂。这种断裂本身就混淆了大众文化资本获利动机与普遍流行事实的理解。因此,从这种混淆中产生的抵抗诗学的锋芒就固然不知所向。所以其锋芒的来源与指向是否可行并站得住脚是值得怀疑的。

再看抵抗锋芒的错位。抵抗诗学的来源之处也是大众文化的历史动机与普遍流行含义的断裂之处,这种断裂表明大众文化缺少一个正面打量的规范性思想。用批判理论的尺度打量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必然被定义为具有资本增值动机的文化商品,这抹杀了大众文化的中性化含义。在哈贝马斯看来,用批判理论的方法打量大众文化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思想领域的错位。按照哈贝马斯在分析现代约法的规范性问题时的话说:“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这种来回折腾,使得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目前处于彼此几乎无话可说的境地。”④ 哈贝马斯虽然没用这种理论详细地论述大众文化,但他认为文化研究中的微观政治学是这种理论的变种。因此,哈贝马斯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此。我们把哈贝马斯的观点引入到大众文化分析中会发现,大众文化资本的生产逻辑只能还原大众文化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大众文化逻辑起点的资本获利性无法否定大众文化结果的普遍流行性。

①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②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

③ 吴兴明:《美学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批判?——从哈贝马斯的省思看批判理论价值论设的失落》,《文艺研究》2006年12期。

④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8页。

因为，这种实证分析忽略了大众文化的规范性理论，这种规范不是在还原的意义上，而是在大众文化生产者主体和消费者主体的关系之间。所以，判断大众文化的普遍性不能因为资本获利动机揭示而遭到否定。大众文化的自我确证应该是来源于非强制性基础上的平等协商，是经过种种复杂程序（市场检验、传播接受等）的协商，是大众基于交往行为之后普遍的认同。因此大众文化在哈贝马斯的这层意义上是社会共同体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实现利益动机的文化。费斯克以金融经济路径为起点分析大众文化，只能说明大众文化是如何生成的，但是生成机制不能代替大众文化生成后的普遍流行特点和中性化含义，更不能衡量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和大众文化的自我确认。所以，用社会还原方法代替正面的协商是对大众文化理解的错位。

如果沿着这种错位去理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流行性等特征就被大众文化背后资本的逐利性、操控性等特征所代替。事实上，这种社会实证还原方法不仅否定了大众文化的普遍性，如果延伸到社会领域，还否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的合理性，即把大众文化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则变成部分资本集团、大众文化生产者操控的权力机制。由此，市场经济普遍规则的合法性被否定。费斯克还把这种理解进一步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如费斯克所述："节假日的官方意义是'身心调剂'并能够支持工作伦理。"[①] 他把大众文化理解成为资本对休闲层面的控制是隐性化的控制，完全忽视了市场调节的复杂性。所以，带着社会实证还原方法的视角分析大众文化必然造成理解的偏差。文化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费斯克虽然承认大众文本的多义性、复杂性，但是基本上是在微观层面，而忽视了大众文化本身是多样的、是面向所有人的。为了满足广泛的、不同的市场需求，大众文化往往呈现出的特征是时而高雅，时而世俗，时而审美，甚至时而色情等。尤其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娱乐的性质甚至压倒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点。所以，费斯克把抵抗诗学功能作为大众文化的价值属性在论述路径上是值得怀疑的。

三、快感与意义抵抗的失落

费斯克带着批判理论的社会实证还原方法进入大众文化研究，让我们认识到了大众文化的利益机制。但是，这不足以构成抵抗的因素，只能显示为大众文化的逻辑生成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费斯克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诊断并无差异。费斯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完成这一步之后与批判理论分道扬镳，把被动的大众论述为积极主动的大众，并从大众的意义与快感两个维度展开了分析。于是，快感与意义构成了抵抗诗学的重要维度，并成为批判资本逻辑的理论依据。问题是，这两个维度能否承担起抵抗诗学的功能。事实上，快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被收编的快感，并且快感本身的抵抗就值得怀疑；而符号层面上的抵抗在现实的财富分配机制面前，也如同梦境一样虚幻。

先看快感抵抗的失落。当快感使大众逃离日常生活规则控制的时候，快感构成一种对现实凌厉的否定关系。这种快感虽然不同于审美状态中人性自由展开的状态，但是在费斯克看来至少是超脱

① [美]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社会控制与自我控制的自由状态。费斯克的锋芒之处在于,他将快感所超脱的社会控制的自由状态作为最高标准用于分析和评判现实。在快感作为一种绝对价值的照耀之下,多数的社会规则就会显示为片面的不合理,快感就形成了对社会规则的批判。因为快感的产生又与日常生活的相关点有关,所以通过这些相关点,快感的否定力量对日常生活更具有直接的穿透性。这成为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抵抗诗学价值论述的维度之一。但是,用快感原则打量大众文化的抵抗性未免有太多的失落。首先,快感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原则。在逻辑层面,快感的形式虽然多样,但快感状态是一种总体状态。快感的总体状态和审美的总体价值具有类似性,吴兴明在论述审美价值时所言:"审美价值是一种总体价值。总体价值是无法分层的。……任何一种分层都意味着对所谓'总体性'的分割和否定……总体价值不可演绎为规范领域之有效论证的逻辑系统,不能形成规范性系统的逻辑展开。"① 同样,快感作为一种总体状态也不可能演绎为社会市场领域的原则、规范。因此我们不能把快感状态当成新规则来否定现代社会开启以来形成的、已获得广泛认同的社会规则。即便快感状态被强制地纳入到社会规则中,人的体验必然会在快感与规则的切换之间遭遇诸多断裂,如同人在游戏与现实之间的切换一样,游戏规则难以变成现实规则。这就注定了逻辑上的无效。所以用快感的自由状态置换市场原则乃至社会规则是行不通的。其次,快感不是独立的。快感来源于大众对大众文化消费过程中与日常生活相关点的契合。这里有四个影响因素,大众、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相关点。每一个因素都不是固定的,这就决定了快感产生的偶然性,即快感的来源不稳定。这就决定了大众不可能从快感中获得可靠的抵抗力量。快感只是日常生活的瞬间,很快会烟消云散。人不可能一直脱离现实而活在这种瞬间里。一旦我们带着从大众文化中获得的快感进入现实,快感会被强大的现实击得粉碎。最后,快感总是在宰制结构内部形成,因此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社会权力结构的控制。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快感被收编,具有抵抗的快感变成被收编的、安全的快感。

再看符号意义抵抗的虚幻性。在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中,符号学分析描述担负了他对抵抗诗学另一层面的论述。甚至他认为符号抵抗已经超越了经济支配,正如其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支配者的基本权利是经济权力,但这种经济权力被符号权力——即生产意义的权力——所支撑和超越。" ② 符号学意义上的选取是费斯克抵抗诗学理论逻辑的另一维度。因此,我们只需沿着符号学的理论把握抵抗诗学即可。事实上,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把握大众文化的方法在某些层面是有缺陷的。"符号学方法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作为方法论视野如果成为一种仅有的视野,便会转化为对整个消费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巨大感性现实的符号化抽空。" ③ 如果仅在这种视野的打量之下,那么大众文化的符号价值得到单维度的关注,而非符号性因素的经济生产、市场原则等因素则被遮蔽、被排除或者被抽空了,并且被抽空的往往是真实的社会存在。用抽空现实存在的符号意义来抵抗现实强大宰制性的力量,这种抵抗方式本身就把自己悬置在空中,成为现实之外的他者。这在逻辑的起点上,就把非

① 吴兴明:《美学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批判?——从哈贝马斯的省思看批判理论价值论设的失落》,《文艺研究》2006年12期。

② [美]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③ 吴兴明:《反思波德里亚:我们如何理解消费社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符号化的现实排除在外了。正如波德里亚所说："在通向一个不再以真实和真理为经纬的空间时，所有的指涉物都被清除了"[①]，而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指涉性。大众文化的生产形式有着广泛的社会存在基础，其生产是以市场经济原则来组织的。大众文化的意义不是抽象的，更不是脱离现实的，恰恰相反，最流行的大众文化恰好是与社会现实联系最紧密的。因此，抽空现实感的符号意义不能改写大众文化的物质性。在这种意义上，大众文化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在社会现实面前显得微弱无力。把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某一方面特点作为抵抗诗学的论证，不足以具有全面的说服力。即便退一万步，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功能有不可否认的地方，但是当带着这种微弱的功能进入强大的社会生产机制的时候，符号意义上的抵抗最终结局往往是被收编、纳入到经济生产的环节当中，如牛仔裤的厂商深知牛仔裤符号意义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并利用此道谋取更大的商业利润。于是，符号意义的抵抗与现实存在的二元关系被打破，正如费斯克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广告业总是力图控制商品的文化意义，其方式是让商品的文化意义尽可能紧密地配合金融经济的运转"[②]。商品的符号差异最终会变成广泛的购买动员。符号意义的抵抗不断地被现实存在的市场原则击碎、打破、征服，并被资本吸纳进来重新编码。在这种意义上，符号意义的抵抗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微弱无力。

不论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理论抵抗诗学的分析多么复杂、详细，其核心都摆脱不了快感与符号意义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被用于衡量大众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抵抗需要现实层面的生产关系与政治关系的支撑。费斯克的抵抗诗学在现实财富面前影响不了重新分配，大众文化带来的快感和符号意义根本不可能代替财富所有权带来的物感意义。这种微观层面的抵抗就像玩家在游戏中试图改变游戏进程一样，但终究在游戏里，而不可能从外部改变游戏的设计规则；又或像沉睡者的梦一样，梦中有或愉悦、或恐惧、或兴奋、或惊险、或刺激的各种状态，当醒来之后，一切又回到了现实，甚至都不存在记忆里。费斯克把抵抗诗学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价值论设，快感与符号意义顶多是抵抗与霸权对垒中调节氛围的一首小乐曲，而绝对不是具有强大力量的正规军。因此，我们在对待大众文化抵抗诗学的时候要持一种审慎的态度。

国内大众文化研究由于缺少有关大众文化的原创理论，往往过于倚重西方的理论资源，不断把批判理论、现代性理论、新左派理论等植入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不断变化的大众文化研究中。这一移植过程往往产生许多的错位与偏差。就费斯克而言，费斯克在具体的论证路径上与阿多诺等人是一脉相承性的，只是一个否定了大众，一个肯定了大众。在市场面前，资本为了最大限度的自我增值，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商品必然迎合众多市场主体的需求，因此对大众的主体性给以肯定是有价值的。只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抵抗诗学的论述停留在消费环节，并且又局限在快感和符号意义层面，而忽略了大众主体性对其他环节和其他层面的影响。因此费斯克的视野未免狭窄，也显出费斯克的盲目乐观。但是，费斯克的论证路径从大众主体性上展开是非常有意思的尝试。只是，仅仅从快感和符号意义上的展开路径失去了从更广泛的层面洞察大众主体对市场影响的机会。大众文化在很大程

① [法] 让·波德里亚：《仿真与拟象》，马海良译，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0页。

② [美]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度上是市场主体经过复杂程序和规则“共同协商”的产物,是一种彼此的认同。因此在对待大众文化理论所具有的抵抗诗学价值论设时,我们既没有必要像阿多诺那样悲观,也不要像费斯克那样盲目乐观,我们需要持一种审慎的、反思的、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大众文化理论之抵抗诗学价值论设。

责任编辑:董德英

Rethinking Fiske: How to Understand the Poetics of Resistance against Popular Culture

Li Guiq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oochow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Poetics of resist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iske's value of popular culture. He believ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r culture text consumption, the public creates new meaning and pleasur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relevant points of daily life, and the newly-generated meaning and pleasure enable the public to form various kinds of initiatives such as alienation, resistance and offensive against the dominant power at the micro level and the symbol level. In fact, this theoretical assumption is questionable. Sorting out the specific level of the poetics of resistance of Fiske's popular culture theory, clarifying the break between ideological criticism and universal value in his argumentation path, and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istance of pleasure and symbolic meaning are effective ways to reveal the loss of the poetics of resistance as axiology.

Key words: John Fiske; *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 Culture; Reading the Popular*; poetics of resistance; value

耿传明，1963 年生，山东菏泽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天津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写作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学术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摘编，出版《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来自别一世界的启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与乌托邦心态》等专著九部。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中国乌托邦小说研究”（07BZW052）、“时空意识的嬗变与 20 世纪中国小说形态的演进”（14BZW116）、“近现代以来儒家士人形象嬗变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21BZW033）三项，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次天津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等等。

徐赣丽，1967 年出生于江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20 年入选江西省“双千人才”计划。从事民俗学专业教学科研工作近 30 年，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民俗学、文化遗产、手工艺、民俗旅游等，在国内外 20 多种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80 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编。代表性学术著作有：《迈向现代民俗学——都市文化研究的新路径》（2020）、《民族文化的空间传承——基于对侗寨的调查》（2020）、《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来自田野的民俗学研究》（2014）、《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桂北壮瑶三村考察》（2006）等。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子课题一项，获第 15 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学术奖项。

来稿须知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山东省教育厅主管、青岛大学主办、公开发行的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我们一贯秉承学术办刊宗旨,立足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关注学科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注重学术创新。本刊辟有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工商管理、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等栏目。欢迎海内外学人惠赐佳作。

一、本刊面向国内外学者公开征稿,来稿应主题鲜明、内容详实、观点明确、资料翔实、论证充分、逻辑清晰、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创新,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字数 10000 字以上为宜。具体格式及参考文献注释规范见《东方论坛》官网(http://dflt.qdu.edu.cn)。

二、为便于匿名审稿,来稿请在正文中隐去作者姓名、单位等有关信息。投稿时请注明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作者简介包括:姓名、籍贯、所在单位、职称、学历、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邮箱。同时附上中英文题目、中英文摘要(含关键词)。基金项目请注明项目级别、项目名称和编号。以上内容请单独放在一页,置于正文前面。

三、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通联费等任何名目的费用,一旦采用作者稿件,会支付相应的稿酬。

四、著作权使用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五、本刊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同行专家审稿制度。

六、本刊审稿周期为 60 天,若作者投稿 60 天后未收到本刊编辑部的任何通知,可自行处理稿件。

七、作者文章一旦被录用发表,作者须拥有所投稿件的版权,并将其转让给本刊,版权包括本刊纸质出版、发行的权利,网络出版和文摘、转载和汇编的权利。

八、投稿方式:

本刊采用电子邮箱和网络在线投稿两种方式接受来稿。

1. 邮箱投稿

各责任编辑投稿邮箱为:

孙继国(理论经济、应用经济) qddxsjg@qdu.edu.cn

冯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艺术学) dfltfengjiping@qdu.edu.cn

侯德彤(历史、法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社会学) dflt-houdetong@qdu.edu.cn

潘文竹(哲学、古代文学、文献学、体育学) panwenzhu-dflt@qdu.edu.cn

董德英(工商管理、旅游管理、文化研究、民俗研究) dfltwenhuaguanli@qdu.edu.cn

2. 网络在线投稿

进入青岛大学官方主页,点击主页下面东方论坛,进入东方论坛官网; 点击投稿指南,进入投稿指南页面; 点击左侧在线投稿,按照要求完成投稿 (http://dflt.qdu.edu.cn/tougao_dpzw.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017)。

编辑部电话: 0532—85953730

联系邮箱: dflt@qdu.edu.cn

《东方论坛》编辑部